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地理学史



中国地理学史

概述清代地理学的发展

17世纪中叶，清兵入关，中国建立了新的封建帝国——清王朝。它先后经历了10朝267年（1644~1911）。在清政府统治这一时期，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与社会、政治的变动相关，在清代，文化界、地理学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古代传统文化发展，以及中西文化相融的局面。

一、传统地理学的发展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继承古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研究也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无论是地志著作的编纂，还是沿革考证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有清一代，先后由个人或官方组织，完成了多部全国性地理志著作。主要有《明史·地理志》；顾炎武（1613~1682）《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肇域志》；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120卷）；陈芳绩（？~1670左右）《历代地理沿革表》（47卷）；徐乾学（1631~1694）《舆地备考》、《舆地志余》、《舆地记要》；杨丕复（1780?~?）《历代舆地沿革表》（40卷）；段长基（1780?~?）《历代疆域表》（3卷）、《历代沿革表》（3卷）；李兆洛（1769~1841）《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20卷）、《清地理韵编》（2卷），以及官修《大清一统志》等。其中尤以《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记》、《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地理沿革表》、《大清一统志》等最为重要。

在地方志方面，清王朝非常重视方志的修纂工作。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为配合《一统志》的编修，康熙帝就曾命各省督抚聘集宿儒名贤，接古续今，纂修各省通志。同时将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河南省巡抚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颁著天下为式，促进了一大批地方志著作的出现。清中叶，政府仍重视地方志的纂修，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谕就曾针对修志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次年（公元1729年）还颁布了规定各州县志每六十年一修之例。当时除了官方组织系统修志外，也有许多学者积极参予私家修志工作。因此，不仅出现了数千种志书，而且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地方志著作。

据陈正祥教授估计，目前世界上有中国地方志著作约11000种。而见于《中国地方志综录》的至少有8000多种。据我们统计，其中清代约有5298种。优秀的有：乾隆《历城县志》、《诸城县志》、《太仓州志》、《宁波府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松江府志》、《西宁府志》、《朝邑县志》；嘉庆《广西通志》、《湖北通志》、《浙江通志》、《安徽通志》、《扬州府志》、《长安县志》、《咸宁县志》；道光《湖广通志》、《雷州府志》、《泾源县志》；雍正时的《畿辅通志》、《贵州通志》，以及缪荃荪（1844~1919）的《顺天府志》等。

特别是这一时期结合方志的编修，许多学者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并逐

《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五。

《吉安府志》定祥序：“志例每六十年而一修”。

渐建立起一套方志学理论体系。当时著名学者如钱大昕（1728～1777）、孙星衍（1753～1818）、洪亮吉（1746～1808）、戴震（1723～1777）、章学诚（1738～1801）等，都发表过有关方志学的理论见解，参加过具体的方志编纂的实践活动，使这一时期的方志学不仅在编纂数量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还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方志组成部分的边疆域外地区的地志研究、著述，在清代有了突出的发展。

关于边疆域外的史地研究，在清代前期即已开始。在鸦片战争前已出现的有《柳边纪略》（杨宾著）、《宁古塔纪略》（吴振巨著），以及祁韵士的《西域释地》、《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西陲要略》，徐松（1781～1848）的《西域水道记》、《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新疆识略》以及《明史·外国传》等边疆域外地理著作。但当时的研究，主要限于对东北、蒙古、西北各地的风土见闻等记载，以及历史地理考证研究。

据陈正祥教授估计，目前世界上有中国地方志著作约 11000 种。而见于《中国地方志综录》的至少有 8000 多种。据我们统计，其中清代约有 5298 种。优秀的有：乾隆《历城县志》、《诸城县志》、《太仓州志》、《宁波府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松江府志》、《西宁府志》、《朝邑县志》；嘉庆《广西通志》、《湖北通志》、《浙江通志》、《安徽通志》、《扬州府志》、《长安县志》、《咸宁县志》；道光《湖广通志》、《雷州府志》、《泾源县志》；雍正时的《畿辅通志》、《贵州通志》，以及缪荃荪（1844～1919）的《顺天府志》等。

特别是这一时期结合方志的编修，许多学者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并逐渐建立起一套方志学理论体系。当时著名学者如钱大昕（1728～1777）、孙星衍（1753～1818）、洪亮吉（1746～1808）、戴震（1723～1777）、章学诚（1738～1801）等，都发表过有关方志学的理论见解，参加过具体的方志编纂的实践活动，使这一时期的方志学不仅在编纂数量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还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方志组成部分的边疆域外地区的地志研究、著述，在清代有了突出的发展。

关于边疆域外的史地研究，在清代前期即已开始。在鸦片战争前已出现的有《柳边纪略》（杨宾著）、《宁古塔纪略》（吴振巨著），以及祁韵士的《西域释地》、《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西陲要略》，徐松（1781～1848）的《西域水道记》、《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新疆识略》以及《明史·外国传》等边疆域外地理著作。但当时的研究，主要限于对东北、蒙古、西北各地的风土见闻等记载，以及历史地理考证研究。

自鸦片战争以后，关于边疆域外地理研究的情况大有改变，一方面研究人员增多，二是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方向，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据对清代有关地理著作文献的分析统计，仅研究西北地区边疆史地的著作，约有 200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三联书店，1983年版。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统计为 5518 种。第 342 页，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多人、300多种，其中80%的研究著作是在清道光以后至清末这段时间出现的。出现了黄沛翹、曹廷杰、何秋涛、魏源、徐继畲等著名边疆域外地地理研究者。著作有沈垚（1798~1840）的《新疆私议》、张穆（1805~1849）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1824~1862）的《朔方备乘》、龚自珍（1792~1841）的《乌梁海表》、《蒙古图志表》、《西域置行省议》、朱一新（1846~1899）的《东三省内外蒙古地图考证》、曹廷杰（1850~1926）的《东三省輿地图说》、黄沛翹的《西藏图考》、屠寄（1856~?）的《黑龙江輿地图及图说》，以及魏源（1794~1856）的《海国图志》、徐继畲（1795~1872）的《瀛环志略》、同康庐的《中外地輿图说集成》（光绪二十年，即公元1894年刊印）、萧应椿的《五洲述略》（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1902年刊印）、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宣统二年，即公元1910年刊印）等。

这一时期，清王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士大夫倍感痛心疾首，所以，许多人是抱着“以求抚驭之宜”“徐筹制夷之策”的目的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他们或旁搜博采，援古证今；或亲历边疆实际考察。因此，这一阶段除了一般的考证、见闻记述研究外，研究工作往往是与时政紧密相关。如黄沛翹在《西藏图考》中就说道：“今英吉利占据五印度，兼并廓尔喀、哲孟雄诸部，铁路已开至独吉岭，其言重在通商，而唐古特部众又复迭次阻挠，难保不发生变故，且边界汉番杂处，万一乘机窃发，处处堪虞，是则南界之防，尤今日之急务也。”曹廷杰在他所著《东北边防辑要》一书中，更是重点介绍山川险要以利防守，并在书中指出何秋涛之所以著《朔方备乘》，是与“俄人乘隙窥我东北”有直接关系。何秋涛自己也在该书的叙言中说，他写《朔方备乘》是为了“备国家缓急之用”的。

此外，在清代的传统地理学发展中，还出现了一些汇集历代地理著述的类编型著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方輿类汇编、《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以及清末王锡祺（1855~1913）的《小方壶斋輿地丛钞》。

中国历代重视河渠水利事业，因此，有不少专述河渠水利，以及河流状况的著作存世。清代较之过去各代更有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关于当时全国河流水系状况和历代水利资料汇集的著作。主要有：黄宗羲（1610~1695）《今水经》（1卷）；姜宸英（1628~1690）《江防总论》（1卷）、《海防总论》（1卷）；傅泽洪（1640?~?）等撰的《行水金鉴》（175卷）；黎世序等的《续行水金鉴》（156卷）；齐召南（1703~1768）《水道提纲》（28卷）；王太岳（1722~1785）《泾渠志》；赵一清（1722?~?）《直隶河渠志》（132卷）；戴震《直畿河渠书》（110卷）；程瑶田（1725~1814）《水地小记》（1卷）；李元（?~1816）《蜀水经》（16卷）；陈揆（1780~1825）《六朝水道疏》；徐松《西域水道记》（5卷）；陈沣（1810~1882）《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7卷）等。其中以《行水金鉴》、《水道提纲》、《西域水道记》等，尤为重要。

成书时间很早的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在长时间中，主要靠相互传抄、翻刻流传，因此，到清代时，各种古代地理著作的版本就比较多。它们相互之间都有缺漏、差异，甚至造成意思上的矛盾。加之中国上古、中古语言、文字变化较大，后人对古人著作的理解因时代不同，文字的解释上也各有差异；思想上的理解更是各有见解。这些都为后代阅读造成极大的困难。因此，由

乾隆时期兴起的“考据”学派，其最主要的工作，首先便是对古代著作进行文字、版本上的整理、校勘和意义（内容）上的注释，在地理学方面，用力最勤、成绩最显著者，主要是对《禹贡》、《水经注》，以及正史《地理志》的校勘、注释。

关于《禹贡》的校勘，主要有胡渭、徐文靖、程瑶田、丁晏等。清初胡渭（1633~1714）曾著有《禹贡锥指》20卷，地图47幅。搜集历代方志舆地著作史料，对《禹贡》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考释注解。还对所谓“禹河”（传为大禹治水后的黄河下游河道）在历史上的迁徙，以及汉、唐、宋、元、明代黄河河道进行了精密考证。此后，徐文靖（1667~1757）在胡渭研究的基础上，又旁引、参校其他版本著作，写成《禹贡会笺》12卷，总汇各种解释校注成果。程瑶田则著《禹贡三江考》，专门考释长江。丁晏（1794~1875）所著《禹贡锥指正误》，主要是对胡渭校注中的一些错误进行辨析、补正。

关于《山海经》的校勘，主要有毕沅（1730~1797）的《山海经新校正》（18卷），郝懿行（1757~1825）的《山海经笺疏》（18卷）。毕沅主要对《山海经》的篇目、文字、山川等进行了考证，尤其是在山川方面，加强了地理内容的考释。郝懿行较毕沅晚，他的著作除了文字等校释外，对山川方位等论证，多与毕沅相同。

关于正史《地理志》的校释，当时用功的人很多。主要有：钱坫（1744~1806）撰、徐松集释的《新斟注汉书地理志集释》（6卷）；汪远孙（1794~1836）的《汉书地理志补校》（2卷）；全祖望（1705~1755）的《汉书地理志稽疑》；毕沅的《晋书地理志新校正》（5卷）；洪颐煊（1765~1833）的《汉志水道疏证》（4卷）；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2卷）；吴卓信的《汉书地理志补注》（103卷）等。他们订补了《地理志》中的不少错讹之处。

关于《水经注》的校勘注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自问世以来，即被后人广为刊印、传抄、引用。到宋代，版本间已有了较大差异，所以金代开始，即有人进行《水经注》的版本、文字整理校订，但直到明代朱谋诤的《水经注笺》，都不十分精慎。到了清代，对《水经注》的校勘研究，一下成了一门用功最多的学问，几乎清代第一流的学者，十有八九都校注过《水经注》。其中清初有黄宗羲、顾炎武、顾祖禹、胡渭、黄仪、刘献廷；清中叶有齐召南、全祖望、戴震、赵一清、孙星衍、段玉裁；清晚期有陈沆、王先谦、杨守敬、熊会贞、丁谦等。其中校注《水经注》最有名的是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王先谦、杨守敬。而尤以清中期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的文字、版本整理为重要。全祖望著有《全氏七校水经注》，赵一清有《水经注释》，戴震有《水经注》。他们通过文字、版本的比较校勘，校理清楚了《水经注》在传抄过程中的《经文》、《注文》相互混杂、篇目混乱的现象，基本理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水经注》版本，为以后的《水经注》研究、使用，奠定了基础。

清代学者除了对几种主要地理著作的校勘外，还对其它相关地理著作进行了校勘、注释、整理，特别是进行了许多地理考证工作，如：张庚（1681~1756）的《通鉴纲目释地纠谬》（6卷）、《通鉴纲目释地补注》（6卷）；江永（1681~1722）的《春秋地理考实》（4卷）；檀萃（1740?~?）的《穆天子传注》（6卷）；王绍兰的《管子地员篇注》（4卷）；马宗樵（?~1802）的《战国策地理考》；陈懋令（1759~?）的《六朝地理考》；陈揆

的《六朝水道疏》；沈钦韩(1775~1831)的《释地理》(8卷)；管同(1780~1831)的《战国地理考》；郑瓚(?~1825?)的《春秋地理今释》(20卷)；徐松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考》(2卷)；程恩泽(1785~1837)的《国释地名考》(20卷)；王鏊(1786~1843)的《四书地理考》(14卷)；丁晏的《禹贡集释》(3卷)；洪孙(1804~1859)的《补梁疆域志》(4卷)；姚燮(1805~1864)的《胡氏禹贡锥指勘补》(12卷)；陈沚的《水经注提纲》(40卷)；杜文灿(?~1887)的《禹贡川泽考》(4卷)、《毛诗释地》(6卷)、《春秋列国疆域考》(1卷)、《群经舆地表》(1卷)；何秋涛的《蒙古游牧记补注》(4卷)；李文田(1834~1895)的《元史地名考》、《耶律楚材西游录注》；赵元益(1840~1902)的《战国策略地》(2卷)；缪荃孙的《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遗文》(3卷)等。特别是清末杨守敬、丁谦、王锡祺的工作最为重要。

杨守敬除有关历史地图工作外，在文字考证方面，以《水经注疏》40卷和《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最为重要。《水经注疏》博采《经》、《传》、《雅》、《记》，相互参证，校正疏理郦注疑滞，利用地志、图经反复校勘，更正郦注本身错误，同时对郦注所征引史实，皆注明出处。其用功之深，考证之详尽，获得学术界高度评价。如潘存题词说：“楚北杨君惺吾（守敬）所撰《水经注释》，神光所照。直与郦亭共语，足使谢山却步、赵戴变色。文起梅村，未堪比数，霾蕴岁久，焕若神明。旷世绝学，独有千古，大雅宏达，还我河汉”。《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是杨守敬历时30年，“五易其稿”，悉心研究的成果，该书旁征博引，广为诠释，不仅在《隋书·地理考》地名下注以今地，补叙其沿革及治所迁移，而且书其命名由来和重大历史事件，大大丰富扩充了《隋书·地理志》的内容。同时订正了书中记述，以及相关资料的许多错讹之处。杨守敬的工作弥补了《隋书·地理志》的不足，成为有关《隋书·地理志》研究的划时代之作，至今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地理志》，“采用《杨考》者亦较多。”

丁谦(1843~1919)是清末以考证著称的地理学家，他一生著述甚丰，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地理考证和古代史籍中的外国传考证两方面。其著述后由浙江省图书馆于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印行，分为两集，称为《浙江图书馆地学丛书》，或称《蓬莱轩舆地学丛书》，其第一集收入著作17种35卷，包括：《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汉书西南夷朝鲜传地理考证》等。第二集收入的著作为：《穆天子传地理考证》、《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1卷；《宋云西域求经记地理考证》12种33卷。丁谦的考证严谨、广泛、系统，他的著作被誉为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天下之奇作”，是清末传统地理学继续发展的又一典型标志。

作为地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图，在清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除了各种地图大量出现外，最突出的发展变化是：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和经纬绘图法在传统地图中的出现。

关于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在中国出现很早。晋裴秀(224~271)就曾绘

《水经注疏要删·潘存序》。

《隋书·地理志》注释。

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刊本目录。

《浙江图书馆地学丛书·序言》。

制过历史地理图集性质的《禹贡地域图》18篇。清代的历史地图集的编制，不仅在种类上众多，而且在质量、范围、系统性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

早在清初，胡渭《禹贡锥指》中就附有18幅历史地图。清道光时，李兆洛主持编绘的《历代舆地沿革图》，以《皇朝（清）舆地图》为底本，将上自禹贡、夏、商、周、春秋、战国，以至元明各代地名注于其上，制成22幅地图，以红色印制底图（清代）、墨色标记古代地名的传统“朱墨套印”法制版。同时，又将《皇舆表》、《一统志表》中的各地历史沿革注在图上，以便相互对照，成为清代一部重要的历史地图集。此后，杨守敬所绘制的《历代舆地图》（又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更是将清代，以及中国古代传统的历史沿革地理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关于西方经纬度制图法在中国传统地图中的出现，除了作为独立的西方制图法测绘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等存在于清代的大量地图中之外，重要的是，在清后期的许多中国人绘制的传统地图中，出现了不少运用西方制图法的痕迹。如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湖北出版的《大清一统舆图》（又称《皇朝中外一统舆图》，邹世诒、晏圭斋等编绘），就是将西方的经纬度和传统的计里画方法混合使用。清末，为编制《大清会典舆图》，在其所规定的制图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以传统画法为基础和对西方制图法的采用。如：既规定使用计里画方法，又要求省图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圆锥投影”法。而在已编成的许多省级地图集中，都体现了这种中西制图法混用现象。如《甘肃全省舆图》、《安徽舆地图》、《陕西省舆地图》等，不仅有经纬度，还有图例方面的科学化革新，尽管这些图上的经纬度、投影法等，都极为简单、不准确，但却是中国传统地图法向近代科学制图法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明中叶以后，西方基督教耶稣会为了向外发展势力，先后多次派遣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世界各地传教布道。明万历时即有不少传教士来华，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西方新知识，尤其是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haeus Ricci 或 Matteo Ricci，1583~1610年在华），以及后来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o Aleni，1610~1649年在华）、日尔曼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n Schall Von Bell，1622~1666年在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o de Ursis，1606~1620年在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1599~1618年在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97~1654年在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59~1688年在华）等，为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宣传了大量西方新知识，其中地理知识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宣传主要以一些世界地图、地理著作作为载体。

据统计，仅利玛窦在华制作的各种世界地图就有10多幅，其图名、绘

《水经注疏要删·潘存序》。

高僊：“明清两代全国和省区地图集编制概况”，《测绘学报》，1962年第4期。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五。

高僊：“明清两代全国和省区地图集编制概况”，《测绘学报》，1962年第4期。

图时间、刊刻等情况见表 1。地理著作方面有：龙华民的《地震解》；利玛窦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艾儒略的《坤舆图说》、《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坤舆全图》）、《坤舆外纪》等。

通过这些地图、著作的编制、流传，主要向中国社会介绍了地球的球形体、世界地理形势、风土人情、经纬度制图、投影法等西方地理、地图知识。自明末清初，这些地图、著作被反复刻印、抄录，并以它丰富的地理内容和科学方法，给当时中国的传统地理学以及地理认识以很大冲击，甚至出现了革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思想。特别在绘制地图方法等方面，西方经纬度测量、投影法等，更是给中国传统“计里画方”制图学以根本否定，致使清初聘用西方传教士，采用西法，进行了全国范围的经纬度大测量和全国新地图的编制活动。

清初康熙帝对地图测绘非常重视。康熙二十五年(公元 1686 年)他给《大清一统志》总裁勒德洪的上谕中曾说道：“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此后，他通过对用西方经纬度法测制的京师附近地图（康熙四十六年，即公元 1707 年）的亲自校勘，看到新法测绘的地图确比旧图要精确。因此，在进行了必要准备工作后，遂下令采用西法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工作。

表 1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

图名	绘图时间	刊刻者	绘图地点	备注
山海舆地全图	1584	王泮刻版	肇庆	
(世界图志?)	1559		南昌	绘赠王多
山海舆地图	1595 ~ 1598	赵可怀刻石	苏州	翻王泮本
世界图记?	1596		南昌	王佐编制
世界地图?	1596		南昌	绘得一、二本
山海舆地全图	1600	吴中明刻版	南京	增订王泮本
舆地全图	1601	冯应京刻版	北京?	二小圈图等
坤舆万国全图	1602	李之藻刻版	北京	增订吴中明本
坤舆万国全图	1602	刻工某刻版	北京	复刻李之藻本
山海舆地全图	1604	郭子章刻版	贵州	缩刻吴中明本
世界地图?	1606	李应试刻版	北京	增订李之藻本
(坤舆万国全图)	1608		北京	诸太监摹绘李之藻本多份

自康熙四十七年（公元 1708 年）到康熙五十六年（公元 1717 年），康熙帝聘请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 ~ 1730）、雷孝思（Jean - BaptisteRegis1663 ~ 1738）、杜德美（PetrusJear toux1668 ~ 1720）等人，率领中国测绘人员进行全国大地测量工作。先后测绘了全国 641 个点（未含西藏）的经纬度。在此基础上，采用西方地图投影法编制了中国第一幅实测

全国地图——《皇輿全览图》。到清乾隆时，清廷平定了新疆等地后，曾两次（乾隆二十一年、二十四年）派人前往新疆测绘了哈密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 90 个经纬点，又调整了内地省份的个别经纬点。然后以《皇輿全览图》为基础，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 1762 年）补绘成一幅《乾隆内府輿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图》）。图幅涉及范围比《皇輿全览图》扩大 1 倍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地图，也成为 20 世纪初以前中国各种先进地图的蓝本。

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扩张，许多西方地理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同时，一些地理考察家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也以各种目的来到中国进行地理考察，将中国作为亚洲大陆腹地探险的组成部分，这也扩大了国外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影响。此外，中国学者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为了了解世界，也积极编写了一批世界地理著作，加速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据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备》统计，自咸丰三年（公元 1853 年）到宣统三年（公元 1911 年）近 60 年间，共有 468 种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属于地质地理学的就有 58 部，包括林则徐主持翻译的《俄罗斯总记》、英国衣丁保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英国慕维廉的《地理全志》、英国艾约瑟的《冰洋事迹述略》、英国莱伊尔的《地学浅释》、吴宗廉等译的《澳大利亚新志》、日本野口保兴的《中华大地志》、樋田保熙《世界地理志》、辻武雄《五大洲志》等。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地理、地质学家深入中国内地，进行地理、地质和资源考察，足迹几遍中国内地，尤其是边疆各地。其中著名的有美国地质学家庞培烈（R.Pumpelly），他 1862 年来华，曾考察了华北和长江上游一带地区。1904 年他再次来华，与美地理学家戴维斯（W.H.Davis）和亨丁顿（E.Huntington）考察了天山和塔里木盆地。1903 年，美国地理学家威里士（B.Willis）曾率队来华，先后在山东、山西、陕西、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考察，归国后著有《中国的研究》一书。俄国地理学家普日瓦爾斯基（H.M.

）在 1870~1884 年期间，先后 4 次来华考察，足迹遍及内蒙古、新疆、青海、藏北等广大西部地区，著有《蒙古和唐古特地区：在东部亚洲高原的三年旅行》、《从伊宁经天山到罗布泊》等著作。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 . . . ）1892~1926 年期间，对西北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到过青海湖及河源地区，著有《蒙古与喀木：1899~1901 年科兹洛夫的探险报告》等著作。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曾在 1860、1868 年来华，考察了中国东部各省，以及西北内陆地区，著有《中国》一书，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考察成果。此外，法国人戴普拉（J.A.Deprat）等对中国西南地区、英国人麦克唐纳（D.MacDonald）等对西藏地区、日本人对中国各地、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Hedin）对中国西部地区，都进行过重要的地理考察和探险活动。他们的考察，都采用西方近代地理学的思想和方法，对地理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和记述，并著有多种研究报告。他们的科学成果，一方面向国外社会介绍了中国的地理状况，同时，往往又成为中国近代地理研究的基础，扩大和促进了西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深入。如他们关于北方地文期，关于黄土成因和气候变迁，以及罗布泊地理等问题的探讨，都成为后来中国地理研究的热点，促进中国学者对科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视，加速了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

三、近代地理学的萌芽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列强侵略，在中国先后出现了“洋务派”、“维新派”，先后提出了要放眼世界，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开办新式学校，改良旧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学习“西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地理学作为了解世界的首要对象和手段，在清末得到了迅速发展，首先是翻译、编著了许多外国近代地理著作，介绍外国的地理环境、地理方法。其次，随着19世纪末新式学校的陆续开办，学校地理教育也受到重视。特别1909年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的成立，标志着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兴起。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康有为倡导维新，1898年6月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京师大学堂即“新政”措施之一，于是年开办，规定设置舆地课程。这是中国政府正式规定在高等学校设置地理课程之始。1897年上海开办的南洋公学，于1899~1903年聘用张相文在该校教授地理，这是中国在中小学设置正规地理课程之始。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高等学堂政科课程包括中外舆地课，由中外教授教习，学制3年。其中第一年学习欧美非洲各境及群岛各境；第二年学习地质学大纲；第三年学习地文学大概。规定商务科学习商业地理学。此外规定中小学也应设置地理课程。这是中国官方颁布的第一个学堂章程。1904年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等拟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分为8门专业学科，其中经学、文学、格致、农、商5科都设地理课程，在文学科下又设有中外地理专业，规定学制3年。其课程有：地理学研究法、中外地理、政治地理、商业地理、交涉地理、历史地理等。地理学研究法主要讲习中国与外国、气候与地理、财政与地理、海陆交通与地理、历史与地理、动植物与地理、文化与地理、军事与地理、风俗与地理、工业与地理的关系。开设的自然地理课程有：地质学、地图学、气象学等。《奏定学堂章程》还规定在进士馆、译学馆、师范馆开设有关地理课程（见表2）。

表2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科地理课程

课程 科别	主 课	辅助课
文 科	地理学研究法、中国今地理、外国今地理、政治地理、商业地理、交涉地理、历史地理	地质学、地文学、地图学、气象学
进士馆	地理总论、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界务地理、商业地理	
译学馆	中国地理、亚洲各国及大洋洲地理、欧洲各国地理、非洲及美洲地理、地文学	
师范馆	亚细亚洲、大洋洲、欧罗巴洲、阿非利加洲、亚米利加洲	

1906 年清政府又制定了《优级师范选科章程》，规定优级师范以培养中小学教师（“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为对象，分本科与预科两科，其中本科学制 2 年。规定开设地理总论、中国地理、各洲分论、地质、地文和人文地理等课程。预科一年毕业，规定每周要学习世界地理大要 3 课时。

以上规定，本世纪初陆续在有关学校贯彻执行。如京师大学堂自 1902 年起正式招收学生（师范馆 79 名，仕学馆 57 名），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的 9 年间，共有毕业生 306 名、未毕业生约 230 名，都受过正规的地理教育。其各年级设置的地理课程情况如表 3。其它如上海南洋公学等都开设了相应的地理课程。

表 3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仕学馆地理课程

	师范馆	仕学馆
第一年	全球大事、本国各境、地图（2）	全球大事、本国地理（3）
第二年	外国各境、地图（2）	外国地理（3）
第三年	地文地质学（2）	地文地质学（3）
第四年	教地理之次序方法（2）	

注：括号内数字为周学时数

由此表明，从本世纪初以来，近代地理学被作为一门学问开始正式列入中国各级学校的教育内容之一，并得到一定的实施。

近代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中，为近代地理学体系在中国的确立做出重要贡献的先驱人物，首推张相文。

张相文（1866~1933）字蔚西，清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公元 1866 年 5 月 29 日）生于江苏省桃园县（今泗阳）县东门外南园。他自幼好学，博览史传，识见卓越。后师事胡和梅、王先谦、王懋琨等，学问大进，名噪江淮。甲午战争后，他萌发了研究地理学的决心，积极学习外国地理等知识。1899 年起，在上海南洋公学教授地理课程，并参照日本等国外地理教科书资料，亲自编写地理教材，于 1901 年出版了《初等地理教科书》（2 册，南洋公学出版）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4 册，上海兰陵出版社），这是中国自编地理教科书的嚆矢，而且影响很大，总发行量在 200 万部以上。1908 年，张相文还编著出版了《地文学》一书（上海文明书局）。这是中国第一本普通自然地理著作。全书分星界、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 5 编。直至今日，普通自然地理教材的基本内容仍不出这一框架，特别是在此之前，国内外的自然地理著作内容仅限于无机自然界，而张相文却新增生物界一章，把无机自然与有机自然联系起来，这在世界地学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在这本书里，他“参酌东西各大家学说”，吸收国外先进的地理学理论，对自然地理许多方面的现象与事实，进行科学的因果分析，试图阐明其形成原因与发展规律。并在《地文学》绪论中明确指出：“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普通自然地理学的独立，是新的近代地理学区别于旧地理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张相文《地文学》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此外，张相文还著有《地质教科书》等，在地质地貌方面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张相文不仅在齐鲁、冀北、内蒙、山西、热河等地作过许多地理考察，而且在

鞠继武：《中国地理学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

张相文：《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1908 年版。

河套地区进行过垦殖试验，努力使地理研究与改造社会相结合。他担任中国地学会会长长达 20 年之久，为创建中国的近代科学地理学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著述甚丰，反映地学研究成果的论文，大都收集在《南园丛稿》一书中。

光绪末年，面对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国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场所和瓜分的对象，“非惟边徼多事，内地亦几遭蹂躏”，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企图通过创办学会，研究地学，拯救中国。张相文也深感“博稽载籍，既言人人殊，耳目所接，足迹所经，检查测量，又苦其有限。”因此，他早“怀集思广益之心”，积极酝酿组织地学研究团体，促进地理研究的迅速发展。1909 年 9 月 28 日，他邀请白毓昆、张伯苓、陶懋立、韩怀礼等地质和地理学家、教育界官员及各校师生 100 多人，在天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该会于 1912 年迁往北京）。会上张相文被推选为会长，白毓昆为编辑部长，吴鼎昌为干事部长，任宪吉为总干事员。地学会成立后，将同好团结在一起，又陆续吸收了许多地理、地质方面的专家，使中国研究地学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30 年春，张相文年事已高，会长改由张溥泉担任。1937 年 11 月 10 日，中国地学会在北平团城举行会议，通过张星烺、黄国璋、王益崖、张印堂、毛子山、王献乌、王华隆、刘雪崖、黄玉善、白眉初、洪绂、王成祖、葛绥成、孙宥越、陈宗经为理事，张星烺为理事会主席。

保存在《地学杂志》第一年第一号中的“中国地学会启”，系统阐述了中国地学会的办会宗旨。全文如下：

中国地学会启

人生缘大地以为食息，聚国族以谋生存，而天演剧烈，势不能各守封疆，无相侵夺，则每每员舆，实与民族为消长，日辟百里，日蹙百里，固随其人自取，然溯其由来，亦惟地理上之知识优劣不齐，其影响遂被于国家，其祸端并延于种族，此亦物竞天择之公例矣。

近世以来，持帝国主义者类能浮海辟新地，以蕃殖其种族，而我国地大物博，坐资强敌，外交失败，边事日亟，虽欲划疆自守，聊固吾圉，而犹不可得，呜呼，惰农荒亩，邻犁侵耕，老渔醉眠，窃人割网，同处漏舟之中，共集危巢之下，时势所迫既如此矣，岂得以抱膝空山，行吟泽畔，如秦人视越人之肥脊，漫然无慨于其心耶。顾今日学校渐兴，言教育者，既以地理为重要学科，缀学之士亦竞竞焉，披舆图，考疆索，分经析纬，若网在纲，而以视西人之予海陆形要，实地探测，无不可以资生利用者，犹千百之能十一，岂非以幅员辽阔，调查犹有未周者乎。

夫环球交通，藩篱尽撤，海氛不靖，陆险亦夷，当此危急存亡之际，而欲举地理密切之关系，编辑成书，贡之当世，博稽载籍，既言人人殊，耳目所接，足迹所经，检查测量，又苦其有限，研究地学之难，固苦是哉。虽然乌获举鼎，十步而喘，弱夫百人负之而趋，良工造车，三月不成，漆斫不兼，旬日而就，天下事独立则难，分工则易，昭昭然矣。以故东西各国，考查地理，罔不有正式集会，领之以亲贵之官，辅以探险之队，诚重其事而分其任也。我国民何遽让此。今与海内诸君子约，仿彼之例，组成中国地学会，各怀集思广益之心，籍收增壤益流之效，则庶几山川、扼塞、河渠、水利、原

隰、土宜、疆域、险易、方物、息耗、交通便否，皆有以周知其故，而发抉搜剔，靡使内有利蕴，外有孽媒，则裨益于学术、政治者，岂浅鲜哉！

嗟乎，西力东渐，万里神皋乃为他族权利竞争之场，数年以来，非惟边徼多事，内地亦几遭蹂躏，而莫敢谁何。推原祸始，实由地学隔膜，有以增敌之骄，而短我之气，凡我同志，抚丘墓之墟，怵陆沉之祸，果有热诚提倡，谋所以交通而启牖之者乎。仆等不敏，窃愿馨香顶礼以迎之，谨具简章于后，惟海内宏达赐教正焉。（以下为《中国地学会简章》，略）。

中国地学会还开展了许多富有意义的学术活动。如邀请外国学者讲学、翻译外国地理著作、派员参加国际地学会议、开展学术考察、讨论。还出版会刊《地学杂志》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早期发展。

《地学杂志》是中国地学会联系同好、扩大影响的重要桥梁，也是报导地学发展状况、交流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它以刊登“地学上最新之发明”为主，“选择材料力求新颖”。较之传统的地理文献，它是一种全新学术刊物。1911年7月出版的《地学杂志》刊登了一则地学会的有奖征文启示，列出了有关地学的3类25个问题，涉及到自然地理、文化地理、医学地理、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历史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军事地理等众多领域。

由上述可见，20世纪初，无论从地理教育、地学组织，还是当时地理学所涉及的研究范围、课题，都标志着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萌发。

沈之洵：“续刊《地学杂志》叙”，《地学杂志》，1929年第1期。

“《刷新内容》广告”，《地学杂志》，1921年第12期。

上 篇

地理著述

第一章 地理总志编纂的成就

总志是以全国范围为记述对象的地理志。本章论述《明史·地理志》、《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城志》、《读史方輿纪要》、《嘉庆重修一统志》、《历代地理沿革表》和《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或者在学术成就方面超越了以往同类型的志书，或者在体例方面有所创新，它们不仅在地志编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迄今为止，仍是中国地理文献宝库中的珍品。这些著作情况颇不一致，今存《明史·地理志》、《读史方輿纪要》、《嘉庆重修一统志》内容完备，卷帙齐全；《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城志》已有缺损，并非足本。而《历代地理沿革表》和《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的体裁，属于表而不属于志，但因其所述内容皆为历代政区沿革，故亦暂且归入总志论述。这是首先应该说明的。

一、《明书》、《明史稿》和《明史》中的地理总志

清初编纂过 4 部明史，它们是傅维麟的《明书》、万斯同的《明史稿》、王鸿绪的《明史稿》和张廷玉的《明史》。万斯同的《明史稿》今已不传，姑且不论，其余 3 部皆有地理志。这 3 部地理志各有特点，大体愈后愈精，而以《明史·地理志》最佳。

（一）《明书·方域志》

作者傅维麟（？~1666）原名维楨，字掌雷，号歎斋，直隶正定府灵寿县（今河北灵寿县）人。明崇祯壬午（公元 1642 年）科举人，清顺治丙戌（公元 1646 年）进士。寻选入翰林，授编修，分修《明史》。他历任东昌兵备道、少廷尉、太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通政使、户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官至工部尚书。傅为官有德政，任东昌兵备道时，驻扎临清，临清地当水陆要冲，供应频繁，百姓不胜负担，他每“设法供应，不令民间输半菽，齐民感之”。顺治十一年（公元 1654 年），“山左大饥，（傅）施粥设赈，安集流亡，赖以活者数万人”。当时“屯田为民累”，傅作《屯田苦民书》，御史悉以入告，后“尽除之”。为官之余，他广泛收求明代遗书、家乘、文集、碑刻共 300 多种 9000 余卷，经过爬梳整理，考订异同，著成《明书》171 卷。

《明书·方域志》共 5 卷。首载总论，次述 2 京 13 布政使司，殿以边关 9 镇。

《碑传集》卷九《傅维麟传》。

《碑传集》卷九《傅维麟传》。

同上。

同上。

总论不长，共包含 4 层内容。一述明代疆域，“纵一万九百里，衡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过于宋，敌于唐，不及于汉”；二述明代编选地志图籍的梗概；三述纂修《明书·方域志》的依据，“惟以《大明会典》为正，而参互诸书、群著于谱”；四述明代政区，“约计南北直隶府二十二，州三十六，县二百一十三。承宣布政使司十有三，领府一百三十八，州一百四十六，县九百四十三，编里六万九千五百五十六”。

明代政区分为布政使司、府（州）、县 3 级。明初，13 布政使司分辖道，“道”是监察区，亦分领府（州）县。《明书·方域志》以明初 13 布政使司所辖各道为单位，叙述所属府的天文分野、历代沿革、民情风俗及所领县。各布政使司皆有一篇区域地理总论，阐述该区山川形胜、交通、出产、贡赋、土壤、户口和各道统领府（州）县的情况。记述府（州）、县 2 级地理内容时，详于府（州）而略于县。记述各府沿革、天文分野、山川形胜、历史事件和民情风俗的文字，多达数百言，而记述县仅举名称，罕有其它内容。

《明书·方域志》依据的资料，虽“以《大明会典》为正”，然以万历重修《明会典》校之，多不相同。现将 2 直隶 13 布政使司所领府（州）县统计数字，列表比较如下（表 4）：

表 4 《明书·方域志》、《明会典》所载府州县比较表

	2 直隶			13 布政使司					
	府	州	县	府	州	县	军民府	宣慰司	宣抚司
明书·方域志	22	36	213	138	146	943			
明会典（万历重修本）	22	36	222	123	209	943	13	8	4

《明书·方域志》所载各道以及所领府（州）县，与清龙文彬《明会要·方域》也不完全相同。现将《明书·方域志》的内容叙列于后，并与《明会要》比较如下：

浙江省分道五：杭严道领杭州府、严州府；嘉湖道领嘉兴府、湖州府；宁绍道领宁波府、绍兴府、台州府；金衢道领金华府、衢州府；温处道领温州府、处州府。（《明会要》卷七十三同）

江西省分道五：南昌道领南昌府、瑞州府；湖东道领广信府、抚州府、建昌府；湖西道领吉安府、临江府、袁州府；九江道领九江府、饶州府、南康府；岭北道领赣州府、南安府。（《明会要》卷七十三同）

湖广省分道七：武昌道领武昌府、汉阳府、黄州府；荆西道领承天府、德安府；上荆南道领荆州府、岳州府；下荆南道领襄阳府、郢阳府；湖北道领常德府、辰州府、靖州；上湖南道领衡州府、永州府、郴州；下湖南道领长沙府、宝庆府。另有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永顺军民指挥使司、保靖军民指挥使司。（《明会要》卷七十三“承天府”作“安陆府”；未叙列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永顺军民指挥使司、保靖军民指挥使司）

山东省分道三：济南道领济南府；海右道领青州府、登州府、莱州府；东兖道领兖州府、东昌府。（《明会要》卷七十三同）

福建省分道四：福宁道领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武平道领邵武府、延平府；建宁道领建宁府；漳南道领汀州府、漳州府、福宁州。（《明会要》卷七十三漳南道无福宁州，余同）

山西省分道四：冀宁道领太原府；河东道领平阳府；冀北道领大同府；

冀南道领潞安府、汾州府、辽州、沁州、泽州。（《明会要》卷七十三冀南道“汾州府”作“汾州”，余同）

河南省分道四：大梁道领开封府、归德府；河南道领河南府；汝南道领南阳府、汝宁府、汝州；河北道领彰德府、卫辉府、怀庆府。（《明会要》卷七十三河南道领河南府、汝州；汝南道领南阳府、汝宁府，余同）

陕西省分道六：关内道领西安府；关西道领凤翔府、平凉府；关南道领汉中府；河西道领庆阳府、延安府；陇右道领巩昌府、临洮府；西宁道领宁夏中卫、洮州卫、岷州卫、河州卫、靖虏卫及陕西行都司。（《明会要》卷七十三作分道五，无西宁道所领诸卫、宁夏中卫等五卫及陕西行都司，余同）

四川省分道四：川西道领成都府；川北道领保宁府、顺庆府、潼川州；川东道领重庆府、夔州府；川南道领叙州府、马湖府、嘉定州、镇雄军民府、遵义府、东川军民府、乌蒙军民府、乌撒军民府、龙安府、眉州、邛州、泸州、雅州。另有永宁宣抚司、西阳宣抚司、石柱宣抚司、黎州安抚司、梅邑洞长官司、平茶洞长官司、天金六番招讨使司、松潘指挥使司、建昌行都司、垒溪守御千户所。（《明会要》卷七十三作分道五，川西领成都府、龙安府及潼川州；川北道领保宁府、顺庆府；川南道领叙州、马湖2府和镇雄、东川2军民府及嘉庆、眉、泸、邛4州；另有上川南道辖雅州府及建昌行都司，无永宁宣抚司等10卫所，余同）

广东省分道五：岭南道领广州府、韶州府、南雄府；岭西道领肇庆府、高州府；岭东道领惠州府、潮州府；海北道领雷州府、廉州府；海南道领琼州府、罗定州。（《明会要》卷七十三海南道无罗定州）

广西省分道四：桂平道领桂林府、平乐府；左江道领南宁府、浔州府、太平府；苍梧道领梧州府；右江道领柳州府、庆远府、镇安府、思恩军民府。另“有州十一”，实载十：田州、归顺州、利州、奉议州、向武州、都康州、龙州、江州、思陵州、都祥州。另有上林长官司、安隆长官司、直隶布政使司。（《明会要》卷七十三右江道领柳州、庆远、思恩、思明、镇安5府，无田州等10州）

云南省分道四：安普道领云南府、曲靖军民府、寻甸军民府；临沧道领临安府、澄江府、广南府、广西府、元江军民府；洱海道领楚雄府、蒙化府、永宁府、顺宁府、景东府、姚安军民府、武定军民府；金沧道领大理府、永昌军民府、鹤庆军民府、丽江军民府、北胜州、新化州。另有者乐甸长官司、澜沧卫、孟定府、孟良府、威远州、湾甸州、镇康州、大侯州、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大古喇宣慰使司、底马撒宣慰使司、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州宣抚司等。（《明会要》卷七十三无临沧道；安普道内有新化州；洱海道内有镇沅州）

贵州省分道五：贵宁道领贵阳府、贵州宣慰司、金筑安抚司；思石道领思州府、思南府、石阡府、铜仁府；都清道领镇远府、黎平府、都匀府；新镇道领平越府、镇宁州；威清道领凯里安抚司、普安州、永宁州、安顺州。另外威清卫、平坝卫、安庄卫、普安卫、普定州、安南卫属于威清道；新添军民指挥使司、龙里军民指挥使司属于新镇道；都匀卫、毕节卫、清平卫、乌撒卫、兴隆卫、赤水卫属于都清道。（《明会要》卷七十三无新镇道；贵宁道无贵州宣慰司；亦无威清道所辖诸卫）

这些不同之处，可供研究明代行政区划和监察区划参考。

地名和地理内容的多少，是衡量旧志史料价值的标准之一。《明书·方域志》不载州县沿革，州县下不附其它资料，小地名略而不书，内容过于简略。因此，自《明史稿·地理志》和《明史·地理志》成书，遂被取代。

（二）《明史稿·地理志》

《明史稿》题王鸿绪纂，但《明史稿·地理志》却非王鸿绪所编。王鸿绪编纂《明史稿》时，利用了万斯同编纂的《明史稿》，但《明史稿·地理志》的编纂者也不是万斯同。

万斯同是清初著名史学家，历代学者评品万斯同和他编纂的《明史稿》，著述颇多。但却很少有人对他编纂的《明史稿》作过仔细分析，也无人论及他编纂纪、表、志、传各部分的详细情形。早在民国，万氏之书已“莫能见其真本”，该书原貌如何？有无地理志？遂成不解之谜。今人著录万斯同《明史稿》，皆云500卷。然《万季野先生墓志铭》有“辑成列传三百卷”之语；刘坊《万季野先生行状》亦有“散失明史列传三百卷”之说。二相印证，万斯同所著可能只有列传300卷，而纪、表、志部分的200卷并非万氏亲笔。魏源评论《明史稿》优劣时，曾指出：“尝闻杨椿之言曰：《明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功尤多。纪传长于表志，而万历以后各传又长于中叶以前。袁崇焕、左良玉、李自成传原稿皆二巨册，删述融汰，结构宏肃，远在宋元诸史上”。又云：“至于食货、兵政诸志，随文抄录，全不贯串，或一事有前无后，或一事有后无前，其疏略更非列传之比”。不难发现，他对万季野主笔的列传语多褒嘉，而对食货、兵政诸志批评较多。这些评论也可证明，《明史稿》列传和表志并非万斯同一人所作。

《明史稿》的编纂过程较为复杂。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朝廷诏设明史馆，简选大臣充任总裁官。时诸事草创，迁延未就。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史馆，又因编纂《世祖实录》而中辍。十八年始命徐元文为监修，正式开始编纂。后因卷帙繁浩与纂修时间太长，久久未能成书等原因，遂改用总裁“分工责成，各专一类，然后会校”的办法分工合作。当时，议定张玉书任志书，陈廷敬任本纪，王鸿绪任列传。三十六年清廷又令王鸿绪为总裁官，“董率分纂诸臣”，编修全书。据此，则《明史稿·地理志》最初应为张玉书所纂。

张玉书（1641~1711）字素存，江苏丹徒人。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进士。授庶吉士、编修。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迁国子监司案。次年，迁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八年转左庶子，充明史总裁官。此后，历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侍郎。二十六年擢刑部尚书。二十七年转兵部尚书。二十九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石园文集·张寿楣序》。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斯同先生传》。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四《书明史稿》。

同上。

《碑传集》卷九《傅维麟传》。

同上。

后又充任会试正考官；随康熙远征噶尔丹，予参帷幄；兼任过《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编辑政治典训、修纂国史和《一统志》的总裁官。素存为官20年，谨慎谦虚，饮食服御简朴，深得康熙信任。

《明史稿·地理志》记述明代疆域政区较《明书·方域志》详细。其记叙明代疆域，言明初和嘉靖以后两个不同时期的范围：“明初封畛，东起朝鲜，西接土蕃，南至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里。迄于嘉靖以后，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叙明代政区，则以明代盛时为准，计开：“直隶者二，曰京师，曰南京。为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其分统之府，凡百有四十，州百有九十三，县千一百三十八。又羁縻府十九，州四十中辍。十八年始命徐元文为监修，正式开始编纂。后因卷帙繁浩与纂修时间太长，久久未能成书等原因，遂改用总裁“分工责成，各专一类，然后会校”的办法分工合作。当时，议定张玉书任志书，陈廷敬任本纪，王鸿绪任列传。三十六年清廷又令王鸿绪为总裁官，“董率分纂诸臣”，编修全书。据此，则《明史稿·地理志》最初应为张玉书所纂。

张玉书（1641~1711）字素存，江苏丹徒人。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进士。授庶吉士、编修。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迁国子监司案。次年，迁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八年转左庶子，充明史总裁官。此后，历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侍郎。二十六年擢刑部尚书。二十七年转兵部尚书。二十九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后又充任会试正考官；随康熙远征噶尔丹，予参帷幄；兼任过《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编辑政治典训、修纂国史和《一统志》的总裁官。素存为官20年，谨慎谦虚，饮食服御简朴，深得康熙信任。

《明史稿·地理志》记述明代疆域政区较《明书·方域志》详细。其记叙明代疆域，言明初和嘉靖以后两个不同时期的范围：“明初封畛，东起朝鲜，西接土蕃，南至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里。迄于嘉靖以后，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叙明代政区，则以明代盛时为准，计开：“直隶者二，曰京师，曰南京。为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其分统之府，凡百有四十，州百有九十三，县千一百三十八。又羁縻府十九，州四十中辍。十八年始命徐元文为监修，正式开始编纂。后因卷帙繁浩与纂修时间太长，久久未能成书等原因，遂改用总裁“分工责成，各专一类，然后会校”的办法分工合作。当时，议定张玉书任志书，陈廷敬任本纪，王鸿绪任列传。三十六年清廷又令王鸿绪为总裁官，“董率分纂诸臣”，编修全书。据此，则《明史稿·地理志》最初应为张玉书所纂。

同上。

《碑传集》卷九《傅维麟传》。

同上。

同上。

《碑传集》卷九《傅维麟传》。

同上。

张玉书（1641～1711）字素存，江苏丹徒人。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进士。授庶吉士、编修。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迁国子监司案。次年，迁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八年转左庶子，充明史总裁官。此后，历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侍郎。二十六年擢刑部尚书。二十七年转兵部尚书。二十九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后又充任会试正考官；随康熙远征噶尔丹，予参帷幄；兼任过《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编辑政治典训、修纂国史和《一统志》的总裁官。素存为官20年，谨慎谦虚，饮食服御简朴，深得康熙信任。

《明史稿·地理志》记述明代疆域政区较《明书·方域志》详细。其记叙明代疆域，言明初和嘉靖以后两个不同时期的范围：“明初封畛，东起朝鲜，西接土蕃，南至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里。迄于嘉靖以后，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叙明代政区，则以明代盛时为准，计开：“直隶者二，曰京师，曰南京。为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其分统之府，凡百有四十，州百有九十三，县千一百三十八。又羁縻府十九，州四十七，县六。编里六万九千五百五十有六”。明代都司卫所有2种，置于未设州县之地，兼理民政，成为地方行政区划者，称为实土都司卫所；另一种置于各布政使司府州县境内，只理军政，不理民政，不占实土者，称为非实土都司卫所；前者与疆域政区关系密切。《明史稿·地理志》叙列“两京都督府分统各都指挥使司十六，行都司五，留守司二，其所属卫共四百九十三，所二千五百九十三，守御千户所三百一十五”，“土官宣慰司十一，宣抚司十，安抚司二十二，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六十九，蛮夷长官司五”。

《明史稿·地理志》与《明书·方域志》比较，颇多不同之处：第一，全志以2直隶13布政使司分篇，布政使司下不按监察区分道，迳以府为单位，记述一郡及州县地理。第二，各篇首有序论，记述各省历代沿革、四至八到、统辖府州、户口数字。尾有附论，记述形胜、风俗、攻战防守得失，内容偏重兵要地理，评品历代史事尤多。第三，以府为单位，记述历代沿革、所领州县、距二京布政使司距离，载有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和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2个户口数字。少数府（州）或有3个户口数字，或1个户口数字，或不载户口数字。叙列属县时，附郭县排在第一，注“倚”字，以示区别其它属县。第四，州县下记述别称、得名原因、沿革、山川险要、古迹、城址迁移等，内容较为丰富，颇便于读者了解州县情况。

（三）《明史·地理志》

《明史·地理志》是清代官修的正史地理志。从设馆开局编纂《明史》，到全书删定刊行，首尾经历94年，实际编纂时间长达56年。前后三易其稿，方才克成。就《明史·地理志》而言，经历了张玉书撰稿、王鸿绪编纂和张

同上。

《碑传集》卷九《傅维麟传》。

同上。

同上。

廷玉删定 3 个阶段。与修者还有徐元梦等人。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 1700 年）进士，历任庶吉士、庶子、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雍正元年（公元 1723 年）擢礼部尚书，入直南书房，加太子太保，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六年进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八年为军机处大臣，参与机密。廷玉强记慎密，世宗恩宠屡加。他历仕康、雍、乾三朝，位极人臣，死后配享太庙。终清之世，汉大臣惟其一人受此殊荣。他制定军机处规制，数任会试主考官，又先后充任《圣祖实录》副总裁；《世宗实录》总裁；三礼馆、会典馆、明史馆总裁。在清廷加强中央集权、肃清吏治和编纂文献方面颇有作为。他为官之余，喜好览阅史乘，注重讲求实学，对礼乐、刑政、田赋、兵戎、河渠、平准等时务皆有研究，今《明史·地理志》小序即其亲手所作。

从《明史稿·地理志》到《明史·地理志》不仅体制变化较大，而且内容删增较多。《明史·地理志》凡例今已不存，但如将二者对照研究，便可探知其端倪。今试录二志直隶保定府原文比较二书的异同（表 5）。

《明史稿·地理志》	《明史·地理志》
保定府周幽、并二州地。春秋时，燕、鲜虞二国境。战国时，燕、赵二国境。汉涿、钜鹿二郡、信都、中山二国地。唐莫州地。宋置保州。元升保定路。洪武初为府，州三，县十七。距都城三百五十里。弘治四年，编户五万六百三十九，口五十八万二千四百八十二。万历六年，户四万五千七百一十三，口五十二万五千八十三。	保定府元保定路，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九月为府。十月属河南分省。二年三月来属。领州三，县十七。东北距京师三百五十里。弘治四年编户五万六百三十九，口五十八万二千四百八十二。万历六年，户四万五千七百一十三，口五十二万五千八十三。
清苑倚。汉北新城、乐乡、樊舆三县地。隋，清苑。宋，保塞。金，复为清苑。北有徐河。西有清苑河。	清苑倚。北有徐河，一名大册水，自满城县北至安州，东入淀。又西有清苑河。又南有张登巡检司，嘉靖十三年自满城县方顺桥移置于此。

《明史稿·地理志》	《明史·地理志》
<p>满城后周，此平改为永乐。唐曰满城。五代周，废。金，复置。</p>	<p>满城府西，少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庆都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北有徐河。南有方顺河。</p>
<p>安肃隋，遂城县。宋，安肃。金，为安肃州治。元废县存州。洪武初，改为县。西南有废北新城。又，易水在北，徐水在南，西南又有鲍水。</p>	<p>安肃府北，少东。元安肃州。洪武二年七月降为县。易水在北。曹河在南。徐河在西。西南又有鲍河。又西有遂州，元属保定路。洪武初降为县。八年二月省。</p>
<p>定兴金析范阳县黄村地置。西有拒马河，亦曰白沟河。</p>	<p>定兴府北，少东。元属易州。洪武六年五月改属府。西有拒马河，即涑水也。又易水自西来，合焉，谓之白沟河。南有河阳巡检司，后移于清苑县界之固城镇。</p>
<p>新城 唐置。元曰新泰州，寻复故。洪武初，属雄州。六年改属。东有废新昌县。南有白沟河。</p>	<p>新城府东北。元属雄州。洪武初属北平府。六年五月改属府。南有白沟河。西南有巨河镇巡检司。</p>
<p>雄唐，归义。五代周，雄州。宋，改县曰归信，为雄州治。洪武初，省县入州。六年，改州为县。北有废易县。又有废易京城，公孙瓒所筑也。又，白沟河亦在县北。南有易水，亦曰瓦济河。又有雄河，瓦桥关亦在焉。</p>	<p>雄府东北。元雄州。洪武二年七月省州治归信县入焉。七年四月降为县。北有白沟河。南有瓦济河。</p>
<p>容城 汉置范阳、容城二县。北齐省容城入范阳。隋又改为迺县。唐复为容城。西有易水、濡水。</p>	<p>容城府东北。元属雄州。洪武七年四月省入州。十三年十一月复置，来属。旧治在拒马河南，景泰二年迁于河北。西有易水，又有濡水。</p>
<p>唐汉县。西北有中山废城。又有大茂山，即恒山异名也。又，唐河在县西，源出恒山，流经定州，曰滹水，下流合于南易水。又，西北有倒马关，古曰鸿上关。</p>	<p>唐府西，少南。西北有大茂山，即恒岳也，东麓有岳岭口巡检司。又唐河在西，源出恒山，流经定州曰滹水，下流合于南易水。又西北有倒马关，有巡检司，后移于县西之横河口。又有周家铺、军城镇二巡检司。</p>
<p>庆都汉，望都。金，庆都。</p>	<p>庆都府西南，南有唐河。北有祁水。</p>
<p>博野旧博野，元省入蠡州。此博野，元世祖时始置。洪武初，属祁州。六年改属。西北有博水。南有唐河，亦曰滹水。</p>	<p>博野府南。旧治在今蠡县界，直隶保定路。洪武元年迁今治，改属祁州。六年五月还属府。西北有博水。南有唐河，亦曰滹水。又有永安镇巡检司，有铁灯盏巡检司。</p>

《明史·地理志》	《明史·地理志》
蠡 汉，蠡吾。晋，蠡吾、博陆二县，博野。元，蠡州。洪武八年改为县。西有清凉废城，石赵置。	蠡 府南，少东。元蠡州，属真定路。洪武二年七月来属。八年正月降为县。杨村河在南，滋、沙、唐三河之下流也，谷亦谓之唐河。
定 汉，北平。金，永平，寻升为完州。洪武二年改为县。东南有秦曲逆故县。汉，汉北平废县在县东。又，废阳城亦在东南。西有伊祁山、马耳山。西北有白崖山。南有祁水、濡水，濡水亦曰曲逆水也。	完 府西。元完州。洪武二年七月降为县。西有伊祁山，祁水出焉，其下流为方顺河。
(祁州以下略)	

《明史》纂修官杨椿云：“椿在明史馆见徐公（元梦）所撰地理志建置沿革亦繁，请于总裁朱公（轼）曰：‘《志》为《明史》之志，宜纪明一代之事，宋、元前可不必’。朱公深以为然”。今《明史·地理志》各布政使司府（州）县已删去元末以前沿革和古迹，着重记叙有明一代建置沿革，以及当代各种地理情况，深合断代地理志的体裁，更使地理志具有明代特色。可见张廷玉、朱轼等采纳了杨椿的建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明史·地理志》又增补了许多明代内容。主要有：州县在本府的方位；藩王府驻地；府（州）县置废、改隶、迁移的详细情况；佐式官分防驻所和巡检司所在地；明代卫、所、关、寨、营、堡、寺、监、苑的详细资料。增删后的《明史·地理志》体例严谨，记述府（州）县沿革详略得当。较之《明史稿·地理志》质量有所提高。

《明史·地理志》在官修正史地理志中能够达到较高水准，有 3 点原因：第一，修志的资料较为完备。明廷曾多次下令编纂地理图志，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令儒士魏俊民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及降附始末，著《大明志》；六年令各地府（州）县绘山川险易图上报；十六年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关津、亭堠、仓库、水陆道路及山川图；十七年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图；二十七年编修以驿途道里为主要内容的《寰宇通衢书》；天顺五年（公元 1461 年）撰《大明一统志》；嘉靖初，吏部郎李默撰《皇明舆地图》，后罗洪先又编绘《广舆图》，以上所举仅其大要。据《明史·艺文志》统计，明代 13 省各有省志，大多数府州有府志或州志，不少行都司和卫所也有图志。此外，还有许多专志，如：曹学佺的《蜀中风土记》、张邦翼的《岭南文献志》、魏焕的《九边图考》、胡宗宪的《筹海图编》等等。清初，这些图籍绝大多数依然保存完好。为搜集资料编纂《明史》，清政府还下令各直省及府州县修志，供明史馆采集。明清王朝为编纂高质量的《明史·地理志》准备了丰富的素材。第二，责成学有专长的官员和学者负责：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皆担任过总纂，具有非常丰富的编纂经验。最初负责编纂工作的万斯同也有丰富的学识，他尝论朝廷设局分修史书之失，曰：“昔（司马）迁、（班）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期堂寝匱漏，继而知其畜产礼俗。

杨椿：《孟邻堂文钞》卷二。

《明书·方域志》。

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察习，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历届主持《明史》编纂的总裁都赞同和接受这一观点，所以分纂人员皆由熟悉情况的廷臣担任。例如，张玉书历任尚书，熟悉六部情况，利用六部资料十分方便，由他分纂《明史》诸志无疑十分合适。后来，改行总裁官“专任责成，独当一门，然后会校”的办法，也是为了克服分修志书容易流于杂乱的弊端。这也是《明史·地理志》能够达到较高水平的原因之一。第三，是几代人呕心沥血、群策群力的结果。梁启超指出：“康熙间，清廷方开明史馆，欲籍以网罗遗逸，诸师既抱所学，且籍以寄故国之思，虽多不受职，而皆间接参与其事，相与讨论体例，别择事实。故唐以后官修诸史，独《明史》称完善焉。”时至今日，与修馆臣文集中论及编纂《明史·地理志》的资料，已如凤毛麟角，但我们仍可以从零星资料中看到与修人员的贡献。从万斯同、张玉书，到王鸿绪、张廷玉，为此耗费了半个多世纪的心血。雍正年间重修时，徐元梦、朱轼、杨椿等人都参与过讨论，张廷玉还亲自写小传。这都是与修馆臣同心协力的证明。尚若不具备上述3项条件，《明史·地理志》是很难达到较高水平的。

《明史·地理志》也有缺点。第一，未注明资料的标准年代；第二，《明史稿·地理志》的附论，即关于区域地理概述的内容很有价值，在《明史·地理志》中已被删去，市镇墟集等县以下行政单位很少或付之阙如也令人惋惜。第三，经济、风俗、交通的内容太少是明显的缺陷。因为内容比较狭窄，所以有人认为它还比不上《汉书·地理志》等前代正史地理志。此外，最初修成的《明史·地理志》对元代人名、地名的音译也不够准确。经过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和四十二年两次修改，讹谬之处才得以刊正。

二、《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一）顾炎武及其著作的基本特色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下简称《利病书》）和《肇域志》（附《山东肇域记》），是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未竟之书。

顾炎武初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早在少年时，他就加入“复社”，与宦官作斗争。清兵南下后，他又参加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昆山城破，其母绝食而亡，顾炎武幸而逃脱。后来，唐王在福建遥授他职方主事，他因道路阻隔，未去赴任。入清以后，顾炎武看到东南的明朝军队不足成大事，且民气柔脆，地势亦不利进取，遂决计北游，想通观形势，阴集豪杰，以图光复。随着时间的推移，胜利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他的斗志却毫不衰减。他秉承母训，坚守民族气节，终身不在清朝为官，以处士终。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学问家，他不满晚明年间文坛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万季野先生行状》。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万季野先生行状》。

的腐朽状况，奋力与侈谈理性的习气抗争，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他的思想紧扣时代的脉搏，面对民族危机，他呼吁：“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这种以拯救国家、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治学方面，他学风严谨健实，成就卓著宏富，在经学、音韵学、史学、地理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梁启超评价顾氏之学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据《亭林年谱》统计，他一生著述多达38种。在地理著作中，《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气势规模最为宏大。

明朝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暴发了危机，明王朝的统治犹如大厦将倾，岌岌可危。崇祯年间，顾炎武亲眼见到明王朝东北边防日渐废弛，满洲崛起后，派兵南下，连陷辽东、直隶、山东70余城，深入2000余里，势同摧枯拉朽，锐不可挡；又见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转战东西，犹如暴风骤雨，所向披靡，而明军节节败退，不堪一击，他感到治理国家，兵防不可不严。顾炎武又亲见封建国家国用不足，“三饷”加派及其它苛征暴敛层出不穷，许多百姓冻饿逃亡，被迫起义，又感到赋役必须减轻。他目睹水旱相仍，蝗灾不绝，加以黄河连年决口，濒河州县一片汪洋，百姓家室离失，饿殍载途，他又感到水利不可忽视。这类问题经常盘旋在他的脑际。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顾炎武乡试失败之后，有感于国家多难，读经的儒生拿不出解决的办法，决心不再“以有用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他断然摆脱科举制度的束缚，开始把全部精力用到挽救社会危机的探索中去。

顾炎武针对上述社会问题，努力从书籍中搜集有关兵防、赋役、水利、农业、矿产、交通等方面的资料，准备编写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给治国者参考，并借以寻找明末社会积弊的根源，以及革除这些积弊的途径。由于战争，这部著作没有写成。后来，顾炎武把这部多年收集的资料一分为二，有关地理的部分叫做《肇域志》，有关经济的部分叫做《天下郡国利病书》。

《利病书》自序云：“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乱后多有散佚，亦或增补。而其书本不曾先定义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稿存之篋中，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云尔。壬寅七月望日。”

《肇域志》自序云：“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年来糊口四方，未遑删订，以成一家之书。叹精力之已衰，惧韦编之莫就，庶后之人有同志者为续而传之，俾区区二十余年之苦心，不终泯没尔”。

这两篇自序，文字不多，却很重要，是研究《利病书》和《肇域志》关系的钥匙。将其参证研究，便可发现：《利病书》和《肇域志》皆崇祯己卯辑录，编纂年代相同；二书所录资料，均来源于二十一史及郡县志书；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文集》之七十五。

二书皆未成之书，《利病书》“以初稿存之筐中”，《肇域志》“未遑删订”，性质相同；编纂《肇域志》和《利病书》的背景和作者寄托的希望也都一样：因“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因而“叹精力之已衰，惧韦编之莫就”，希望“后之君子斟酌去取”，“后之人有同志者为续而传之”。由此可见，这两部巨著，最初本是作者在同一时代背景、同一著作动机下，为编纂同一著作而辑的资料汇编。

这两部书的相互依存关系，有助于断定它们的成书年代。笔者认为，《利病书》和《肇域志》既从同一批资料汇编析出，那么《利病书》辑成之日，亦即《肇域志》编成之时。换言之，这2部书是同时编成的，基本上不分先后。可能在个别地方，作者后来又有增补和调整。辑录资料的起始时间，是崇祇己卯，亦即崇祇十二年（公元1639年）。如果顾炎武为《利病书》作序的壬寅年，亦即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是二书辑成之年，那么，顾炎武编纂这2部著作一共用了23年时间，与作者自序所云“俾区区二十余年之苦心”的说法基本一致。最近，参加整理《肇域志》的人员，发现稿本中辑有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成书的《延绥镇志》的资料，因此提出成书的年代尚需商榷。笔者认为这类未经删订的资料汇编与一般著作的成书年代不同，一般著作的成书年代当以定稿时间为准，而这类“有得即录”的资料汇编，在基本辑成后，作者可能又作过少量增补，但这不同于著作的定稿。综上所述，将《肇域志》的辑成年代定在康熙初是较为合适的。

《利病书》和《肇域志》二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它们还有许多相同的特点。

（1）原书皆无卷帙之分，今存之书皆非足本。《利病书》“原不分卷”，“原编册数未有次第”（《利病书》涵芬楼昆山图书馆藏稿本影印本编例序言），自清乾隆年间，黄丕烈据原书页面所标省府厘定后，始排定页次。今分为北直、苏松、常镇、江宁、庐州、安庆、凤、宁、徽、淮、徐、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交趾、西南夷、九边四夷诸部分。今存之书，在清乾隆间已“缺第十四本”（《利病书》黄丕烈序）。影印本“山东、河南二省起处各阙数页。”“江西省篇帙独少，与传写本、刻本相对，缺形胜、水利二篇，云南省亦缺形胜一篇，贵州省阙总舆图记、疆域二篇”（《利病书》编印例言四）。可见已非足本。笔者参加《肇域志》整理工作时，所见到的国内数种《肇域志》抄本亦不分卷，今抄本只存南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部分，缺京师（北直隶）、江西、四川、广西诸省，残缺部分较《利病书》更多。

（2）未立体例，编次零乱。二书皆顾炎武“本不曾先定义例”（自序）、“有得即录”（同上）的读书札记，故每篇多自为起讫，编次上十分零乱。例如《利病书》北直隶辽镇形势当与昌镇形胜相接，原编误隔15页。湖广有宫殿名称一篇，当属于承天府者，原编误置全省图经之下（《利病书》编印例言五）。《肇域志》亦然，以陕西省部分为例，府州县重出现象非常普遍。如庆阳府重出3次；泰州、阶州、徽州重出5次；宁远县重出6次；富平、同官2县重出5次，等等。州县沿革、山川形势等内容先后错见的情况亦常见。如布政使司总论列于州县之下，甲府辖县列入乙府，丙县内容见于丁县

之内。又如山川与古迹夹杂，风俗与形势交错，史事与沿革并存于一段之中的情况，也俯拾皆是。

(3) 以广征博引为主，考据审订较少，经常兼收并蓄不同的观点和矛盾的史料。因是准备著书的资料，所以作者不厌其烦地摘录资料。例如，为要研究三吴地区水利，《利病书》辑录了宋郑亶的《上言苏州水利》、单锷的《吴中水利书》，以及明代夏元吉、徐献忠、周忱、崔恭、徐贯、金藻、归有光、吕光洵等人的奏折，几乎全部在篇，力求完备。有些不同说法，顾炎武亦兼收并蓄。如《战国策》及《史记索隐》云曾子是费县人，《兖州志》、《嘉祥县志》云曾子是嘉祥县人，《肇域志》均照录不误。旁注又附杂记云：“成化元年山东守臣上言：‘有渔者在玄塞山穴中，得悬棺。其石碣镌曾参之墓’云云”。其后自注：“未知孰是？”方志有明显错误的地方，《肇域志》也全部照抄。如隆庆《淳化县志》卷四云：“晋宁康九年，符坚将姚萇背坚，起兵北地，自立为王，国号秦。秦王殿盖始于此。”按宁康无九年，姚萇起兵称王事应在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隆庆《淳化县志》误，《肇域志》亦未加考订。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

(4) 内容分而不清、资料归属不妥的现象时有所见。《利病书》应专记郡国利病，《肇域志》应专述舆地之记，由于分析归类工作比较粗疏，二书分而不净，杂夹在一起的资料不少。因此，《利病书》也夹有山川、城池的资料，《肇域志》也包含食货、兵防、水利的内容。就门类而言，二书不相伯仲，如沿革、山川、城池、古迹、市镇、风俗、赋役、屯垦、水利、漕运、兵防、马政、盐政等内容，能在《利病书》中找到，也见于《肇域志》记载。资料归属不妥现象时有所见。吴荣光读《肇域志》后曾指出：“此书专记地舆形势沿革，每篇之末，间及时事，如漕耗、备倭之类，与《利病书》同义”，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甚至还能发现论证同一问题的资料被硬拆开而分置各书的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顾炎武对曾子籍贯的研究，提出问题和罗列不同说法的材料见于《肇域志》，考证的结论见于《山东肇域记》，而大量考证文字都残留在《利病书》内。所以《利病书》和《肇域志》的资料往往能够互相补充，彼此参证，对照阅读，甚有好处。

尽管《利病书》和《肇域志》颇多相同之处，然而它们毕竟是两部内容不同的著作。一般说来，《利病书》偏重于经济，《肇域志》偏重于舆地，它们仍各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作者编纂《利病书》的目的在于论说郡国利病，所辑资料偏重于政治、经济、军事内容。该书在地理著作中别开生面，独具一格，有人称它为经济地理学，也有人称它为“政治地理学”。

论说郡国利病的宗旨何在？张元济对此有一段很好的说明。他认为：此书“无非欲诏示后世，使凡有国有家者知此（指兵防、赋役、水利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数事，推而至于其他”。他还认为，《利病书》要告诉治国者，“莅民之事，得其道则利，失其道则病，利则其民奋，而国随之以兴，病则民悴，而国随之以亡”。“果能晓然于利病之所在，而讲求趋避之方，转贫弱而为富强，康乐和亲之盛，何在不可几及，不然未有不蹈亡明之复辙者也”。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讲究利病是贯串《利病书》的红线，而在全书之中，

兵防、赋税、水利3项，则是顾炎武辑录资料的重点。

有感于兵防的重要性，顾炎武很重视研究各地的兵要地理，他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等无不详细摘录，对北直隶的4镇2关、山西大同、陕西巩昌、洮、岷之堡寨，江浙、福建、二广的海防，对若干地区的将领委任、武器装备、作战方案等，都有具体记载。

在赋税方面，明末“一条鞭法”遭到破坏的事实，“三饷”加派的弊病和恶果，全国租税最重的江浙地区的农民负担，盐额课征最重的山西解州、四川、南直、浙江等地的税额，江南农村土地分配和赋税征收的管理制度，历代名臣变通赋税征收办法，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政绩，以及与之有关的土田、屯垦、粮额、租税等项目，也是该书辑录的主要内容。

水利方面的资料，以黄、淮、长江诸河的河工，漕运诸河（如运河、胶莱河等）的航运，主要作物产区的农田水利，以及历史上水利专家的治水方略居多。顾氏对三吴地区农田水利特别重视，有关的资料辑录尤多，宋邦彞、单锷的水利作品，以及明代夏元吉、徐献忠、吕光洵等人的奏折，全部在编。

《利病书》的资料，虽有一些摘自于地志，但更多的却辑于实录、邸抄、文集及各种史料，所以与其说《利病书》是地志，倒不如说它是史抄。

《利病书》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资料汇编。首先，它汇总了许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资料，包括一些今已失传的或罕见的碑刻和地方史志资料，为后人研究明史作了搜集资料的准备。梁启超曾高度评价这种工作，他说：“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澈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在这个意义上，顾炎武按地域把各方面的资料汇总起来的功绩是很大的。其次，顾炎武生于明季，经历了明王朝的覆亡，对各种矛盾和社会危机有深切的感受。他又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问题作过认真考察，他的主张和见解，皆“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这些也都给后人研究明史以启发。

《肇域志》是明代地理总志，包含沿革、形势、城郭、山川、道路、驿递、街市、坊宅、兵防、风俗、寺观、水利、陵墓、郊庙等项内容。有的府州后，还附有长篇食货或职官的资料。顾炎武很注重文献资料的考证和实地调查，他“尝以一骡二马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士民，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为了编纂《肇域志》，他“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他还考察山川，访问风俗，进行实地调查。其“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宫室，皆出自实践”，所以《肇域志》也是一部很有价值和特色的著作。表现在：

第一，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最为珍贵的是已经失传的明方志资料，

《天下郡国利病书·张元济跋》。

同上。

《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

《肇域志·自序》。

《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

如明《泰宁志》已佚，但《肇域志》辑录了该志“吏役”、“户口”、“贡赋”、“军政”、“民兵”、“徭役”、“邮置”、“匠役”等内容 7000 余字。又如《肇域志》保存了《嘉靖淮扬志》刘健《高邮州新开康济河记》全文，今本《嘉靖淮扬志》卷三十五所载原文已佚，也靠《肇域志》得窥全豹。《肇域志》还引用了许多稀有的地方史志，如应天府先后引用了唐许嵩《建康实录》、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元张铉《金陵新志》、明洪武《京城图志》、明陈沂《南畿志》、《金陵古今图考》、程嗣功《应天府志》、顾起元《客座赘语》、周晖《金陵琐事》等书，史料价值也很高。此外，《肇域志》还摘引了许多罕见的专书专志资料，如《泉河史》是记载山东运河附近各派泉眼分布、疏导和管理的专书，《肇域志》辑录原文达 1.8 万多字；又如《吕梁洪志》是记载徐州地区黄河变迁和航道工程的专志，传本极少，《肇域志》也有大段摘引。

第二，许多内容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经世致用是顾炎武一贯的指导思想，《肇域志》也很重视辑录这类资料。例如嘉靖以后，北方边患和东南倭寇威胁着明王朝的安全，顾炎武对“九边”都司卫所和关镇堡寨的建置格外留意，对浙闽沿海地区的岛屿、水寨、民城和哨守的安全也非常关切，辑录的资料非常详细。又如苏、松、杭、嘉、湖地区是明王朝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一地区沙洲海涂的开发和农田水利的兴修，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封建国家的税收，它们在《肇域志》中所占的篇幅也较多。顾炎武还辑录了《明实录》和许多文集集中的资料，以备综合研究之用，这些资料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

第三，收编了大量的地名。除内容而外，地名的多少是衡量地志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志。《肇域志》不但记载了各省府州县著名的山川古迹，而且收录了许多小山、支水、盐场、坑冶、镇市、渡口、巡检司和税课司所在的小地名。其数量之多，不但远远超过《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而且南京（江南）、陕西、山东等省还多于《读史方輿纪要》。在个别地区，《肇域志》记载的地名比有关专志还多，如《九边考》、《九边图说》是专载明代长城沿线关堡和防务的专书，有些地区所收的地名却不如《肇域志》齐全。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辑录的小地名很多，经比较，亦有部分地区不如《肇域志》。

第四，可据以校勘其它古籍。《肇域志》取材丰富，引证宏博，从《禹贡》、《山海经》、《尔雅》到《水经》、《皇览》、《地理志》；从《元和志》、《寰宇记》到《明一统志》和各地方志；从官修实录到民间碑刻，皆有辑录。这些资料和顾炎武所作的考证，可供校勘古籍参考，例如《广志绎》是专述明代地理的史料笔记，今本《广志绎》的《方輿崖略》部分已有脱漏，不如《肇域志》所辑的内容完整，可据其校补；又如顾炎武在摘引《齐乘》时，校出原书讹误数十条，亦可据以订正《齐乘》。

以上所举数端，足以证明《肇域志》是中国历史地理古籍中的珍品，是一部有待学者去采掘的资料宝库。

（二）《山东肇域记》

《山东肇域记》又名《有明肇域记》，或《肇域记》。清康熙十二年（公元 1673 年）顾炎武旅居山东济南修志馆时所撰。顾炎武《肇域记序》云：“刘

昭承班固之书，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以后汉二百年之志而春秋之事备焉。愚今略仿其意，以有明一代郡邑、藩封、官守为一书，而参以六经二十一史之故，上接元史，讫于崇祯。俾后之人，既以知今，亦可验古。但唐宋地志久亡，近时之书，大半多齐东野语，且不能尽得。余老矣，日不暇给，先成此数卷为例，以待后之人云。书名有明肇域志”。

顾炎武选择《肇域志》的山东部分，将其删定为《山东肇域记》，不是偶然的。他在山东作过长期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对齐鲁地区的地理情况十分熟悉。此前，他撰有《山东考古录》一书，该书名曰考古，实言地理，“最为精赅”，另有许多地理考证收集在《谿觚十事》、《日知录》和《亭林文集》中。顾炎武撰著《山东肇域记》时，吸收了以前的研究成果，该书实际上是他研究山东地理集大成的著作。

明山东布政使司有南北2部，南部相当今山东省；北部辽东都司相当今辽宁省大部、吉林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隅一部。今存《山东肇域记》仅载山东布政使司南部府州县，夏文焘怀疑它不是足本，但《山东肇域记》6卷与顾炎武所云“先成此数卷为例”合，与顾炎武外甥徐秉义《培林堂书目》所云“一册”合，与道光间陈揆《稽瑞楼书目》、咸丰间韩应陆《读有用书斋书目》所云卷数同，似可断定《山东肇域记》仅此6卷，今所存者乃是足本。

《山东肇域记》的主要特点是：

(1) 立论严谨。《山东肇域记》的论点与论据，经过作者严密思考和反复推敲，与兼收并蓄、不加考辨的《肇域志》大不相同。例如：《肇域志》费县曾子墓下，引《战国策》及《史记索引》，证曾子为费人；又于嘉祥县曾子墓下，引《兖州志》、《嘉祥县志》，证曾子为嘉祥人（已如上述）。

《山东肇域记》载曾子墓则完全不同，嘉祥县下已删除了曾子墓的全部内容，而于费县下引《孟子》、《战国策》、《史记》、《后汉书》为证，辨曾子为费人，并在其后曰：“曾子费人无疑，而嘉祥之武城谬矣”。又如《肇域志》引《莱芜县志》注牟国，云“牟城在县东二十里”。修《山东肇域记》时，顾炎武已纠正了《莱芜县志》“多未分析”的含混注释，改用《山东考古录》“春秋以牟名国与地者有三”的说法，将三牟（牟娄、根牟、牟山）分注于诸城、莱芜、安丘县下。

顾炎武很重视收集原始资料。《肇域志》辑录的资料虽已十分丰富，但修撰《山东肇域记》时又有增补。例如：《肇域志》载长城，仅援引《竹书纪年》、《齐记》、《括地志》为证。《山东肇域记》成书时，又新增了《管子·轻重》、《史记·六国年表》、《史记·苏秦传》3条资料，使论据更为坚实有力，内容更为丰满。

《山东肇域记》引用的资料，皆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筛选。顾氏认为：“凡考地理，当以《水经》、《皇览》、《郡国志》等书为据。”

《续山东考古录·杜受田序》。

《续山东考古录·杜受田序》。

《山东肇域记》卷二。

《山东肇域记》卷一、四。

《山东肇域记》援引史料，以经典和正史为主，很少使用方志资料。《山东肇域记》引书 80 余种，引文 700 余条。其中出自《尚书》、《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及先秦诸子者，共 280 余条（内《春秋》、《左传》近 200 条）；出自《史记》、《汉书》等二十一史者，共 300 余条（内前四史约 200 余条）；《水经》、《水经注》80 余条；各类典章制度，政书、总志、方志、碑刻、文集、游记 60 余条。而其中元、明方志则不满 20 条。即使引用方志，也证之于正史，例如《肇域志》在恩县下，引《旧志》释“四女树”得名，未详始末，《山东肇域记》则另引《旧唐书》为据，叙明其原委。充分地占有资料和科学地鉴别资料，正是顾炎武立论严谨的前提和保证。

改动《肇域志》之处，《山东肇域记》皆有考证。有些条目下未附考证，并不是作者的武断和疏忽，而是别有专论，故于书中省略的缘故。例如：辨潍水和考徐州见于《日知录》；辨孟尝君封邑和考泰山无字碑见于《读觚十事》；考画邑和辨“淄川非薛”见于《山东考古录》；辨《集解》“二向为一地”和“凡伯之楚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见于《左传杜注补正》。

（2）考辨精详。顾炎武很重视考证史料，从不“信古注而拂事理”，拜倒在古人脚下。例如：《春秋》杜预注、《史记》刘昭注、《通典》皆云，莱人兵劫鲁侯之夹谷，“在赣榆县西五十里”。顾炎武经过考证，认为赣榆距齐、鲁之都各五六百里，莱人径入鲁境如此之远，兵劫鲁侯，有乖史实。而《一统志》言夹谷在“莱芜县南三十里”，该地正当齐、鲁边界，鲁侯在边境被擒，颇合事理，与《水经注》记载亦合，殊为可信。于是，他便摒弃古注，采用新说。又如：《魏书·地形志》、《旧唐书·姜抚传》：“劳山”误作“牢山”，《太平寰宇记》误作“劳盛山”；《史记·秦始皇本纪》：“成山”误作“荣成山”，千余年来，无人匡谬。顾炎武在《山东肇域记》中，一一考辨订正，指出唐人“未曾详考”，“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荣之号。”

经过考证，顾炎武发现和纠正了经、史及地志的许多错误。例如：于钦将《汉志》济南郡之邹平县和台县，误断为邹县和平台县；又不知《晋志》有阙文，误引《晋志》为证，以为汉济南郡有邹县，而邹平县为后汉所改。顾炎武考证后，作了改正。

顾炎武考证地理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进行野外调查。例如他曾多次到即墨劳山和临淄田氏四王冢考察，《亭林文集》卷三《劳山图志序》和卷五《齐四王冢记》，记载了他考察和调查的详细经过。野外调查使顾炎武跳出了书斋考证的窠臼，得到很多收获，这是《山东肇域记》能够超越旧志的重要原因。

（3）在运用史料和编撰体例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夏文焘对《山东肇域记》运用史料的独到之处有一简单介绍，现转引如下：

济南府历城县之解华不注；淄川县之不载孟尝君封邑而于滕县载之；长清县之考灵岩寺；泰安州高里山辨“蒿里”之误；肃然山不用服虔在梁父、《酉阳杂俎》长白山之说，而一以《史记·封禅书》、《魏书·崔光传》为据；莱芜县夹谷引《水经注》“夹谷之会即此地”，而辨杜元凯东海祝其之

顾炎武：《读觚十事》。

顾炎武：《读觚十事》。

《山东肇域记》卷二。

说为太远；兖州府曲阜县引《鲁世家》“筑矛阙门”以证阙里；引司马彪《庄子注》以证杏坛为不可知其地；滕县灵丘城辨《赵世家·正义》今蔚州县之误；宁阳县洸水引《晋书·荀羨传》以辨商辀《埭城闸记》“至元二十六年，始筑坝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济宁”之误；金乡县东缙城辨非陈留之东缙；城武县楚丘亭辨其非卫文公所迁之楚丘；东河县治本汉东郡之穀城县，辨其为春秋之穀而非小穀，曹县景山辨其非“景山与京之景山”；沂城向城言春秋之向，现杜注分为二而其实一向；宣四年注以丞县之向远为疑，而隐二年注以为龙亢之向城，不知其更远；费县言曾子居之武城，而以嘉祥之武城为谬；又引《史记·田完世家》以证南城之即南武城，引程大昌《澹台祠友教堂记》以证子羽亦南武城人；青州府诸城县载齐之长城；辨潍水《汉地理志》“淮”、“惟”、“维”三见之为异文；登州府胶州洋河引《通鉴》刘怀珍遣王广之袭不其城事，而不沿胡三省注即巨洋水之讹。

又地名之同而异者，莱芜县牟城引《春秋》桓十五年及僖五年《传》；安丘县之牟山故城则云隋置牟山县；诸城县之娄乡城则引隐四年“莒人伐杞取牟”为证。旧书所未分析而是书逐一剖别之，凡此皆先生平日读书有得，发前人之所未发者。

《山东肇域记》在体裁方面也有革新。论门类，它只叙郡邑、藩封、官守、山川、古迹，不收食货、风俗、职官、艺文、灾异；叙沿革，“上接《元史》，迄于崇祯”，以有明一代为断；考古迹，重在注释今地和阐述现状，一开卷就新人耳目。这些体例是顾炎武为后人续纂《肇域记》制定的准则，也是他为改革方志所作的尝试。

从《肇域志》山东节本到《山东肇域记》成书，不仅有“量”的变化，更主要是“质”的飞跃。前代学者早已注意到它的学术价值，黄丕烈将《山东肇域记》与《明一统志》比较，“稍检数条，已知此善于彼”。清嘉庆年间重修《一统志》，馆臣们曾多次引用《山东肇域记》。

顾炎武一生著述甚丰，但同时留下资料长编与已定文稿的著作却绝无仅有，因此《肇域志》山东部分和《山东肇域记》，又是我们研究顾炎武学术思想极其难得的实物资料。

三、《读史方輿纪要》

清初，在地理学领域里，出现了一批能够通达古今之变，为政事、为军事、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重要著作。侯仁之在回顾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时，曾经指出：“其中比较晚出而有代表性的系统著作，当推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

《读史方輿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传世之作。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他出生在常熟，又自署常熟人。后迁居无锡城东宛溪，学者又称他宛溪先生。顾祖禹生于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享年61岁。幼年时，聪颖好学，背诵经史如流水。少年时，纵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成年

《山东肇域记·夏文焘序》。

《山东肇域记·黄丕烈序》。

侯仁之：“《历史地理》发刊词”，载《历史地理》创刊号。

后，熟谙经史，博学多识。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躬耕于虞山之野，生活非常穷困。他授课糊口，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生活，而不肯随波逐流，求名于时。其父柔谦是一位心怀亡国之痛的绩学遗老，临终遗言说：“及于之身而四海陆沉，九洲沸腾……嗟乎园陵宫阙、城廓山川俨然在望，而十五国幅员（指明2京13布政使司）三百年之图籍混焉沦没，文献莫仿，能无悼叹呼？余死，汝其志之。”顾祖禹秉承父命，从顺治十六年起，一面教书，一面撰写《纪要》。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三藩起兵，祖禹弃家入闽，投效耿精忠，参加反清复明的军事斗争。三藩兵败，祖禹回归家乡，重操旧业，继续撰写《纪要》。其后，虽参与编修《大清一统志》，但他坚守民族气节，不受清朝一官一职。他一生中的全部精力，皆贯于著述《纪要》之中，从29岁起，至50岁止，经过20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

顾祖禹编撰此书，怀有明确宗旨和无限隐痛。他痛心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因而最后遭致亡国。他说：“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作者对此书寄托很大的希望，希望它有助于反清复明的大业。他在这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历史事迹，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很像是为反抗清朝统治的军事行动进行论证。张之洞说：“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说：“景范此书，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而据史迹推论得失成败之故，其性质盖偏于军事地理，殆遗老力谋匡复所将有事耶。”

又说：“其著述本意，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序所言深有隐痛焉。”这些评论虽有偏颇之处，但也说出了一定的道理。

《纪要》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有所不同。《自序》云：“禹之为是书也，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河渠沟洫足备式遏，关隘尤重，则增入之。朝贡四夷诸蛮严别内外，风土嗜好则详载之。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游观诗赋何与人事，则汰去之。”故其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而游观诗赋则为其所轻。

全书排列的次序，“首以历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之以北直（疑脱江南），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之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之以四川、湖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赋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又次以川渚异同，昭九州之脉络也；终之以分野，庶几俯察仰观之义与”。

分卷情况如下：

卷一至卷九历代州域形势

《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一。

《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三。

侯仁之：“《历史地理》发刊词”，载《历史地理》创刊号。

《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一。

《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三。

《读史方舆纪要·序》。

《读史方舆纪要·凡例》。

卷一十至卷一八 直隶
 卷一九至卷二九 江南
 卷三十至卷三八 山东
 卷三九至卷四五 山西
 卷四六至卷五一 河南
 卷五二至卷六五 陕西
 卷六六至卷七四 四川
 卷七五至卷八二 湖广
 卷八三至卷八八 江西
 卷八九至卷九四 浙江
 卷九五至卷九九 福建
 卷一百至卷一百五 广东
 卷一百六至卷一一二 广西
 卷一一三至卷一一九 云南
 卷一百二十至卷一二三 贵州
 卷一二四至卷一二九 川读异同
 卷一百三十 分野

《纪要》体大思精，组织严整明晰，论说颇多独到之处，在古今地理著作中罕有其匹。该书《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是最有特色的部分，写得十分精彩，几乎每篇都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在记述舆地方面，纲目极为分明，2京13布政使司下，按府州县分叙四至八到、历代沿革，各县载有编户里数，并山川、关、城镇、古迹、驿站等内容，有关史事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类似的地理著作完整保存下来的不多，能够与其相媲美的更少，故《纪要》素有海内奇书之称。

与其它舆地著作相比，《纪要》具有鲜明的特色：

(1) 军事地理的色彩非常浓厚。《纪要》叙述疆域政区和山川形胜，皆从历史上穷本溯源地备述其军事价值。顾祖禹很重视各地的攻守利害，他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之于兵，如养生者必籍于饮食，远行者必资于舟车”，必须“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因此，他结合历代军事，精辟分析了各地区的山川形势和军事地位。他分析直隶形势说：“直隶雄峙东北，关山阻险，所以隔阂奚戎，藩屏中夏。说者曰：‘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幽燕形胜，实甲天下’。”又云：“文皇起自幽燕，尊涿鹿而抚轩辕之坂，勒擒狐而空老上之庭。前襟漕河，北枕大漠。川归毂走，开三面以来八表之梯航，奋武揆文，执长策以扼九州之吭背。秦晋为之唇齿而斥堠无惊，江淮贡其困输而资储有备。鱼盐枣粟，多于瀛海碣石之间，突骑折冲，近在上谷渔阳之境，修耕屯而塘泊之利可兴，振师干而开宁之疆在握，此真抚御六合之宏观也。然而居庸当陵寝之旁，古北在肘掖之下，渝关一线为辽海之咽喉，紫荆片垒系燕云之保障，近在百里之间，远不过三二百里之外，藩篱疏薄，肩背单寒，老成谋国者，早已切切忧之。”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他分析徐州形势说：“州冈峦环合，汴泗交流，北走齐鲁，西通

《读史方輿纪要》总叙三。

《读史方輿纪要》卷十。

梁宋，自昔要害地也。”又引证东吴吕蒙、南朝王元漠、唐李泌、宋苏轼、元胡三省诸家议论，阐明徐州得失对于全局的利害关系，指出徐州为南北襟要，资储重地，经营天下，绝不可以“彭城为后”。类似论述，比比皆是。该书对江南、陕西、河南等地的分析，也很有见地；对四川、湖广、两广的研究，更是言有所指。说《纪要》是研究军事史和军事地理的空前巨著，是毫不过誉的。梁启超认为：“今日海陆交通情况，迥异三百年前，其书自强半不适于用，然国内战争一日未绝迹，则此书价值，固一日未可抹煞也。”

(2) 人地关系的辩证思想较为突出。《纪要》虽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但顾祖禹在总叙中却不厌其详地说明“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的道理，反复论证无论何等天险地利，都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在评判战争胜负原因时，他指出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他说：“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奇正断于脑中，生死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焉，此固大将之所任。”接着又说：“虽然攻守万端，巧拙异用，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而已矣。”他在论说历代建都时，也批判了那种地势险固决定一切的观点。他认为：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适合建都，彼时不定适合建都；是否适合建都，不仅看形胜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生产是否发达，交通是否方便；建都何处，取决于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形胜未可全恃”。他的这些军事思想和辩证观点是很先进的。

(3) 经世致用的思想贯串全书。《纪要》注重经世致用，对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尤为重视。明嘉靖以后，河患颇为严重，顾祖禹非常关切黄河的治理。他认为：“河之患，萌于周季，而浸淫于汉，横溃于宋。自宋以来，淮、济南北数千里间，岌岌乎皆有其鱼之惧也。禹贡不生，河患未已，国计民生，靡所止定矣。”为此，他在《纪要》中辑录了大量前人治水的主张，留给后人作借鉴，他赞赏潘季驯的治河方针，指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因而引证潘季驯的言论尤多。顾祖禹对漕运也很重视，他认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那种为了保运而置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他为民请命，大声疾呼：“淮、济诸州之民何罪，而尽委之谿壑乎。”在《川读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对于治河通运很有参考价值。

有明一代，苏松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较快。顾祖禹阐述苏州经济在全国的地位说：“苏州枕江而依湖，食海王之饶，拥土膏之利，民殷物繁，田赋所出，吴郡常书上上。说者曰：吴郡之于天下，如家之有府库，人之有脑腹也，门户多虞而府库无恙，不可谓之穷；四肢多病而脑腹尤充，未可谓之困。盖

《读史方輿纪要》卷二九。

《读史方輿纪要》卷二九。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文集》之七十五。

《读史方輿纪要》总叙三。

《读史方輿纪要》卷十。

《读史方輿纪要》卷一二六。

《读史方輿纪要》卷一二五。

五代以后，东南之财力，西北之甲兵，并能争雄于天下”。他对于转漕城镇的冲要地位也十分重视，如论述扬州说：“都燕之后，转输特重”，“十三年（公元1415年），会通河成，海运始废，自是除河南、山东、两淮诸处运米各由近道达北京外，其浙西漕粟凡一百六十五万余石，皆自瓜州坝以达于扬州；上江及江西、湖广漕粟凡八十八万余石，皆自仪征坝以达于扬州，扬州盖东南漕粟之咽喉矣。”他论及淮安说：“今岁漕数百万石，咸取道于淮安，哽咽或生，则京师有立槁之虑。”此外，该书关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都有详细的记载。所以《纪要》又是研究经济史和经济地理的必读之书。

（4）研究方法与著述体裁别具一格。治史与研究舆地的关系十分密切，若没有地域概念，不能将古今史事按之于舆图，不能在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上向读者作明确的交待，则所作研究终有缺憾，未臻完美。顾氏将研究史事与研究方舆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使史事成为研究舆地的向导，又使舆地成为研究历史的图籍。是书每省首冠以总叙一篇，论其地在历史上关系最重要之诸点，次则叙疆域沿革、山川险要，务使全省形势了然。每府亦仿此，而所论更分析详密。每县则记辖境内主要之山川关隘、桥梁及故城等。记述史事的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十分清楚，为以往史学著作所不及。全书的体裁亦严整明晰，其顶格写者为正文，低格写者为注，夹行写者为注中之注。全书脉络连贯，条理清楚，主次分明，次序井然，在古今著作中罕有其匹。梁启超评价说：“专就研究方法及著述体裁上评价，则在今日以前之地理书，吾终以此编为巨擘。”

为了撰著《纪要》，顾祖禹参考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他自己说，其所著之《纪要》，“六经而外，左、国、史、汉皆有诠释，古人散逸之书，见于古人援引者为多，是书悉为搜讨，至杜、郑、马三家之书，其言方舆，皆资采取，而杜氏尤长，王厚斋《玉海》一书中所称引，类多精确；而《通释》一种，为功于《通鉴》甚巨，胡身之从而益畅其说，搜剔几无余蕴，余尤所服膺，故采辑尤备。”可见他搜集资料之多，采辑之广。顾祖禹也做过一些实地考察和调查，凡舟车所经之地，“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道里、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众客谈论，考核异同”。但他考察和调查过的地方毕竟有限，只是“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他编撰此书，主要依靠在书斋内收集整理资料，进行严密考订。由于他治学严谨，所用材料皆经过反复选择和仔细审订，因而准确性较高，错误较少。韩子儒家居云南，出入黔蜀间20余年，熟知其中山川道里，而顾祖禹闭户宛溪，足不出吴会，其所举黔蜀地名，所论攻守奇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四。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三。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九。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二。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六。

《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序》。

《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二。

同上。

正，即使荒僻幽仄之处，也犹如亲历其地，韩子儒读《纪要》后，大为敬佩。魏信亦盛赞此奇书是“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汪士铎称此书“为地理学空前绝后之作，可与郦氏称二大家。”江藩认为：“读其书可以不出户牖而周知天下之形胜，为地理之学者，莫之或先焉。”

《纪要》虽是顾祖禹个人的撰著，但他凭借渊博的学识和艰苦的劳动，仍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该书内容之丰富，地名之齐全，考订之精详，结构之严密，既胜于唐宋时期的《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也超过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和《明一统志》，即使与此后集众家之手官修的《清一统志》相比，也各有千秋，毫不逊色。该书纠正史书中沿袭相传的错误较多，如西汉长安西南的昆明池，本来是仿照昆明国洱海开凿的，晋代臣瓚在《汉书音义》中将洱海误作滇池，此后以讹传讹，误传 1000 多年，直到顾祖禹写《纪要》，才将二者关系搞清楚。它的许多研究成果，曾被《清一统志》所采用。迄今为止，《纪要》仍为研究历史地理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之一。

《纪要》贯通古今史地，辩论形势险要，诚为千古绝作，然而也有不足之处。刘继庄指出：《纪要》“详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读史，固大资识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需历练也。”顾氏自论其书，亦云：“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言：“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愤愤焉。则见闻与传闻异辞者不可胜数也。”这种不足显然与顾氏著书缺少实地调查有关。《纪要》虽视他书赅博，于明代史志尤其熟悉，然亦不能无误。清嘉庆间许鸿磐（云峤）著有《方輿纪要考证》一书，辨证顾氏舛漏甚多，惜今已佚。其他清代学者如全祖望、杨椿等均指证其错误多处。

四、《嘉庆重修一统志》

（一）编修经过

清代编修《一统志》共有 3 次。早在康熙十一年（公元 1672 年）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奏云：“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之文献，然迄今各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何以襄我皇上兴隆盛治乎？除河南、陕西已经前抚臣贾汉复纂修进呈外，请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发总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康熙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各省施行，编纂地方志书。然因“三藩之乱”，兵事未停，迁延未就。平定三藩之后，各省又续修地方志书，为《一统志》准备资料。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 1686 年）清政府又下令编纂《一统志》，“以昭大

《读史方輿纪要·魏序》。

《汪梅村先生集》卷九《肇域志跋》。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十一。

《读史方輿纪要·顾祖禹序》。

《读史方輿纪要》总叙二。

同上。

《康熙莱阳县志》卷首《奉上修志敕文》引礼部咨文。

一统之盛”。该志分为：分野、部辖、图经、建置沿革、城池、形势、里至、议论、设官、户口、田赋、风俗、山川、古迹、旧都宫阙、考订、陵墓祠庙、关隘、桥梁、土产、人物、仙释诸门类。兹因规模宏大，卷帙浩繁，“久而未成”。雍正即位后，又重加编纂，历时 10 余年，至乾隆八年（公元 1743 年）告竣。全书 342 卷。这次编修，名为勒德洪、弘昼、蒋廷锡负责，实际由陈廷敬、徐乾学领其事，顾祖禹、阎若璩、齐召南等著名地理学家参修。

乾隆前期，清廷平定准噶尔部、回部及大小金川战役获得胜利，西南土司又相继归附，版图进一步扩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与发展；内地各省户口蕃衍，田赋日增，人官物土之盛远非昔日可比。与此同时，新置的厅、监不断增加，府州县时有并改，政区变化较大，成书于乾隆八年（公元 1743 年）的《一统志》内容陈旧，已经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此外，该志本身“记载、体例、征引详略亦多未协”，其它考稽失实等问题也在所难免，于是决定重修《一统志》。当时乾隆帝在位，他对馆臣说：“前此修志之书，必待移取各省通志而后从事，以致旷日持久，艰于集书。此次特就已成之书酌加厚核，即新疆幅员辽阔，而一切事实又有《西域图志》及《同文志》诸书为之蓝本，馆臣采撮排撰，实为事半功倍。”他又晓喻馆臣“随缮随进”，由他审定。二修始于乾隆二十九年（公元 1764 年），成于四十九年。由领侍卫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和珅主持。全书 424 卷，加子卷 500 卷。这次续修突出了乾隆帝的文治武功，但与修的馆臣为让乾隆帝生前看到续修的《一统志》，编纂工作匆忙粗疏，有的门类“未曾析载”，有的内容“悉仍前志”；“考稽失实”，“挂漏冗复”的现象依然存在。龚自珍任校对官时，指出二修的主要问题有 18 处，枝节问题尚且不论。

嘉庆年间，方略馆再次奏请重修《一统志》。三修工作由穆彰阿、李佐贤、泮锡恩、廖鸿荃、龚自珍等主持，历时 34 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公元 1842 年）完成。这次重修始于嘉庆十六年（公元 1811 年），所辑资料又以嘉庆二十五年为断，故名《嘉庆重修一统志》。

这次重修，根据各省各地区提供的资料，并《八旗通志》、《日下旧闻考》、《热河志》、《盛京通志》、《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平定金川方略》、《天下輿地全图》等书，旁搜博采，对续修的《一统志》作了较大的改动。

（1）增补门类。三修以嘉庆二十五年（公元 1820 年）为断，增补了四方面内容：新建或新葺的城池、学校、海岳江河神庙、河工海塘事宜、陵墓、寺观等；各府州县入学人数，除规定的旧额外，补充了增减后的实际名额；乾隆年间和嘉庆二十五年以前的西南土司承袭裁汰事项；增加“税课”门，补载盐课和关税。就地区而论，增补的情况很不平衡。一般说来，

乾隆四十九年《清一统志》卷首《御制大清一统志序》。

《檐园文集》卷三五徐乾学《大清一统志》凡例。

乾隆四十九年《清一统志》卷首《御制大清一统志序》。

《康熙莱阳县志》卷首《奉上修志敕文》引礼部咨文。

乾隆四十九年《清一统志》卷首《御制大清一统志序》。

《嘉庆志》凡例。

乾隆四十九年《清一统志》卷首上谕。

《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

内地各省增加甚微，边疆地区增加明显。例如乌里雅苏台统部自设将军、参赞统辖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和喀尔喀四部后，其具体内容，旧志未经晰载，三修增加了“晷度”、“山川”、“卡伦”、“台站”门，新疆统部增加了“台站”、“营塘”、“卡伦”、“属境”门；蒙古统部增加了“旗分”、“封爵”、“属部”、“驿站”门；盛京统部增加了“关邮”、“城堡”诸门。由于增补了门类，充实了内容，全书总卷数从一修的356卷和二修的500卷，上升到560卷。

(2) 完善体例。一修、二修的体例未协之处，三修时进一步加以完善。例如：一修、二修的《沿革表》，根据政区沿革的实际情况立标目，元明以前多不相同，三修则予以划一（见表6）。改用统一标目后，统一王朝的疆域政区一目了然，颇便于比较各级政区的相互关系和置废情况，将分裂时期错综复杂的内容移入“建置沿革”叙述后，又改变了《沿革表》标目杂乱、排列不齐的状况。又如：一修和二修将清初诸王、八旗大臣与顺天府“名宦”排列在一起，眉目不分，三修规定：“诸王及八旗大臣等，事迹已详《八旗通志》者，兹不重载，其八旗大臣中，有任职封疆、政绩懋著者，仍载入各省‘名宦’中。”又规定：“名宦凡统辖全省及辖数府者载入统部，知府以下暨武职等官专管一郡一邑者，分载各府部，间有一人而各省俱载者，止就本省本任政绩记录，不牵叙别省别任之事，以清眉目。至‘名宦’、‘人物’二门，有一人而彼此互见者，‘名宦’撮举政绩，‘人物’历序生平，自不重复。”又如二修载山川，以四止四隅为序，先叙东西南北，再叙东南、西南、西北、东北，经常混淆，三修恢复一修旧例，仍以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为序，使其地势相连，条理分明。较之一修和二修，三修体例更规范更科学了。

表 63 部 《清一统志》沿革表比较

乾隆八年纂《清一统志》			乾隆四十九年纂《清一统志》			《嘉庆志》
顺天府	淮安府	冀州	江苏统部	湖南省表	镇西府	各省府州厅直隶州同秦
汉	两汉	汉	两汉	两汉	西汉 东汉	汉
三国魏 晋	三国晋	魏晋	三国吴 晋	三国吴 晋	三国 晋	三国（魏吴） 晋
后魏	宋齐梁 魏	后魏	宋齐	宋齐梁 魏齐周	北魏	南北朝
齐周 隋	齐周 隋	齐周 隋	梁陈 隋	陈 隋	周 隋	隋
唐	唐	唐	唐	唐五代	唐	唐
五代辽	五代	五代	五代		五代	五代（辽）
宋金	宋 以下略	金	宋	宋 以下略	宋	宋（金） 以下略

《嘉庆志》凡例。

(3) 详今略古。《一统志》卷帙繁浩，类目众多。建置、沿革、山川、形势、关隘、古迹、名宦、人物、土产等应如何撰写？通志馆旧藏诸本中，“徐本太繁，韩本太简”，应如何取舍？总裁及通志馆经过反复讨论，馆臣杨椿云：“椿往在明史馆，见徐公所撰《地理志》，建置沿革亦繁。请于总裁朱公曰：‘《志》为《明史》之志，宜纪明一代之事，宋元前可不必。’朱公深以为然”。他强调：“今《一统志》虽与史志不同，然奉敕为本朝作则。前代事见于古书者，仿《元和郡县图志》，仅书其大概。关于本朝者，内则稽之《实录》、《起居注》、《方略》、《会典》部院八旗档案，外考之史册，及府州县所咨送，下逮名人文集传记”。在处理建置、沿革、山川等史料时，总裁亦采纳了杨椿的这一指导思想，如“山川志其现在，古名不可考者，不必过为探索。”“形方地势，今古或殊，关隘险塞，止纪大者。”“前代战攻屯守，毋容述之过多。佐贰分防及巡检所辖，皆今之要地，宁详毋略。”“古迹类多附会，惟实有其地者量录”。成书后《一统志》基本达到了“详而不冗，简而不漏”的要求。

(4) 正讹补脱。一修、二修未作辨析的错误，三修发现后皆作考辨。例如宁国府陵阳山，《隋志》、《元和志》、《寰宇记》、《九域志》载于泾县；《舆地纪胜》既载于泾县，又载于太平县，说法不一。据考，陵阳山本在隋泾县境内，《隋志》所载不误。唐天宝中，析泾县地置太平县，陵阳山遂入太平县境。《元和志》、《寰宇记》未考唐天宝中县之分析，照抄《隋志》，因以致误；《舆地纪胜》不作考订，两地并载亦误。三修时，则改载于太平县下。又如《寰宇记》云：秦驻山（又名秦柱山、秦望山）在昆山县东南三十里。《嘉庆志》引《图经》辨之，改为在浙江海盐县东南三十里。再如：清丹阳县治（即今江苏丹阳）本秦之曲阿、三国吴之云阳，至唐始改为丹阳，汉丹阳郡治宛陵，即清之宁国府（即今安徽宣城）；其所领之凡阳县，即清太平府当涂县（即今安徽当涂）境；晋以后，丹阳郡治建康，即清江宁府（即今江苏南京市），三者并非一地，皆不治于清丹阳县。旧志将其混为一谈，三修作了分析，并指出其误。一修、二修脱漏之处，三修也作了增补。如璦辉将军萨布素是黑龙江名将，康熙年间曾率兵击退俄军，收复雅克萨城，一修、二修皆未载，三修始收入黑龙江“名宦”。

经过第三次修订，《嘉庆志》的质量明显超出前两部清《一统志》之上。张元济说：“居今日而治舆地之学，欲求一官本且后出而可信者，宜莫如此书。”所以《嘉庆志》问世后，很快就取代了前两部清《一统志》。

（二）内容特色

《嘉庆志》以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 1820 年）版图为据，首叙京师，次叙直隶、盛京、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新疆、乌里雅苏台、蒙古 22 统部以及青海、西藏等地区。最后附“外域朝贡诸国”。各统部先有总图、

杨椿：《上一统志馆总裁书》。

同上。

同上。

《嘉庆一统志·张元济跋》。

总表、总叙(内地统部各省“分野”、“建置沿革”、“形势”、“文职官”、“武职官”、“税课”、“户口”、“田赋”、“名宦”;边疆各统部增叙“属部”、“旗分”、“封爵”、“驿站”、“山川”、“土产”不一),再以府、直隶厅、州分卷,各有图、表,分叙“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二十五目(边疆各统部之属部略异,又有“属境”、“晷度”、“关邮”、“台站”、“营塘”、“卡伦”等不一;亦有属部无图者),州县之内皆在其中(蒙古各藩部辖旗亦同)。京师及兴京所在的盛京统部另有“坛庙”、“宫殿”、“行宫”、“苑囿”、“官署”等项,与其它地区略有区别。青海、西藏不称统部,无总图、总表、总叙诸项内容,直接记述各部的情况。

《嘉庆志》内容十分丰富,除侧重叙述疆域政区和建置沿革外,还包含着许多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材料。

在人文地理方面,《嘉庆志》记载了城池、风俗、学校、古迹、户口、田赋、土产、关隘、津梁、堤堰、陵墓、寺观、驿站等项内容,每项下又分为若干细目,如“古迹”一项载有故城、里、乡、村、垒、亭、台、楼、阁、馆、坛、街巷、园、苑、宫、圃、殿、堂、宅、碑、废卫、废所、废路、旧地等;“关隘”一项载有巡司、关、镇、市、所、口、站等;“田赋”项载有田地数、地丁正杂银、屯田丁粮银等。有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蒙古统部奉天府、锦州府、吉林、黑龙江的“驿站”,牧厂“古迹”所载的明初旧驿,伊犁、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哈尔、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哈密、吐鲁番、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喀尔、叶尔羌、和田、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的“卡伦”和“台站”(其中塔尔巴哈尔、吐鲁番、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库伦六地无“台站”),库尔喀喇乌苏、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哈密的“营塘”,穿越喀尔拜瀚海的“度漠驿站”,都是很珍贵的资料。又如《嘉庆志》统计的户口数较为完备,有的不仅可用于研究人口分布和人口密度,还可用于研究人口构成和人口迁移。卷五一七载伊犁地区有“驻防满州兵六千五百七十四名,锡伯兵一千十八名,索伦达呼尔兵一千十八名,察哈尔兵一千八百三十七名,绿旗兵三千九十八名,厄鲁尔特上三旗一千二百四十二名,下五旗二千四百八名。回户六千四百六户,二万三百五十六名口,民户七十一户,二百九名口。遣犯为民,五百三十名口”。这无疑是研究伊犁地区人口地理难得的资料。再如:“建置沿革”、“关隘”、“古迹”诸项中还保存了许多重要的碑文,卷五四七的“唐碑”记载了长庆初年唐与吐蕃会盟碑的全文;卷七一记载了康熙年间雅克萨战后在吉尔巴齐河口东岸建立《黑龙江分界石碑》的情况;卷五四五的《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文》记载了康熙帝亲征克鲁伦河,击败噶尔丹部、平定漠北的经过;卷五二七保存了乾隆《平定回部勒铭叶尔奇木碑》全文等等。这些文字和文物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此外,《嘉庆志》记载的手工业、农产品、田赋数、税课数、风俗、市镇、府州县学、书院等,也是研究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参考资料。

在自然地理方面,《嘉庆志》记载了各地区的地形大势,包括:山、岭、冈、峪、坡、石、嶂、洞、洲、滩、岛、屿、礁、矶、江、湖、河、海、荡、

溪、漳浦、港、湾、沟、渎、潭、泾、池、塘、泊、泉、井，以及沙漠、矿藏、气候和土壤等。其中，关于各地水体的记载尤为系统全面，它述及的水体之多，范围之广，是任何水利专书和地志无法比拟的。清代水利专书虽多，但论述的对象多为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等影响较大或为害较深的河流；有关农田水利的专书，则集中于太湖流域、畿辅地区等少数区域，大部分地区则付之阙如，若对清中叶全国水体分布情况进行普查，则舍《嘉庆志》之资料而莫属。《嘉庆志》记述水道又详于沿革和变迁，无论研究运河沿线的闸、坝、井、泉，濒海府州的海塘堤堰，还是探索关中地区的水利遗迹，调查洪泽湖和鉴湖等地的水陆沧桑，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又如关于各地温泉的特点和疗效的记载，可为今后开发和利用水热资源服务；关于各地矿藏的某些记载，还可供研究矿石的金属成分和推算矿区总储量参考。

《嘉庆志》是旧时代的总志，总的说来，人文地理（尤其是沿革地理）的资料居多，自然地理内容所占的比重并不大。

元明清3代皆撰有《一统志》，《元一统志》已佚，仅有残本、辑本传世。保存较完整的是《明一统志》和《清一统志》。若以《嘉庆志》与《明一统志》比较，其具有下列优点：

（1）在取材时间断限方面。明王朝以永乐年间的疆域最为辽阔，宣德以来，由于东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日益强大，以及明王朝内部的种种原因，明统治者对东北地区都司、卫、所的控制日益松弛，后来遂弃大宁、开平，失滦河、龙冈之险，明王朝实际控制的地区大体上限于辽东都司境内。

《明一统志》修于天顺年间，所载的疆域已非明朝全盛时期版图，永乐年间设置的奴儿干都司及其下属卫所已经全部失载。而嘉庆年间是清代版图最为辽阔、疆域最为稳定的时期，《嘉庆志》以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版籍为准，记载了全国各级政区，包罗了清王朝全盛时期的统辖范围，保存了许多研究清代边疆地理的资料。就2志取材的时间断限而言，《嘉庆志》较《明一统志》为优。

（2）在记述沿革方面。《明一统志》有关沿革的内容，仅见于“建置沿革”，而且十分简略；“古迹”中也罕有论及沿革之处。《嘉庆志》记述沿革，一见于“沿革表”，二见于“建置沿革”，三见于“古迹”，不但内容翔实，而且各有侧重，可以相互参证。例如《明一统志》卷十六池州府石埭县“建置沿革”云：“本汉陵阳、石城、泽三县，地属丹阳郡。三国吴置石埭场，梁因置石埭县。以有两石横亘溪上如埭，故名。隋省入南陵，唐复置，宋、元仍旧，本朝因之。”全文仅近60字，所云甚为简略。《嘉庆志》卷一二载池州府石埭县沿革，共有三处：一见于“沿革表”：“三国吴为石埭场。南朝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置石埭县。隋废。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复置，属池州。宋因之。元属池州路。明属池州府。本朝因之。”二见于“建置沿革”：“汉置陵阳县，属丹阳郡，后汉因之。晋初改属宽城郡。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改曰广阳。宋、齐以后，因之。隋平陈，废入泾县。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割秋浦、青阳、泾三县地，置石埭县，属池州。五代、宋因之。元属池州路。明属池州州府。本朝因之。”三见于“古迹”：“石埭故城，在今县西。《元和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洪州都督李勉奏割秋浦、青阳、泾三县，于吴所置陵阳城南五里置县。’《寰宇记》：‘吴封韩当为石城侯，遂置石埭场。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废入宣城。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置石埭县。隋平陈，并入南陵。唐永

泰初复置。’《县志》：石埭故址，在县西有五十里，今名七里街。宋桂大受《水晶宫记》曰：‘理宗宝庆初，始作新邑于此，以四门皆山，不立城郭，因掘珠岭为东门，南山为南门，处岭为西门，硤路为北门。后六年迁他所，盖还旧治也’”。两相对照，《嘉庆志》的记载详备得多。

(3) 在类目和内容方面。《明一统志》各布政使司下分 21 类（京师、中都、南京增加“城池”、“坛庙”、“山陵”、“苑囿”、“公署”，多少不一），《嘉庆志》则分 25 类，较《明一统志》多“疆域”、“分野”、“城池”、“户口”、“田赋”、“税课”、“堤堰”、“关隘”、“津梁”7 类，缺“郡名”、“书院”、“封藩”、“关梁”4 类。在《嘉庆志》所缺 4 类中，“郡名”已并入“建置沿革”，“书院”已并入“学校”，“藩封”已并入“人物”（边疆地区另有“封爵”），而“关梁”则已分为“关隘”和“津梁”2 类。实际上类目并未减少，内容反而有所增加，例如《明一统志》“关梁”只记关隘和津梁，而《嘉庆志》“关隘”又载巡司、驿站（少数边疆地区单独立目）、镇、卫、所、营、河泊所等，“津梁”下载桥、津、渡等。《嘉庆志》总叙和其它各类的内容也较《明一统志》丰富。

(4) 在表述地理内容的形式方面。与《明一统志》相比，《嘉庆志》更重视利用地图和沿革表。《明一统志》只有卷首一幅简图，各布政使司及府州皆无地图。《嘉庆志》卷首有《皇舆全图》一幅，各省统部和府州卷首又绘有分图，表示各级政区的地理方位。这些地图“分则粲若列眉，聚则合如连壁。”极便观览。《明一统志》无表，《嘉庆志》则利用“沿革表”表示自秦迄清的各级政区的废置并迁，查阅十分方便。《嘉庆志》的图、表，再加上“建置沿革”部分的文字，可谓集图、表、志的优点于一书，其立意和构思皆在《明一统志》之上。

另外，《嘉庆志》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编纂的最后一部总志，距今不到 200 年。近 200 年来，政区变革虽多，但县级政区相对较为稳定，内地各省的变化也不是很大。在通常情况下，利用《嘉庆志》查考历代建置沿革和确定古地物方位最为方便，因此它历来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由于卷帙繁浩，与修人数众多而水平不一，《嘉庆志》也有一些错误或不妥之处。在边疆地区，政区和山川的记载较为疏略，例如清朝于沿边地区设有多处牧厂，据《蒙古游牧记》、《东三省政略》等书考证，养息牧厂东北至科尔沁左翼前旗仅 35 里，《嘉庆志》却云 110 里；西与西北至西勒库图伦界 110 里，《嘉庆志》却谓 150 里，养息牧场的面积显然被夸大；又如清代混同江应指黑龙江干流下游，而《嘉庆志》则将整条黑龙江和松花江并释为混同江，概念含混。《嘉庆志》记述的地理内容间有脱漏之处，如雍正二年（公元 1724 年）至十二年清政府先后设置了张家口、多伦诺尔、独石口 3 厅，管辖长城口内外部分旗民，《嘉庆志》表疏漏而未列。也有不够精当之处，例如据史籍记载和今人考证，汉华容故城在今湖北潜江县西南，《嘉庆志》却云在监利县西北；汉云杜故城即今湖北京山县治，《嘉庆志》却云在沔阳。又如秦柱山（即今浙江海盐县东南秦山）并非苏州、松江、嘉兴 3 府的界山，却在《嘉庆志》中重出 3 次，一见于苏州府，二见于松江府，三见于嘉兴府（载于苏州、松江 2 府者误），此皆疏忽不慎之处。此外，《嘉庆志》将派出使者来华的朝鲜、日本、法兰西等诸国，统称为“朝贡诸国”，作为末志列于最后的卷文中，自以天朝大国自居。

五、《历代地理沿革表》和《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

（一）《历代地理沿革表》

《历代地理沿革表》共 47 卷（卷首目录 1 卷，表 46 卷），为清陈芳绩所撰。陈芳绩字亮工，生卒年不详，江苏昆山濂泾人。其父陈梅曾在濂泾与顾炎武同居 5 载，交往过密。芳绩亦“游从有素”，《亭林文集》中有寄怀酬答诸诗记之，可见其学问盖有渊源。明亡之后，陈芳绩隐居不出，弃举子业，以教课为生。他有感于“历代史与天下府州县志大都纷纭错杂，牵扭重叠，皆因作史者止就一代，作志者止就一方，未究根源，而阅之者承讹袭舛，终莫考正”，乃“究心于天文地理之书，著《天下郡县舆图》”，又“博观二十一史，广搜天下志乘，按其山川、城廓、形势、位置，究其历代渊源”，于康熙元年（公元 1667 年）冬撰成《历代地理沿革表》。

陈书乃未竟之稿，撰成后并未刊刻，由是埋没 156 年。后来，张大镛在屈侃甫家发现此稿，“览而善之，思广其传”，乃嘱同乡黄廷校勘补正，又由蔡芳、罗棻、吴翊寅、桂铭球、陈名慎、傅维森、李肇元、史悠成、陶福祥、张成德、廖廷相、汪兆铨分任一校、二校、三校，至道光十三年（公元 1833 年）交付剞劂，始得以问世。

《历代地理沿革表》是以表的形式论述上古至明代地理沿革的著作。表分 3 等：一曰部表（卷一～三）；二曰郡表（卷四～一八）；三曰县表（卷一九～四六）。叙列历代政区沿革，凡有关添设、并省、更名、徙沿者，尽量详细具载。

芳绩云：“舜建十二州牧。汉仿其制而为十三部刺史，统辖天下郡县。至南北朝，滥及二百余。隋复并而为九。唐变化为十五道采访使。宋变而为十九路安抚使。元又更为行中书省。明则为布政使司。名虽异而体实同。故作部表”。故全书首列部表，该表以虞为首，次汉至明，共 12 格。

芳绩云：“秦以天下为郡。汉以后俱仍其制，迨隋唐而或称州，又有曰府曰军，元则称路，明尽称府，皆以统县”。故次列郡表，郡表以秦为首，次汉至明，亦 12 格。

芳绩云：“县自春秋时，‘楚子县陈’而名始见，其时县大于郡。至秦始皇尽县天下，县始隶于郡。迄今数千年，皆不改易，县亦当以秦始。惟秦无记载，至《汉书》始有地理志，县名、建置乃得详书，故县表第据《汉志》为断”。故殿为县表。其一二置于先秦暨春秋列国地名，皆附注于汉格。

《历代地理沿革表》内容包括：

（1）虞 12 州。实载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荊州、扬州、交州、雍州、梁州、并州、幽州、营州 13 表。

张大镛：《校刊历代地理沿革表序》。

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自序》。

张大镛：《校刊历代地理沿革表序》。

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凡例》。

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凡例》。

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凡例》。

(2) 秦 40 郡。实载内史、三川、河东、颍川、泗水、碭郡、东郡、邯鄲、钜鹿、郟郡、琅邪、薛郡、齐郡、南阳、南郡、长沙、九江、鄣郡、会稽、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上党、太原、雁门、云中、九原、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南海、桂林、象郡共 40 表。

(3) 汉县。共 1577 表。

诸表包罗秦汉至元明各种政区的发展变化情况，如州、道、路、省、郡、府、县、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的添置、归并、更名、改隶、迁治、废仍情形。“凡说有不同者，皆明辨而详注之”，“其未能确然者，两存之”。

表中用方框标出的 147 处考证和辨析（部表 7 处，郡表 53 处，县表 87 处），是本书精华所在，有的考证和辨析，如《秦三十六郡考》、《考竟陵云杜》、《废东城考》、《丹阳考》，都是内容精湛、质量较高，可以单独成篇的论文。如前所述的郡表以秦 40 郡为目，然史志所载，各有异同，故芳绩作小序于前，又作《秦三十六郡考》于后，该文实为郡表 40 郡取舍之依据，与郡表关系甚大。现摘录如下，以便读者了解其观点及文采。

附《秦三十六郡考》

案《史记》秦并诸侯，分天下，置三十六郡。今详其名，合内史而有鄣、黔中，无南海、桂林、象郡者，《史记》裴骃《注》也。别内史而有南海三郡，无鄣、黔中者，《汉书·地理志》也。合内史、南海三郡，并鄣、黔中，增闽中为四十郡者，《晋书·地理志》也。其班《志》不言秦置而为秦郡者，《后汉书·郡国志》丹阳之为秦鄣郡、武陵之为秦黔中也。其《史》、《志》不言秦置而见于《汉书》注者，东海郡下应劭曰秦郟郡也（按：应亦后汉人，首注《汉书集解》）。其别内史，并数鄣、郟二郡，去闽中而增榆中为四十郡者，今之陈氏《地理沿革表》也。聚讼纷如，几令考古莫适所从。已不憚谫陋，取《史记》合两汉、晋地志文注反复参稽，知三十六郡之名，裴《注》最近之。窃谓于裴《注》，当增郟郡、别内史而为三十六。于《晋志》，当去闽中而增郟郡，合内史而为四十。汉既分内史为三，当并数冯翊、扶风，得四十二。以班《志》总注，凡郡国一百三，并计秦置汉增之数适合，如此则诸说可通，《史》、《志》之文皆无违戾矣。班《志》统汉郡下，有“秦”字者三十六，今三十六郡之名不从《汉志》而从裴《注》何也？以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分置诸郡，自不得列后之平百越所置之三郡也。况《汉志》总论云：本秦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下云：汉兴，稍复开置。知三十六郡第溯其初制，非综秦一代之逮置。而南海三郡下，又明言武帝元鼎六年开，则虽曰秦郡已入之开置，其不当并数于前三十六郡中明甚，不得以数之偶合，强为依违也。惟秦以内史外分三十六郡，犹后之以京师直隶外省，内史自不在三十六郡之列，故裴《注》当参以《汉志》注中郟郡补之。至《晋志》之四十郡，去闽中而增郟郡数之，盖由初而言，不当列内史于诸郡；由后而言，不得外内史于秦置。其异于《汉志》者，鄣与黔中本之《郡国志》也，郟郡本之《汉志》注文也。三十六郡之名既得其实，则裴《注》与汉、晋两志之

相违，不过在南海三郡之离合、内史之出入而已。一溯其始，一纪其终，大致本无抵牾也。若榆中之名，虽见《史记·东越传》，而两汉地志未载，则以汉平东越，已虚其地，不设郡县，此与塞外榆中之三十四县旋置旋弃者，皆在所当略矣。

此外，陈芳绩考宋有 2 桂阳，一属连州，一属郴州，元至元十九年（公元 1282 年）升州之桂阳非郴州之桂阳（卷三 县表一二）；考汉晋地志无平阿，证《惟扬志》云高邮在汉为平阿县之误（卷二六县表八）；据《寰宇记》、《宋史》，证《黄冈县志》、《明一统志》云宋黄冈县迁治邾城之误（卷八郡表五）；据《水经注》，证三国石阳故城在吉水东北 20 里者是，云在泰和西北 30 里者误（卷三二县表一四）；辨细柳营在咸阳西南 15 里，云在万年县东北 30 里、长安西北 13 里及昆明池南者皆误（卷一九县表一）；辨南朝齐有四丰阳、其北丰阳属南上洛郡，余皆属北上洛郡（卷二 县表二）；辨沧州徙治长芦当在靖难之后，证元季和洪武初迁治之误（卷六郡表三）等等，皆其精思卓见之处。这些考辨散见于表中，往往为读者所忽视。今特举数例，以提示读者观览。

中国历史悠久，数千年来，政权之兴替、割据、纷争，政区之更迭、发展、变化，均十分复杂。欲将如此庞杂的内容纳于一表，殊非易事。为了解决种种问题，陈芳绩根据制表要求，拟成许多具体例则。例如：州在历代之升降不同，汉晋六朝时，州总管郡国；隋唐以后，等于郡守；至元以后，相当于县。故陈芳绩将隋以前之州列于部表，隋以后之州列为郡表。元以后，因州亦能统县，故仍将其列在郡表之中。又如，青、徐、兖、豫诸州，地当南北之交，宋魏之世，日相争夺，郡县失陷后，则以其流民侨置，是以一郡一县，官无专制，刺史守令，五六同城，表有限制，难以具载，陈芳绩遂“止纪其侨置州郡而已，其侨置县则略之”。为使行文简练，他又规定各种用语的特定含义，如：“此郡之县改隶彼郡者，曰改属。以县分立新郡，曰分属。郡废而县并某郡者，曰并属。以县分去而复归，曰复属。仍旧而郡名已改者，曰仍属”。根据这些例则，陈芳绩将资料爬梳整理，参对详核，使之分别等级，逐一入表。道光年间付梓前，黄廷 又做了许多校补工作。凡原稿脱漏之处，皆发书补之。如原稿有缺页，无别本可补，廷 遂“依据汉县为提纲，以历代史志及唐宋以来总志补之”；又如，三国、五代时期之州县，原稿多阙建置年代与“仍”、“废”字，廷 乃“详考历代史志，旁参唐宋舆地书，暨今之吴氏《十国地理表》、洪氏《三国疆域志》，有可据者补之”（凡廷 补正之文，皆加“按”字，以区别于陈文）。凡断代欠妥之处，悉加订正。原稿以辽入五代，殊为不妥，因辽之立国在梁贞明年间，亡国于宋宣和之时，与宋南北对峙 160 年，理应与宋、金为一代，廷 遂“改宋、辽、金为一格”。凡纪年杂乱之处，悉改用统一年号。如明太祖建元之前，原稿有用元末年号者，有单举甲子者，有以龙凤纪年者，例殊庞杂，廷 改为“概书太祖某甲子年”。凡 3 表列格不统一者，悉改成一律。如部、郡 2 表，原稿起于虞秦，下至元明，列 12 格，而县表则自汉至明，列 11 格，例殊不一，廷 亦将县表“改从十二格”。凡文字较长、检阅不便者，亦变通书写形式，加以技术处理。廷 “择其正文可断者离之，另作方围，书于左右空方，俾上下文既不淆杂，而观者亦作醒目”。校补后的《历代地理沿革表》，条分缕析，体例井然，开卷之后，一目了然，是一部颇便检索的历史地理参考书。

本书由古至今，上溯虞夏 9 州，下逮明代分省，包括数千年之州、郡、府、县，并将其贯串无遗，开创了新的史地表体裁，被时人誉为“前此未有之书”^①。这种体裁为许多后世学者所采用，段长基《历代疆域表》、杨丕复《舆地沿革表》皆仿此而作。

陈芳绩和黄廷 于此表用功虽多，但受条件限制，陈芳绩“未能悉致天下之书”^②；黄廷 校补时，“钦定《明史》未颁，故叙明代事，祇据《明一统志》及郡县诸志”^③，因而遗误难免。又受体裁限制，有些内容只能剔除在外，这也影响到它的参考价值。

（二）《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

《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是一部分韵编排的历代地名字典。作者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清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嘉庆十年（公元 1805 年）进士，选庶吉士，后官凤台知县。7 年任期内，他浚焦冈湖（汉芍陂故址），增堤防，设沟闸，兴办水利，百姓屡获丰年。于僻远地区设立义学，招聘良师，推广教化。又发动百姓捕捉盗魁，察辨好坏而抚用之，“为人所喜称”^④。后因父忧离去，不再作官，主讲江阴书院二十年之久。他通晓经学、音韵、训诂、历算、地理，以“实学”为教授内容，培养出不少人材，江阴承培元、宋景昌、缪尚诰、六承如等皆其门生。生平著有《养一斋集》、《历代地理沿革图》、《皇朝舆地韵编》、《皇朝一统舆图》，纂有《皇朝文典》、《凤台县志》、《骈体文钞》等。

李氏嗜好舆地之学，他感到：“历代地理建置沿革变化纷总，名实讹淆，或同地而异名，或同名而异地，南北相乖，东西易向，试图史书，方隅莫辨”^⑤。于是率同诸门人汇集历代郡县地名，“以韵编之，分别时代，条其异同，钩稽今代所在之处”^⑥，纂成《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一书。最初的编写者，有徐绍堂、王渭行、夏时、陆楨、张志纯、吴廷灿、曹秉纯、刘纯祚。参与定稿缮录的有宋景昌、六承如、周賡良、郑经、徐思锴、黄志述等。李氏以六严为主要助手，得其力十之七八焉。^⑦

按照字音编排的字典，早在魏晋时期已经出现。这类字典，首推韵书。它们大都先分四声，次分韵部，再分韵目，用反切注音。所谓四声，即“平、上、去、入”四声（后因“平”声字多，又分为上下两部，有“上平”“下平”的分别）。所谓韵部，就是把同韵的字归为一部，如《广韵》分为 206 部、《平水韵》分为 106 部、《中原音韵》分为 19 部等等。所谓韵目，是指韵部的标目及次序，如上平声的一东、二冬、三江、四支；去声的一送、二宋、三绛……等。所谓反切注音，就是用上下两字切成一个音节，取上字的声和下字的韵，来拼合成所切字的音节。例如“中”字是“陟弓切”，取“陟（zhì）”字的声母（zh—）和“弓”（gong）字的韵母（—ong）来拼合成“中”（zhong）字的音节。“国”字是“古或切”，取“古”（g）字的声母（g—）和“或”（huò）字的韵母（—uo）来拼合成“国”（guo）字的音节。韵书便于一般人写作诗文和应付科举考试，所以魏晋唐宋以来特别流行。音韵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至金、元时期，韵母已逐渐简化，形成了并韵的风气，又因为韵书有应试作文之用，便产生了 106 个韵目组成的《平水韵》。这 106 韵，元明清时被定为政府功令，不特为制作近体诗赋时的依据，并且作为一些工具书排检字词的编目。李氏使用这种编目方法编排历代地名，无疑是一

种可贵的尝试。

《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编排地名，以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5部为纲，以《平水韵》106韵为目，全书卷次内容如下：

卷一~五：上平之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鱼、七虞、八齐、九佳、十灰、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删。

卷六~一一：下平之一先、二萧、三肴、四豪、五歌、六麻、七阳、八庚、九青、十蒸、十一尤、十二侵、十三覃、十四盐、十五咸。

卷一二~一四：上声之一董、二肿、三讲、四纸、（五尾缺）、六语、七虞、八荠、九蟹、十贿、十一軫、（十二吻缺）、十三阮、十四旱、十五潜、十六铣、十七筱、（十八巧缺）、十九皓、二十哿、二十一马、二十二养、二十三梗、二十四迥、二十五有、二十六寝、二十七感、二十八俭、二十九赚。

卷一五~一八：去声之一送、二宋、三绛、四寘、五未、六御、七遇、八霁、九泰、十卦、十一队、十二震、十三向、十四愿、十五翰、十六谏、十七霰、十八啸、十九效、（二十号无）、二十一个、二十二宥、二十三漾、二十四敬、二十五径、二十六宥、二十七沁、二十八勘、二十九艳、（三十陷无）。

卷一九~二二：入声之一屋、二沃、三觉、四质、五物、六月、七局、八黠、九屑、十药、十一陌、十二锡、十三职、十四缉、十五合、十六叶、十七洽。

每一韵目下，同声同韵的历代地名汇编在一起，分别予以诠释。其地名下小注，“以时代先后为次，郡详其所属州部，县详其所属州郡。同地同名等以代，中隔以空圈。地异而同名者次之，隔以黑子”^①。例如卷七韵目六麻下，同韵字十八，计有麻、花、霞、家、华、沙、瓜、邪、嘉、瑕、衙、巴、葭、挝、靡、吾、杷、查。其“瓜”字条地名及释文如下：

黄瓜（北魏）县。秦州汉阳郡。今甘肃秦州西南。

瓜（唐）州。陇右道。今甘肃安西州东。（元）州。甘肃沙州路。今甘肃安西州治。

木瓜（宋）堡。陕西永兴军路环州。（金）镇庆原路环州。甘肃庆阳府环县东北一百四十。（明）司。贵州省贵阳府。今阙。按当在贵州贵阳府境。

清代地名声读，多沿用方言土音，与通行声读不同。李氏编书时，凡“《汉书》有注说可据，则依注分韵。晋、宋以下，别无注证，则以通行声读编之字之。”^②“古今异体者，悉依各史原文编入，仍归一韵”^③，如黝、黟；孤、觚、溪皆是。“若一字异音，则两韵分收”^④，如“虹”分东、送；“共”分冬、送；“与”分语、御皆是。又“字有今韵所无者，各依编旁音纽附入”^⑤，如羨入支，入尤，邛入纸等。

编入《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的地名，采自《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新五代史·职方考》以及宋、辽、金、元、明五史《地理志》。除州郡、府、县外，唐、宋、金、元、明《地理志》每详镇、堡、羁縻州郡、长官司类，有“实地可据”者，皆“并列之”^⑥。南北朝侨置州郡虽无实地，但“侨置之处多有可考，故即其附注在所，约略注释”^⑦。

本书是假众人之手，断断续续编纂而成的。自道光二年(公元 1822 年)，“以上古《禹贡》三代、春秋、战国为经始，年余乃成。继检各史地志，别为录副而编以归韵，编写凡三四年乃既。继检《皇舆表》及《一统志表》，详其沿革，著之于图，皆得其实地，则又七八年。继会前代郡县注之每韵下，又三四年而后成” 。先后达 16 年之久 。14 部《地理志》地名繁浩，编排时又无前例可供借鉴，工作难度很大，李氏颇有“成之甚难，散失甚易”，“写之颇难，校之尤难” 的感叹。此书编成后，李氏曾打算将正史地名，“见于因事而非郡县者，悉编出之，亦以韵类之，籍可并入上古《禹贡》三代、春秋、战国诸地名” ，使诸史地名皆有归宿。因困难甚多，后来仅徐思锴成《晋书》一种，余皆未竟。

正如李氏本人预料的那样，“编长纂杂，诚不能无舛谬漏舛” 。作为一部工具书，《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尚不能尽如人意。同治年间，李鸿章应刊刻《李氏五种全集》者之请，为之作序，指出其存在问题多种：

其书以史志为主，《史记》八书无地舆，故所载古国邑、秦郡县皆不录，而断自汉始。三国及梁、陈、北齐、周诸史无志，故梓潼、朱提置于蜀，武昌、建业创于吴，而统称晋郡。江阴、昆山，梁县也；成安、固始，北齐县；熊耳、灵泉，周县也，而统称隋县。数代之规，二志为总汇，而《晋志》特为疏略，如南广为蜀郡，沿于宋，《齐志》独无之；雍州之始平，广平之临水，皆不言魏立；其三国增置，晋革其名，如云阳、莹阳、吴昌、广魏之属，益无所征也。又其甚者，晋代之制，如齐国有般阳，汶山之典乐本名白马，见《太康三年地记》；晋熙之怀宁、新治，豫章之豫宁，见沈约《宋志》；陇西之兰池，见王隐《晋书·地道记》，而志皆无征。且一书之中，传及，地志乃佚其名，如《陶侃传》为枞阳令，志无枞阳县；侃为荆州，领西阳等郡，陈頊、庾亮翼诸《传》皆云西阳太守，而志无有。又况散见于他书，为《晋志》无考，如汉沙羨(音怡)县地，晋置沌阳县、渫阳县，晋太康中置；越巂、灵关、道县，晋改护龙，见《水经注》；阴平有平武、梓潼之涪城，侨置，西充国益昌二县，见《元和郡县志》，不胜屈指，颇有出于毕秋帆《尚书新补正》之外者。其在他史，遗佚亦往往而有，如《汉志》庐江郡自注金兰西北有东陵，《水经》、《禹贡山水释地》东陵地在庐江金兰县西北；《水经·沔水篇》又东过牛渚县南，注牛渚在姑孰、乌江两县界中，而汉、晋、宋、齐诸《志》无金兰及牛渚、姑孰县名；又金女、大文、桃班、阳口、历口之类，皆不见于诸《志》；元巴延潜兵入汉，屠沙洋，陷新郢，《宋志》乃无沙洋、新郢也。抑是篇所谓“皆得其实地者”，亦不能无憾焉。《水经注》汉西陵在黄石矶，今黄州府东南百里也，今释云在黄州西北。汉南安当即今四川乐山县治，今释云在夹江县西北二十。安乐水源北经安乐县界，又经符县下，北入江，今释符及安乐俱云在泸州合江县西。又《旧唐书》石首旧治在石首山下，显庆初移至阳岐山下，按郗氏石首山乃调弦口东南之东山，邑志云县旧址在调弦口，往东山路是也，今自晋及明，统释云今石首县治 。

清代虽盛行《平水韵》，但实际读音多以北方官话音作标准，而地名声读又多沿用方言土音，因此本书在编排、检索、使用时，与实际读音和流行读音违碍之处不少。民国以后，废除科举，新文化运动肇始，新诗流传，一般说话唱戏也多采用“普通话”读音，声、韵、调系统日趋简化；加上检索方便的各类地名工具书不断涌现，《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遂被其它地理辞书所取代。

第二章 方志与域外地理志

一、方志

方志是中国地理学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起源早、数量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现存方志达 8000 种以上，其他国家罕有其匹。清代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鼎盛时期。官修的省府州县志成批涌现，私修的方志亦如雨后春笋，与官修方志争相辉映，成为清代地理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一）清代方志概述

清代方志大多是省、州、府、县奉命纂修的，少数由地方或个人撰修。

清初编纂《明史》、三修《清一统志》，后来编纂《大清会典》、《清文献通考》等文献典籍，皆令直省编纂志书，提供资料，直省和府州编纂省志、府志，也要州县修志，以供采择。如康熙年间修《明史》，清廷特命各省督抚修志^①；二十四年（公元 1685 年）又诏天下各修府州县志，以备《清一统志》采择；雍正六年（公元 1728 年）“命天下督臣修直省通志”，“汇送一统志馆”^②。以后又规定，各地方志“每六十年一修”^③。清初编纂规模巨大的全国性巨著以及方志“六十年一修”的规定，促进了各地修志的经常化和制度化，因此康熙至嘉庆年间成书的方志特别多。后来，“六十年一修”的规定虽未严格执行，但不少府州县志皆能做到数十年或百余年一修。今存清代云南省志有 13 部、河南省志 6 部、永平府志 5 部、徐州府志 5 部、徽州府志 6 部、松江府志 6 部、光州志 6 部、六安州志 6 部、无锡县志 10 部、丹徒县志 6 部，便是典型的例子。当时不论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还是边远地区，清修方志数量，都比明代明显增加。（参见表 7、表 8）

私家编纂的方志，原因有多种多样，有的是地方官到任后，为了解当地情况而修纂的，如云中知府胡文焯到任后，“日侍别府帷幄，凡所咨扼塞、户口、士马、金谷之数，多不获原册考究”^④，便在顺治七年（公元 1650 年）聘请博学之士，纂成《云中郡志》，以供参考；有的是在外患内乱交困时，为“御寇边防，兼筹水陆，依山设险，添建围墙”而编纂的，曾国荃修《山西新志》便是为此。有的是发现旧志有误，为辨正舛误而修纂的，康熙年间方式济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被发配到黑龙江卜奎（今齐齐哈尔）戍边，通过实地调查，他发现旧志所载大多得于传闻，秉笔者并未亲临其地，以致错误甚多，便在考察地理古迹、探诸风物源流的基础上，撰成《沙龙纪略》一卷。有的因参与志局修书，或不遂己意，或因故未成，便另行编纂，顾炎武修《山东肇域记》、焦里堂修《邗记》便属于这一类。私修方志名目繁多，有纯属方志体例而避其名者，如嘉庆初荔扉所纂《滇系》，实系云南通志，而不用其名；还有不以全境作为记述对象，仅析其中部分专门作志的；更有专门立例示范，仅作编纂提纲，不修全书的。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将那些专记一方史迹的、专记人物的、专记风俗轶闻的、专记路程里距的、专记山川名胜的专书也称作方志，那么清方志在内容上就更加五花八门，体例上就更加风格迥异了。

表 7 经济发达地区修志状况（以今政区统计）

地区	朝代	省志	府、直隶州志	州、县志	乡镇场志	其它
上海	明		4	10	1	
	清		6	35	48	
江苏	明		16	84	4	
	清	3	14	220	68	8
浙江	明	7	28	72	3	1
	清	3	23	262	47	3
山东	明	1		58		
	清	4	2	375	1	
安徽	明		13	58	1	
	清	3	21	217	2	
福建	明	3	24	47	1	1
	清	4	21	147	1	
江西	明	3	18	21		
	清	3	43	358		

清代编纂的方志，没有精确的统计。《清史稿·艺文志》著录 824 种，脱漏大半。《清史稿·艺文志补》补充著录 2159 种，二者相加，共计 2983 种，仍不完全。庄威凤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说现存清方志有 40889 种。但这个数字，未将乡土志、里镇志统计进去，已经失传的方志（包括有存目和无存目者）也未纳入统计，有些方志的“始纂”“辑成”、“刊印”的年代跨越二个朝代或不同时期，情况较为复杂，很难断代归类，因此这个数字只是一个不完整的相对正确的统计数。笔者也做过一个统计，包括乡土志、里镇志在内的方志现存有 5298 种。这个数字仍然是一个相对正确的统计数，统计时所作的技术处理，同样很难说十分科学。这 2 个统计数表明，学术界认为清修方志不少于 6000 种的看法，基本正确。清修方志的卷数和部数，在历代方志中皆居第一位。

为使各地官修方志符合中央需要，清廷颁令修志时，往往附有许多具体规定，以便各地遵循。清康熙十一年（公元 1692 年）保和殿大学士周祚建议：“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田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周祚的建议已提出了汇集的内容。这一建议，后经康熙帝批复，转发各省施行。同年，礼部七月二十四日《题本》又强调“直隶各省通志，请敕下该督抚详查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题本》不仅规定了各省通志的内容，而且进一步规定了通志的款式。河南巡抚贾汉复纂修的《河南通志》是清代最早修成的省志，于顺治十七年（公元 1660 年）成书，共 50 卷。分图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风俗、城地、河防、封建、户口、田赋、物产、职官、公署、学校、选举、祠祀、陵墓、古迹、帝王、名宦、人物、孝义、列女、流寓、隐逸、仙释、方技、艺文、杂辨 30 门。其内容及分类较符合要求，故清廷命令各省一律按此发凡起例、定下程式。各省督抚奉命后，悉以此为例修纂志书。两江总督于成龙为《江

西通志》制定凡例时，便明确指出：“今遵部文，体例科条悉仿《河南通志》” 。其它各省，亦皆如此。康熙二十二年（公元 1683 年），礼部檄催天下各省，又再次强调“遵照《河南通志》例，限三月成书” 。因此，这一时期成书的省志，内容和体例大体雷同。

表 8 经济不发达地区修志状况（以今政区统计）

地区	朝代	省志	府、直隶州志	州、县志	乡镇场志	其它
内蒙古	明					
	清	2		6		8
黑龙江	明					
	清	2		7		
新疆	明					
	清	6		51		
台湾	明					
	清	12		29		2
广西	明	2	7	1		
	清	4	22	102		
云南	明	5	3	2		
	清	13	401	134		8
贵州	明	4	1	2		
	清	7	19	52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 1690 年）河南巡抚阎兴邦向所属府州县颁发修志牌照，对各款内容详加诠释。其凡例共有 22 条，规定十分具体：

- 总图：须精详。
- 沿革：须照诸史考证，毋得混入，不必过多。
- 天文：略摘切要者，勿用混载，以分野所躔者广也。
- 四至：疆域要考证。
- 建置：城池需载明几时建，某人修，一一查明。学校止载其起修、修葺，不必载闲文。其新定乐午等宜增入。
- 河防：宜先叙前代，而以今近所开、所淤，备细入之。
- 乡村集镇：止载方隅里数，有古事者注之。
- 公署：止载创建始末。
- 桥梁：止载创建始末。
- 仓库、社学：止载方隅、建造日月。
- 街巷、坊第：须注明何处。以上凡有事实者，当详考而载之。祀典及书院考证，载之勿遗。
- 山川：须考果系封内者方载入而不可遗漏。河道要将近日祈开浚、淤塞、变迁等查明，其间事实详细说明，不可以小说搀入，如《宜阳志》之可笑也。
- 古迹：须考明某代某人，将事实注明，不得遗漏，不可以小说搀入，如《宜阳志》之全载野史也。

—风俗：略载之，而不自加论断。
—土产：非地所出及平常草木，可不必载，须载其特产者。
—陵墓：须注明某代某人，有碑碣与否。
—寺观：必奉敕建，或建置已久，有可考者载之，余删。
—赋税：止载旧额若干，新增新减若干，不必一一细注，有关系者全载之。

—职官：须载其爵里、时代、年月、有可纪，略书之。

—人物：圣贤、忠贞并入。其科贡等，必载其家世、时代、年月、字某、号某，分别某科某项。若系乡贤，为立一小传于后。

—流寓：孝义、烈女、隐逸、方技：各考实详核以载，其节烈务在阐发幽光，勿专载世家而遗寒素。

—艺文：须择佳者，或关驿乘者载之。八景不可录，录必录其佳者。

—灾祥、杂杨：仿古为之。

这一通行河南各府州县的凡例说明，对每个门类和款式都有详细具体的要求。这种做法对方志体例的规范化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廷对各地修志十分重视，除由上而下逐级行文、颁发志例，由下而上申详呈报、逐级审查外，还将所修志书的优劣作为考评地方官政绩的标准，进行议叙，予以奖惩。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颁旨称：“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葺，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缺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宽至二三年内纂成具奏。如所纂之书，果能精详公当，而又速成，著将督抚等官，俱交部议叙。倘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或至有如李绂之徇情率意者，亦即从重处分”。奖惩事关地方官前途，故各级官员无不用心，谨慎从事。评定志书优劣，第一标准便是体例是否允当。这种行政手段，也迫使方志体例趋向于严谨和规范化。

清代，学者参与修志活动蔚然成风。在这些学者中，一部分人身为封疆大吏或府州长官，他们亲自主持修志工作，如广西巡抚谢启昆、广东巡抚阮元、山西总督曾国荃、扬州知府伊秉绶等，修成的志书，多为佳作。更多的学者，如顾炎武、方苞、戴震、章学诚、钱大昕、纪昀、洪亮吉、孙诒让、鲁一同、钱泰吉等，或受聘担任总纂，或布衣参与修订商榷，皆在不同程度上参加过修志工作，他们将修志看作“著述大业”，“不朽盛事”，不仅态度认真，学风严谨，十分重视体例和考证，而且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志书之中，他们很爱惜自己的声名，不盲从不同的观点，更不肯苟且从事，由他们主修的方志质量很高。这些人名望高，影响大，他们纂修的方志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多为时人所仿效。陈澧说：“昔阮文达修通志时，遍选各志书，以谢中丞所修《广西通志》为最佳，故《广东通志》仿其体例。嗣后各府县志，多依阮通志体例。今修《肇庆府志》，亦依阮通志体例”。

清代著名的方志很多，以省志而言，顺治《河南通志》，康熙《陕西通志》，雍正《浙江通志》，嘉庆《广西通志》、《湖北通志》、《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安徽通志》，道光《湖广通志》、《陕西通志》，同治《畿辅通志》、《江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湖南通志》、《安徽通志》、《湖北通志》，宣统《新疆图志》等修得较好。府志中，乾隆《宁波府志》、《松江府志》、《西宁府志》、《汾州府志》、《庐州府志》、《江宁府志》、《荆州府志》，嘉庆《扬州府志》、《徽州府志》，道光《雷州府志》、《宝庆府志》、《贵阳府志》，咸丰《遵义府志》，同

治《苏州府志》、《湖州府志》，光绪《绍兴府志》、《顺天府志》等较为出色。州县志中，康熙《邹平县志》、《济阳县志》、《德州志》，乾隆《历城县志》、《诸城县志》、《临清直隶州志》、《鄞县志》、《汾阳县志》、《偃师县志》、《乌程县志》、《昌化县志》、《六安州志》、《泾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天门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嘉庆《凤台县志》、《怀远县志》、《禹州志》、《鄱陵县志》、《河内县志》、《长安县志》、《咸宁县志》、《郟城县志》，道光《兴文县志》、《屏山县志》、《大足县志》、《南海县志》、《新会县志》、《济宁州志》，咸丰《邳州志》、《清河县志》，同治《南海县志》、《鄞县志》、《慈溪县志》，光绪《香山县志》、《湘潭县图志》、《衡阳县志》、《黄岩县志》、《青田县志》、《永嘉县志》、《仙居县志》、《会稽新志》等也可列为名志。乡镇里坊志中，乾隆《乌青镇志》，同治《南浔镇志》，道光《浒墅关志》，嘉庆《瓜州志》，光绪《唐楼志》等也可跻身名志行列。

可入著作之林的佳作，大多由著名学者与修。如康熙《邹平县志》、《德州志》，有顾炎武参与；乾隆《宁波府志》有全祖望参与；乾隆《鄞县志》有钱大昕参与；乾隆《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有戴震参与；乾隆《松江府志》、《鄞州志》、《三水县志》由孙星衍主撰；乾隆《庐州府志》、《江宁府志》、《六安州志》由姚鼐主撰；乾隆《宁图府志》、《怀庆府志》、《延安府志》、《登封县志》、《固始县志》由洪亮吉主撰；乾隆《永清县志》、《天门县志》、《石首县志》有章学诚参与；乾隆《朝邑县志》，由钱坫主撰；嘉庆《广西通志》由谢启昆主修；嘉庆《浙江通志》、道光《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皆阮元、陈昌齐、江藩主撰；嘉庆《徽州府志》有龚自珍参与；道光《湖广通志》由林则徐总裁、俞正燮总撰；咸丰《邳州志》、《清河县志》由鲁一同主撰；同治《苏州府志》由冯桂芬主撰；同治《江宁府志》有汪士铎主撰；同治《湖州府志》、《归安县志》由陆心源主撰；光绪《杭州府志》、《黄岩县志》由王棻主撰；光绪《湖北通志》、《顺天府志》、《荆州府志》由缪荃孙主撰。

方志的通病，是芜杂不整，而这些佳作经学者精心撰著，则全然不同，完全可以入著作之林，是方志中的佼佼者。

（二）方志举例

方志，即一方之志。以记述的地域不同，分为省志、府志、州县志、乡镇志等数类。一般说来，以全国范围为记述对象的总志、记载单一内容的专志，则不应包括在内。

1. 省志

省志是以直省为记述范围的方志，如康熙《江西通志》。

康熙《江西通志》54卷，于成龙、张所志、安志鼎等纂。康熙年间，清廷编纂《一统志》，令各省督抚修志，以备采集。当时，于成龙为两江总督，张所志、安志鼎先后任江西巡抚，遂奉命纂成此书，献上朝廷。《于成龙序》叙其经过说：“辛酉冬，臣成龙蒙皇上简命总督两江，以明年壬戌夏抵任，又明年癸亥礼部奉旨督催各省通志。臣成龙驻扎江宁，既与江苏巡抚臣余国柱、安徽巡抚臣徐国相同辑《江南通志》，见在付梓，另呈宸览。惟江西去

江宁千有余里，控辖辽阔，不得身至其他，于是发凡起例，定为程式，移檄江西布政使司兼摄抚臣事臣张所志，诹日设局，罗致文献，摭摭裒辑，鳞次栉比，务期典核。凡阅十旬，以所志录稿本授臣，臣又与江西新任抚臣安世鼎为之钩稽考核，芟繁补缺，荟为成书”。该书康熙十二年（公元 1673 年）开编，二十二年成本，历时 11 年告竣。它是清初第一批官修的省志之一。

该书体例深受顺治《河南通志》影响。《凡例》云：“江西旧志分叙各府纪述简略。今遵部文，体例科条，悉仿《河南通志》”。惟内容“较诸旧志，稍加详备而已”。二志目录如表 9。

两相比较，除封建、物产、帝王等少数目录不同外，门类和体例基本相同。

省志记述疆域、山川、津梁、物产等，应以府为单位，亦应以府为重点。康熙时，江西布政司辖南昌、饶州、广信、抚州、建昌、南康、九江、瑞州、临江、赣州、吉安、袁州、南安十三府和宁州一州。康熙《江西通志》记述各有关内容时，亦大都以此十三府一州为单位逐一叙述。

康熙《江西通志》重视记述疆域政区和建置沿革。编纂者运用图、表、注等多种形式，对疆域政区和建置沿革进行详尽的交待。卷首绘有《江西郡县图》、《江西一十三府一州总图》及各府图。《图考》云：“古者，左图右书，书以纪事，图以观理。图也者，佐书之所不逮者也。故象万物者，莫善于图，而用诸舆地为尤重”。由于编纂者深谙地图的功用，懂得它在方志中的价值，故广泛用来表示疆域政区的地理范围，给读者以直观的地理概念。在叙述建置沿革时，先以“总叙”开篇，记述布政司沿革概要，然后分叙各府州沿革。府州沿革前，又各有“小序”，记述府州沿革概要。“小序”之后，才是各府沿革表。沿革表后又有注文，记述各县沿革。三者相互补充，环环入扣，颇便读者查对。今将“总叙”及饶州府部分摘录于后，以便读者了解其体例。

表 9 顺治《河南通志》与康熙《江西通志》卷目

顺治《河南通志》	康熙《江西通志》	备注
图考	图考	
建置沿革	建置沿革	
星野	星野（祥异附）	
疆域	疆域（形势、封爵附）	
山川	山川	
风俗	津梁、风俗	
城池	城池兵御（驿、盐、漕运、关税附）	
河防	水利	
封建		
户口	户口（田赋、蠲恤附）	
田赋		（江西通志）附于“户口”下
物产		
职官	职官	
公署	公署（学校、贡院、书院附）	
学校		《江西通志》附于“公署”下
选举	选举	
祠祀	祠祀（丘墓附）	
陵墓		《江西通志》作“丘墓”，附于“祠祀”下
古迹	古迹（寺观附）	
帝王		
名宦	名宦	
人物	人物	
孝义	孝义	
列女	列女	
流寓	流寓	
隐逸	隐逸	
仙释	仙释	
方技	方技	
艺文	艺文（御制、表、笺、疏、赋、诗、序、记、碑记、书论等）	
杂辨		《江西通志》附于“艺文”下

江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建置沿革（总叙）

……江西故扬州之域，春秋属吴，周元王四年，越灭吴，又居越。显王三十五年，楚威王败越，杀越无疆，遂于楚。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灭楚，郡县楚地，是为九江郡。汉改九江郡立淮南国、吴国，高帝十一年，封皇太子长为淮南王，兄子濞为吴王，二国遂尽有扬州之地。景帝七年，濞连七国反，周亚夫平之，始于此置豫章郡。武帝元封五年，置扬州部刺史，治丹阳，

九江、豫章其郡也。后汉因之，三国属吴，晋复置扬州，豫章隶焉。惠帝元康元年，分治江州部刺史，治豫章，其后治浔阳。宋、齐、梁、陈因之。隋置总管府于洪州，按饶、江、抚、袁、吉、虔等诸州，炀帝罢之，复为郡。唐初仍隋制，置洪都总管府，寻改都督府，后罢，置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分江南道为东西二道，江南西道置采访处置使，后改观察使，又称镇南军。南唐置南都。宋置都督、洪都、豫章郡、镇南军。分江东西路、东按饶、信二州、南康军，西按江、洪、抚、筠、吉、虔六州，临江、南安二军。元设行都元帅府，寻改江西道，置江西等处行中书省，隶江南诸道行御史台。至元十四年，置提刑按察司，二十八年改肃政廉访。明初仍元置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寻改承宣布政使司，又置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南昌道、湖东道、湖西道、九江道、岭北道。领府十三、州一、县七十七、卫四、所八。皇清因之，卫所俱裁。康熙二十一年，各道裁，设分巡饶南九道、分巡赣南道，领州县如故。

饶州府小序

《禹贡》扬州之域，所称“彭蠡既猪”，即鄱阳湖也。周《职方》隶扬州。春秋楚东境，吴阖间伐楚取番道，属吴隶越。勾践平吴，属越。楚灭越，复属楚。秦并天下，置鄱阳县，隶九江郡，项羽立黥布为九江王，复属楚。汉初，属淮南国，后属豫章郡。三国吴置鄱阳郡，晋初因之，后因荆扬地广，统理尤难，割荆扬凡十郡，置江州，隶江州都督。宋、齐复隶扬州，为鄱阳郡。梁置吴州。陈复为鄱阳郡。隋改为饶州，以物产丰饶故也，隋置饶州，复为鄱阳郡。唐初为饶州，后改鄱阳郡，又复为饶州，其中分隶诸道州，不一而足。南唐置永平军，宋仍为饶州，元置饶州路。明初，改为鄱阳府，复改饶州府，属江西布政使司。正德七年，割饶州之鄱阳东南、余干之西、乐平之东、信之贵溪东南都图为万年。皇清因之。领县七：

饶州府沿革表

时期	总部	郡	县
唐虞三代	扬州		
春秋	楚、吴、越		
战国	楚		
秦		九江郡	鄱阳、余干
汉		淮南国	
东汉		豫章郡	鄱阳、余干、乐平

(续表)

时期	总部	郡	县
三国吴		鄱阳湖	鄱阳、余干、弋阳、历陵、乐安、葛阳
晋	江州	江州都督	鄱阳、余干、弋阳、历陵、乐安、葛阳、晋兴
南朝宋齐	扬州	鄱阳	
梁	江南东路	吴州	
陈		鄱阳郡、饶州	
隋		鄱阳郡	鄱阳、余干、弋阳
唐	洪州大都督府	饶州	乐平、广晋、新平
	江南道		
	江南西道	鄱阳郡	鄱阳、余干、乐平、浮梁、弋阳
	江南西道	饶州	鄱阳、余干、乐平、浮梁
南唐		永平军	乐平、德兴
宋	江东路转运使	饶州	鄱阳、余干、乐平、浮梁、德兴、安仁
	江东路提刑使		
	江南东路宣承观察使		
	建康沿江制置使		
元	江东路宣慰使司	饶州总管府	鄱阳、余干、东平、浮梁、德兴、安仁
	江浙行中书省		县：鄱阳、德兴、安仁 州：余干、乐平、浮梁
明	江西承宣布政使司	饶州府	鄱阳、余干、乐平、浮梁、德兴、安仁、万年
皇清	江西承宣布政使司	饶州府	鄱阳、余干、乐平、浮梁、德兴、安仁、万年

浮梁县（饶州府属县注文举例）

唐本古番地，唐武德中，析置新平县，寻省，开元初复置，为新昌县。天宝元年改曰浮梁。以溪水时泛，伐木为梁，故名。永泰二年，析北境，今黔南置祁门县。元和中，县治被水，徙西北，即今治。南唐、宋因之，为望县。元升为州。明改为县，属饶州府。皇清因之。编户一百一十二里。

康熙《江西通志》重视阐明著书的时间断限和资料的时间概念。一部好的志书，必须交待著作时间断限，引证资料（尤其是经济资料）必须冠以时间，叙事必须给读者以明确的时空概念。否则，堆砌的内容和被引证的资料犹如废纸一堆，令人读来不得要领，更谈不上供人参考的作用。康熙《江西通志》能够避免和纠正一般方志的通病，在《凡例》中明确交待各种统计数据的时间，如“镇营、防御、军国重务、官兵驻汛，悉准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内见在数目”，“户口、田赋悉准康熙二十二年刊定《赋税全书》”等等。这是本志的一大优点，也是著述严谨的表现。

康熙《江西通志》保存了许多珍贵资料。例如《物产》南昌府“占”字注文下，记载了宋代占城稻传入江西的经过。注文曰：“稻种。有早、晚、赤、白，称名不一。本占城国种。宋大中祥符五年，遣使往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遍给江淮间播种。始及江西，列郡县皆有之”。这条资料不论对于研究农作物栽培史，还是研究区域开发史，都是很珍贵的。再如《碑记》也保存有许多重要资料：《柏虔冉新创千金陂记》记载了唐上元、咸通年间临川境内兴修水利的情形，《筑五圩碑记》记载了修筑五圩的作用与用工经过。

这同样是研究江西农田水利史的重要资料。

编纂卷帙繁浩的志书，一要体例严谨，二要防止脱漏，三要风格如一，在这3方面，康熙《江西通志》仍有不足之处。表现在：在体例方面，大多数类目以府为单位进行记述，但少数类目，如桥梁、水利等又改用县为记述单位，此其一；内容间有脱漏之处，如首列江西13府1州图时，漏载宁州图，此其二；在前后行文风格和各地区内容详略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此其三。

2. 府志

府志是以府为记述范围的方志，如《松江府志》。

嘉庆《松江府志》是清代名志之一，84卷，首2卷，图1卷，内题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纂。宋如林是松江知府，孙星衍是著名学者。孙氏撰有《周易集解》10卷、《夏小正传校正》3卷、《明堂考》3卷、《考注春秋别典》15卷、《尔雅广雅诂训韵编》5卷、《孔子集语》17卷、《晏子春秋音义》2卷、《史记天官书考》10卷、《寰宇访碑录》12卷、《金石萃编》20卷、《续古文苑》20卷、《诗文集》25卷。他一生中编纂过《澄城县志》、《直隶邠州志》、《三水县志》等7部方志，嘉庆《松江府志》是他一生中所修的最后一部志书。

卷首有汤金钊、陈桂生、觉罗麟祥、魏元煜、宋如林序。《宋如林序》涉及修志经过及全书概况，其云：

志非史也，编辑较易，而史即出志也，志载易详。士大夫力持清议，上下古今，每寓褒贬于叙述之中，以示劝惩，故于人物独加意焉。至山川、土田、兵农、金石之属，往往略而不详，夫不详不可谓之志也。

松郡枕海带江，东南一大都会，沿革损益，政绩人文，即岁集一编，书不胜书矣。郭志修自康熙癸卯，距今一百五十六年，其间典章文物，欲一一访求补载，罔有遗失，难矣哉。长沙周君希甫先此摄篆，因都人士之情，方议设局重修，余喜周君之先得我心也，龟勉从事，因延阳湖孙观察渊如、山阴朱郡守意园总其成。又明年甲戌，今仓场侍郎宝斋莫公来主云间讲院，后先考证，重加厘正，而一时群贤萃集，采访搜罗，综合寻求，殚心竭力，各尽所长，时阅六载，稿凡三易，而是书以成。是书也，列十四门，分八十上卷，积一百八十万一千四百五十九字。说者以卷帙繁浩，殊失事增文减之例，不知山川名胜图经易沿其误也，民赋兵防随时以制其宜也，遗征盛事尚虑其久淹也，诗、古文、词尚虞其不富也，金石文字足以资考订也，人物代有兴者，善善从长，有美必录，士大夫知人论事，日久自有定评。今兹摭摭，不厌其详，一待以太史辘轳之采，亦以助后来修志者之编香焉。

孟秋之月，将以俸满入都，会剗剗告竣，因掇其大略弁于简端。至各门标目，详于凡例，兹不复赘云。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七月知松江府事宋如林撰。

清嘉庆年间，松江府辖1厅7县，府志叙述疆域、山川、建置、田赋、学校、武备、职官、名宦、选举、古今人物、艺术、寓贤、方外、列女、艺文、名迹、拾遗等项内容，悉以所辖地域为记述范围。其在编纂思想上，有以下3方面特色值得肯定：

(1) 重视运用地图。《凡例》云：“府境形胜绣错，建置罗列，非绘图不能解”。卷首除《建置图》、松江府及所辖各厅县《全境图》、《城池里》外，还绘制了《乡保市镇图》、《松江水利原委图》、《九峰三泖图》、《海防图》、《府署图》等39幅地图。这些地图绘制技术较高，较一般府志详尽，

且“附说于后”，意思简单明白，颇便读者对照阅读。

(2) 重视府境利病。松江府襟江负海，为东南泽国，水利为一郡先务。《山川志》按照《水经注》体裁，将府境河流湖浦及其支脉条分缕析，并述其源流、利病及浚治工程。其搜集的资料，从《禹贡》起，至清嘉庆二十年（公元 1815 年）止，包括历代帝王谕旨、名臣奏议、古今图籍及金石，凡与水利有关的资料，莫不搜求齐全，内容十分丰富，对考究松江水利甚为有益。

(3) 重视国计民生。明清二代，松江赋役之重，天下闻名，明末几乎酿成变乱。《田赋志》不仅记载了历代田亩、田赋、各种杂派，而且记载了明万历年间上海、华亭、青浦等地百姓反对“勘绝田”，抗议加派赋额的经过，崇祯年间华亭知县“秘匿部文”，擅加赋税的盘剥行为，以及农民在苛税重赋下的沉重负担等情况。

3. 州县志

州县志是以州县为记述范围的方志，如嘉庆《泾县志》。

嘉庆《泾县志》共 32 卷，由清李德淦修、洪亮吉纂。李德淦是泾县知县，实际编纂工作由洪亮吉主持。洪亮吉是清中叶著名学者，在经学、地理学、人口学方面皆有建树，著有《更生斋文集》等。他编纂过乾隆《延安府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澄城县志》、《固始县志》等七八部志书，经验十分丰富。《泾县序》集中反映了他的修志观点，其中不少观点，现在仍有参考价值。他认为：“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苟简，则舆图疆域，容有不详”。“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才于异地，侈景物于一方，以致以传，误中复误”。他主张：“撰方志之法，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义归一是，庶乎可断踵前修，不诬来者矣”。

嘉庆《泾县志》为清代名志之一，梁启超称其为县志中之最。其所列门类及编排，曾被誉为州县志典范。该志目录如下：

卷首叙、例、图

卷一沿革（星野、疆域、形胜、风俗）

卷二城池（故城、街巷、坊表、乡都、市镇、桥梁、津渡）

卷三至四山水（诸条山、诸条水、陂泽、湖池井泉）

卷五食货（蠲赈、恩赉、田赋、杂税、户口、徭役、积贮、盐法、马政、屯田、囚田、物产、兵防）

卷六至七学校（学署、学田）

卷八书院（书院田）

卷九坛庙

卷十官署（仓库、公馆）

卷十一古迹（冢墓）

卷十二金石

卷十三职官表

卷十四至十五选举表（荐辟、例仕、吏仕、武选举、武职、赠封、荫袭、戚畹、乡宾）

卷十六名宦

卷十七至二十人物（名臣、宦业、忠节、孝友、儒林、文苑、武功、懿行、尚义、五世同

堂、百岁、隐逸、艺术、寓贤）

卷二十一至二十四列女（烈妇、贞女、旌表节妇、孝女、寿妇、旧志所载待旌节妇、新

增待旌已故节妇，新增待旌现存节妇）

卷二十五寺观（仙释）

卷二十六艺文

卷二十七杂识（纪事、灾祥、轶事、异闻）

卷二十八辨证

卷二十九旧志源流

卷三十至三十二词赋（宦寓与本县诸贤赋、宦寓诸贤诗、本县诸贤诗）

这份目录，可供读者了解其内容作参考。

洪亮吉是方志地理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纂修的《泾县志》带有明显的地理派色彩。

第一，重视记述境内地理内容。作为县志，它不仅重视记述县邑本身疆域的沿革，而且十分重视记述乡里、市镇等县以下行政单位的疆域和沿革。唐以前，泾县乡都无考。唐仅知 18 乡，名称无考。元代沿革亦不详。除此而外，对宋代及明、清 11 乡的分合并省均有考述，对清中叶 18 市镇的方位和兴废也有翔实记载。《泾县志》沿革类的内容很丰富，如“风俗”门不仅记述历代民情、民俗、民风，而且详细记载方言、气候、岁时琐事及其演变等内容，为一般县志所罕见。针对当时方志讹陋甚多的通病，《泾县志》在每条沿革内容后，皆注明资料出处；沿革不详者，皆明确说明；旧志中与沿革无关的内容，一概省略；旧志错误之处，皆附短篇考证于后，加以澄清或纠正。严谨程度，如同学术著作。

第二，引征广博。《泾县志》重视借鉴和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凡例》说：“舆地之书，除历代地理志外，如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记》、祝穆《方輿胜览》等有关涉县境者，无不一一秉录，而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所载县事尤详，今并分门录入”。志山水时，“凡唐宋以前诸图经地志所载者，无不录入，并加以考证”。志风俗时，亦引证唐陈势《大宁塔记》、卢肇《新兴寺碑》等 17 种。使《泾县志》起到了汇集一方有关文献的作用。

第三，注重考证旧志讹误。凡重要记载，《泾县志》皆求证于史传载记，凡史传载记错误之处，皆一一刊正，使引证之资料做到正确无误，可以“传信”，“不貽后人口实”。叙泾县沿革时，通篇考证 20 处。如《泾县志》引《晋书·地理志》“太康二年置宣城郡”后加按语云：“按宣城郡建置年月当从沈约、酈道元作‘元年’为是，今考《元和郡县志》，又云汉顺帝立宣城郡。《太平寰宇记》又云武帝元狩元年改鄣郡为丹阳郡，至顺帝又改为宣城郡。恐皆误”。又如引《隋书·地理志》“泾，平陈，省安吴、南阳二县入焉。”及《通志》“隋平陈，废宣城郡，仍并安吴、南阳二县入泾县”后，加按语云：“按南阳当为广阳。《隋书》、《通志》并误作南阳，南阳盖唐武德时所置”。这类考证，或纠正年代错误，或指出内容脱漏，或辨正旧志引文疏略，或证明有其他不同说法，起到了匡谬纠误的作用。

4. 乡镇志

乡镇志是一乡一镇为记述范围的方志，如嘉庆《南翔镇志》。

嘉庆《南翔镇志》共 12 卷，内题张承先纂、程攸熙订正。南翔，别称槎溪。自南朝萧梁建白鹤南翔寺，聚落日盛，后因寺成镇。清嘉庆年间，属嘉

定县，“殷繁为诸镇之冠”。当时，“民居稠密，百货骈阗，市声浩浩，有如通都大邑”^①，乡绅遂有修志之意，嘉庆十一年（公元 1806 年），邑人程攸熙遂对乾隆年间张承先所修《槎溪志》加以订正，纂成是书，并改曰《南翔镇志》。

由于乡镇志的记述范围仅限于一乡一镇（也有少数扩大到邻近数乡），可供编纂的文献和素材相对较少，因此除个别著名市镇外，内容皆不及州县志丰富，所列类目也与州县志有所不同。

嘉庆《南翔镇志》目录如下：

卷一疆里（沿革、里至、乡都、水道、开浚、物产附）

卷二营建（官廨、书院、庙坛、婴堂、营汛、递铺、坊表、街巷、桥梁）

卷三小学（小学、义塾、乡饮）

卷四职官（分防县丞、巡检、汛弁）

卷五选举（进士、举人、贡生、例贡、例选、杂进、荐举、武科、封赠、荫叙）

卷六至八人物（贤达、孝义、文学、隐逸、耆德、艺术、流寓、列女、方外）

卷九艺文（书目、碑刻、文、诗）

卷十至十二杂志（寺观、庵院、神祠、尼庵、第宅、园亭、古迹、祠墓、纪事、轶事）

各门类内容也较少，沿革和建置的内容，减少更加明显。嘉庆《南翔镇志》沿革云：“槎溪，古嚆也。萧梁时，建白鹤南翔寺于此，因寺成镇，遂以寺名。六朝迄唐宋属娄、属昆山，迨南宋析昆山置嘉定，乃改隶焉。历元明至国朝，皆因之”。一共只有 56 字。余如官廨、职官、水道等项内容也较为简单。

但是，乡镇志也有独特的优点，以嘉庆《南翔镇志》为例，第一，有关本乡镇的内容，记述十分详尽。如该志逐一记载南翔镇 52 条街巷的各种情况，而一般州县志受体裁或篇幅限制，往往只记县邑的街巷，市镇的街巷很少记载；再如宋元至明嘉靖间，市廛和民居多有徙移，镇区颇多拓展和变化，《南翔镇志》的记载也比县志详细。第二“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市镇志所载当时当地的情况，往往比州县志可靠。如镇区水道的走向、通航、开浚情形，以及营汛、递铺的置废和迁移等，皆比州县志准确。第三，对本地古迹、祠墓、物产的调查与统计，比州县志齐全，白鹤南翔寺和古猗园是南翔镇两大著名古迹，《南翔镇志》搜集的有关资料甚为齐全，是复原这些名胜古迹的重要依据。这也是州县志所难以比拟的。

由此可见，乡镇志是一种珍贵的乡土资料，尽管州县志也包含有乡镇志的内容，但它们并不能取代乡镇志。

乡镇志大多为邑人编纂，极少著名学者参与，因而大多数乡镇志编纂水平不高。

二、域外地理志

清代对域外地理的大规模研究，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鸦片战争前，不少人将西方地理知识视为天方夜谭，无稽之说。鸦片战争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一部分有识之士出于御侮图强、“以夷制夷”的需要，

率先研究西学、传播西学，这才出现了研究域外地理的新局面。开始阶段，这种研究主要表现为翻译和介绍西方地理图籍，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的图籍与日俱增，才逐步出现以国学体裁研究西学的地理著作。

这里论述的 5 篇域外地理著作，《明史·外国传》成书于清初，反映清初人们的地理观念和域外知识水平；《瀛环志略》、《海国图志》、《朔方备乘》是鸦片战争后成书较早的域外地理志，从不同角度反映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五洲地理志略》则是清末作品，反映西方地理学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深刻影响，以及中国传统地理学日益向西方地理学靠拢和接近的情况。

（一）《明史·外国传》

《明史·外国传》是《明史》专门记述明王朝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的传记，其中有许多域外地理和中外交通的内容。《外国传》虽是记述明代史实，但它成书于清初，实际上反映清初人们的知识水平和域外地理观念。

《明史·外国传》共记载 91 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内，有历史上曾为中国地方行政区划的国家和地区，如安南、福余、泰宁等；有曾为中国属国的国家和地区，如朝鲜、暹罗、旧港等；有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自主政权，如鞑靼、瓦剌、兀良哈、鸡笼山等；有和明王朝保持朝贡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如吕宋、文莱、古麻刺朗、满刺加等；还有向明朝派遣传教士的西方国家等等，情况较复杂。这些国家和地区分布范围可见表 10。

表 10 《明史·外国传》记载的国家和地区分布范围

国家或地区名称	现今地理区域
朝鲜	在今朝鲜半岛
安南	在今越南北部，有时也包括越南中部
日本	泛指今日本辖境
琉球	在今琉球群岛
吕宋	在今菲律宾吕宋岛
合猫里	在印尼爪哇岛附近，或在淡目一带
美洛居	在今印尼马鲁古群岛
沙瑶呐哔啵	今地不详，待考
鸡笼	在今印度尼西亚卡里马塔岛
婆罗	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
麻叶瓮	在今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或指该岛西北的文岛或宾坦岛
古麻刺朗	在今菲律宾棉兰老岛，或云在吕宋岛博利瑙角附近
冯嘉施兰	在今菲律宾班丝兰省仁牙因一带
文郎马神	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南岸马辰
占城	在今越南中南部
宾童龙	约在今越南顺海省北部和富庆省南部
真腊	约在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
暹罗	在今泰国大城府及附近地区
爪哇	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阁婆	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苏吉丹	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布格角南，一说指加里曼丹岛西南苏加丹那
碟里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日里
日罗夏治	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其附近
三佛齐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至占卑一带
淳泥	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或云在文莱，或指坤甸附近
满刺加	在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一带
苏门答刺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金刚石岬西
须文达那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洛克肖马韦一带
苏禄	在今菲律宾和乐岛
西洋琐里	在今印度科罗曼德海岸

国家或地区名称	现今地理区域
琐里	在今印度纳加帕塔姆
览邦	今地不详，待考
淡巴	在今马来半岛丹帕湖一带，一说指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甘巴河流域
百花	今地不详，待考
彭亨	在今马来西亚彭亨州，一说指彭亨河口北干；或云指关丹
那孤儿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实格里，一说在实格里东洛克肖马韦
黎伐	应为黎代。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洛克肖马韦与班达亚齐之间
南渤利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班达亚齐
阿鲁	今地不详，待考
柔佛	在今新加坡宾坦岛
丁机宜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岸直名丁宜
巴喇西	即波斯
佛郎机	即今葡萄牙
和兰	即今荷兰
古里	即今印度喀拉拉邦北岸科泽科德
柯枝	即今印度西南岸柯钦
小葛兰	在今印度南部西岸奎隆
大葛兰	在今印度南部西岸奎隆附近
锡兰山	即今斯里兰卡
榜葛刺	约在今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邦地区
沼纳朴儿	在今印度北方邦东部、比哈尔邦贝拿勒斯西北江普尔
祖法儿	在今阿拉伯半岛阿曼西海岸的多法尔
木骨都束	即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不刺哇	即今索马里东南岸布腊瓦
竹步	即今索马里南部朱巴河口准博
阿丹	即今南也门亚丁
刺撒	在今阿拉伯半岛南岸木卡拉附近的 Lasa 村
麻林	即今肯尼亚东部马林迪，或云莫桑比克；一说即今坦桑尼亚基尔瓦基西瓦尼
忽鲁谟斯	即今霍尔木兹海峡中歇姆岛东部霍尔木兹岛
溜山	在今印度洋中马尔代夫群岛或拉克代夫群岛

国家或地区名称	现今地理区域
比刺	在今非洲瓜达富伊角外的阿卜德库里岛
孙刺	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说在新拖；一说在梭罗
南巫里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班达亚齐
加异勒	在今印度南部东岸卡异尔镇
甘巴里	即今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西部科因巴托尔
急兰丹	在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州一带
沙里湾泥	在今南也门东北沿海的沙尔伟恩角
底里	即今印度德里
千里达	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北岸井里汶
失刺比	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斯勒巴尔
古里班卒	在今马六甲海峡附近
刺泥	在今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
夏刺比	在今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
奇刺泥	在今印度西岸坎贝湾附近
窟察尼	在今印度西岸卡奇湾一带
舍刺奇	在今印度西岸塔普河口苏拉特
彭加那	即今孟加拉国
八可意	在今印度古吉拉特邦东南部沿海，或云在布罗奇附近
乌沙拉踢	今地不详，待考
坎巴	在今印度喀拉拉邦西部科因巴托尔
阿哇	在今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阿默达巴德，一说指阿鲁
打回	指今印度洋西岸的第乌
白葛达	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黑葛达	今地不详，待考
拂林	在今小亚细亚一带
意大利亚	即今意大利
鞞鞞	
瓦刺	
朵颜	
福余	
泰宁	

《明史·外国传》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__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出产等情况。如榜葛刺“其国地大物阜。城池街市，聚货通商，繁华类中国。四时气候常如夏。土沃，一岁二稔，不待籽耘。俗淳古。有文字，男女勤于耕织。容体皆黑，间有白者。王及官民皆回国人，丧祭冠婚，悉用其礼。男子皆剃发，裹以白布。衣从颈贯下，用布围之。历不置闰。刑有笞杖徒流数等。官司上下，亦有行移。臣卜、阴阳、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益前世所流入也。”又如忽鲁谟斯“其国居西海之极。自东南诸蛮邦及大西洋商舶、西域贾人，皆来贸易，故宝物填溢。气候有寒暑，春

发葩，秋陨叶，有霜无雪，多露少雨。土瘠谷麦寡，然他方转输者多，故价殊贱。民富裕厚，或遭祸致贫，众皆遗以钱帛，共赈助之。人多白皙丰伟，妇女出则以纱蔽面，市列廛肆，百物具备，惟禁酒，犯者罪至死。医卜、技艺，皆类中华。交易用银钱。书用回回字。王及臣下皆遵回教，婚尚悉用其礼。日斋戒沐浴，虔拜者五。地多碱，不产草本，牛羊马驼皆啖鱼腊。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寝处庖厕及待客之所，咸在其上。饶蔬果。”有关国家和地区与明王朝的关系。如祖法儿，“永乐十九年遣使偕阿丹、刺撒诸国入贡，命郑和赍玺书赐物报之。二十一年，贡使复至。宣德五年，和再使其国，其王阿里即遣使朝贡，八年达京师。正统元年还国，赐玺书奖王”。又如古麻刺朗，“永乐十五年九月遣中官张谦赍敕抚谕其王干刺义亦奔敦，赐之绒锦、丝、纱罗。十八年八月，王率妻子、陪臣随谦来朝，贡方物，礼之如苏禄国王。王言：‘臣愚无知，虽为国人所推，然未受朝命，幸赐封诰，仍其国号’。从之，乃赐以印诰、冠带、仪仗、鞍马及文绮、金织裘衣，妃以下并有赐。明年正月辞还，复赐金银钱，文绮、纱罗、彩帛、金织裘衣、麒麟衣，妃以下赐有差。王还至福建，遘疾卒。遣礼部主事杨善谕祭，谥曰康靖，有司治坟，葬以王礼。命其子刺苾嗣为主，率众归，赐钞币。”记叙的文字，少者二三十个字，多者一二千字，因内容而

《明史·外国传》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出产等情况。如榜葛刺“其国地大物阜。城池街市，聚货通商，繁华类中国。四时气候常如夏。土沃，一岁二稔，不待籽耘。俗淳古。有文字，男女勤于耕织。容体皆黑，间有白者。王及官民皆回国人，丧祭冠婚，悉用其礼。男子皆剃发，裹以白布。衣从颈贯下，用布围之。历不置闰。刑有笞杖徒流数等。官司上下，亦有行移。臣卜、阴阳、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益前世所流入也。”又如忽鲁谟斯“其国居西海之极。自东南诸蛮邦及大西洋商舶、西域贾人，皆来贸易，故宝物填溢。气候有寒暑，春发葩，秋陨叶，有霜无雪，多露少雨。土瘠谷麦寡，然他方转输者多，故价殊贱。民富裕厚，或遭祸致贫，众皆遗以钱帛，共赈助之。人多白皙丰伟，妇女出则以纱蔽面，市列廛肆，百物具备，惟禁酒，犯者罪至死。医卜、技艺，皆类中华。交易用银钱。书用回回字。王及臣下皆遵回教，婚尚悉用其礼。日斋戒沐浴，虔拜者五。地多碱，不产草本，牛羊马驼皆啖鱼腊。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寝处庖厕及待客之所，咸在其上。饶蔬果。”有关国家和地区与明王朝的关系。如祖法儿，“永乐十九年遣使偕阿丹、刺撒诸国入贡，命郑和赍玺书赐物报之。二十一年，贡使复至。宣德五年，和再使其国，其王阿里即遣使朝贡，八年达京师。正统元年还国，赐玺书奖王”。又如古麻刺朗，“永乐十五年九月遣中官张谦赍敕抚谕其王干刺义亦奔敦，赐之绒锦、纁丝、纱罗。十八年八月，王率妻子、陪臣随谦来朝，贡方物，礼之如苏禄国王。王言：‘臣愚无知，虽为国人所推，然未受朝命，幸赐封诰，仍其国号’。从之，乃赐以印诰、冠带、仪仗、鞍马及文绮、金织裘衣，妃以下并有赐。明年正月辞还，复赐金银钱，文绮、纱罗、彩帛、金织裘衣、麒麟衣，妃以下赐有差。王还至福建，遘疾卒。遣礼部主事杨善谕祭，谥曰康靖，有司治坟，葬以王礼。命其子刺苾嗣为主，率众归，赐钞币。”记叙的文字，少者二三十个字，多者一二千字，因内容而异。明王朝周边诸国，或与明王朝有特殊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如朝鲜、日本、安南、鞑靼、和兰、意大利等，则记载较为详细，字数多达五六千字左右。当时，日本与明王朝

关系复杂，明初“胡惟庸谋逆，欲籍日本为助”^①；后倭寇长期为患，不断骚扰沿海地区，甚至勾结官吏和巨匪，入侵内地，倭患几与明代相始终。万历时，日本又加兵朝鲜，欲犯中国，明王朝数次发兵援朝，丰臣秀吉死，战争才罢，故记载较为详细。再如鞑靼，为元朝后裔，雄踞北疆，迭与明王朝抗衡，正统后为北方主要边患，边陲无宁，常常危及内地不安定，故亦列为记叙重点。其它如和兰曾侵占澎湖和台湾，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来明王朝传教，影响较大，记载亦详。

十五六世纪，是人类地理视野大发展的时代。先是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他率领的船队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大增长了中国人的域外地理知识。在稍后几十年中，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再过几十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完成了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他们的航海实践，比郑和更成功，他们的发现使人类地理视野发生了质的飞跃，极大地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明王朝在郑和下西洋后不久，就停止与海外交往，实行封闭自守的政策。直到清初，这种局面没有太大的变化。在郑和下西洋以后的2个世纪中，除传教士带来的海外信息外，中国对世界知之甚少。《明史·外国传》有许多内容反映这种状况：记载与明王朝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大多局限于郑和下西洋前后，明中叶以后的情况知之甚少；郑和下西洋未到达过的国家和地区，所载甚少，记述简略；由于对新世界不了解，对许多世界地理知识既不敢轻信，又不能否定，只能听之记之。例如利玛窦来华传教时，“自称大西洋人”^②，礼部则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③。利玛窦《万国全图》根据当时的地理发现，云天下有五大洲，《外国传》则根据陈旧的传统观念认为：“其说荒渺莫考”^④。但是作传者看到“其国人充斥中土”，不容否定，所以又说“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⑤。这种心态和笔法，是当时中国人的地理知识远远落后于世界地理学发展水平的证明。

与过去的正史《外国传》、《外夷传》和中外交通史籍相比，《明史·外国传》虽记载了一些新鲜的世界地理知识，但在总体上，它仍属于那种用陈旧的地理观念、传统的记实笔法写成的外国地理传记。它说明，西方先进的地理学思想和地理知识虽已逐渐传入中国，但在清初学者心目中仍未占据应有的地位，作为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还未被中国学者接受，当时中国知识界还未从长期自然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对外部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瀛环志略》

《瀛环志略》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方地理知识的著作之一。王先谦认为：中国人了解“五洲志地，托始徐书（按指《瀛环志略》）”，其贡献可与《汉书·地理志》比美。^⑥梁启超认为：“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⑦。是书在普及世界地理知识，推动变法维新方面，均产生过积极影响。

作者徐继畲（1795～1873）字健男，山西五台人，清道光丙戌进士，曾出任广西浔州知府、福建建延邵道、汀漳龙道道台、两广运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广西巡抚，后调福建办理通商事务，还担任过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行走和太仆寺少卿的职务，他“久驻岭表”，“洞悉时势”，“于通商事务，尤老成远虑” 。“先是宣宗询以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爰命采辑为书”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书成，即《瀛环志略》。他还著有《退密斋诗文》集等。

《瀛环志略》是根据美国人雅裨理提供的地图和介绍，并参证其他西方人提供的图书资料 and 情况，改写成的地理书。徐继畲说：“道光癸卯，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促不能详也。明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二尺余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纸片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之说，采诸国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久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 。在雅裨理和刘韵柯、陈庆偕、鹿泽长和彭蕴章的帮助下，徐继畲花了5年时间，终于撰成此书。

《瀛环志略》共10卷，约20万字。卷一至三，介绍地球及亚洲各国概况；卷四至七，介绍欧洲俄罗斯、瑞、噠、奥地利、普鲁士、日耳曼、瑞士、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和兰、比利时、佛朗机、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诸国；卷八介绍非洲诸国；卷九至十，介绍美洲各国。《瀛环志略》是一部详略分明、很有特色的著作：以图为纲。作者认为“地理非图不明” ，故全书各卷皆附有地图，而地图悉“从泰西人原来钩摹” ，如介绍“地球”时，附有当时西方人绘制的东西半球图（图1、图2）；介绍澳洲时，附有澳洲位置图等等。内容专详域外。如中国“仅绘一图于卷首”，其余不赘一词；西域诸部亦“约略言之”，不涉考据。记述重点，一为南洋诸岛国，因当时被殖民主义者占领，已成为欧洲列强“埔头”，徐继畲认为：“此古今一大变局，故于此言之较详” ；二是欧洲、非洲、美洲诸国，“从前不见史籍”，故“溯其立国之始，以至今日” ，所用笔墨也较多。

《瀛环志略》对西方地理知识的介绍，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1）对地球的介绍。《瀛环志略》首先阐述地球形状、地理坐标和地球分带。“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每一周得三百六十度，每一度得中国之二百五十里”。“地球从东西直剖之，北极在上，南极在下，赤道横绕地球之中，日驭之所正照也。赤道之南北各二十三度二十八分，为黄道限，寒温渐得其平。又再北再南各四十三度四分，为黑道，去日驭渐远，凝阴互结，是为南北冰海”，“地球从中间横剖之，北极南极在中，其外十一度四十四分为黑道，再外四十三度四分为黄道限，再外三十三度二十八分，赤道环之”。接着介绍地球的大洲大洋：“大地之土，环北冰海而生，披离下垂，如肺叶凹凸，参差不一。其形泰西人分为四土，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一作利未亚），此三土相连，在地球之东半；别一土曰亚墨利加，在地球之西半”。“四大土之外，岛屿甚多，最大者澳大利亚。”又云：“土之外，皆海也，一水汪洋，为如界画，就各土审曲而势，强分为五，曰大洋海，曰大西洋，曰印度洋，曰北冰海，曰南冰海”。其中，除将南极洲误认为“南冰海”外，其余皆与今日所理解的地理知识一致。《瀛环志略》对有关地球知识的介绍，不仅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而且纠正了许多错误观念，对于正确认识世界具有极大的

意义。过去以为“愈南愈热”，“以赤道为南极”等不正确的说法，对地球有了科学认识后，始“闻此说而不信也”。

(2)对美洲、澳洲新大陆的介绍。《瀛环志略》对新发现的美、澳 2 洲，皆有详细介绍。如记述澳大利亚，对其发现经过、得名原因、原始状况、开发程度、风俗特产等，记述十分具体。“澳大利亚一名新荷兰，在亚细亚东南洋布巴亚岛之南，周回约万余里，由此岛泛大洋海东行，即抵南北亚墨利加之西界。其地亘古穷荒，水通别土。”“前明时，西班牙主遣使臣墨瓦兰由亚墨利加之南西驶，再寻新地，舟行数月，忽见大地，以为别一乾坤。地荒秽无人迹，入夜磷火乱飞，命名曰火地，又以使臣之名名之，曰墨瓦腊尼加”。“最后英吉利得之，因其土地之广，坚意垦辟，先流徙黑人于此，为屯田计，本国无业贫民愿往谋食者，亦载以来，他国之民愿受一廛者听之。”又云：“地在赤道之南，天气炎热，海滨多平土，山岭高者，不过三十丈，江河绝少，杂树荒草，灌莽无垠，鸟兽形状，诡譎与别土异。土番黑面，披发裸体，食草根山果，结巢于树，予之酒，一饮即醉卧泥中，如豕负涂，男役女若畜，怒则杀之。英人流寓者，垦海滨湿土，种麦与粟。草肥茂，牧羊孳乳甚速，毛毳细软，可织呢绒。现居民不足十万。每年运出之羊毛，值银二百余万两。百物未备，日用之需，皆从别土运往。英人于东境海口建会城曰悉尼，居民二万。捕鲸之船，时时收泊，贸易颇盛。而流徙之户亦莠民饮博，荡侈相习成风，流寓良民亦颇染其俗”。“北境近赤道，天气酷热。产海参、海菜、燕窠*意义。过去以为“愈南愈热”，“以赤道为南极”等不正确的说法，对地球有了科学认识后，始“闻此说而不信也”。

(2)对美洲、澳洲新大陆的介绍。《瀛环志略》对新发现的美、澳 2 洲，皆有详细介绍。如记述澳大利亚，对其发现经过、得名原因、原始状况、开发程度、风俗特产等，记述十分具体。“澳大利亚一名新荷兰，在亚细亚东南洋布巴亚岛之南，周回约万余里，由此岛泛大洋海东行，即抵南北亚墨利加之西界。其地亘古穷荒，水通别土。”“前明时，西班牙主遣使臣墨瓦兰由亚墨利加之南西驶，再寻新地，舟行数月，忽见大地，以为别一乾坤。地荒秽无人迹，入夜磷火乱飞，命名曰火地，又以使臣之名名之，曰墨瓦腊尼加”。“最后英吉利得之，因其土地之广，坚意垦辟，先流徙黑人于此，为屯田计，本国无业贫民愿往谋食者，亦载以来，他国之民愿受一廛者听之。”又云：“地在赤道之南，天气炎热，海滨多平土，山岭高者，不过三十丈，江河绝少，杂树荒草，灌莽无垠，鸟兽形状，诡譎与别土异。土番黑面，披发裸体，食草根山果，结巢于树，予之酒，一饮即醉卧泥中，如豕负涂，男役女若畜，怒则杀之。英人流寓者，垦海滨湿土，种麦与粟。草肥茂，牧羊孳乳甚速，毛毳细软，可织呢绒。现居民不足十万。每年运出之羊毛，值银

《瀛环志略》卷一《地球》

同上。

同上。

《瀛环志略》卷二《东南洋各岛》。

《瀛环志略》卷一《地球》

同上。

同上。

《瀛环志略》卷二《东南洋各岛》。

二百余万两。百物未备，日用之需，皆从别土运往。英人于东境海口建会城曰悉尼，居民二万。捕鲸之船，时时收泊，贸易颇盛。而流徙之户亦莠民饮博，荡侈相习成风，流寓良民亦颇染其俗”。“北境近赤道，天气酷热。产海参、海菜、燕窝”，又云：“计澳大利亚一土，英人四境所耕收，仅海滨片土，不过百之一二。其腹地，则奥草丛林，深昧不测，土番如兽，老死无往来，不特风土无从探访，即山川形势亦无由乘轮历览”。该书对美洲的介绍，也十分生动。这些新鲜内容是清初绝大多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

(3)对西方国家的介绍。《瀛环志略》很重视西方各国的发展情况，例如：在欧罗巴总叙中，列有英、法、荷兰、西班牙、比利时等16国的面积、人口、收入、支出、兵力、战舰数字。在分篇记述各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内容时，尤其重视介绍各种新制度和事物。其介绍美国云：“米利坚各国天时正和，迤北似燕晋，南似江浙，水土平良，无沙碛，鲜瘴疠。其土平衍膏腴，五谷皆宜，棉花最良亦最多，英佛诸国咸取给焉，蔬菜果实皆备，烟叶极佳，通行甚远。山内所出者，石炭、盐、铁、白铅。境内小河甚多，米人处处疏凿，以通运道。又造火轮车，以石铺路，熔铁汁灌之，以利火轮车之行，一日可三百余里。火轮船尤多，往来江海如梭织”。“米利坚合众国白人皆流寓，欧罗巴各国之人皆有之，而英吉利、和兰、佛郎西为多，三国之中，英吉利又居大半”。又云：“米利坚政最简易，税亦轻，户口十年一编。每二年于四万七千七百人之中，选才识出众者一人，居于京城，参议国政。总统所居京城，众国设有公会，各举贤士二人，居于公会，参决大政，如会盟、战守、通商、税饷之类，以三年为秩满。每国设刑官六人，主谳狱，亦以推选充补。有偏私不公者，群议废之。合众国税入约四千万元……总统虽总财赋，而额俸万元之外，不得私用分毫”。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徐继畲对这些新制度和事物所持的态度，他在按语中说：“南北亚墨利加，袤延数万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又说其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他十分崇敬华盛顿，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凡于天下为公，赧赧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伟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作为封建国家的封疆大吏，敢于如此赞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领袖，实属少见。

徐继畲在书中介绍和传播西方地理学知识时，仍旧使用中国传统的著述办法，力图通过考证文献资料，追根溯源，证明西方地理知识的可信性。如在记述南洋各岛国时，他就引证《通考·四夷传》、《明史·外国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陈资斋《海国见闻录》、邵星岩《薄海番域录》、黄毅轩《吕宋绝略》、王恽《泛海小录》、王大海《海岛逸志》等作为佐证，剔除了其中荒诞不经的怪异传说，记述的内容都比较准确实在。陈庆偕认为，徐继畲的贡献就在于当人们将西方地理知识视为“无稽之说”、“群起而簧

同上。

《瀛环志略》卷一《地球》

同上。

《瀛环志略》卷九《北亚墨利亚米利坚合众国》。

同上。

鼓之”的时候，他能“于奇奇怪怪之中，芟夷古今荒唐之说，归于实是”，因而《瀛环志略》“为世所推重，群奉为指南”。

《瀛环志略》问世后，何秋涛又撰成《瀛环志略辨正》，薛福成撰成《续瀛环志略初编》，还有人写了《瀛环志略续集》，它们对《瀛环志略》皆有补充和指正。

（三）《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是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第一批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谋求御侮图强的要籍，也是传播和普及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的名著。后人评价甚高，康有为认为《海国图志》是讲西学之基，梁启超认为它激励了国民对外之观念，刘禹生认为是书开了近代研究世界史地之先河。历来受到学术界重视。

作者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1845年中进士，历任东台，兴化，海州等地方官，在修治水利，改举兵制，便民裕国方面，皆有政绩，亦能体察民情，深受百姓拥戴。他涉猎很广，著述甚丰，撰有《元史新篇》、《圣武记》、《孔子集注》、《孟子年表》、《古诗微》、《禹贡说》等等。他与林则徐是挚友，是清代知识分子中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鸦片战争前，他有鉴于国势日蹙，外侮日迫，坚决支持禁烟。鸦片战争后，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谋求变革。他一生中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贡献，便是编纂《海国图志》。

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中国，始于明万历年间利玛窦的《坤舆图说》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当时，“人多谓邹衍之谈”，将信将疑，不予重视，而且这些图籍多藏于深宅大院，除清廷和极少数士大夫外，一般士民难以窥见，流传不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认识到西方地理知识的用处，各种图籍“华梵通译，多以汉字刊成图说”。仅在粤东译出的就有钞本《四洲志》、《外国史传》；刊本《万国图书集》、《平安通书》等，可谓灿若星辰，这些图籍为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提供了有利条件。

《海国图志》为何而作？魏源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是书依据的资料是什么？曰：“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则徐）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关于书的著作特点？答曰：“汇集海谈，旁摭西人著录，附以己意”。

《海国图志》原有60卷，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刻于扬州。后来又有增补，厘为100卷，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再刊于高邮州。100卷本，增辑不少新鲜资料，“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十之八；大小西洋、

《瀛环志略·陈庆偕跋》。

《五台县新志》卷四。

《海国图志·魏源序》。

同上。

同上。

《海国图志·左宗棠序》。

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十之六”^①，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②，内容较原本丰富。

地理内容占全书篇幅的 2/3。其余各卷，或为筹海议论和夷情汇编，或为西方制造战舰，火轮船、大炮、炸弹、鱼雷、测量仪、望远镜的工艺设计和制造技术，以及《西南洋各国教门表》、《中西历法异同表》、《中西纪事通表》等常用工具资料。地理内容集中在 3 部分：卷三至七十，主要记述世界各国概况；卷七十四至七十六国地总论，是西方近代地理学概论，辑有《论五大洲及昆仑》、《利玛窦及艾儒略二西士记》、《南怀仁图记》等；卷九十六至一百地球天文合论，介绍以天体为主的普通自然地理学知识。

《海国图志》的地理学内容很丰富，用今天地理学来分类，大体可分为普通自然地理概论、世界地理通论和国土（区域）地理简论 3 部分。

1. 关于普通自然地理概论

（1）地理研究的对象。《海国图志》认为：讲释地理必须包括“文”、“质”、“政”3 项内容。其“文”者，就是“以南北两极、南北二带、南圆北圆二线、平行上午二线（按：原文如此）、赤寒温热四道、直径横纬度数指示于人也。”其“质”者，就是“以江湖河海、山川田土、洲岛海峡、内外大洋指示于人也”。其“政”者，就是“以各邦各国、省府州县、村镇乡里、政事制度、丁口数目、其君何爵、所奉何教指示于人也”。作者认为：“此三得，地球之纲领也”。欲研究地理“不可缺一”。

（2）地球的形状与位置。《海国图志》云：“地体扁圆如球”，“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形如鸡子，黄在青内”。又云：“天体一大圆也，地则圆中一点。定居中心，永不移动”。当时，人们对天体的认识，显然还不完全正确，但已知地球是球形体，且居于天体之中，从此“天圆地方”说、地球“周围与天边相连”说便再难于立足，这无疑是人们认识宇宙的一大进步。

（3）地球的运动。《海国图志》援引哥白尼的研究成果，指出在太阳系中，“日则居中，地与各政皆循环于日球外，川流不息，周而复始”。又说：“地球之转有二，一则日周，一则年周。日周者，本身之周而复始也，昼夜运动，西向东旋，随旋随升，凡十一时七刻十一分四秒方周……。年周者，旋于日外之周而复始，因其随旋随升，尽历十二宫位。凡三百六十五日二时七刻三分四十五秒方能一周，故有四季之分，寒暑之别也”。这里介绍的“日心说”以及地球同时公转和自转的理论则完全正确。

（4）太阳、地球、月亮和其它星球的直径、体积及运行规律。《海国图志》云：“太阳径长三百一十五万里，比地径大一百一十倍，身大一百三十二万八千四百六十倍。居天之中，枢纽盘旋，不离本位，凡二十五日六时一周复始”。地球“径长二万八千六百五十里，离日三万四千五百万里。循环

①《海国图志·魏源序》。

②同上。

③《海国图志·魏源序》。

④《海国图志》卷七十四。

⑤同上。

⑥《海国图志》卷九十六《地球五星序秩》。

于日之外，凡三百六十五日二时七刻三分四十九秒方行一周。本身西向东旋，至十二时周而复始”。又云“地球之跟星即月地，本体亦无光，其所发之光，乃受日照射者，其径长七千八百二十里，比地径四分之一有余，比地身小四十九倍，离地八十五万九千五百里，循环于地球之外，故曰地之跟星”。这里的“跟星”，就是指环绕行星运行的卫星。此外，对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如水星、金星、火星、土星等也有论述。

(5) 地球上各种自然现象及其成因。《海国图志》还记述了月朔、月望、上弦、下弦、日蚀、月蚀、彗星现象，气候带划分及地球各处昼夜不均衡的科学原理，阐明了空气、风、雷电、冰、潮流、地震、火山等自然现象的成因。如《气论》论述大气云：“凡运动流行于地球四面者，名曰气。由地上升不过数十里而即止。去地近者厚而密，去地远者薄而稀”，“以通呼吸而延寿命，且又易于聚散。其散也则为热，其聚也则为冷，是以所受之热，愈炎而愈散；所受之冷，益寒而益聚，一散一聚，无不流动焉”。“试以其重验之。比水约轻八百五十六倍”。“其体质若有外力制之，可以由大而缩小”。

对大气的物理属性作了近于完整的介绍。又如《地球时刻道论》阐述各地时刻长短说：“凡居于赤道上之处，昼夜均平，日则六时，夜则六时。若所居相距赤道者，凡日之类行，越于春秋分处，愈近夏至之处，昼则渐长，夜则渐短；愈近冬至之处，昼则渐短，夜则渐长，日亦至其处而止。且其昼夜之度，时刻之数，愈离于赤道，或南或北，则逐道愈渐加增，甚至南北二圆线（按指极圈）之处，其昼之长者，竟增至十二时之多。再由二圆线至二枢纽（指南北极）之处，竟增至六个月之久，有昼无夜，皆为白日”。这些论述反映了西方自然科学最新的研究成果。

2. 关于世界地理通论

(1) 世界大洲大洋的划分及水陆面积比例。《海国图志》云：“近日地球始分为五大洲也，一欧罗巴，二亚细亚，三非尼加，四美里加，五阿塞尼亚”。按此说美洲未分南北，南极洲未列入。又云：“地球圈线周围共九万里，复以所得古今各处度量，地面周围约有积方二垓五京七兆九亿六万方里”。“五大洲内所寻之地，所访之岛，所游至近之处，极远之邦，各方共计地约六京八兆八亿二万五千里”。“水陆二面相比较，地则一分，水则三分”。

(2) 各洲山脉、河流综述。根据利玛窦《舆地图说》、艾儒略《五大洲总图略度解》、南怀仁《坤舆图说》，《海国图志》分门别类地阐述了五大洲著名的山脉、河流。其中，被提到的亚洲大河有黄河、欧拂腊得河（长江）、安日德河（恒河）、阿必河（额尔齐斯河）、印度河等；欧洲大河有大乃河、窝尔加河、达乃河、多瑙河；非洲大河有尼禄河等等。

(3) 人种的特点及地理分区。《海国图志》云世界人种“约分五种，或白、或紫、或青、或黄、或黑”。“其白者，乃欧罗巴一州、亚细亚东西二方、亚非利加东北二方、亚美利加北方，此数方之人，颜色皆白，面卵形而俊秀，头发直舒而且柔；其紫者，乃亚非利加北方、亚细亚南方，除天竺及

同上。

《海国图志》卷七十四。

《海国图志》卷九十八《地球天文合论》。

《海国图志》卷七十四《地球总论》。

亚细亚所属海岛不同外，其余颜色黑紫，鼻扁口大，发黑而卷；其黄者，乃印度一国及亚细亚南方，亚美利加南方之人，其颜色皆淡黄，鼻扁口突，发黑而硬；其青者，乃亚美利加人，其颜色大半青绿，面貌毛发与黄者颇相等；其黑者，乃亚非利加人，颜色，容凸颧高，口大唇厚，发黑而卷，有如羊毫，鼻扁而大，类似狮准，间亦有白色之人，居其东北，则皆欧罗巴、亚细亚二处人，昔时迁移彼地者也。又亚细亚南方及各海岛亦有黑人，而形容体态与亚非利加之黑人迥殊”。

(4) 语言文字及地理分区。据《海国图志》统计，当时五洲语言文字，“约有八百六十种”。大致：“欧罗巴语音五十三，其通用者十有七，一大西洋，一大吕宋，一意大利亚，一佛兰西，以上四者，乃罗马国辣丁语所分派者也；一亚里曼，一贺兰，一弗拉萌芽，一大尼，一瑞典，一那华，以上六者，乃古调多尼加语所分派者也；一英吉利，其语乃辣丁、调多尼加二国所相并者也；一厄罗斯，一烘哥尼亚，一伯罗里亚，一布威弥亚，以上四者，乃古斯加拉窝尼亚之语所分派者也；一额力西，其语乃古额力西国所传者也；一回回，其语乃回鹘（又名回纥国）所传者也”。“亚细亚语音一百五十三，其通用者十有五，一回回，一天方，一伯尔西亚，一回纥，一中华，一满州，一蒙古，一日本，一高丽，一琉球，一越南，一阿瓦，一印度，一西藏等语”。“亚非利语音一百一十五，其通用者五，一伯尔卑勒。一壹的科鼻，一尼几里西，一哥布达，一桑哀等语。其天方语言，亦通行于此洲之北方”。“亚美利加语音则有四百二十二，其至通用者，除土语之外，多系别州之语，一英吉利，一大吕宋，一葡萄牙，一佛兰西，一贺兰，一大尼，一瑞西亚等语”。“南洋阿塞尼亚州语音百十七，其通用者惟马来语音也”。以上 860 种，是主要语言文字区，若“按省而分论之，约有五千余种。更按府县村镇而论，则其数至莫能计矣”。

这些新鲜的世界地理知识，对当时中国知识界来说，无疑有着发聋振聩的作用。

3. 国土（区域）地理简论

《海国图志》用整整 67 卷篇幅，逐一介绍五大洲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介绍的重点是最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新发现的大陆或地区，以及最近兴起的国家和地区。

(1) 《海国图志》对英、法、意、荷兰、西班牙等最早发达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甚为重视。以英国为例，《海国图志》以 3 卷的篇幅，辑录中外著述 13 种，用 3 万多字，从各个侧面介绍英国的情况，内容十分详尽。如《英国论略》云：“英吉利国，乃海中二方舆也，其南大岛曰伦敦国，北岛曰苏各兰国，二国共名英吉利。又有小岛称为倚耳兰，鼎足环峙，南及英海峡，隔佛兰西国，北及大北海，西至大西洋海，东距荷兰国不远。英岛延袤二十六万一千方里，户千有五百万口。倚耳兰岛延袤九万六千方里，户七百万口”。该文并强调指出：“（英）本国虽偏小，而除本国外，所割据他州之藩属国甚多，若地中海岛则有十四万户口，若亚非利加海滨新地则有二十五万三千户口，若五印度各藩属则有八十四万户口，在北亚墨利亚接花旗国地则有百五

《海国图志》卷九十八《地球天文合论》。

《海国图志》卷七十四《地球总论》。

《海国图志》卷七十四《地球总论》。

十万口，并其州东群岛白黑居民八十二万；别有新荷兰岛，当中国南海万余里，人户岁岁增益”。“故其人散布天下，无论何埠，皆有英商贸易。”介绍英国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时尚也很生动具体，其文：“其人肌肤白，发则自黄白红黎各色皆具，中多有红毛，故以红毛称之。剪发留短。其瞳睛或蓝或棕或黑。其女美艳闻四海，男四时衣呢戴毡，内衬汗衫，外罩背心短衫，内外二裤。冬则外套长袍，足蹠皮靴。女衣用绸缎及各洋布，随风俗，依时代，百变千式，首戴大帽，面挂薄帕，身衣长衫三四重，最好洁。首饰诸宝，不计价值，归必购各国之珍，以贻女奁。民日三餐，早饮茶、加菲等，暨面包干饵牛乳油，午后大餐，牛、羊、鸡、豚、鱼、菜，惟荷兰薯甲于各国”。“民居高广数层，歪饰精丽，精贴华纸，板铺花毡，户垂帷帐，悬山水之图”。“庶民惟拜天主，尽绝道释，不奉异神。其教礼有一二，一日洗礼，一日圣餐。城邑乡里，各派教主，每七日一礼拜”。“婚姻必男女自愿，然后告诸父母，不用媒妁，惟拜教主，祈上帝，婿则以戒指插新妇之指，即为夫妇”。“国人相接，除帽示敬，尊坐卑立，惟跪拜上帝，即见国王亦不拜也”。

(2)《海国图志》对新发现的大陆和地区也很重视。当时，考察南极的探险活动已经开始，人们已逐渐探知南极有一块新大陆。卷七专列《南极未开新地附录》一节，报道有关考察活动及探勘结果。其一云：“考察南极地方之事，云有新回来之阿弥利坚洲育奈士迭国温先尼士船，船主名威厘机士，此船离腮尼岛已八十日，正月十九直驶至南极之六十四度二十分，见有土地。此船曾绕南极海岸游行七百里，因离岸稍近，常致搁浅，常为冰山所环绕，并历风暴不少，幸未撞破。现带有南极地方之石回来，有重至百余磅者。考察出此地虽无益于贸易之事，然可以释众人欲知南极有无地主之疑心”。另一则云：“去年有一船游弋南洋露出一大洲，在非利亚及米利加二大洲之南，见有岛，名为大风。此外无他生物，亦无果蔬可食，想其地极寒，恐种谷麦不生也”。此外还有数则，兹不赘引。

(3)凡新开发的地区和新兴商埠，尤其是史籍上昔无今有者，亦皆多方搜集资料，详细记述。卷十五所记“新埠”即是一例。新埠（疑即交栏山，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南岸外的格兰岛）又名布路槟榔、槟榔土。旧为海中岛屿，清乾隆年间被英人辟为商埠，发展很快。《海国图志》遂摘录谢清高的《海录》和何大庚的《英夷说》，具体介绍其发展状况。《海录》云：新埠“在沙刺我西北大海中，一山独峙，周围约百余里，由红毛浅顺东南风，约三日可到，西南风亦可。土番甚稀，本巫来由种类，英吉利招待商贾，遂致富庶。衣食房屋，俱极华丽，出入悉用马车。有英吉利驻防番二三百，又有叙跋兵千余。闽粤到此种胡椒者万余人。每岁酿酒，贩鸦片及开赌场者，权银十余万两”。《英夷说》云：“近粤洋海岛有名新埠者，距大屿山仅十日程，沃土三百里，闽粤人在彼种植，以尽地利者不啻数万，阡陌田园，一岁再熟。即粤人所谓洋米是也。英夷以强力拒之，拨叙跋兵二千驻防。其地与新嘉坡相犄角，居然又一大镇矣”。

《海国图志》卷七十四《地球总论》。

《海国图志》卷七十《南极未开新地附录》。

《海国图志》卷七十《南极未开新地附录》。

《海国图志》卷一五《英夷所属新埠岛》。

同上。

魏源在辑录西方地理文献，引用西方新说时，经常提出自己的见解，发表不同的看法。例如他认为被大洋大海包围的陆地才能称作“洲”，而欧亚大陆联成一片，本为一洲，用山脉将其强分为二洲的划分办法不妥。他在译核各种资料的基础上，还经常指出西方学者的疏漏和错误，例如他认为南怀仁所绘地图中，大金沙江下游安日德河与金沙江各自入海的绘法是错误的，便是一例。

《海国图志》内容广博，取材丰富，胜于同时期成书的《瀛环志略》。但《瀛环志略》言简意赅，亦有所长，故《海国图志》百卷本亦辑有《瀛环志略》的内容。《海国图志》卷帙繁浩，不免有疏舛之处，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曾予考订。

《海国图志》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就地理学而言，它促进了中国知识界地理观念的解放，推动了清代地理学的发展，开近代研究地理学的先河，立学术研究“资于救时”的新风，影响深远。在建设地理学科方面，其贡献决不亚于它在推动变法维新方面所起的作用。

（四）《朔方备乘》

《朔方备乘》是一部研究中国北方边陲和俄罗斯等国的资料汇编。作者搜集的资料很完备，“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堪称清代研究北国边务的大全。

作者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人，清道光年间刑部主事。他喜好交游，博览群书，治学则“于经史百家之间，事物之理，考证钩析，务穷其源委，较其异同，而要归诸实用”。何秋涛虽于39岁去世，但仍留下许多著作，所著有《蒙古游牧记补注》4卷、《一镫精舍甲部稿》8卷、《王会篇笺释》3卷，未刻书有《校正元太祖亲征录》1卷、《延昌地形志》、《篆隶源流》。

何秋涛学有根柢，在刑部任职时，“究心经世之务”，因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清王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又鉴于明中叶以前，俄罗斯尚未与西洋诸国往来，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所著图籍中，“于俄罗斯地名多未详载”，清中叶雅裨理所云比较详细，但仍“舛误多端”。秋涛乃采官私载籍，成《北徼汇编》6卷，后复增补图说，共80卷，上呈，咸丰帝赐名《朔方备乘》。此书进呈以后，旋即散亡，吏部侍郎黄宗汉复取其副本，缮清进呈，“复毁于火”。后在李鸿章帮助下，令黄彭年及畿辅志局

《海国图志》卷七四《释五大洲》。

《朔方备乘》卷五三。

《海国图志》卷七十《南极未开新地附录》。

《续碑传集》卷二十。

《朔方备乘·李鸿章序》。

同上。

《朔方备乘》卷五九《辨证瀛环志略》。

同上。

《朔方备乘·李鸿章序》。

诸人“为之补缀排类，复返旧观”。方得以付印问世。

鸦片战争失败后，不仅有识之士深感要研究西学，重新认识世界，就是清朝统治集团中许多当权者和决策者，也感到时代在前进，世界在变化。李鸿章说：“封建既废，关市已通，轮船火车瞬息万时，异域遐方迥若咫尺，顾乃局守堂室，视听曾不及乎藩篱，是岂可久之计哉。”咸丰年间，外患内乱频仍，攘外安内是清廷两大当务之急，统治者迫切需要了解西方列强的国情和动向。俄罗斯与清王朝北方接壤，虎视眈眈，野心极大，尤令清王朝不安。何秋涛编纂此书，正符合清廷政治和外交的需要，作者说：“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蕃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清廷将其列为“钦定之书”，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朔方备乘》凡例、目录 1 卷，卷首 12 卷，本书 68 卷，计全书 80 卷，连例目共 81 卷。除卷首外，所辑资料分别归入《圣武述略》、《考》、《传》、《纪事本末》、《纪》、《考订》、《辨证》、《表》、《图》九大门类。

卷首 12 卷中，惟《圣训》和《平定罗刹方略》内容重要。《圣训》汇集了清朝历代皇帝对北方各国、地区有关诏令和谕旨。《平定罗刹方略》记载了中俄关系大事记及清廷边界用兵方略。

正文 68 卷中，《圣武述略》、《考》、《纪事本末》、《记》的内容最有价值，而《考》在全书中所占的篇幅最多。

《圣武述略》有 6 卷：《东海诸部内属述略》、《索伦诸部述略》、《喀尔喀属略》、《准噶尔荡平述略》、《乌梁海内属述略》、《哈萨克内属述略》各为一卷，记述清王朝东北、北方、西北边疆诸部

《考》有 24 卷：《北徼星度考》、《北徼界碑考》、《北徼条例考》、《北徼喀伦考》、《北徼形势考》、《俄罗斯馆考》、《俄罗斯学考》、《雅克萨城考》、《尼布楚城考》、《波罗的等路疆域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俄罗斯亚美利加属地考》、《北徼城垣考》、《北徼邑居考》、《艮维窝集考》、《库页附近诸岛考》、《北徼山脉考》、《艮维诸水考》、《色楞格河源流考》、《额尔齐斯河源流考》、《北徼水道考》、《北徼教门考》、《北徼方物考》、《乌孙部族考》各为 1 卷。篇名已揭示诸考内容。其中，水道诸篇尚需略加注释，艮维诸水，指当时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河。北徼水道，指在俄罗斯境内的水道。色楞格河包括杭爱山以北，流入“北海”（今贝加尔湖）的诸水。

24 考的地理内容极为丰富，现略举数例说明之。

卷七《北徼星度考》记载了清王朝在北方边疆测定经纬度的始末，大要云：“外藩各部及边徼之外，自古无能详言其境者”。“圣祖（康熙）于地图一事极为留心，每命人乘传旨各部落详询精绘，并命精于推步之人测量天度经纬，或有不能身履其地者，必周谘博访而载之”。“乾隆乙亥平定准噶尔部，高宗命何国宗等率西洋人分道往各部测量星度，占候节气，补入舆图。己卯，诸回部悉隶版图，复命明安图等前往各绘地图，一如旧例”。于是新

同上。

同上。

《朔方备乘》凡例 30 则。

疆各地星度皆可按籍而稽，这是中国北陲有精确经纬度之始。

卷八《北徼界碑考》记载了康熙年间中俄勘定边界的经过以及在“格尔必齐河”诸地立碑刻石的情况。内有《大清国遣大臣与俄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其碑文如下：

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滨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滨河，尽属俄罗斯；

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俄罗斯。其南岸之眉勒尔喀河口所有俄罗斯房舍迁移北岸；

一，将雅克萨地方俄罗斯所修之城，尽行除毁。雅克萨所居俄罗斯人民及诸物用，尽行撤往察汉汗之地；

一，凡猎户人等断不许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猎偷盗者，即行擒拿，送各地方该管官，该管官照所犯轻重惩处。或十人，或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猎、杀人者，必奏闻，即行正法，不以小故沮坏大事，仍与中国和好，毋起争端；

一，从前一切旧事不议外，中国所有俄罗斯之人，及俄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返；

一，今既永相和好，以后一切行旅，有准令往来文票者，许其贸易不禁；

一，和好会盟之后，有逃亡者，不许收留，即行送返。

碑文后，不仅附有《附石大兴安考》、《界碑附近山川杂事》、《附论黑龙江巡察边界事宜》、《附威伊克阿林界碑考》等相关资料，而且附有《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钦定皇朝通志》、《历代掌故》等各种文献中所载的碑文，并考其异同。这种将相关资料和不同文本汇于一书的文献，极便读者研究边疆事务。

卷十《北徼喀伦考》记载了清代边境设置卡伦的经过。卡伦又称台、卡路，为边境地区更番候望之所，犹如汉朝边境设置的亭障。清代，“北徼卡伦之设，始于雍正五年，郡王策凌伯四格、侍郎图理琛等会同俄罗斯使臣萨瓦勘定边界，并设喀伦五十九座。东十二座，属黑龙江将军。西十七座，属办理夷务之喀尔喀王统辖。至乾隆二十七年，始设钦差大臣驻库伦，专理恰克图贸易事，自是以后，喀尔喀四十七喀伦分属于库伦、乌里雅苏台。而乌梁海平后，科布多增设喀伦；准噶尔平后，塔尔巴噶台、伊犁增设喀伦，一如前制，且加派侍卫，分驻巡查。”并逐一胪列 59 卡伦名称、地理位置，迁徙时间及地点于后，甚为详明。

《纪事本末》2 卷，内《俄罗斯互市本末》一篇记载崇德三年（公元 1638 年）以来中俄互市的始末原委、互市地点、通商情形、交涉细节，特别记述了以往官书未载或言之未详的史实，如乾隆年间 3 次闭关及复准通市的经过等，史料价值颇高。现摘其三地互市情况如下：“清朝与俄罗斯互市凡三，曰京师互市，曰黑龙江互市，曰恰克图互市”。京师互市：“康熙三十二年定例，俄罗斯国准其隔三年来京贸易一次，不得过二百人，在路自备马驼盘费，一应货物不令纳税，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师，安置俄罗斯馆，不支廩给，限八十日起程还国”。这是在京互市著令之始。黑龙江互市：“康熙

《朔方备乘》卷三十七。

同上。

二十八年立碑分界后，会宁、中江诸市同为市贸之小者，故其事不甚著。今秉诸书所记，以备稽考”。每“秋尽，俄罗斯来互市，或百人，或六七十人，一官统之，宿江之西，居毡幕，植二旗于门，衣冠皆织为之，易缣、布、烟草、姜、椒、糖、锡等物”。恰克图互市：“菊海以南，燕然以北，广袤数千里，商贾皆萃于库伦所属之恰克图，亦朔漠之间一都会也。康熙年间初设互市，本在库伦，迨雍正五年，卡伦既设，乃迁于卡伦外之恰克图”。“恰克图名初不著，以互市故，始大显。”当时规定“人数不得超过二百，设监视官一员”，“其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物，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初时俗尚俭朴，故多获利，嗣是百货云集，市肆喧阗，恰克图遂为漠北繁富之区云”。

《纪》有2卷，《俄罗斯进呈书籍记》、《俄罗斯丛记》2篇皆有新鲜内容。《俄罗斯进呈书籍记》列举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俄罗斯进献书籍357种，其中“言彼国史事地理武备、算法之书十之五，医药、种树之书十之二，天主教与夫诗文等类，仅十之一而已”。《俄罗斯丛记》内容庞杂，所载《论俄国地势南高北下》、《论俄国水多北流》、《论俄国有塔塔尔遗民》、《俄国近西洋》、《论俄罗斯土地人民》等篇，皆与地理有关。

在《考订》、《辨正》、《表》、《传》4个门类中，也有许多研究边陲和俄罗斯等北方诸国的材料。例如书中考订辨正的19种文献，皆历朝记载北徼地理的要籍，《历代北徼用兵将帅传》、《国朝北徼用兵将帅传》所记，皆是与北方诸国或地区有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北徼沿革表》、《北徼地名异同表》形同工具书，能为读者提供方便。

是书继承传统的“左图右史，相须为用”的编纂形式，其载有地图25幅，供读者参照阅读。其考证，则以清朝钦定之书，历代正史为据，旁采图理琛、陈伦炯、方式济、张鹏翮、赵翼、松筠、张穆、魏源、姚莹等人著述，以及外国人艾儒略、南怀仁、雅裨理等人的论述。

（五）《五洲地理志略》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成书的《五洲地理志略》，是体现清末中国学者学习西学、研究西学的程度和水平，反映知识界思想观念的发展与变化、表明中国传统地理学日益向西方地理学靠拢和接近的地理著作。

作者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学者称葵园先生，民国后又署名曰遁，湖南长沙人，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光绪时，充日讲起居注、国子监祭酒，后因所著书受褒，加内阁学士衔。他为官时，关心时务，4次上书朝廷，指出“俄人叵测”，所陈未尽事宜“多切中利害”；又弹劾太监李莲英，语“尤切直”，“风采倾天下”。他出任江苏学政，主持思贤讲舍、岳麓书院、城南学院时奖掖后学，“成就人才甚多”。他崇尚经学，“致力弥笃”，著有《尚书孔传参正》、《三家诗集义疏》、

同上。

同上。

《碑传集补》卷八。

同上。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王先谦传》。

《荀子集解》等。于史地一门，著述亦丰，力作有《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合校水经注》、《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等。

王先谦著《五洲地理志略》与徐继畲著《瀛环志略》的时代背景略有不同。徐继畲著《瀛环志略》时，系鸦片战争以后不久，中国刚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土初通，图记茫昧”，所记主要依据裨雅理提供的情况和地图，虽然也参证了其他西方人提供的资料，但只是“粗知各国之名”，“匆促不能详”。王先谦著《五洲地理志略》时，距徐继畲著《瀛环志略》又过了70年，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已大大加深，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深刻。在这70年中，西方地理学又有新发展，海外译丛和地理图籍不断涌现，西学译著水平也有明显提高，“外国地理考证之书，日出不穷”。举其主要者，有方式济《沙龙纪略》、西清《黑龙江外纪》、矢津昌永《高等地理》、野口保兴《中外大地志》、伊东古谷《万国年鉴》、坂本健一《地名人辞典》、雷文斯顿《万国新地志》、慕维廉《地理全志》，以及《泰西新史》、《西洋史要》、《大圆球图》、《汉文图》、《平方图》、《俄罗斯史》、《佛兰西志》、《英吉利志》等。据笔者统计，王氏在书中引用的就有60种。这就使作者能够参证比较，综合前后，写出比《瀛环志略》、《海国图志》更为完整精详的新志书。

王先谦是采取为雷文斯顿《万国新地志》作注的形式，撰著《五洲地理志略》的。王氏认为，在众多的地理图籍中，徐继畲著的《瀛环志略》和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893年）刊行的英国爱丁堡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最为重要。他说：“昔中国志地，肇端班史，五洲志地，托始徐志，先河之功，实堪并美”，又说：“雷志纲领完密，英伦尤详”。作者认为，“凡志地，后出为主”。基于这种认识，他撰著《五洲地理志略》时，以雷氏《万国新地志》为正言语，以徐氏《瀛环志略》为注文，并以各种中外志书校之。这种体裁，与他所著的《合校水经注》如出一辙。《五洲地理志略》共36卷，卷一至十三叙亚洲诸国地理，卷十四至十五叙澳洲国家地理，卷十六至十八叙非洲国家地理，卷十九至二十三叙美洲国家地理，卷二十四至三十六叙欧洲国家地理。是书采摘的资料，吸收了最新出版的各国史志中的新素材，地名翻译和地理语言已逐步与现代地理著作接轨。

《五洲地理志略》正文、注文和校补的地理内容，与道光、咸丰年间成书的地理译著、与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著作相比，有以下明显的变化：

（1）记叙更加完备详尽。记载世界大洲大洋的界限，已较过去更加准确。如“亚细亚洲：北尽北冰海，东尽太平洋，南尽印度海，西北以乌拉岭、乌拉河、里海、高加索山（近又以马尼纳河谷为欧亚自然之界）、黑海、地中

《碑传集补》卷八。

《碑传集补》卷八。

同上。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王先谦传》。

《碑传集补》卷八。

《五洲地理志略·序》。

同上。

同上。

海与欧洲为界，东南以巽他婆罗洲、西里伯诸岛与大洋洲分界”。 “ 欧罗巴洲：亚细亚极西北之一隅，地形与海水相吞噬，比亚细亚不过四分之一。部落甚多，大者十余国，中国所谓大西洋者，皆此土人也。北临北冰洋，南枕地中海、黑海、高加索山，与亚非二洲分界，西滨大西洋，遥与北美相对，东以乌拉岭、乌拉河、里海连合亚洲。 ” “ 阿非利加洲：在亚细亚西南，其东西南三面皆大海，北面两内海界隔（红海、地中海），仅一线与亚细亚相连，地得亚细亚之半 ”。 “ 亚美利加洲：在地球之西半，与诸洲不相属，地分南北，两土中有细腰相连。北岸抵北冰海，西北一角与亚细亚东北一角相近，中隔海港数十里，东南与欧罗巴隔大西洋海遥对，西面大洋海，直抵亚细亚之东方，见畔岸，南界南冰海，两土合计，与亚细亚袤延相埒 ”。 “ 大洋洲：乃澳大利亚大陆及太平洋中无数大小岛屿相合而成 ”。这里所记各大洲，界限分明，比例正确。记载五大洲各国，完备详尽的程度也超过以往。例如，王氏将俄罗斯作为主要欧洲国家，分别在欧亚 2 洲中立卷，以整整 6 卷篇幅，约 12 万字，叙述其领土及国情。此外记述美国有 11 万多字，日本有 5 万多字。所记非洲国家和地区的总数，已达到 70 个，记叙“ 塞内冈比亚 ” 与几内亚亦达到 3000 余字。

（2）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五洲地理志略》的自然地理内容有明显增加，对季风、降雨、洋流、海底地貌等都有论述。例如记述大西洋海底地形说：“ 大西洋界于新旧二世界之间，为海底高原，分为东西二半，火成岛如阿科斯、圣保尔阿升、纯剔里斯坦、带铿哈，皆起于此高原之上 ”。又记述里海地质及海情说：“ 据地质学家言，古代里海北至北冰洋，西至黑海，皆其海盘故地，今默捏起河谷，其遗迹也。无潮汐涨落。然西部高加索山脉横贯，伸入海底，故暴风所激，常有怒涛，其水量北部最浅，南部渐深至四千英尺 ”。再如记洋流：“ 大西洋诸泉流，始皆由风而生，贸易风自东北及东南吹至赤道，遂生北赤道流，与南赤道流偏转至新世界（即美洲）之海岸，后分为数派，一派折回几内亚湾，即名几内亚流，一派沿巴西海岸而南，一派加入厘宾海及墨西哥湾，于此遂生湾流，以湾流之暖水，能使欧洲有温和气候，不至困于冰山。有寒流出拔芬湾南流，沿北美洲之海岸，又有寒流从南冰洋而来。沿南美洲之东岸，非洲之西岸，遂调和而生相配较低之热度 ”。北冰洋下又论云：“ 通太平洋与大西洋有三口，一为狭且浅之白令峡，一为大關峡，一在挪威与格林兰之间，湾流之暖水由此入极圈，使挪威海至那岱野随力周年不冰，暖流至西伯利亚岸，力已薄弱，使依岸斜转，遂没入于相反之冷流，此冷流过格林兰及腊勃拉多之东岸，扶大冰块以入大西洋 ”。

经济地理的内容，也有明显增加，如耕地、草场、工厂、移民、工人、国债的数字，工业品、矿产、水产的种类，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情况，都有详细记载。值得重视的是，许多国家所辖的省、邦、州，乃至府、县的内容也很具体，如记述日本大阪府云：“ 大阪在大阪湾东北端，为外国通商场。有陆军制造厂、造糖厂、造币局、造船所、纺绩公所、造火柴厂。商业之盛。

《五洲地理志略·序》。

同上。

《五洲地理志略·卷首》。

同上。

同上。

推为西南第一。出入口货，岁值约七百万元，居民二十万”。这些内容也是道光、咸丰间诸书所未见的。

此外，还记载了许多与五大洲地理有关的内容，最引人注目的，是西方列强殖民和贩卖黑奴的情况，如“打爱司赛拉摩国”云：“千八百八十四年，德国殖民会社始谋殖民于此部海岸，又与各地酋长结约，占领各地。翌年二月，为德保护国，后又派遣军舰威吓，桑给巴尔之回教王亦归保护。其后以保护权让英。千八百八十六年与英订约，定南北界，全面积约三十八万英方里”。“塞内冈比亚与几内亚国”云：“值饥乏，族内自相攻掳，获生口卖以为奴。各国之船往来贩鬻。每船二、三百人，如货豕畜，诸国所用黑奴，皆此土人，贩往美洲者尤多，灌园耕田，种加非，造白糖，如牛马然，终身力作”。

(3) 增补清末地理内容，体例逐渐向西方地理学靠拢。记叙大清国时，作者认为“矿产兴盛，路电交通皆前此所无，不可无述”，又感到：“迩来铁道电线敷设未周；矿产殷闾，采掘尚视为末务；海湾曲折，军港半馈于外人，为国者所宜长虑”，因而特意增加上述有关内容。另如直隶省载交通云：“航路自天津东南，通之罘、上海，东北通营口；东通朝鲜仁川及日本长琦，如塘沽，如秦皇岛，皆为停泊之埠”。又云：“铁路已成者凡五，一京津路，一津榆路，一京汉路，一正太路，一京长路。拟修者有二：津保路、津镇路”。又如“盛京省”载港口云：“旅顺口，黄海北岸一最要军港也，港口南向，港门二山交抱，如蟹之二螯，西螯长而东螯短，山内之澳亦然”；“船坞在东澳，水深浪阔，四山环绕，为能多泊兵船之佳埠”。再如浙江省载电线云：“电线由杭州东北通嘉兴、上海，东南通宁波，西南通福州（由兰溪、衢州，经南溪，东分金华、缙云、温州）”。此外，工商业也开始列为地理内容予以记载，如广东省云：“出口货著名者，如丝绸、茶叶、蔗糖、芭蕉扇、竹布、蕉布、草蓆、花爆等”。又云：“民亦工于制造与商业，较之各省，最有文明之智识”。这些内容的掺入，表明《五洲地理志略》已突破中国地志的传统体例框架，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方面的内容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五洲地理志略》还反映了在激烈的社会变动中，王先谦思想观念的变化。王先谦是一位饱读经史的旧学者，西方地理学传入以后，他在治学上接受了西方地理学的观点，开始将洋流、季风、海底地貌、铁路、电信、矿产、港口等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地理学，丰富和改造了中国传统的地理学；另一方面在思想观念上，他也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认为：“世无欧人，必无美、非、澳三洲，无三洲则地球不通，故欧人者，今世界之枢纽也”。这就使他

《五洲地理志略》卷六。

《五洲地理志略·卷首》。

同上。

同上。

《五洲地理志略》卷六。

《五洲地理志略》卷一。

《五洲地理志略》卷一。

《五洲地理志略》卷七。

《五洲地理志略》卷四。

《五洲地理志略·卷首序》。

陷进了欧洲中心论的泥潭。

第三章 河渠水利专书

一、水道著作

(一) 《明史·河渠志》

《明史·河渠志》是记述明代河渠水利的专篇，共6卷。全篇以黄运2河为记述重点。黄河历来善淤、善决、善徙，为害最烈，影响最大，治理最难。明代治黄又与护陵、保运、治淮有关，遇到的问题更多，耗费的财力更为惊人，因而在《明史·河渠志》中占的篇幅最长，份量最重。

自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贾鲁治河后，黄河干流经开封至徐州，东南流，在清口（今江苏淮阴市西）挟淮北去，沿淮河河道东北流，经云梯关（在今江苏滨海县北）入海。明代前期，北决频繁。弘治年间，刘大夏治河，在武陟、虞城、沛县一线，筑太行堤数百里，防止黄河北决，以保运道无恙，南岸则既不筑堤，也不堵口。这一时期，黄河下游南岸同时存在着睢、涡、颍数股并流的局面。河南、山东、南直隶（约相当今江苏、安徽2省）交界处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强使河水南流，完全逆水之性，有悖自然规律。实施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治理方针后，河南境内的水患转移到下游，对徐州以南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嘉靖以后，潘季驯对黄、淮、运三者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认识到“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制定了治黄为主，兼顾其它的综合性治理方针。又根据他对黄河泥沙的认识，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主张，在黄河下游坚筑堤防，将河水约束在河道当中，让其全力冲沙，刷深河道。经过潘季驯的治理，“河身渐深，水不盈坝，堤不被冲”，出现了河政上的小康局面。黄河为害的原因，一是洪水，二是泥沙。泥沙的危害出现在下游，但产生泥沙的根源却在中上游。潘氏治河的重点放在下游，忽视了对中上游的综合治理，所以未能很好地解决泥沙来源问题，也无法根除黄河的灾害。后来，黄河继续肆虐，只能堤上加堤，于是河身日高，决口泛滥的情况仍然不断发生，直至明朝灭亡。由于治黄、治淮、护陵、保运常扯到一起，关系错综复杂，其矛盾之多，治河之难，实属空前。为此，河臣们提出过多种建议，试行过多种治河方案，如“蓄清刷黄”、“分黄导淮”等等，但限于社会制度和科学水平的制约，任何方案皆无法圆满解决各种矛盾，最后仍以失败告终。以上所述，是黄河为害态势和河防工程的大要。

《明史·河渠志》以此为背景，记载了黄河决徙大要、为害状况，以及堵口、浚河、筑堤、设闸、建坝等河防工程，还记载了白昂、刘大夏、胡世宁、李承勋、朱衡、盛应期、潘季驯、翁大立、万恭、吴桂芳、施天麟、杨一魁、李化龙等院部大臣和河工诸臣的防治主张，其它与河政有关的内容，如河臣的奖惩擢免、沿河州县的赈恤和赋税减免，以及营建神祠、祀奉河神、加封神号等，亦间有所记。

运河也是重点记述的内容之一。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重浚大运

王锡爵：《印川潘公墓志》。

常居敬：《钦奉敕谕查理黄河疏》。

河成功，漕运大通，海陆运俱废，大运河成为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成化以后，岁运漕粮四百万石，悉皆由此，其重要性远非元代所能比拟。这条运粮河，因沿线地势和水情不同，分为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数段，而闸、河、湖3段的防治，“于转漕尤急”。所谓闸漕，即会通河，北起临清，南至茶城（在今江苏徐州市北）。这一段运河，以南旺（在今山东济宁市北）一带地势最高，“北至临清三百里，地降九十尺，为闸二十有一；南至镇口（按指镇口闸，在今江苏徐州市北）三百九十里，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七”。山东雨量较少，全靠汶、泗及诸泉水济运，河水全赖闸坝控制。故除上述48闸外，“又有积水、进水、减水、平水之闸五十有四”。又为坝21处，辅助诸闸防止河水外泄。所谓河漕者，即上起茶城、下至清口（在今江苏淮阴市西）的运河，亦即以黄河作运河的河段。茶城以上的河道分为3支，主流迁徙不定，“上流苦溃，下流苦淤”，河道不时受阻，这是运河受黄河影响最大的河段，其长度约500余里。后来开新河避黄河之险，主要是为了解除这一段黄河对运河的干扰，确保漕运无虞。所谓湖漕，即大运河淮安至扬州段。这一带有管家、射阳、白马、汜光、石臼、甓社、武安、邵伯诸湖，“本非河道”，漕运专取诸湖之水，故曰湖漕。湖漕沿线地卑积水，常为泽国，黄河溃决南移后，疏防工程也很吃重。《明史·河渠志》以此三者为重点，记述了运河多段通航、决溢及淤浅的情形和水柜、斗门、闸坝等运河沿线的水利设施，以及修筑戴村坝、高家堰，开凿弘济河、顺济河、康济河等重大水利工程的情况，对黄运关系、黄淮关系等也有所记载。

除黄运2河外，《明史·河渠志》还逐一记载了淮河、卫河、漳河、沁河、滹沱河、桑乾河等。海运不属于河渠，因与漕运有关，故列于运河之后。直隶水利多涉及湖泽陂墟，也附在本篇之末。

《明史·河渠志》是仿历代正史河渠志编纂的河渠专篇，基本采用编年体，将有关资料按年代先后汇为一编。依据的史料，多为《明实录》、《明史稿》及名臣奏议等。体例悉本正史河渠志，极少创新，惟《直隶水利》一篇，为以前诸志所无。

《明史·河渠志》保存了许多重要资料，如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巡抚徐源疏清复筑堽城土堰，李鏊疏清兼修戴村及春城口二坝等重要内容，皆《明史稿·河渠志》所未载，可资参考。但其所记方面，比较狭窄。就封建国家水利而言，仅记述了治河、灌溉、航运3方面，水利动力和城市用水方面的内容付缺。在河情方面，记述河床宽窄、径流特点、洪水季节变化的内容较少，也未提及泥沙含量及两岸植被情况。在工程技术方面，偶有提及，亦语焉不详。不少方面反而比不上前代所修的《宋史·河渠志》。时至清初，记载河渠水利的专书已经较多，若作比较，则内容不如《读史方輿纪要·川渚异同》简明扼要、条理清楚；资料不如《行水金鉴》丰富和完整；叙述工程原委不如《河防一览》、《治河方略》具体而详备。

（二）《今水经》

《明史·河渠志三》。

同上。

《今水经》是记述清初全国水道源流的专书。

作者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史学家。其父尊素为东林名士，宗羲受遗命师事刘宗周，19岁入京讼冤，以铁锥伤仇人，后领导复社进行反宦官斗争，几遭残杀。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进行武装斗争，被鲁王召为左副都御史。明朝灭亡后，隐居著述，屡拒征召。他博古通今，对天文、地理、算术、乐律、经史百家及释道之书，无不精研。其史学成就尤大，所著《明儒学案》叙述明代讲学诸儒流派分合得失甚详，开浙东史学新风气。在经济方面，他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反对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强调工商皆本。在文学方面，他认为诗文必须反映观点，表达真实情感。黄宗羲著述极丰，计有《南雷文定》11卷、《文约》4卷、《四明山志》9卷、《历代甲子考》1卷、《二程学案》2卷、《明史案》244卷、《明夷待访录》1卷等10余种。

黄宗羲认为，酈道元作《水经注》补《水经》所未备，其功甚大，但不足之处亦多。其一，注文引注广博，但空言甚多，如“开章河水二字注以数千言，援引释氏无稽，于事实何当，已失作者之意”；其二，南方诸水错误不少，“以越水证之，以曹娥江为浦阳江，以姚江为大江之奇，分苕水出山阴县，具区在余姚县，沔水至余姚入海，皆错误之大者”；其三，《水经注》成书时代久远，千余年来水道形势变化很大，作者“参考之以诸图志，多不相合”。因此，他不袭前作，自定体例，条贯诸水，穷源按脉，撰成是书。

《今水经》不分卷，全书仅2万余字。书前有黄宗羲序，开篇首列《今水经表》，为全书纲领。次分北水、南水2区，以入海水系为纲，记叙诸水。殿以其元孙黄璋跋。

《今水经表》所叙诸水纲目如下：

北水：

河入海

忽兰水入河

亦八思河入河

纳邻哈刺河入河

乞里出河入河

鹏楞河入河

邈水入河

凤林河入河

浩亶河入河 湟水入浩亶河

洮水入河

金水入河

吃那河入河 奢延水入吃那河

延水入河

汾入河 涑入汾

渭入河 漳、清、 、泾、沮入渭 马莲河入泾 漆入沮

《今水经·黄宗羲序》。

同上。

同上。

洛入河 涧、灋、伊入洛
济入河 汶入济
沁入河
汁入河 须、郑入汴京入郑索入京
辽入海
大清河、小青河、珠子河、浑河、太子河入辽
鸭绿江入海
大虫江入鸭绿江
混同江入海
松花江入混同江黑龙江入松花江
大凌河入海
小凌河入海
胶入海
卤水、张奴水入胶
淮入海
丹入海
沽入海
墨入海
淄入海
纯、时入淄
滦入海
漆入滦
白入海
黄花镇川河入白潮河入白
卫入海
淇、漳、汶、滹、桑入卫清入淇沙、易入滹温、义入易洋入桑

淮入海
汝、颍、淝、涡、濠、池、泗、邗、沐入淮 滢入汝 洧入颍 沭、沂、
睢入泗
南水：
江入海
皂江入江
大渡河入江沫水入大渡河
金沙江入江大姚江、打冲河、泸水、滇池、牛栏江、马湖、泉江入金沙
江大保河、渠
濠州入滇永宁河入江
资江入江支江入资
南江入江
嘉陵江入江巴、涪入嘉陵江
乌江入江翁首河、南明河、湘江、龙底江、思印江、河由江入乌江
开江入江
清江入江
沮江入江

漳江入江
汉江入江 均水、涓水、夷水、白水、湓水入汉
洞庭湖 水入江湘入湖洮、灌、卢洪江、永、潇、祁、舂陵水、蒸、郴、攸、漉、涟、涓、浏、沔、汨入湘 澧入湖 都梁水入澧 邵水入澧 沅入湖 处洞河、清江、锦江、洪江、淑、西、辰入沅 澧入湖 淩、渫、涇、澹、兰江入澧
沔入江
淠河入江
陆水入江
龙开河入江
彭蠡湖水入江、赣入湖贡水、章水、云亭江、早禾江、吉水、袁江、丰水、蜀江、奉新江
入赣濂水、宁都水、雩都水、兴国水、信丰水入贡犹水入章盱入湖飞猿水、宜黄水、崇仁水入盱鄱江入湖泊水、建节水、德兴大溪入鄱上饶江入
湖永平溪、玉溪、楮溪、白塔河、宋溪入上饶江修水入湖
皖水入江
池河入江
大通河入江
获港入江
漳淮入江
青戈江入江
巢湖入江肥水、桃溪入湖

秦淮入江
滁河入江襄水、清流水入滁
北运河入江
南运河入江
太湖入海
苕溪、荆溪入湖
浙入海
轩驻溪、寿昌溪、东阳水、桐江、浦阳江、钱清江、曹娥江入浙
姚江入海
灵江入海
永宁江入海
永嘉江入海
安阳江入海
连江入海
建水入海
东溪、西溪、南浦溪、松溪、樵溪、海溪、沙溪、尤溪入建水
洛阳江入海
晋江入海
漳江入海

汀水入海
广江入海（右江会左江为广江）
福祿江、融水、洛青江、柯江入右江
白石江、潇湘江、龙江、西江水、八尺江、清江、武流江、秋风江、东班江、宝江入左江明
江、崇善水、驮排江、归安水入龙江
乌江、白马江、繡江入广江
漓江入广江、阳江、银江、相思江、荔水入漓江
陆川、东安水、泷水、新江、绥江入广江
浚水入广江杜安水、凌江水、朔水会浚水、黎溪、武水、翁溪、湟水入浚水
龙川入广江西江、增江入龙川
漠阳江入海
鉴江入海
廉江入海
钦江入海琼海潮候
元江入海
澜沧江入海

样备江入澜沧江西洱海入样备江

大盈江入海

麓川江、潞江

《今水经》最大的特点，是“庶免空言”，注重现状。黄宗羲认为：古人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其所著《今水经》亦贯串这一思想，“先之以表，次分疏其节目，一切卮言剿说，汰尽不留”。与胡渭作《禹贡锥指》的立意完全不同。

黄宗羲改《水经》为《今水经》，原欲补前人之失，但因其不能遍历山川，仍有不少悬揣致误之处。“如河水条下云：河至底柱，又东经孟县南，又东经洛阳北，洛水从南来注之。按《禹贡》导河云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盖河水在洛阳之北，有芒山以间之。其河水所行之地，于今全属孟津，与洛阳不相关涉，又今之孟县在洛阳东北，相去约及百里，乃云东迳孟县南，又东径洛阳北，则于地理显相背戾矣”。“又卫河附注云：清水源出辉县西南七十里山阳镇。按《水经》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黑山。郦氏注：清水上承诸陂散泉，积以成川，瀑布垂岩，悬流注壑二十余丈。则清水实出今辉县之黑山（山今割属辉县）。此云出山阳镇者，亦只得其相近之地，转不如《水经注》之指示深刻也”。

（三）《水道提纲》

《今水经·黄宗羲序》。

同上。

《今水经·黄璋跋》。

张宗泰《鱼岩所学集》卷十一。

同上。

《水道提纲》是记述乾隆中叶国内水道源流脉络的专书。

作者齐召南（1703~1768），字次风，号琼台，学者称息园先生，浙江天台人。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被荐为副榜贡生，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授散馆检讨，后升侍读、侍读学士，十三年擢内阁学士、上书房行走，旋迁礼部侍郎。十四年堕马受伤，回乡养病，未几卒于家乡。齐氏为人谦和，虚怀若谷，天资聪明，好学强记。“自天文律历，以至山川疆域，险阻要隘，了若指掌”，“又深知古今治乱得失，通习掌故”。尝与修《礼记》、《汉书考证》。除《水道提纲》外，所著还有《历代帝王年表》、《后汉公卿表》、《宝纶堂文集》。

齐召南早年应诏与修《一统志》时，同馆杨农先、王次山对他说：“天文地理之书愈久愈详，惟水道未有专书”，“酈道元《水经注》征引虽博雅，而疏漏踳驳亦不免”。劝他重新撰著一书，“记载今日实有之脉络，山川都邑并用今名”。晚年齐氏告归养病时，便按照他们的建议，利用余暇，检出篋中旧稿，次第编录。齐召南在与修《一统志》时，已发现塞北、漠南、流沙、瀚海等西北边陲，新平定的伊犁和回部地区，“诸水绝无径流可纪”，又发现东北黑龙、卢朐、松花、濛尼、乌苏里江也“非从前史志所能稍及”，于是他就考校图籍，“专辑外藩蒙古属国诸部道里翔实”，“条其水道”，“惟图无可据者阙之”。又对历代河渠、沟洫，域中水志、地图，严加考核，“按地势而详著其纲”，撰成是书。齐氏一生辑书不下数十种，而精力所注，称为“呕心之作”的，“尤莫如《水道提纲》一书”。故其临终时，喃喃叮咛曰：“予一生功名事业如浮云，然可弗朽者独此耳，勿佚也”。后经生前好友及门人募捐，此书方才付梓问世。

齐氏编纂是书的指导思想，是“用《水经》遗意，上法《禹贡》导川，总其大凡”。但又“取其质，不取其文”；“取其实，不取其虚”。所记水道，不以《水经》为纲，而是以海为纲。作者认为：“万川会同者，海也。以一水论，发源为纲，其纳受支流为目。以群水论，巨流为纲，余皆为目。如统域中以论，则全归有极，惟海实为纲中之纲”。其论列次第，“自北而南，并取《禹贡》首冀次兖之意。内自盛京、鸭绿江以西而南而西南至合浦，外自云南而西而北，又自漠北阿尔太山、肯特山而东至海。又自海西南而西而北，包朝鲜至辽阳，域中万川纲目毕列。至于葱岭以西，水入西海，印度水入南海，丁零、黠戛斯以北，水入北海”。所举郡县地名，“悉从《皇舆

《今水经·黄宗羲序》。

同上。

《水道提纲·齐召南序》。

同上。

《湖海文传》卷二十六，戚学标《募齐息园先生 水道提纲 启》。

同上。

《水道提纲·齐召南序》。

同上。

同上。

同上。

表》” ，以乾隆年间为准。所据资料，主要是作者撰修《一统志》时所见内府珍藏的实测地图及各省图籍。

《水道提纲》共 28 卷，约 67 万字。各卷内容如下：

卷一海：叙东北自鸭绿江，经盛京、京畿、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诸水域海面。

卷二盛京诸水：叙鸭绿江、大辽河，西至京东滦河、蓟运河。

卷三京畿诸水直沽所汇：叙白河、桑干河、清水河、滹沱河、漳河、卫河。

卷四运河：叙源自山东之汶上分水，北至天津，南至清口，以及山东诸水。

卷五黄河附河源以北青海及甘肃不入河诸水：叙青海、甘肃边地安远堡水、镇番卫水（即渚野永昌卫水）、山丹水（即弱水）、布隆吉水（即黑水）。

卷六入河巨川：叙洮水、湟水、浩亶水、汾水、北洛水、渭水、湟水、泾水、洛水、济水、沁水。

卷七淮：叙入淮巨川汝水、沙水、颍水及南运河邗沟（北自淮水，南至大江）。

卷八至十江。

卷十一至十四入江巨川、叙涪水、白水、西汉水、嘉陵江、渠江、黔江；洞庭所汇澧水、沅水、湘水、资水、汉水；云梦、彭蠡所汇章江、贡江诸水。

卷十五江南运河（北至京口，南至浙江）；太湖入海港浦（江以南，浙以北）。卷十六浙江、浙东入海诸水，附福宁诸小水。卷十七闽江西南至广东潮州府水。卷十八至二十粤江：叙东江、北江、西江及西江之桂水、柳水、北盘江、南盘江。卷二十一云南诸水。卷二十二西藏诸水。卷二十三漠北阿尔泰山以南诸水。卷二十四漠北黑龙江。卷二十五入黑龙江巨川：叙克鲁伦河、松花江、嫩江、乌苏里江。卷二十六海至黑龙江口以南诸水、朝鲜国诸水。卷二十七塞北各蒙古诸水。卷二十八西域诸水。各卷之内，支分条析，丝联绳贯，叙水道源头、流向、长度、汇入诸水、吐纳湖泊、沙滩、沙洲等甚详。作者根据中国东西向河流较多的特点，采用“由北而南”的编排方法，叙列东西向河流时，次序井然。但叙列南北向河流时，却拘泥于体例，未加变通，致将南北大运河分割为四个部分，在京畿、山东、淮水、江南运河分别叙述，不能不承认这是体例上的一大缺陷。

是书“简而能周，博而有要”，“考据尤慎”，颇为学者推崇。王杰云：“潴防宣泄之法，黍稷粟麦之宜，转运飞挽之利，胥此得其概焉。视《方輿纪要》、《锥指》、《金鉴》诸书，其有裨世用略相等”。阮学浚云：“穷流溯源，支分派别，展卷披阅，朗若列眉，洵乎其为通天、地、人之大儒，而其书亦千百世不朽之书”。然书中亦有舛误，卢文弨指正云：“第台湾在闽海外，而先生叙次稍不如粤东琼郡之详，则亦似尚有当补者。至于蒙古部落等名，新有更定，先生不及知之矣。例如僧哭勒河当为僧枯勒河，哭路鄂模当为库路鄂模，谐音取字，宜有趋避，不便袭用旧文。至书有‘忝’字，

同上。

《水道提纲·王杰序》。

同上。

《水道提纲·阮学浚序》。

当即‘奥’字之省文；《集韵》有‘岌’字，又有‘𡵓’字，当即‘站’字之俗体；‘奥’字亦字书所无，古但作‘奥’，而今吴、越、闽、广间，或加山，或加水，见于名人著作者不一而足，故今亦不得而削之；今人名传置之处曰站，亦非古训，然‘𡵓’字实未经见字。更有或脱或讹，以余所知者，增正十余处”。此外，沈垚在《落帆楼文集》中也有指正。

（四）《西域水道记》

清康熙年间，今新疆等西北地区悉入版图。乾隆时，清廷平定准噶尔部和回部叛乱，进一步巩固了天山南北路的统治。但因地处边陲，文化落后，直至嘉庆年间，这一地区仍无志乘，其它诸书所载水道亦皆简略。徐松通过实地调查写成的《西域水道记》甚为准确详备，堪可为据，是研究清中叶西域水道不可或缺的著作。

徐松字星伯，大兴人，原籍浙江上虞。幼年师事钱塘吴锡麒，“九岁应童试，学使者奇其文，取入邑庠”。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中进士，得殿试二甲第一名，朝考第一名，授编修。十三年入值南书房，时大学士董诰总司书房事，“以松淹雅儒才，心重之，一切应差文字，皆出松手”。十七年因事被御史赵慎畛所参，谪戍伊犁。二十四年获释回籍。次年，他将在新疆考察所得，撰成《总统事略》一书，详述新疆建置、物产、钱粮、兵籍、险要等情况，后被道光帝召见，赐书名为《新疆识略》，又委以内阁中书。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升铸印局员外郎，二十三年授江西道监察御史，后转江南道。次年，任陕西榆林知府，二十八年病卒。徐松生平喜好研究经术，尤精史事，亦通舆地。入全唐文馆后，嗜读新旧唐书及唐人小说，多有采辑，又将《永乐大典》中河南志图、金石传记，合以前人著述，作《唐两京城坊考》。后又辑成《宋会要》初稿290卷和《续编》75卷。又“性好钟鼎碑碣文字”，在西域时，他手拓汉裴岑纪功碑、唐姜行本碑以归。复于敦煌搜得唐索勋及李氏修功德两碑，此“皆向来著录家所无者”。徐松“喜延誉后进”。沈垚、陈潮、李图等，皆得其识拔提携。自塞外归来后，“文名益噪，其时海内通人游都下者，莫不相见恨晚”。所著述有《唐登科记考》1卷、《宋三司条例考》1卷、《后汉书西域传补注》2卷、《长春真人西游记考》2卷、《新注地理志集解》16卷、《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等。

徐松谪戍新疆期间，伊犁将军松筠闻知徐松精通地理学，遂约请徐松修订汪廷楷、祁韵士编纂的《伊犁总统事略》。徐松不囿旧说，进行实地调查，天山南北两路“壮游殆编”。他在调查时，“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会则进仆夫、驿卒、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

《抱经堂文集》卷九《水道提纲·卢文弼跋》。

《续碑传集》卷七十八。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续碑传集》卷七十八。

既久，绘为全图，乃徧稽旧史方略及案牘之关地理者，笔之为记”，撰成《西域水道记》5卷。此书是记载西域水道的空前杰作，邓廷桢认为《西域水道记》有五善：一为补缺，二为实用，三为利涉，四为多文，五为辨物。“五者兼备，实为不可多得的好书”。梁启超称其为“精心结撰之作”。

徐松说：“志西域水道，难于中夏者三，一曰穷边绝徼，舟车不通；二曰部落地殊，译语难晓；三曰书缺有间，文献无征”。龙万育为“三难”注释云：“如喀楚特西之雅布塔尔，水归于西海；宰桑淖尔溢出之额尔齐斯河，入于北海。中外所限，固天绝已；即近在边内，天山、葱岭积太古之冰雪，玛海噶逊亘千里之沙碛，虽在章亥，亦将裹足，所谓‘舟车不通’也”。“新疆之界回部，厄鲁特、土尔扈特、和硕特、沙毕纳尔诸种人处其内，扎哈沁、乌梁海、杜尔伯特、哈萨克、布鲁特、霍罕、布哈尔诸种人环其外，或逐水草，或居域廓，嗜欲不同，言语互异，国语（按指满语。下同）谓山为阿林，蒙古语则曰鄂拉，回语则曰塔克，西番语则曰里；国语谓水为穆珂，蒙古语则谓乌苏，回语则曰苏，西番语则曰楚，复有重译难通，象胥不能尽解者，怀铅握槊，乌乎志之，所谓‘译语难晓’也”。“马、班始立《大宛》、《西域》两传，灼然可见者，惟龟兹一河、葱岭一山，而天山莫得其主名，大河不知其分合。自是以降，《水经注》最为古籍，乃以南河、北河分入于海。唐时，又移轮台，改置玉门，至于车师六国，康居五城，其可知者，大抵茫昧，所谓‘文献无征’也”。事实上，在此“三难”之外，还有许多困难，如在旧有记载中，有实非古地而附会者，有实见古笈而误改者，有以译语致误者，种种不可胜言；而且新疆之水，有地异而名异者，有地异而名同者，有名异而实同者，“如斯之类，尤不易抉别”。而徐松正是知难而进克服了种种困难后，才撰成此书的。

《西域水道记》各卷内容如下：

卷一罗布淖尔（今罗布泊）所受水上

卷二罗布淖尔所受水下

卷三哈喇淖尔（今哈拉湖）所受水

巴尔库勒淖尔（今巴里坤湖）所受水

额彬格逊淖尔（今玛纳斯湖）所受水

喀喇塔拉额西柯淖尔（今艾比湖）所受水

卷四巴勒喀什淖尔（今巴尔喀什湖）所受水

卷五赛喇木淖尔（今赛里木湖）所受水

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所受水

阿拉克图古勒淖尔（今阿拉湖）所受水

噶勒札尔巴什淖尔（今布伦托海）所受水

宰桑淖尔（今斋桑泊）所受水

以上共 11 篇，记载 11 个湖泊的河流源流，以及流经地区的交通、物产、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西域水道记·龙万育序》。

同上。

民族、风俗、城邑、历史、地貌、气候、水利工程等地理情况，而且还往往援引前人著述及考察资料，对流域内的有关问题进行考释、分析、论证。每篇有图。“列城相望，具言其地。其所不言，非水所经也”。

徐松著《西域水道记》，仿酈道元注《水经》的体裁。全书文字有记有注有释，“记”犹如《水经注》的经文，“注”犹如《水经注》的注文。“释”是注的注文。记主于简要，注主于详备，释主于诠释。“记”文叙水道，曰导、曰过、曰合、曰从、曰注；注文叙水道，经水曰出、曰迳、曰会、曰自、曰入；枝水曰发、曰经、曰汇。其所记水道，为防止异文舛驳，悉以《西域同文志》为准。现以罗布淖尔所受水为例说明之。纪文例：

罗布淖尔者，黄河初源所停滯也。初源三：一曰喀什噶尔河。其河二源，北源曰乌兰乌苏河，南源曰雅满雅尔河。过喀什噶尔城南而合，是为葱岭北河。又东至噶巴克阿克集，与南河合。一曰叶尔羌河。其河二源，西源曰泽普勒善河，东源曰听杂河布河。过叶尔羌城东而合，是为葱岭南河。又东与北河合。一曰和阗河。其河二源，西源曰哈喇哈什河，东源曰玉陇哈什河。又东北与葱岭河合。三源既合，阿克苏河从北来注之。又东，克勒底雅河从南来注之。又东过布吉斯孔郭尔郭境，北为额尔勾河。又东过沙雅尔城南。又东为塔里木河。又东，渭干河从北来注之。又东过库尔勒庄南。海都河从北来注之。又东注罗布淖尔而伏，再出为黄河。〔按上述纪文，以句号为断，各为一注释段落，每句之下皆列有注文。本段纪文约300字，其注释文字约3万余字，为纪文百倍。〕注文释文例（注“初源三：一曰喀什噶尔河”）：

“回语谓各色为喀什，砖屋为噶尔。地富庶，多砖屋也。《元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以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干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屯田。《耶律希亮传》：中统四年至可失哈里城。《拜延八都鲁传》：至元二十一年诸王术伯命兀浑察往乞失哈里之地为游击，是在元时已为城号（《元史·地理志》作可失哈耳。《曷思麦里传》又作可失哈儿）。西方有墨克及墨德那（墨，《明史·西域传》作默）诸国始汗曰青吉斯汗，其裔孙派噶木巴尔（《明史·西域传》：其初国王谟罕募德生而神灵，西域诸国尊为别谿拔尔，犹言天使。按别谿拔尔，即派噶木巴尔）。倡回教为第一，世祖生四子，皆天，以女妻同祖兄阿布塔拉布之子阿里嗣教为第二世，传至二十五世，曰玛木特额敏，四子长曰哈色木，迁布哈尔图；仲曰木萨，迁拜勒哈图；叔曰墨敏，居故地；季曰玛木特玉素布，迁喀什噶尔，喀什噶尔之有回教，自兹始也。季之曾孙曰玛罕木特，最得众心，噶勒丹策凌（策妄阿喇布坦之长子，绰罗斯第十七世汗）召囚之伊犁，并系其二子，长曰波罗泥都（四人旧称冲和卓木。“和卓”，有道者之称。“冲”，大也。和卓木犹言我和卓亲之之词），次曰霍集占（四人旧称奇齐克和卓木。“奇齐克”，谓小也），即所谓大小和卓木者也。大军定伊犁，玛罕木特已死，定北将军班公第释二子囚，留霍集占于伊犁，使效力，送波罗泥都归喀什噶尔，领旧部，时乾隆二十年也。阿睦尔撒纳作乱，霍集占乘间归叶尔羌，与波罗泥都各据城叛。二十三年六师问罪。次年夏，定边将军兆惠由阿克苏取喀什噶尔，波罗泥都方援叶尔羌，闻之遁归，掠人畜，逾山而西，阿琿（回人之司经况者）和济默尔等六人，以喀什噶尔城降。其境东与南接叶尔羌，西接喀尔提锦部布鲁特（布鲁克之部曰鄂拓克，今皆曰部，以省文），

北接冲巴噶什部布鲁特(“冲”,回语已见。“巴噶什”,布鲁特语手腕也),河水自西出其东,故以名之。〔按括号内,皆原书释文,特予说明。〕由于《西域水道记》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记载大都翔实可靠。如塔里木河上源的和阗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的源流、流经之地、交汇,伊犁河支流恰伦河(时称察林河)、库尔契列支河(时称车里克河)的弯曲、支流等也都记述得详细准确。

关于木札尔特冰谷的记述,尤其值得一提,其云:

阿克苏城北四百四十五里,伊犁惠远城南六百五十五里,有大山曰木素尔岭(回语,汉译为冰岭)……山脉来自西三百里之萨瓦布齐山,亦喀克善山支峰,故《唐书》以为葱岭北原,岭长百里,高百余丈,坚冰结成,层峦叠嶂,高下光莹,冰有三色,一种浅绿,一种白如水晶,一种白如砗磲……。冰每坼裂,宽或近尺,塞马骨作桥。上岭数里,渡雪海,周三四里,一线危径,界海正中,劣裁客马……。冰中时含马骨,又含巨石如屋,及其融时,冰细若臂,衔石于颠,柱折则摧,当者糜碎……。由木素尔岭行走四十余里,地多冰石相杂,内有二里

全系冰山,滑不可行,每日派回人十名鑿凿磴道。

这里,徐松依冰体结构特征,正确指出了由粗雪变质结成的冰晶,由冰水凝成的青冰,及粗大冰晶这3种冰的颜色。同时,还准确记述了冰川微地貌的冰裂隙、冰蘑菇、冰瀑布及冰雪盆等,是一段比较精彩的冰川地貌记录资料。

在记述方法上,《西域水道记》创造了以湖泊划分内陆水系的原则,这在以前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尚无人使用这一方法。此外,徐松还应用经纬度标明河流源头及交汇地点,也较为科学。

尽管《西域水道记》记述的地理内容大都翔实可靠,但由于写作时代的局限,仍有不少不足之处,需加注意。

(1) 在记述西域水道方面,虽以水道为名,实受制于湖泊水系的限制,记载并不全面。凡不入所列11个湖泊的河流,皆不在记述之列,这样就使许多河流,如塔里木盆地南侧的尼雅河及其以东的河流,皆未记载。

(2) 列入记述之列的河流,也有记载不够全面、准确的地方。如伊犁河上源喀什河(今喀什河)以南的大小支流无一记载,另一上源空格斯河(今巩乃斯河上游)的许多支流,仅记载了冒曼河等少数几支。又如流入罗布泊的车尔臣河是一条大河,但在书中却无记载。再如伊犁河的二级支流科克乌苏河,记载与水道实际走向相去甚远。

(3) 置唐代以来对河源较正确的认识于不顾,仍旧迷信黄河潜流重源说。徐松认为:“罗布淖尔水‘伏流东南千五百余里,涌出于巴颜哈喇山之麓’”。又说:“自先秦古书言河出昆仑而不言昆仑之所在,言河伏流而不言伏流之所出。至《汉书》始有源出葱岭于阗,潜流地下,南出积石之文,是得河之初源而失其重源。唐刘元鼎使吐蕃,误指库尔坤(今巴颜喀拉山、积石山一带)为昆仑山,而云河源出其间,是失河之初源、重源,而并失昆仑。元潘昂霄撰《河源志》,以火墩脑儿为河源,而并失昆仑与积石。凡此数书历代言河源者,所共宗仰而愈矫愈失,去古弥远,其他附会更何足云”。出现这

《西域水道记》卷二。

《西域水道记》卷二。

种错误的批判，是极不应该的。

二、水利工程专著

（一）《治河方略》

《治河方略》是论述 17 世纪治河通运工程的专书。靳辅撰。

明末，河政废弛，决溢严重。清初，黄、淮、运连年成灾。康熙十五年（公元 1676 年）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家堰大堤决口 34 处，淮水冲入淮扬运河，运河堤决口 300 余丈，里下河地区 7 州县被淹，黄河又决口数十处，漕运受阻。次年，靳辅就任河道总督，受命治河。他制定了确保运道为主的治河方针，并接受陈璜综合治理的建议，提出黄、淮、运全面施工兴治的方案，采取浚淤、开河、分洪、堵口、筑堤、疏通海口等一系列措施，先浚下游，后疏上游，堵塞所有决口，坚筑两岸堤防，又兴建减水坝泄洪，经过 10 余年治理，黄河复归故道，取得了治河通运的显著成效。他们又凿通中运河，使黄、运分离，各行其道；黄河南段堤工也坚修巩固，河政出现小康局面，收到了黄淮安流、运河通畅的巨大效益，被认为是清朝 260 多年中治黄通运最大的成就。靳辅结合亲身实践，论述和总结了治黄通运的实践和经验，撰成是书。乾隆年间，崔应阶刊刻此书时，又将陈璜的《河防述言》、《河防摘要》附于书后，并传于世。

靳辅（1633~1692）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祖籍山东历城。清顺治时，官内阁中书。康熙时，迁内阁学士，后出任安徽巡抚。十六年（公元 1677 年）至二十七年及三十一年间，先后任河道总督 10 余年，康熙帝对他评价甚高。有《靳文襄公奏疏》等著作传世。

《治河方略》共 10 卷，约 12 万字。卷首录圣谕 4 道，进书疏 1 道，有黄河图、黄河旧险工图、黄河新险工图、众水归淮图、运河图、淮南诸湖图、五水济运图各 1 幅。卷一至三《治纪》；卷四川读考、诸泉考、诸湖考、漕运考；卷五河决考、河道考；卷六至七奏疏；卷八名论。卷九附陈璜《河防述言》；卷十附陈璜《河防摘要》。靳辅所著，实为 8 卷。

是书主要记述黄、淮、运干支水系、泉源、湖泊概况，黄河变迁情形，历代治河议论，着重阐述 17 世纪苏北地区黄、淮、运决口泛滥并治理经过，其精要之处，皆在《治纪》。《治纪上》论黄、淮 2 河得以复故的原因，述首严处分、改增官守、设立河营、挑浚引河、开辟海口、塞决先后、量水减泄、防守险工、坚筑河堤、堵口诸要、就水筑堤、栽植柳株、酌用芦苇、运载土方、采办料物、土方则例。《治纪中》主要议论各处要害，如高家堰、永安河、南运口、皂河、中河、黄淮全势、黄淮交济、南岸遥堤、北岸水利、萧碭南河、骆马湖口、下河形势、王公堤、黄河三沙、岁修永计、论贾让治河奏、论贾鲁治河。《治纪下》论堤工、河工、物料。俞调元说：“凡防守之要，修筑之法，古人之成见，悉具于此。自明潘司空《河防一览》外，未有能逮者也”。

兴修水利，根治河患，是中国古代人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实践。

有关利用水文知识和地理知识兴利除害的情况，反映出清初地理学用于实践的社会效应，值得重视。

(1) 关于地形地势。靳辅认为地形、地势与河患大小有关，他在论述黄河中下游河患时说：“有失而害小，有失而害大”。“决之害，北岸为大，何也？南亢而北下也”。又说：“然一北岸，而其害又有大小之不同。偌上自阆乡，下迄荥泽六百里，大抵山多而土坚，不甚溃决不具论。至安东以下，虽北岸，然与海近不远，漫徐、邳北岸即溃决，而冈阜四合，盘纡东下，贯皂河而入骆马，而并归中河。曹、单溃决，或由鱼台上下以入运，或汇荆山口、彭家河以入运，皆无夺河之患。若宿、桃、清河北岸，一有溃决，则运道首阻，而自海、沐以南，马陵迤左，周围千里渺然巨浸矣”。因此，他在治理河患时，重视各处的地形及其变化。明潘季驯修筑高家堰时，筑堤礅石3000余丈，当时堰西南周桥至翟坝30里间，因“地形稍亢”，为天然减水坝，未曾筑堤。自黄流倒灌后，“湖底垫高，湖水亦因之而高，周桥至翟坝一带地势相对变低，九道决口在此淌刷成河，“地形、水势与明万历年大异”。靳辅根据变化了的地形，在此创建新堤，有效地消除了水患。又如，潘季驯治水时，宿迁北岸有马陵山及仓基、侍邱等湖为天然遥堤，毋需筑堤。清代，“地形水势则大不然”，“黄河之底与黄河之岸，较之明万历时既高数丈，而仓基、侍邱等湖又皆淤为平陆，无尺寸滞水之地”，河水一旦出槽漫堤，便会酿成水灾，靳辅也补筑了遥堤和重堤。这些治河措施说明，靳辅对水患与地形地势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地形地势是他制定治河方略时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2) 关于水性。陈璜认为治水必须知水性、顺水性，他指出：“善治水者，先须曲体其性情，而或疏、或蓄、或束、或泄、或分、或合，而俱得其自然之宜”。又说：“夫水丽于地者也，其道之变迁必由于盈，而流利必归于谦也。盈也者，涨也，塞也。谦也者，虚也，下也”。“故善治水者，惟于盈而防其变，于谦而道其流，水自得其性也”。他还强调治河必须“度其势”，非历览而规度，“则地势之高下不可得而知，水势之来去不可得而明，施工之次序亦不可得而定也”。鉴于对水性的认识，他提出的许多治理方案，如“上流应泄者，先须于下流疏之”等方法，收到较好的效果；又如挑浚引河，“分流以缓冲”，“预浚以迎溜”、“挽险以保堤”的措施，也较成功。

(3) 关于土性。陈璜在解释黄流湍急、易淤易浊的原因时，曾说：“中国诸水，惟河源为独远，源远则流长，流长则入河之水遂多，入河之水既多，则其势安得不汹涌而湍急哉”。他又特别指出：“西北土性松浮，湍急之水即随波而行，于是河水遂黄也”。他还根据元代朱思本关于河源的报告，指出河水“自星宿海发源，行十数日，水犹清浅，可涉而渡，又行数日，水渐

《治河方略》卷二。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治河方略》卷二。

同上。

同上。

深浊，则河源本清，与他水无异，是其挟沙而浊者……又遇西北沙松土散之区，于是流愈疾而水愈浊，浊则易淤，淤则易决耳”。这里提到的“西北沙松土散之区”，就是指今天的黄土高原地区，黄土的特性之一，就是土性松浮，容易被流水冲蚀。陈璜还了解到不独河水多沙，“渭流亦浊”，“他如燕地卢沟之水，其势酷似黄河……晋之汾、沁诸水亦浊”。可见他对黄土高原诸水的特性都很熟悉，对黄土高原范围内的土性都有所认识。

历史上，黄河善淤、善决、善徙，既有自然原因，也有社会原因。自然原因是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易受冲刷，黄河流入中下游以后，坡降变小，流速减缓，泥沙沉淀，日积月累，造成水患。社会原因则是人类对上游、中游植被的破坏，导致了水土失衡。《治河方略》的作者，显然已经认识到产生河患的自然原因，但尚未认识产生河患的社会原因。认识的局限性，反映在治河工程中，便是对山、陕地区水土保持工作重视不够，以致无法减少河水挟带的大量泥沙，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治河通运的被动局面。

靳辅、陈璜提出的治河方针，有许多方面与潘季驯相同，如主张束水攻沙，主张蓄清释黄，将工程重点放在徐州以下等等。另有许多方面超过潘季驯，如开凿中运河，使黄、运分离；增筑高家堰大堤，消除泗州水患；主张使用机械，消除海口积沙方面，皆较潘氏又进一步。此外，他们在工程设计中，已有了明确的流量概念，重视量出为入，这也是明代治水专家未曾注意的。因此，《治河方略》被后世治河者奉为金科玉律，与潘季驯《河防一览》齐名。

（二）《海塘录》

《海塘录》是记叙浙江海宁至杭州境内海塘修筑历史和工程技术的专著。翟均廉著。海宁至杭州境内海塘历史悠久，汉唐以来，代有修筑。清代，杭、嘉、湖地区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和赋税来源，康熙、雍正、乾隆3朝对海塘的修筑十分重视。雍正帝指出：浙江海塘关系民生，最为紧要，并任命江南河道总督嵇曾筠总理海塘事，又责成尚书朱轼、浙江总督程元章、将军阿里衮、副都统隆升等人协办有关事务。乾隆帝也多次强调浙江海塘为捍卫民生要务，曾亲临视察海塘工程。雍正执政时，为此下达的谕旨多达240次；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以前，清廷下达的谕旨亦多达18次。翟均廉是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深知修筑海塘的重要性，便广征博采，详加考证，于乾隆年间撰成是书。此书著成后，未能刊印，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收入《四库全书》时略有增补。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时，才正式面世。

翟均廉字春祉，生卒不详。乾隆举人，官至内阁中书。所著除《海塘录》外，还有《周易章句证异》传世。

钱塘江河口呈喇叭形，杭州至海宁附近是钱塘江水和海潮交汇处，潮汐运动十分典型。清代，“江水从西南来，过仁和而入海，海潮从东北至，趋钱塘以汇江，江犹狭而海广阔，冲激时虞不免”，“稍有溃决，则浸入内地”，关系农田水利甚大。海宁附近，素称江海门户，地势险要。赭山、禅机山、

《治河方略》卷九。

《治河方略》卷九。

河庄山等耸立江中，将入海水道一分为三：在南岸龛山和赭山之间，为南大门；在禅机山之北、河庄山之南者，为中小门；河庄山之北、海宁海塘之南为北大门。因受山势逼迫，这一带海潮和江涛尤为凶猛。如水势南侵，因有龛、常诸山捍卫，其患犹轻，若“水势北徙，则直逼仁和、海宁塘身，为害最剧”。故海宁附近向为修筑海塘的重点所在。《海塘录》便以这一带为记述对象，详载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以前历代修筑海塘的经过、施工情况，以及海塘的地区分布和兴废沿革。

《海塘录》共26卷。卷首录诏谕圣制，其后分图说、疆域、建筑、名胜、古迹、祠祀、奏议、艺文、杂志9门。“图说”包括海塘图、江塘图、引河图、土修塘图、柴塘图、清鱼鳞大石塘图、大石塘底椿式、十八层砌式、条式担水图、草盘头图、切沙图、尖山石坝图、木柜图、竹络式、明五纵五横鱼鳞图等15幅，皆附有文字，说明起讫长度、用料、规格、施工要领有关内容。“疆域”记述海塘沿革和乾隆年间查勘海塘的情形。“建筑”记述历代修筑海塘的历史。“名胜”、“古迹”记述沿线山、河、湖、塘、浦、石、桥、亭等地物和诗文。“祠祀”记述沿线海神庙、祭文和诗词。“奏议”记录工部诸臣奏章。“艺文”收录南北朝至乾隆间赋、状、书、文、表、议、考、记、诗、词数百篇。“杂志”记述潮汐成因、潮候等。

是书与《治河方略》一样，同属水利工程专书，其中也包含许多水文地理知识：

（1）在利用风向和水流冲刷沙洲方面，大学士嵇曾筠提出：“宁邑塘工之患虽在北岸，而致患实由南岸长有沙滩，绵亘百余里，又有沙嘴挑溜，遂致江海水势全向北趋”。他主张用借水攻沙之法，在南岸沙洲用铁器具梳控陡岸，使沙岸根脚空虚，再“乘冬季西北风多，海潮往来，使之自为冲刷，随势坍卸”。

（2）在利用海潮倒灌，挟带泥沙护堤方面，朱轼提出：“海宁沿海地方，俱系沙土，且潮汐往来，变迁无定，今沿海一带长有微沙，乘此新涨时，急将石塘砌筑，将来沙能渐聚，便可拥护塘根”。

（3）在利用河底高程，开挖引河、导引水流方面，《海塘录》提出：“开挖引河，必须看河头有吸川之形，河尾有建瓴之势，因高就下，一气贯注，方能掣溜成功”。

这些工程设计，无不反映出清中叶地理知识用于实践的社会效应，它生动说明了地理学历来说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

《海塘录》综括古今，资料丰富，“征引各史志及《玉海》、乾道、咸淳《临安志》、《四朝闻见录》、明各朝实录诸书，考订、征引颇为该洽”。例如：唐开元时，所筑盐官海塘长24里，旧《志》误引《泊宅编》，作224里，凡属此类，皆作订正。又如：所载铁符镇海一事，海宁海堤始筑于沈让诸等，皆过去志乘未备，系新增加的资料。再者，《浙江通志》虽载有海塘

《海塘录》卷一。

《海塘录》卷一。

同上。

《海塘录》卷十三。

《海塘录》卷十五。

《海塘录》卷首。

事宜，然仅至雍正十一年（公元 1733 年）为止，《海塘录》则详叙至乾隆二十九年（公元 1764 年）。所载清廷有关修筑海塘的谕旨，亦有参考价值。是书间有脱误之处，《四库提要》云：“如建筑门，叙述宋制而不及引《咸淳临安志》所载林大鼐之议。明安然之筑石堤，《明实录》载于洪武十年（公元 1378 年），而书中误作十一年”等等。这些小误不足累及全书，它的史料价值和地学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

三、水利资料汇编

《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是 2 部首尾衔接的水利文献资料。它们系统地汇总了中国黄河、淮河、长江、永定河、运河等流域的水道变迁、水利工程和行政管理的情况，所辑资料从上古到清嘉庆末，是研究河渠水利的重要参考书。

（一）《行水金鉴》

清傅泽洪、郑元庆所撰的《行水金鉴》，成书于雍正三年（公元 1725 年）。所辑资料从上古到清康熙末，全书 175 卷，卷首附图 1 卷，约 120 万字。

傅泽洪字稚君，镶红旗汉军，官至分巡淮扬道按察使副使。他曾出任淮扬道河官，有丰富的治水经验，“尝寒暑风雨于泥淖番锄间二十余年”。他积数年心力，渔经猎史，远稽胜国之实录，近述当代之文献，编成是书。郑元庆系傅泽洪幕僚，字芷畦，归安（今浙江湖州市）人，与全祖望、李绂等为友，学问颇深。梁启超指出：《行水金鉴》“芷畦在傅幕府为之纂辑，而遂假以名，如万季野之《读礼通考》假名徐氏矣”。

江、淮、河、济 4 渎，皆中国古代运道，与国计民生关系甚巨。4 渎之外，又有运河，用以转漕。历史上，运河以 4 渎之通塞为利害，而受黄河的影响最大。明朝末年，水利失修，“黄水湍悍为中州病，淮水停蓄为高堰危，黄强淮弱为清口梗，山左泉源涸、水柜竭，济汶诸水俱不足以济运”，黄、运 2 河敝败已极。清初经过大力整治，情况方才有所好转。傅泽洪长期从事治水工作，对水利事业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他深切体会到治水必须得法，否则徒耗数百万金钱，劳民伤财无已时。为了帮助治水者制定切实可行的治河通运的方案，他将 4 渎及运河兴废的缘由，疏筑塞防的轻重缓急，以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皆从文献中辑录出来，按类排比，编纂成书，供治水者借鉴，故名曰《行水金鉴》。傅泽洪希望司水政者“三复斯编”，予以特别重视。

《行水金鉴》卷首有河水图、淮水图、汉江二水图、济水图、运河图。资料排列的顺序，依次为：河水（卷一至六十）、淮水（卷六十一至七十）、汉江、江水（卷七十一至八十）、济水（卷八十一至八十五）、运河水（卷

《行水金鉴·傅泽洪序》。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文集》之七十五。

《行水金鉴·傅泽洪序》。

同上。

八十六至一百五十五)。后附两河总说(卷一百五十六至一百六十三)、官司(卷一百六十四至一百六十九)、夫役(卷一百七十至一百七十三)、河道钱粮、堤河汇考(卷一百七十四)、闸坝涵洞汇考、漕规、漕运(卷一百七十五)。其例皆摘录诸书原文,以时代类次,使各条相互证明,首尾贯串,其中有原文未备者,亦间以考核,附注其下。经过傅泽洪的排比整理,上下数千年间,地形之变迁,人事之得失,丝牵绳贯,始末犁然。《四库全书提要》认为:“谈水道者,观此一篇,宏纲巨目,亦见其大凡矣。”

该书汇编的资料十分丰富,凡《禹贡》、《河渠书》、《沟洫志》、《水经注》、两汉魏晋六朝及南北朝帝纪臣传,及各种地志悉皆辑录,无不参互考索,庶求完备。新旧唐书不志河渠,然纪传所有,无不登载。宋金元三史除《河渠志》外,如纪传、五行、百官诸志,捃拾靡遗,诸载籍中有关河务者,亦悉登载。明代则据《明实录》、《明会典》、《明史稿》,以及直省通志、府州县志、《南河全考》、《北河续纪》、《通漕类编》等书,并旁及传记、碑版、稗史、小说,几乎囊括了当时能见到的文献图书。历代治河名臣的著作,如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万恭的《治水筌蹄》、靳辅的《治河方略》、张伯行的《居济一得》等,摘录尤多。资料详备是《行水金鉴》在著作如林的水利书中能够“并传不朽”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记述水道的地理著作,自《禹贡》以后,有《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等河渠志,此皆历代正史中之专篇而非专书。专书自《水经》始,以酈道元的《水经注》最为著名,它们虽能标举源流,疏证支派,旁及水道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但不涉及水道的疏浚堤防之事。自宋单锷著《吴中水利书》、元欧阳玄著《至正河防记》,始详言治水之法。此后,水利专书渐多,论及水道形势、治理方法和管理经验者日多,刘天和的《问水集》、潘季驯的《河防一览》、靳辅的《治河方略》皆重要的治水文献,然而大多偏举一隅,专言一时一水。中国古代水利著作中,首次综括古今,胪陈利弊,统前代以至于清初,系统记述4读分合,集运道沿革和防治工程于一书的著作,应举《行水金鉴》。该书具有以上优点,所以“凡讲求水政者,莫不奉为圭臬”。

(二)《续行水金鉴》

《续行水金鉴》是《行水金鉴》的续编。先后由黎世序、张井、潘锡恩3人主持编纂。

黎世序,原名承惠,字景和,号湛溪,河南罗山人。嘉庆间,署官江苏淮扬道,后升署江南河道总督。在任时,“尤善商工,谨度支,而绳人不苛刻,故属吏用命,河淮晏然”。

张井字仪九,号芥航,又号晴,晚年自署畏堂。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署河东河道总督。六年调任江南河道总督。他曾经阅遍河道,测量海口。又能深入民间,向老农、鱼户求教,所上治水条议颇多真知灼见,故久于其任。

《再续行水金鉴·杨寿楣序》。

《碑传集补》卷十六,梁章钜《江南河道总督黎襄勤公墓志铭》。

《碑传集补》卷十六,程恩泽《江南河道总督畏堂张公墓志铭》。

潘锡恩字芸阁，安徽泾县人。道光初，擢江苏淮扬道。六年升南河副总河，后入京为光禄卿，历任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十三年，再任南河河道总督，兼署漕运总督。潘氏长于治河，“先后在任十载，无河患，清、淮士民称颂不衰”。

《续行水金鉴》编成于道光十一年（公元 1813 年），所辑资料从雍正初年（公元 1723 年）到嘉庆末（雍正以前的资料，略有补充）。全书共 156 卷，附卷首 1 卷，约 200 万字。

乾隆中叶以后，于封建国家关系最大的黄、运 2 河多变。黄河“溃决频闻，河身亦垫，于是淤淮不出，无以收刷涤之效而河日病。淮既不能畅出，势不能不增高堰以积湖渚，守王坝以防减泄，适遇风力猛盛，危险异常，于是河病而淮亦病。河高则易致倒灌，淮淤则专籍南趋，运河兼受二渎委输，满则易溢，于是河、淮病而运亦因之。”河情变，河工重点亦变，如黄河北岸防淤的侧重点已移至微山湖、荆山桥河、骆马湖等处；南岸分泄淤涨的侧重点已移至考城、清河一带，因袭康熙以前之旧观，已不能治乾嘉年间之河。

基于上述情况，黎世序等人师承《行水金鉴》的宗旨，仿照《行水金鉴》的体例，把有关的水利资料汇总起来，辑成一书，名曰《续行水金鉴》。该书收集的章牍和档案资料，具体记载了雍正至嘉庆年间的水情和治防工程，很有参考价值。

《续行水金鉴》的附图、编目和次序，比之《行水金鉴》，并不完全相同。卷首附图中，增加了永定河图，删去了济水图。所辑资料依次为：河水（卷一至五十）、淮水（卷五十一至六十四）、运河水（卷六十五至一百三十二）、永定河水（卷一百三十三至一百四十五）、江水（卷一百四十六至一百五十六）。《行水金鉴》中，官司、夫役、河道钱粮、堤河汇考、闸坝涵洞、漕规皆单独成卷，《续行水金鉴》则将有关内容分入各厅工程之中。另外，《行水金鉴》附图的展开方向是从南向北，《续行水金鉴》则已改为由北向南。

《行水金鉴》和《续行水金鉴》2 书卷帙庞大，字数浩繁。2 书选录诸书原文，虽分流域按年分排列，但是它们对流域的分类并不一致，所分细目亦较粗疏，年份次序间又有差误，许多学者和从事水利工作的人员深感使用不便。1949 年后，南京水利处为了使这两份文化遗产更好地为现实服务，编制了《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分类索引》，便于使用 2 书。

《续碑传集》卷三十三《潘锡恩传》。

《续行水金鉴·潘锡恩序》。

第四章 地理类编与论著

一、类编

清代，中国传统的地理学发展到最高阶段，地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各种体裁的汇编、会要、类书如雨后春笋，仿历代名著或集前代大成编纂的巨著层出不穷，在地理类汇编中，最为著名又较常用的有《古今图书集成》的《方輿汇编》、《续三通》和《清四通》的《地理篇》，以及《小方壶斋輿地丛钞》及其补编和再补编。

(一) 《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

《古今图书集成》是清雍正以前中国历代图书的总汇，康有为赞誉它是“清朝第一大书”，“中国之瑰宝”。

这部巨著分为6编32典：历象汇编：下分乾象典、岁功典、历法典、庶政典；方輿汇编：下分坤輿典、职方典、山川典、边裔典；明伦汇编：下分皇极典、宫闱典、官常典、家范典、交谊典、氏族典、人事典、闺媛典；博物汇编：下分艺术典、神异典、禽虫典、草木典；理学汇编：下分经籍典、学行典、文学典、字学典；经济汇编：下分选举典、铨衡典、食货典、礼仪典、乐律典、戎政典、祥刑典、考工典。典下分部，部下分卷，计有6109部，合1万卷，另有目录40卷，合计约1.6亿字。这部巨著自成体系，搜罗丰富，区分详析。《永乐大典》散佚后，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用途最广、规模最大的类书，其规模比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还要大三四倍，堪称中国古典文化的结晶，人类文化史上的巨著。

《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者，有4种说法：一作清圣祖(玄烨)敕纂，世宗(胤禛)续成；二作蒋廷锡、陈梦雷奉敕撰；三作蒋廷锡奉世宗敕纂；四作陈梦雷奉敕纂。《古今图书集成》是官修类书，按第一种方式著录无可非议。事实上，玄烨和胤禛决不可能亲身参与编纂，而真正的初编者是陈梦雷，续纂者是蒋廷锡。

陈梦雷字则震，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进士，官编修。后被人诬陷，谪戍沈阳。三十七年，玄烨东巡，他献诗称旨，得以赦归，受命在皇太子胤祉藩邸行走。胤祉爱好文学，对陈梦雷礼遇颇隆，命梦雷发凡起制，据协一堂藏书和私家藏书编纂这部巨著。从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起，至四十五年止，历时6年，初编告成。初编之书，名曰《古今图书汇编》，“为编者六，为志三十有六，为部六千有零”，由胤祉代为具奏进上。康熙帝很高兴，命将书名改为《古今图书集成》，并下令开馆重辑，仍由陈梦雷董其事。不久，胤禛夺嫡当了皇帝。雍正帝登上宝辇后，着手剪除异己，陈梦雷被视为胤祉亲信，再次被发遣到关外。与此同时，雍正帝任命蒋廷锡续成其事。又经过数年努力，至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该书方告克成。

《方輿汇编》是《古今图书集成》有关地理内容的资料汇编，分为4典。

《古今图书集成·康有为跋》。

《松鹤山房文集》卷二《进 汇编》*

其中,《坤輿典》分为土、泥、石、砂、汞、矾、黄、灰尘、水、冰、泉、温泉、井、輿图、建都、留都、关隘、市肆、陵寝、冢墓等 20 部,共 140 卷。《职方典》分为京畿、盛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南、江西、浙江、福建、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 16 省,省下分府,先汇考,次总论,有图志,然后按府逐一记述建置沿革、疆域、星野、山川、城池、关梁、公署、学校、赋役、风俗、祠庙、古迹、艺文、杂录、外编等项内容,共 1544 卷。《山川典》分为山部和水部,山部载大山、名山 283 座,水部载江河湖海等 117 个水体,共 320 卷。《边裔典》记载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及其它国家,共 140 卷。

与其它类书相比,《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体例较为科学,它既师承了唐宋类书的编纂优点,又吸收了《通典》、《通志》、《通考》的分类长处,在分类方面较《初学记》、《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书为佳。《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亦载有土、石、山川、州郡和四夷等内容,但它们或分属于其它类目,或各自成篇,互不联系。《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则将《坤輿典》、《职方典》、《山川典》、《边裔典》汇集在一起,罗列了书中与地理有关的全部内容,自成一编,这在分类学上显然是一大进步。《永乐大典》以“洪武正韵”为纲,以韵统字,用字系事,如《天文志》载在“天”字下,《地理志》载在“地”字下,遇有条目很多的字头,查找十分不易,兼以“洪武正韵”和“和水韵”的韵目不同,检索时也很麻烦。而《古今图书集成》分门别类,纲举目张,即类求书,便于按图索骥,它所收的资料虽然浩如烟海,却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

《方輿汇编》辑录了大量的府州县志,选编了许多重要文献,收录的地名非常丰富。该书《凡例》曰:“《一统志》于沿革只记其代,山川只列其名,关隘驿传只志其地,户口财赋只记其数,风俗节序只存其概。今则于通志、府州县志所已有者,皆分为各考,而与史传所载有关地方利害者,悉按年代入于纪事,则灾变救禳之宜,山川关隘防守之要,水利蓄减、驿递增减之法,移风易俗、休养生息之方皆尽焉。至于山川古迹之古今互异,或传说附会,地方大事之是非得失,或各为己见,或各为辩证,则皆归于杂录,此则较《一统志》从详者也”。所以,不见于明清《一统志》的小地名和稀有文献,常常能够在《古今图书集成》中找到。

《方輿汇编》编排山川、陵墓所采用的办法也多可取之处。如述山川,凡一郡一邑之内的山川,则仿《一统志》之例,书于《职方典》各府州县之下;凡大山名川,连跨数十州县者,则别立一章,载入《山川典》中,并绘有图形,以志识别,又考其跨越地界,与别地名同而实异者。至于山泉矿产之多寡,寺观古迹之兴废,皆书于其下,以备查考。这种分类处理的方法,比《一统志》将名山大川硬行划归某州某县,或将整个山系河流割裂为若干单元,分叙于府州县下的作法更为科学。

《方輿汇编》绘制的地图,吸收了当时最新的测绘成果,印刷也很精美。最值得一提的,是《坤輿典》和《职方典》中各省府州地图已经采用实地测绘资料,地物方位的标绘比晚出的《嘉庆重修一统志》卷首附图准确,山脉河流的描绘手法和现代地图更为接近,注记州县以下小地名也较《嘉庆重修一统志》齐全,这些地图在当时已有“图绘精详、考订精当”之誉。

《方輿汇编》辑录资料的方法，往往是将原书整段、整篇地收入，不加改动，因而比较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已佚或罕见的古籍。特别是引证古籍时，一一详注出处，标明书名、篇名和作者，便于查对原书。

陈梦雷编纂此书时，条件有限，他所能利用的资料，仅是藩府和他本人的藏书，既未接触过藏在圆明园的《永乐大典》，也未看到内府秘藏的“天禄琳琅”，这就使《古今图书集成》的整个内容和水平受到限制。《方輿汇编》辑录方志资料虽然很多，但方志编纂者的学识和水平不同，各种方志的优劣出入很大，有的方志修得较好，有的方志问题很多，本书辑录资料时，未对资料进行考订，也影响到本书的价值。各种地志的编纂有先有后，府州县辖境多有变迁，《方輿汇编》辑录资料时，未注明用书的成书年代，可谓一大缺陷。该书从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开编，至四十五年初编告成，只用了6年时间。此后，从康熙帝下令增辑至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成书，虽有10几年时间，但经过胤禛夺嫡之争，实际所花的时间也不长，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成就卷帙如此浩大的巨著，殊为不易，所以书中也存在许多因审校不精而产生的讹误。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古今图书集成》编成后，仅以铜板印出64部，除赏赐有功的王公大臣和特旨奖励外，皆藏于内府，民间只慕其名，未见其书。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上海点石斋书局集股翻印1500部，但印刷粗糙，脱卷脱页很多，许多读者不满。十六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把原本发上海道，饬令同文书局照原本大小石印，并由该局编辑部作《考证》24卷。这个石刻本质量较高，明显优于点石斋本。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又从康有为处购得同文书局石印本一部，将其缩印上石，每一面为3栏，每栏为原书之一页，双面印，每页相当原书6页，书品和原书同样大小，连同《考证》分装808册，这就是目前流传较广的中华书局缩印本。至此，《古今图书集成》才为广大读者所使用。目前，中华书局和巴蜀书社已共同将其重新影印，陆续出版。

（二）《续三通》和《清四通》的《地理篇》

《续三通》和《清四通》是继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后记叙中国典章制度及其沿革的专书。《续三通》是《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的总称。《清四通》是《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续文献通考》的总称。后人将《三通》、《续三通》、《清四通》中的前三通合在一起，称为《九通》。加上《清朝续文献通考》，则合称为《十通》。《续三通》和《清四通》中的前三通，皆清代官修，成书于乾隆年间；刘锦藻编纂的《清朝续文献通考》成书于1921年，1935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收入《十通》。

《续三通》和《清四通》皆《三通》续篇。《通典》所纂内容，止于唐天宝末。《续通典》所纂，则自唐肃宗至德年间起，至明末止。《通志》所纂内容，纪、传及谱讫于隋，二十略止于唐。《续通志》所纂，纪、传自唐始，略自五代始，皆紧按前志，叙至明末为止。《文献通考》所纂内容，断于宋宁宗嘉定以前，《续文献通考》则起于元代，讫于明末。清三通是《续三通》的续篇，所纂内容起于清初，讫于乾隆末。《清朝通典》、《清朝通志》皆无续篇，惟《清朝续文献通考》又续叙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

至宣统三年（公元 1911 年）的内容，记事直至清末，最为完整。

乾隆年间，清廷设三通馆，任命稽璜、刘墉、王杰、曹文植为总裁，以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续修《三通》。最初，《续通典》与《清朝通典》合为一书，《续通志》与《清朝通志》合为一书，《续文献通考》与《清朝文献通考》合为一书，故所设馆名为“三通馆”。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16 年），续纂之文献通考因“前朝旧事”与清代典制编在一起时，“体例迥殊，难于划一”，乾隆帝“遂命自（清代）开国以后自为一书”，“其《续通典》、《续通志》皆古今分帙”，这才将《续三通》与《清三通》分开，各自成书，《续三通》所纂悉讫于明末，《清三通》所纂皆始于清初。

《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皆典志体史书。三书所用名目有别，但不少内容实则相同，只是互有详略而已。如《通典》的州郡、边防，就是《通志》的地理、都邑，也就是《文献通考》的舆地、四裔；又如《通志》的礼、乐、职官、选举、刑法目，《通典》、《通考》皆有之；《通志》的食货，《通典》有之，而《通考》则析为田赋、钱币、户口、征榷、市余、国用诸门；再如《通考》的王礼，亦与《通典》的嘉礼、《通志》的器服互见。此乃就其大要而言，若细加分析，自然还有若干区别。三书的特点，大抵为：《通典》主于简要，《通考》主于周详，《通志》更多取材于旧史。《续三通》和《清四通》仿《三通》体裁、本杜、郑、马遗意而作，其特点亦大体相同。

以上所述，是《续三通》和《清四通》的一般情况。

《续三通》和《清四通》中的《地理篇》，主要指《续通典》、《清朝通典》中的《州郡》、《边防》，《续通志》、《清朝通志》中的《地理略》、《都邑略》，《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中的《舆地考》、《四夷考》。它们虽是《三通》中《地理篇》的续篇，但体例已与《三通》中《地理篇》有所不同。

《三通》中的《地理篇》体例，是作者按照当时的编纂需要创立的，时至清代，已不完全适用。究其原因，主要有 3 方面：

（1）中国的行政制度和地理区划时有变化。《三通》论述地理，皆本《禹贡》九州。所谓九州，是一种地理区划，是当时假想的行政区划学说。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未被政治家采用。直到汉武帝时，才分全国为 13 州，当时的州是监察区，而非行政区划。后来制度渐变，州刺史改为州牧，州才成为郡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单位。东汉末年，曹操执政，依《禹贡》而实定九州制度，“九州说”才付于实践。两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州的数量迅速发展，后来出现一州管二郡、一郡统二三县的情况，至是州、郡、县 3 级制徒有虚名，失去意义。隋唐时又改行州县 2 级制（其中也推行过一段郡县 2 级制）。五代以后，州县之上，或分为路，或分为道，或分为省，各成一代之制。其中，唐代的道是地理区划，宋代的路是监察区，元代的行省先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后来才成为行政区划，情况复杂。但它们经常成为历代划分州县的基本单位，出现在史书和地志上。杜佑作《州郡典》时，用《禹贡》九州考述唐以前的历代疆土，已感“更置弥繁，愈分愈离，殊难索合”。宋至清代，行政制度和地理区划的变更愈加纷纭，旧体制的缺陷和弊端更加暴露出来。

（2）中国的疆域和中央王朝的版图时有变更。五代之后，北宋与辽、西

夏并列，南宋与金并存，西南地区还有大理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明代，北方也有瓦剌、鞑靼等少数民族的自主政权。元代和清代前期是较前强大的大一统帝国，版图极其辽阔。以清代前期为例，“自京师、盛京而外，为省一十有八，分置各府，以领诸县，诸州则参列其间，或直隶如府，或分治如县。至各边外之地，北自大青山左右，为蒙古诸部，至喀尔喀地；南自五岭外，为广东、广西及各土州地；东北自盛京境外，为吉林、黑龙江等地；西南自四川境外，为云南及青海、西藏地；正西则自安西境外，至于流沙，而禹迹已尽”。此外，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天山南路的喀什喀尔、叶尔羌、和阗等地，亦皆建官授职，纳入版图，这些地区已远在《禹贡》九州之界限之外，旧体裁已难以包容。

(3) 古今“四裔”和“边防”的变化较大。中国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时期中国的版图，不仅包括中央王朝的疆域，而且包括各少数民族建立的自主政权的辖境，许多中原王朝的“国境线”，实际上是中国各自立政权之间的分界线。因此，“四裔”和“边防”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政权而言，皆有不同的内涵。唐代的挹娄、靺鞨诸部，在清代为黑龙江、宁古塔地区；唐代的乌桓、鲜卑诸部，在清代为金州地区；唐代的车师、龟兹、于阗诸部，在清代为天山南北路地区；唐代称为“四裔”的地区，在清代则已不可以“边防”视之。由于各自主政权的兴衰更替和疆域的此消彼长，常会出现“或同是国而名已递更，或同是地而境兼并”，“每有见于前史而后史无闻者”。这也是使用旧体裁续纂《续三通》和《清四通》感到困难的原因。

因此，《续三通》和《清四通》，续纂《地理篇》时，对原有体裁都有所调整或变通。如杜佑《州郡典》叙地理，“以九州为纲，以其时之州郡为目，由唐而上逆溯之，以合于唐虞”，《续通典》叙地理时，已“稍变其体例”，“自五代迄明”，逐一续辑。又如郑樵《地理略》首列水道，以水证地，然其所载，仅限于江河淮济四渎。由于“四渎未足以包括域内水道之全势”，“宇内之水不入四渎者尚多”，《续通志》虽仍“用郑例”，但“增益其所未备”者甚多。《三通》的《地理篇》中，《文献通考》的《地理篇》“以九州为纲，以朝代为目的，由唐虞以降顺推之”，体例最善，故《续通考》、《清文献通考》的体例大体不变，但细微处也有变通和匡正。

《续三通》和《清四通》中的《地理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第一，汇编历代正史地理志及其它重要资料于一编，为后人研究沿革地理提供了方便，如《续通志》，除正史地理志、各朝会要外，还辑入了欧阳忞的《舆地广记》、乐史的《太平寰宇记》、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地志的内容，又如《清朝通典》所采地理书有《皇舆表》、《大清一统志》、《钦定日下旧闻考》、《盛京通志》、《热河志》、《皇舆西域图志》以及《大清会典》

《清朝文献通考·凡例》。

《续通典·凡例》。

《续通典》卷百二十一《州郡》。

《清朝文献通考·凡例》。

《续通典·凡例》。

同上。

《续通典》卷百二十一《州郡》。

及则例等等，内容很丰富。第二，《续三通》和《清四通》对前人著述的内容作过考订、补充和匡正。例如，马端临作《文献通考》之后，又有明代王圻著《续文献通考》，但王考“体例糅杂，舛错丛生”，为论者所病，清廷纂辑《续通典》时，便博征旧籍，又参以说部、杂编、议论，并广取文集，左以史评、语录，进行考订，而“采取王圻旧本者，十分不及其一”。第三，《续三通》和《清四通》对某些专题的研究和论述，可为后人研究提供借鉴，例如《续文献通考》考《宋史·地理志》漏载晋宁军应属雍州而不属石州，中山府有胫邑县而《文献通考》失考；金代郡县中应有钟秀县等，皆可供参考。

典、志、考3书中，《舆地考》和《四夷考》记载周详考订严密，富有参考价值。《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3考中，《清朝续文献通考》最应受到重视。这是因为：《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皆讫于乾隆年间，前2种后无续篇，惟有《清朝续文献通考》补纂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至清末的内容，以1书补3书缺，保全了《清四通》记载有清一代典章制度和地理沿革的完整性。乾隆至宣统年间，清王朝的社会性质、典章制度、疆域政区发生许多大变革。例如，鸦片战争和戊戌变法后，新政迭起，外交、邮传、实业、宪政皆历代未有之事；又如道光以后，边地被列强吞食，疆土日蹙；光绪年间，西域改设新疆省，盛京改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行省等，也为前朝所无。这些重要变革皆见于《清朝续文献通考》的记载。新增不少门类和子目。马端临《文献通考》共24门，《续文献通考》增为26门，《清朝文献通考》不变，《清朝续文献通考》已增为30门，计有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余、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群祀、宗庙、群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外交、邮传、实业、宪政诸考。诸考子目增加更多，如征榷考并铁与坑冶，而标明盐法，又续增厘金、洋药；国用考增银行、海运；兵考原删车战，续增长江水师、海陆军、战船等，记载了许多未见于《九通》新内容。

《清朝续文献通考》中的《地理篇》对记叙方法和记述重点所作的改进，同样值得重视，例如记述州县方位时，不再采用推算里至的方法，而以经纬度附注于下，既准确，又科学。在内容方面，则突出了对商埠、交通等与经济地理有关的内容。刘锦藻认为：“海通而后，商竞日亟，互市之所在，财货之所聚也，而贸易之赢绌见焉，民生之枯荣缘焉，甚至国计之盈虚消长，亦莫不隶焉，关系之大，几莫与京”。他还指出：“铁路为交通要政，品物之转输，行旅之往来，莫不由之，而军事之凭赖，尤急焉”。所以对新开商埠、铁路交通、邮电实业等，皆重点记叙。这些改进和调整都是符合时代特点和科学进步的。不足之处是记叙过于简略，其它地理内容太少。

（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3种

《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

《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五《舆地考》。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五《舆地考》。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以下简称《丛钞》)、《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以下简称《补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以下简称《再补编》)是清末著名的舆地丛书。光绪时,“海内识字者,莫不知有小方壶。小方壶之名,与知不足斋、粤雅堂埒”。《知不足斋丛书》、《粤雅堂丛书》皆清代著名舆地丛书,小方壶斋丛书能与其相提并论,可见《丛钞》、《补编》、《再补编》名气之大、影响之广。

编纂刊印这3套丛书的王锡祺(生卒不详)是清光绪年间著名的编辑家。字寿萱,号瘦丹,江苏清河人。王锡祺生平喜好舆地游览之书,“闻人谈游事则色然喜,阅诸家记录与夫行程日记,即欣然而神往”。“凡山经、地志以至集部诸书,无不泛览”。同光年间恰逢多事之秋,内乱外患频仍,他想往清初“东服诸部、北犁蒙古、西戡卫藏、南辑緬暹”的强盛,怀念“乾嘉以降,海宇承平”的盛世,对同光年间的腐败十分不满,他愤然指出“异族叩关,覬觐百状,将军奕山懦弱无能,割东陲三数千里于前,近者巡抚某,轻听人言,弃南疆三数千里于后,自撤藩离,开门揖盗……有志之士所为抚膺扼腕长太息者也”。他谋取功名不遂,“九应省试不中”,乃从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起,改而研究经、史、古文、诗、辞学。又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起,转为研究舆地、洋务、时政。后来,他在沈蝶庵、龚寿秋、丁衡甫、王锡初等亲友的帮助下,经过15个寒暑的努力,收集舆地游览书稿数千种,于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编成《丛钞》。以后,“续有所获,仍逐次增入”,又于二十年辑成《补编》、二十三年辑成《再补编》。王锡祺本出身于中资家庭,但他“磊落自熏,不事生产”,惟以编书为乐。20余年来,他全身心地专注于编辑这套舆地丛书,“其刊钞糜弃于书者,且不下万余缗”,以致晚年穷极潦倒,妻离子散,自己也客死于泰县。

小方壶斋舆地丛书卷帙繁浩,《丛钞》共12帙64卷,收书1200种;《补编》有12帙,不分卷,收书58种;《再补编》也分12帙,不分卷,收书90种。这部丛书共36帙,64卷,收书1348种。就收书种类而言,堪称清代舆地丛书之最。

《丛钞》编例,“首辑总论,继以各说”;“以华夏始,以外洋终”;“行程记录,祇搜本朝”。《补编》、《再补编》略有不同。

这套丛书内容庞杂,若以自然地理知识、地界地理、中国地理分类,各类数量如表11。

表11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3种主题分类表

《碑传集补》卷五十三。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王锡祺序》。

《续纂清河县志》卷十。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王锡祺序》。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王锡初跋》。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王锡祺序》。

《碑传集补》卷五十三。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王锡祺序》。

	《丛钞》(种)	《补编》(种)	《再补编》(种)	总计
自然地理知识	13	0	22	35
世界地理	211	29	47	287
中国地理	976	29	21	1026
合计	1200	58	90	1348

在自然地理知识中,有《盖地论》、《地球总论》、《地理述略》、《地球形势论》、《五洲方域考》等 35 篇。其中,有外国人撰著,如葡萄牙玛吉士的《地球总论》、美国林乐知的《地球浅论》、裨理哲的《地球说略》等;也有中国人的作品,如傅云龙的《地椭圆说》、欧氏的《地球寒热各带论》、杨毓辉的《大洋海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海南冰海考》等。

在世界地理方面,除各大洲总论(如《五洲方域考》、《欧洲总论》、《亚细亚说略》)和专论(如《地理形势考》、《五大洲輿地户口物产表》)外,有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澳洲诸国和地区的地理专篇。其中,有考辨,如《暹罗考略》、《高丽水道考》、《南极新地辨》;有志略,如《中外交界各隘卡略》、《越南道路略》、《越南志》;有行记、游记如《东游纪略》、《航海述奇》、《初使泰西记》、《使琉球记》;有日记、随笔,如《英鞞日记》、《使德日记》、《欧游随笔》、《漫游随录》等,共 287 种。

中国地理种类最多,有属于中国地理总论的,如《中国方域考》、《方輿纪要简览》、《天下形势考》、《輿地全览》;也有专门论述全国某项地理内容的,如《府厅州县异名录》、《中国历代都邑考》、《輿地经纬度里表》、《中国物产考》等;有属于各省地理总论的,如《直隶考略》、《江苏考略》、《广西考略》;也有专门论述省境某项地理内容的,如《东蒙古形势考》、《回疆风土记》、《山东诸水编》等。还有属于行政区域、山川形势、边防海防、驿站交通、农田水利、名胜古迹、风俗民情、民族事务,以及外交、通商、边境事务等方面的论著、译著、史钞、考证、行记、笔记、杂录等等,共 1026 种。

这套丛书辑录的资料,一来源于专书、地志,如《丛钞》第一帙的《地球志略》摘录于《瀛环志略》卷一《地球》;《丛钞》第二帙的《绥服内蒙古记》,摘录于《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内六盟蒙古;《丛钞》第三帙的《雅克萨考》摘录于《朔方备乘》卷十四,《尼布楚考》摘录于《朔方备乘》卷十五等等。二来源于清人文集,如《丛钞》第四帙的《登泰山记》取材于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十四;《登南岳记》取材于唐仲冕《陶山文录》卷七;《游庐山记》取材于洪亮吉《更生斋乙集》卷八;《游九华山记》取材于施闰章《愚山先生学余文集》卷十四等等。三来源于各种传抄本、稿本,如杨宾的《柳边纪略》、高士奇的《扈从东巡日录》、博明的《凤城琐录》等等。四来源于今已不知所本的各种文献,这些文献原书亡佚后,《丛钞》却将有关内容保存了下来。这些资料编入《丛钞》时,一般皆照原书过录,一字不改,也有少数几篇改动过个别字句。

这套輿地丛书搜集的资料,从清初到光绪年间,内容十分丰富,史料价值和地学价值毋庸赘。令人感到缺憾的是,编者在辑书时未注明资料来源和出处,又删去了原书的序跋和凡例,读者如果引证这些资料从事学术研究,

有时还得再花一番查证功夫。

二、综合地理著作举例

清代对古代地理名著的整理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校勘、补注、疏理古籍方面，出现了许多集大成的著作。魏晋以来，《山海经》、《禹贡》、《水经注》诸书一直是历代学者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对于《禹贡》和《水经注》的研究，差不多代有名人名著，已各自单独发展为一门学问，这就是后世所称的禹贡学和酈学。这里，笔者仅以《禹贡锥指》和《水经注疏》2书的学术成就，来探讨清代整理古代地理名著的情况。

（一）《禹贡锥指》

《禹贡》是托名大禹治水，记述先秦时期地理环境、自然区划和地理学说的著作，是保存在《尚书》中的中国最古老的地理文献。旧史家认为，《禹贡》为大禹所撰，而《尚书》又是孔子编纂的经典，历来将它视为神圣的作品，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禹贡》一书，一来因为成书年代很早，后世与先秦时期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变化，山川名及地名又多有变化；二来因为作者、成书年代、书名含意及内容本身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所以后世诠释它的著作很多，汉唐以来，几乎代有所出。胡渭作《禹贡锥指》前，已有易祿的《禹贡疆理广记》、毛晃的《禹贡指南》、程大昌的《禹贡论》和《禹贡山水记》、傅寅的《禹贡说断》、茅瑞徵的《禹贡汇疏》、朱鹤龄的《禹贡长笺》，诠释《尚书》包括《禹贡》的著作，还有孔颖达的《尚书正义》、林子奇的《尚书全解》、蔡沈的《书集传》、黄伦的《尚书精义》等，此外还有苏轼、曾旼、叶梦得、张九成、薛季宣、黄度、吕祖谦、王炎、吴澄、王充耘、王樵、邵宝诸家。顾颉刚先生指出，为着时代不同，思想有异，这些解释《禹贡》的书，“分为汉学和宋学二派”。“汉学注重师传，容易墨守成规；宋学注重批评，敢于自出新鲜，但在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学科不发达的时候，也容易流于武断”。

胡渭（1633~1714）初名渭生，字拙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幼好学，后应试，屡不第，乃“潜心经义，尤精舆地之学”。清廷诏修《一统志》，徐乾学开馆洞庭山，延聘国内著名学者与修，“胡渭与黄仪、顾祖禹、阎若璩等分郡纂辑，得观天下郡国书”，他与黄仪、顾祖禹、阎若璩等朝夕相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因而“受益弘多”，学问大进。胡渭素习《尚书·禹贡》，发现前人著作有不少问题。他认为：“孔冲远及蔡沈于地理皆疏舛，如三江当主郑康成说，庾冲初之言不足信。‘浮于淮泗，达于河’，‘河’当从《说文》作‘荷’。‘滎波既潏’，‘波’当从郑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与导川之黑水，不可溷而为一”。“程氏（大昌）锐志稽古，而纰

顾颉刚：《禹贡》注释，见《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碑传集》卷百三十一。

同上。

同上。

《碑传集》卷百三十一。

谬实多。傅氏（寅）缀辑旧闻，附以新意，颇多发明，惜多散逸。近世乡先生芳公瑞征著《禹贡汇疏》，摭收最博，但总杂无纪，断制尚少”。后来，因患足疾，卧病在床，他遂谢绝一切人情事务，取旧日手记，潜心研究，历三寒暑，著成《禹贡锥指》一书。梁启超评价胡渭说：“他的学风，不尚泛博，专就一个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开后人法门不少。几部书中，后人最推重的是《禹贡锥指》。这部书虽然有许多错处，但精勤搜讨，开后来研究地理沿革的专门学问，价值当然也不可磨灭。”

《禹贡锥指》的得名，取意于《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一语。“管”、“锥”，皆言其小。胡渭云：“夫其不曰管窥，而曰锥指者，《禹贡》为地理之书，其意较切故也”。《禹贡锥指》是专门诠释《禹贡》的著作，《禹贡》分为九州、导山、导水、五服4部，《禹贡锥指》亦“依经立辞”，“章别句从”，分成4部分，再加上篇首所冠47幅地图及文字说明，全书实分为图说、九州、导山、导水、五服5部分。

1. 图说

胡渭认为，注释《禹贡》，“苟有说而无图，则山川之方向，郡国之里至，学者茫然莫辨，说至详，亦奚以为”，于是“据九州、五服、导山、导水之文，证以地志、《水经》，参之诸家传记，略朱思本意，计里画方，为图四十七篇”。内有九州分域图、尔雅九州图、职方九州图、冀州图、兖州图、青州图、徐州图、扬州图、荊州图、豫州图、梁州图、雍州图、九州贡道图、导山图、导弱水图、导黑水图、梁州黑水图、导河图、龙门吕梁图、邳东故大河图、九河逆河碣石图、西域河源图、吐蕃河源图、荊阳引河图、禹河初徙图、汉屯氏诸决河图、禹河再徙图、唐大河图、宋大河图、金大河图、元明大河图、导濊图、东西二源图、导江图、三江异派图、导源图、出河三济图、大小清河图、导淮图、沟通江淮图、导渭图、关中诸渠图、导洛图、涧瀍改流图、五服图、周九服图及四海图。胡渭说，47幅图皆其手绘，“凡九州之疆域，山海川流之条理，原隰陂泽之形势，及古今郡国地名之所在，八方相距之远近，大略粗具”。惟“独恨晋图既系亡，诸地记道里之数，无以得准望远近之实”。然据考证，上述47幅图中，1/3以上系据明艾南英《禹贡图经》绘成，但作者未注明其出处。

2. 九州

《禹贡》九州，指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这是以名山大川为标志划分的地理区划，每州之间以两三个名山作为分界点，与后代地志列出的“四至”、“八到”不同，界限不很明确。胡渭在分析比较诸家观点的基础上，逐一考证九州在春秋、战国、秦汉、二晋、隋唐、直至清代的境界和接壤，详述康熙年间所包含的府州县地域。

《禹贡锥指》云，冀州：“以今舆地言之，山西太原、平阳、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泽、辽、沁三州，河南则怀庆、卫辉、彰德三府，直隶则顺天、永平、保定、广平、顺德五府及真定、河间二府之西北境，大名府浚县

《禹贡锥指·胡渭序》。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文集》之七十五。

《禹贡锥指·胡渭序》。

《禹贡锥指》卷首略例《禹贡图》。

《碑传集》卷百三十一。

之西境，又新置宣化府及故辽东都司之西境，其北则逾塞直抵阴山下，西起东受降城之北，东讫于大辽水，皆古冀州域也”。

兖州：“河南卫辉府之胙城县（胙城本在河南，自金明昌五年河徙，出县南，而县治为河北地）、直隶大名府（惟浚县之西境当属冀，长垣、东明二县当属豫）及真定、河间二府之东南境（当以汉时漳水故道为界，东南属兖，西北属冀），山东则东昌府，其兖州府则曹州、阳谷、寿张、郟城，济南、青州二府则西北境（当以汉时济水故道为界，西北属兖，东南属豫、青、徐），皆古兖州域也”。

青州：“山东登州、莱州二府，其青州府则益都、临淄、昌乐、安丘、寿光、临朐，及诸城、高苑、博兴、乐安之南境，济南府则肥城、长清、历城、章丘、邹平、长山、新城、淄川及泰安、莱芜之北境，兖州府则潍、东阿及平阴之北境（三府之地，南以齐长城故址与徐分界，西及北以汉时济水故道与充分界），其东北跨海，为故辽东都司之东境，及朝鲜国，皆古青州域也”。

徐州：“江南徐州及凤阳府之怀远、五河、虹县、泗州、宿州、灵璧，淮安府之桃源、清河、安东、邳州、宿迁、睢宁、海州、赣榆，山东兖州府则滋阳、曲阜、宁阳、邹县、泗水、滕县、峄县、金乡、鱼台、济宁、嘉祥、钜野、东平、汶上、沂州、郟城、费县及平阴之南境，济南府则新泰及泰安、莱芜之南境，青州府则蒙阴、沂水、莒州、日照及诸城之南境，皆古徐州境也”。

扬州：“浙江、江西、福建皆是，江南则江宁、扬州、庐州、安庆、池州、太平、宁国、徽州、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广德三州，其凤阳府则凤阳、临淮、定远、寿州、霍丘、盱眙、天长，淮安府则山阳、盐城，河南则汝宁府之光州、光山、固始，湖广则黄州府之罗田、蕲水、广济、黄梅，广东则潮州府，皆古扬州域也”。

荆州：“湖广武昌、汉阳、安陆、荆州、岳州、长沙、衡州、常德、辰州、宝庆、永平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卫，其襄阳府则唯南漳县，德州府则安陆、云梦、孝感、应城、应山及随州之南境，废光化县地，黄州府则黄冈、麻城、黄陂、黄安，四川则夔州府之建始，广西则桂林府之全州（本汉零陵县，属零陵郡，隋改置湘源县，唐属永州，五代晋改为清湘，于县置全州，明省县入，又改属桂林）及兴安县岭北之地（县在府东北一百二十里，越城岭在县北三里），皆古荆州域也”。

豫州：“河南则河南、开封、归德、南阳、汝宁五府及汝州，直隶则大名府之东明、长垣，山东兖州府之定陶、曹县、城武、单县，江南则凤阳府之颍州、颍上、太和、亳州、蒙城，湖广则襄阳府之襄阳、光化、宜城、枣阳、谷城、均州，郟阳府之房县、竹山、竹溪及郟西县之东境，德安府随州

《禹贡锥指》卷二。

《禹贡锥指》卷三。

《禹贡锥指》卷四。

《禹贡锥指》卷五。

《禹贡锥指》卷二。

《禹贡锥指》卷三。

之北境，皆古豫州境也”。

梁州：“陕西汉中府兴安州及西安府之商州、洛南、山阳、镇安、商安，巩昌府之凤县、两当、徽州、成县、阶州、文县，湖广鄖阳府之房县、竹山、竹溪及鄖西各县之西境，四川则成都、保宁、顺庆、龙安、马湖五府，潼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叙州、泸州、重庆、夔州之江北诸州县，松潘卫、迭溪营、天全六番招讨司、黎大所、建昌卫，皆古梁州域也”。

雍州：“陕西临洮、平凉、庆阳、延安、凤翔五府，其西安府则唯商州、洛南、山阳、镇安、商南，巩昌府则唯凤县、两当、徽州、成县、阶州、文县为梁域，余皆属雍。又榆林卫、宁夏卫、宁夏中卫及靖远、岷州、洮州三卫，行都司所领甘州、庄浪等诸卫所。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倾、积石、西逾三危，北抵沙漠，皆古雍州域也”。

3. 导山

《禹贡》导山部分所举山岳，皆治水经过的重要山名。后来，汉儒对导山部分加以阐述，形成所谓“三条”、“四列”之说。马融、王肃认为，三条者，导岍北条，西倾中条，嶓冢南条。此说始于班固。四列之说出于郑康成。即导岍为阴列，西倾为次阴列，嶓冢为次阳列，岷山为正阳列。胡渭评论诸家说：“蔡传云：‘三条四列之名皆未当，今据导字分之，以为南北二条，而江河以为之纪，于二之中又分为二焉。异岍为北条，大河北境之山；西倾为北条，大河南境之山。嶓冢为南条，江汉北境之山；岷山为南条，江汉南境之山’。此朱子之意，而蔡氏述之，精且详矣。然以岍、岐、荆为大河北境之山，则犹未当，盖三山在北河之南、渭水之北，不得概言大河北境也”。又说：“吴幼清说此节云：‘岍、岐、荆三山在渭北，北条之北之一；壶口至碣石九山在河北，北条之北之二也，如是即无病矣’。朱子于二之中各分为二，吴氏又于四之中各分为二，首节以逾河入海为限，后三节则以至于某为限也。四列长于三条，或嫌其阴阳之名近于怪，余曰阴阳字只作南北字用，于义无害”。胡渭又进一步评论：“（导山）本无列之可言，自说经者就大禹之迹以为列，遂觉九州实有此四列耳”。“然则本意云何？曰莫善于陈寿翁栋之言，曰禹之导山，虽曰因而治众水大概。岍岐之列，河济所经；西倾之列，伊、洛、淮、渭所经；嶓冢之列，汉水所经；岷山之列，江水所经也。明此义则枝蔓之辞一切无庸矣”。作者自己的观点，已尽包含在评论之中。

4. 导水

导水一章是《禹贡锥指》着力诠释的部分。《禹贡》所云弱水、黑水、河水、漾水、江水、淮水、渭水、洛水等9条主要河流，《禹贡锥指》皆有详尽考释。胡渭说：“余释九州之文，每水必援《水经》以为证，而于导水尤详，更摘取注中要害，夹行附提纲之下，亦或有借助作提纲者。凡历代史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及古今辞书之要语，皆荟萃于其下”。“惟黑水原委杳无踪迹，弱水自合黎以北、流沙以西，亦难穷究”。故而付

《禹贡锥指》卷八。

《禹贡锥指》卷九。

《禹贡锥指》卷十。

《禹贡锥指》卷八。

《禹贡锥指》卷九。

阙。

导水一章附有《附论历代徙流》一文，提出黄河 5 次大改道的观点，最值得重视。胡渭认为，“河自禹告成之后，下迄元明，凡五大变”。“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经》所称大河故渚者是也。二、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注清河、平原、济南，至千乘入海，后汉永平中，王景修之，遂为大河之经流，《水经》所称河水者是也。三、宋仁宗时，商胡决河分为二派，北流合永济渠至乾宁军（今青县）入海，东流合马颊河至无棣县（今海丰）入海，二流迭为开闭，《宋史·河渠志》所载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实宋光宗之绍熙五年）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注梁山泺，分为二派，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阳武县南，新乡之流绝，二十六年会通河成，北派渐微，及明弘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盖自大伾以东，古兖、青、徐、扬四州之域，皆为其纵横糜烂之区”。此说对后世研究黄河变迁影响甚大。直到近代，岑仲勉作《黄河变迁史》仍主此说。时至 80 年代后，谭其骧先生的研究才证明，在黄河故渚之前，还有一条山经河水；邹逸麟教授的研究又证明，金明昌五年河决算不上一次大改道。至此，胡渭提出的黄河五大徙之说，渐被否定。

5. 五服

五服指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这是古代理想化的行政制度。其说云：在王都四面各五百里的地方叫“甸服”，“甸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叫“侯服”，“侯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叫“绥服”，“绥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叫“要服”，“要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叫“荒服”。五服形同一个以王都为中心，向四面等距离扩张的矩形中心。胡渭的看法是：“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势，别为九州，初不计幅员之广狭、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则规方五千里之地，以为五服之制，周围二万里。其中积方五百里，百方千里者二十五。虽有绝长补短之处，而大概整齐，划为纂局。若夫荒服之外，尚有余地，所谓外薄四海、威建五长者，则东渐于海，直抵嵎夷，西被流沙，届于黑水，计其延袤，当不下万里”。作者又“用开方法，画为百区，区方五百里，甸服为方五百里者四，侯服十二，绥服二十，要服二十八，荒服三十六”。胡渭亦知事实上决不可能有如此方方正正的区划，故云：“非谓禹当日所制四方均齐方正，截然如纂路也。学者观象，而得其意，勿复为盘打烛之见，则善矣”。

《禹贡》除记述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外，还有湖泊、土壤、物产、赋、贡品、水陆路线等内容，《禹贡锥指》诠解的内容同样十分丰富。而河道迁徙，为民生国计所系，胡渭尤加注意，他对于海口、清口、洪泽湖、高

《禹贡锥指》略例。

同上。

谭其骧：《长水集》下《山经》*

谭其骧主编：《黄河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禹贡锥指》略例。

同上。

谭其骧：《长水集》下《山经》*

家堰、会通河等内容的诠释，表明作者不是不通时务的迂儒，而是十分重视著作的经世致用。

经书注释，皆以《禹贡》主辞。“经下集解，亚经一字，首列孔传孔疏，次宋、元、明诸家之说”。“郑康成书注间见义疏及他籍，故不多取”。“蔡传较劣，采擷寥寥，备数而已”。“至若语涉《禹贡》，而实非经解，如《通典》之类，亦或节取一二句”。胡渭本人的看法，则“缀于其末，用‘谓按’二字别之”。“集解后发挥未尽之义，又亚一字”。二孔、蔡氏之说，“有差谬者既不采入”。“诸家之说得失参半者，亦必细加剖析”。至于地志、《水经》细缕本末，附以夹注。胡渭的注文，“诸家书解及《河渠书》、《地理志》、《沟洫志》、《水经注》之外，凡古今载籍之言，无论经、史、子、集，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而《山海经》、《越绝书》、《吕氏春秋》、《淮南子》、《河图括地象》、《吴越春秋》等书，所言禹治水之事，多涉怪诞，故一切摈之，不予入注。

《禹贡锥指》是一部集前人研究大成的著作，几乎搜集了前人研究《禹贡》的全部精华。诸家之中，发前人所未发者，书中“称引特多”。此外，凡有一得之见者，作者也弃短录长，“概不敢遗”。顾颉刚先生说，诠释《禹贡》诸家中，“以胡渭用力最深，他的《禹贡锥指》可以说是一部具有总结性的书”。这个评语是十分恰当的。先儒认为，汇总源充，疏通《禹贡》，容易产生2种偏向：一曰博而不择，一曰固而鲜通。但《禹贡锥指》较好地避免了这2种弊端，既做到了博而不滥，详略得当，又能通古达今，二者兼顾，因而为后学研究《禹贡》提供了许多方便，故李德裕称赞是书为先圣之功臣，后学之津筏。

《禹贡锥指》问世已有20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了很大发展。不仅历史学者、地理学者研究《禹贡》，许多其他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在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禹贡》。顾颉刚的《禹贡注释》、辛树帜的《禹贡新解》、李长傅的《禹贡释地》都有新发现、新见解，不少方面的研究，较之《禹贡锥指》又前进了一步。

（二）《水经注疏》

《水经注疏》是疏证《水经注》的巨著，中国郦学史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水经注疏》从撰著到问世，过程相当复杂。先是杨守敬在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撰成《水经注疏》初稿。后来，在其门人熊会贞参与下，于三十年完成第一次修改稿。此后，他们在刊行《水经注疏要删》、《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和《续补》的同时，继续致力于《水经注疏》的修改工作。1915年，杨守敬去世。临终前，他嘱咐熊会贞：“《水经注疏》不刊，死不瞑目”

《禹贡锥指·胡渭序》。

同上。

顾颉刚《禹贡》注释，见《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禹贡锥指·李德裕序》。

同上。

。熊会贞回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秉承业师遗志，在此后 22 年内继续修订，“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次写定”。其间，孙先梅参加了补疏工作，颇有贡献。1936 年熊会贞去世前，“全疏增删补正略定”，仅渭、沔二水尚未定稿。后来，又有李子魁的参与和努力，《水经注疏》才得以问世。今熊会贞疏证的原稿本下落不明，今刊诸本之间的关系，存在许多有待商榷的地方。这方面的情况，中国著名郦学家陈桥驿教授在他的研究专著《水经注研究》、《水经注研究二集》以及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水经注疏》附录中有详细的介绍和评述。

杨守敬（1893~1915）字惺吾，号邻苏，湖北宜都人，出身于店商家庭。8 岁四书成诵，19 岁参加科举考试，“府试五场，皆居第一”。24 岁中举后，一度锐意功名，但当时官场积弊已深，6 次应试皆名落孙山。他在北京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学问大进。同治五年（公元 1866 年）开始设馆授徒，并从事撰著，才学渐露端倪。光绪五年（公元 1879 年），他担任驻日大使随员，在日本搜求珍贵古籍 3 万余卷，每得一书，便考其原委，立为提要，编成《日本访书志》，后来据此刻成《古逸丛书》。光绪十年（公元 1884 年）回国出任黄冈教谕，后改两湖书院地理教习，又担任勤成学堂和存古学堂总教长。1914 年，出任袁世凯顾问和参议院参政。次年病故。杨守敬是清末和民国初年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当时人称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杨守敬的地理学为清代三绝学，《清史稿》称“其学通博，精輿地，用力于《水经注》尤勤。通训诂，考证金石文字。能书，摹钟鼎至精。工隶体，为箴铭之属，古奥耸拔。为鄂学灵光绪垂二十年”。贺昌群说：“他在晚清学术上的贡献，有三点可以指出：一是《日本访书志》和《古逸丛书》刊行；二是历史地理特别是沿革地理学上的撰述；三是《水经注疏》”。其生平著述多达 80 余种，在史学、地学、制图学、金石学、训诂学、版本学术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

熊会贞（1878~1936）字啻之，湖北枝江人，亦为著名郦学家。他家世贫寒。后追随杨氏数十年，襄助其师纂疏《水经注疏》。杨氏死后，他移居武昌菊湾杨氏故居，秉承杨氏遗志，20 余年如一日，继续从事修订工作，殚精竭力，不分寒暑，为《水经注疏》的完成和刊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杨氏相比，他在郦学思想上有较大发展，“在新的科学思潮的启发下，正视了旧郦学研究中落后的一面，而力图刷新郦学研究的内容与方向”，并获得不少新的成果。他的学术道德，亦堪为后人楷模。杨氏生前规定，署名时，应写明“此书二人同撰，文各一半”。熊会贞出于对业师的尊敬，后来署名时改为“宜都杨守敬纂疏，门人枝江熊会贞参疏”。“文，杨师三分之二，会贞

《禹贡锥指·胡渭序》。

同上。

向宜甫：《水经注疏》，1949 年武昌新地学社排印本序言。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

《清史稿·杨守敬传》。

同上。

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说明》。

向宜甫：《水经注疏》，1949 年武昌新地学社排印本序言。

三分之一”。他也很尊重后学的劳功，曾在书稿上加“孙先梅补疏”一行。肯定其助手孙先梅的贡献。鉴于他的杰出贡献，后人提到《水经注疏》时，皆将杨熊二人并称。

《水经注》是中国6世纪前综合性的地理名著，具有很高的史学、地学和文学价值。传至宋初，已佚5卷，后人又将其改编为40卷本，以凑原书之数，以后迭经传钞翻刻，误简夺讹严重，几至难以辨读。是书如此重要而又向无善本，明清郦学家便主志校理。明代校本中，以黄省曾校刻本、吴琯校刻本、朱谋玮笺本和赵琦美三校本为佳，清代校书中，以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家最著名。其后又有王先谦集全、赵、戴诸名家校本于一书，列诸家校语于其下，著成《合校水经注》。经过数代人努力，《水经注》虽已接近恢复旧貌，但仍存在许多问题。杨守敬说：“自全、赵、戴校订《水经注》之后，群情翕然，谓无遗蕴，虽有相袭之争，却无雌黄之议。余寻绎有年，颇觉三家皆有得失，非唯脉水之功未至，即考古之力亦疏”，“综而论之，此书为郦氏原误者十之一二，为传刻之误者十之四五，亦有原不误为赵、戴改订反误者，亦为十之二三”。后遂矢志作《水经注疏》。

疏证《水经注》与校正《水经注》不同，前者难度远较后者为多。汪辟疆说：“古书有注，复有疏。疏者，所以补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滞也”。清代学者欲为《水经注》作疏者，不乏其人，刘献廷、毕源、王先谦等皆未能构成不朽之作，究其原因，皆因难度太大。直至杨守敬、熊会贞二人出，才完成这件郦学史上的大事。

《水经注疏》共40卷，分卷悉从《水经注》。全文约150万字，是《水经注》的4倍。其篇幅之浩大，征引之广博，考订之精详，“使以前的所有版本都为之逊色”。汪辟疆说：“其书精诣，有突过前人者”。汪所举列，大要有四：确定朱谋玮《水经注笺》为正文，据全、赵、戴或已见文献对注文多所订正。凡朱本讹《注》作《经》、混《注》入《注》者，全、赵、戴改之有据，则据以证朱；全、赵、戴所改不尽合者，仍返朱旧；诸家所改而未言其证者，则溯本究源，加以证明。凡郦书征引的史实，皆补注其出典。诸家校理《水经注》，虽辨析《经》、《注》混淆和文字歧异，但于郦注本身却未遍征出处。《水经注疏》则对六朝以前的地记、图经、逸文，引见于唐宋类书及《寰宇记》、《名胜志》诸书的资料，无不逐条勘核，证其所本。博采《经》、《传》、《雅》、《记》，相互参证，疏通郦注疑滞。除校正文字、详征出处外，疏文还博考群书，钩稽史实，以疏注义。又于古地名下，一律标注今地（按指清代）名。对照地志图经，反复校勘，订正郦注本身失误多处。对于这部杰作，许多学者予以高度评价。潘存说：“楚北杨君惺吾所撰《水经注疏》，神光所照，直与郦亭共语。足使谢山却步，赵、戴变色，文起梅村，未勘比数，霾蕴岁久，焕若神明，旷世绝学，独有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

《清史稿·杨守敬传》。

《水经注疏要删·杨守敬序》。

《水经注疏·凡例》。

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杨熊合校 水经注疏*

陈桥驿：“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杨熊合校 水经注疏*

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杨熊合校 水经注疏*

千古”。汪辟疆评价《水经注疏》说：“抉择精审，包孕宏富”，“真集向来治郦注之大成也”。

近年来，中国郦学研究又有新进展，许多学者开拓了研究《水经注疏》的新领域，从崭新的角度阐明了它的疏证特点和学术价值。著名郦学家陈桥驿教授认为，郦学研究可分成考据、词章、地理3个学派。杨熊二氏在《水经注疏》中十分重视山川地理的分析。山川地理的内容占全书很大比重，“这是所有考据学派的著作中所未曾出现的”。“他们开创了郦学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派，即地理学派，使郦学研究从此获得更大的实用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思潮的启发下，为校定全书作出重大努力的熊会贞力图刷新郦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删去在内容上有明显错误的疏文，加入了不少经过他反复推敲的新资料。在修改疏文的时候，他常常用较新的地理学说代替陈旧的地理学说，如诠释“昆仑墟在西北”、“河水冒以西南流”时，用新疏文代替旧疏文，便是最好的例子。他还用经纬度、比例尺和新式地图考订今地，这些都是以往的郦学家所未能做到的。毫无疑问，熊会贞的许多地理观念超越了他的老师，但他毕竟是一位旧学者，缺乏地质学、地貌学等新学科的知识，因此在不少疏文中，他想把疏文写得更科学些，但“仍然没有将问题说清楚”。这种状况决定了《水经注疏》成书时的面貌。

迄今为止，所知传世的《水经注疏》，共有2种残本、2种影印本、1种日文本、1种排印本。2种残本，一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的朱栏粗格稿本，仅存卷八《济水注》1册；一指1949年武昌亚新地学社的排印本，仅存《河水注》3卷。2种影印本，一指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水经注疏》；一指1971年台北中华书局出版的《杨熊合撰水经注疏》。日文本指1947年由日本著名郦学家森鹿三主持翻译的节文《水经注（抄）》。排印本指198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的由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2种影印本早出，但问题较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水经注疏》问世后，钟凤年便开始校勘，最后校出错误达2400余处，“这些错误遍及经、注、疏三者，有些地方，由于错误连篇，竟至不堪卒读”。后来他写成的《水经注疏勘误》长达7万字。台北中华书局出版的《杨熊合撰水经注疏》，也存在着许多重要缺陷和令人遗憾之处，陈桥驿教授曾作《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校水经注疏》一文，详论其得失。日本森鹿三主持翻译的节文丁此《抄》实际上是一部研究性著作，仅《河水》5卷就作注释放1114条，“这些注释，无论 诤 悖 取 瞳 群 涂 蒲 苑 矫 妨 家 殉 怨 端 琛 贰”。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本子，陈桥驿教授在段熙仲教授点校的基础上，又依据台北影印本《杨熊合校水经注疏》、

《水经注疏要删·杨守敬序》。

《水经注疏·凡例》。

陈桥驿：“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陈桥驿：“近代郦学研究概况”，《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详见陈桥驿：“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等论文，今主要汇编于他的《水经注研究二集》中。

陈桥驿：“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陈桥驿：“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陈桥驿：“近代郦学研究概况”，《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详见陈桥驿：“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等论文，今主要汇编于他的《水经注研究二集》中。

钟凤年《水经注疏勘误》，台北傅纬平校勘以及他本人历年对此书的校勘，对《水经注疏》进行复校。卷首载有陈桥驿的“排印《水经注疏》的说明”、酈道元的“《水经注》序”、杨守敬的“《水经注疏》凡例”、熊会贞的“亲笔《水经注疏》修改意见”。正文后的附录，收录了段熙仲的“《水经注》六论”、汪辟疆的“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陈桥驿的“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关于《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贺昌群的“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这些研究酈学的重要成果，颇便读者研读《水经注疏》时参考。

三、清人文集中的地理作品

谭其骧教授指出：“就清代学者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而言，地理是最突出的领域之一。我国传统的地理学研究到清朝发展到了最后阶段，其成就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清人的地理研究成果，除了作者另有专著或少数著作中收录比较集中外，其它文章大多散见于诗文中。虽然这些诗文集一般还不是珍本秘籍，但由于卷帙浩繁，内容分散，查找也非易事，所以这些地理文章往往被人们忽视了”。时至 80 年代，这种状况并无很大变化，清人文集除有少数新版或铅印本流传外，多数还只有原来的刻本，且不说私人不可能都有收藏，即使较大的图书馆也往往收不全。清人文章的题目往往名不符实，或者根本看不出实际包括的内容，有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找来的材料，很可能根本不管用。因此，本世纪 30 年代，王重民先生编排《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时，谭其骧先生曾搜集 300 多种清人文集，编成《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的地理类目录，基本囊括了清人分散在各处的地理作品名目。

1984 年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所和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由谭其骧教授主编，葛剑雄、杨正泰先生具体负责，编辑出版的《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7 巨册，则是清人散在文集中的地理作品汇集。

《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的文献，基本上是根据王重民《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地理类编辑的，但删去了一些明显不属于地理内容及毫无实际意义的文章，增补了一些原索引漏编的文章。个别文章篇幅过长，查阅并不困难，如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节录》遂未收录。少数文章有删节，标题后括注“节录”二字，文章中则括注“以上略”、“中略”、“以下略”等加以说明。所用文集，均据《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少数查找困难或有更佳版本者，则采用其它版本代替。编排次序亦照《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少数明显错误之处，有所改动，新增篇目按内容插入有关部分。此外，尚有两点须指出：所收文集中有几种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版的，有些文章也作于辛亥之后，但习惯上往往将这些文集也视作清代著作，而且原索引已经收入，故未删去；书中方志序跋部分，《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按 30 年代行政区划编排，现改用今天行政区划编排，其中河北、北京、天津并为一个单位，

《中国历史地理学论著索引·谭其骧序》。

《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谭其骧序》。

1986 年~1990 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中国历史地理学论著索引·谭其骧序》。

江苏、上海并为一个单位，蒙古内含内蒙古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两部分。

编辑出版《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是总结、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大工程中的一项重要成果。《汇编》实收清人文集 300 种，有关地理文献 2158 篇，约 397 万字，较全面地反映了清人文集中

地理篇的情况，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不仅将众多不易收集的清人文集中的资料汇编在一起，而且将这些地理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全编分为 8 部分，具体内容及文章篇数为：

第一部分通论

一、论说 18 篇

二、序跋 6 篇

第二部分总志

一、考释 16 篇

二、序跋 100 篇

第三部分方志

一、考释

1. 古地理 144 篇 2. 地方沿革 18 篇

3. 民族 7 篇 4. 杂说 40 篇

二、序跋

1. 江苏、上海 87 篇 2. 浙江 110 篇

3. 安徽 36 篇 4. 江西 17 篇

5. 湖北 10 篇 6. 湖南 12 篇

7. 四川 12 篇 8. 河北、北京、天津 48 篇

9. 山东 14 篇 10. 河南 7 篇

11. 山西 8 篇 12. 陕西 21 篇

13. 甘肃 7 篇 14. 福建 8 篇

15. 广东 11 篇 16. 广西 6 篇

17. 云南 7 篇 18. 贵州 11 篇

19. 新疆 13 篇 20. 吉林 2 篇

21. 黑龙江 2 篇 22. 青海 2 篇

23. 蒙古（内外）11 篇 24. 西藏 2 篇

25. 附修志义例 37 篇

第四部分河渠水利

一、考释 168 篇

二、记叙 168 篇

三、策议 60 篇

四、杂说 53 篇

五、序跋 62 篇

第五部分山川

一、考释 68 篇

二、杂说 10 篇

- 三、序跋 46 篇
- 第六部分游记
 - 一、山 281 篇
 - 二、水 63 篇
 - 三、其他 86 篇
- 四、序跋 35 篇
- 第七部分古迹名胜
 - 一、考释 63 篇
 - 二、杂记 21 篇
 - 三、序跋 58 篇
- 第八部分外纪边防
 - 一、考释 23 篇
 - 二、序跋 56 篇
- 附录

- 一、本书所收文集目录
- 二、本书所收文集著者姓氏索引

其中，有关文献皆作了分段和标点，附录颇便读者检索。

清人文集中的地理著作，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和清代地理学史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此书的编辑出版，为全面了解和析清代地理学的发展状况和学术成就，提供了重要依据。这项学科基本建设的完成，对推动清代学术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的编辑工作虽不算复杂，但也遇到一些困难。例如本编所辑文献主要采自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的清人文集，其它图书馆的藏书颇不易调阅，好的版本很难借到，善本书复印困难等等。此外，辑录的资料未作校勘，少数分段和标点也不尽妥帖。凡此等等，皆为不尽人意之处。

四、《二十五史补编》中的清人地理篇

二十五史是中国史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文献。就体裁而言，这类史书中，既有纪传，又有表谱志书。然而，二十五史中，表志齐备者，惟《史记》（称书不称志）、《汉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等 9 种；其余《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南史》、《北史》等 7 种，则无表无志。此无表无志之 7 种与有志无表之 9 种，自然不能称为完善，即以表志齐全者论之，作者的学识与所取的材料亦未必完全无瑕可指。历来的史学家为了弥补这种缺失，做了许多补作、校正和考订工作。起先，这些作品大多分散在各种丛书中，极少单行本，如果没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很难将它们搜求齐全。又有一部分是尚未付刻的稿本，更不容易见到。本世纪 30 年代，上海开明书店在国内史学界的赞助和支持下，搜求丛书旧刻本与稿本 240 余种，其中旧刻本 180 余种，稿本 60 余种，将其汇编成册，与二十五史相辅而行，这就是《二十五史补编》。

《二十五史补编》（以下简称《补编》）所收，皆以表志为限，凡增补、注释、考订、校勘诸作，不问往昔遗籍，时贤近著，知见所及，靡不甄采。

《补编》的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兵刑、食货、艺文等方面的著述，内容非常丰富。

地理志是二十五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十五史中，只有 17 部地理志，并不齐备，而 17 部地理志亦因当时作者的疏忽以及后世传刻的错误，存在种种问题，引起许多读者的憾惜，因而后人增补、注释、考订、校勘地理志的著作颇多，这类著作在《补编》中所占的比例较大。

《补编》所收清人地理篇的作者中，有年逾 70 的老人，也有年方 20 的青年，有著作如林的一代名流如万斯同、杨守敬等，也有成就盛业而以前名不出闾巷的吴卓信等。但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名家，如《汉书地理志稽疑》的作者全祖望，兼通经学、史才和词科，曾 7 校《水经注》，为学渊博无涯，于书无不贯通，所著《经史问答》“足以继古贤，启后学，与顾炎武《日知录》相埒”。又如陈澧，“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篆隶无不研究”，撰有《汉志水道图说》7 卷、《水经注提纲》40 卷、《水经注西南诸水考》3 卷等 12 种。他们在研究舆地方面有深厚的功力和较高的造诣，多数著述代表了当时治学的最高水平。

《补编》中的清人地理篇有：

- 刘文淇撰《楚汉诸侯疆域志》3 卷
- 汪远孙撰《汉书地理志校本》2 卷
- 杨守敬撰《汉书地理志补校》2 卷
- 吴卓信撰《汉书地理志补注》103 卷
- 钱坫撰徐松集释《新 地理志集释》16 卷
- 汪士铎撰《汉志释地略》1 卷
- 洪颐煊撰《汉志水道疏证》4 卷
- 陈澧撰《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7 卷
- 吴承志撰《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补正》7 卷
- 黄大华撰《汉志郡国沿革考》1 卷
- 吴增仅撰、杨守敬补正《三国郡县表附考证》8 卷
- 谢毓英撰《三国疆域表》2 卷
- 洪亮吉撰、谢毓英补注《三国疆域志补注》15 卷

- 谢毓英撰《三国疆域志疑》1 卷
- 毕源撰《晋书地理志新补正》5 卷
- 方恺撰《新校晋书地理志》1 卷
- 洪亮吉撰《十六国疆域志》16 卷
- 成孺撰《宋书州郡志校勘记》1 卷
- 洪 孙撰《补梁疆域志》4 卷
- 臧励和撰《补陈疆域志》4 卷
- 温曰鉴撰《魏书地形志校录》3 卷
- 杨守敬撰《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9 卷
- 汪士铎撰《南北史补志》14 卷
- 练恕撰《五代地理考》1 卷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

李慎儒《辽史地理考》5卷

（按：主要在民国年间成名的学者及其著作未列入）

上述作品中，有几种情况：一是补作，补正史所缺的地理志表，或补志表中语焉不详者，如《补梁疆域志》、《补陈疆域志》、《楚汉诸侯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等。一是考订，如《五代地理考》、《宋史地理志考异》、《辽史地理志考》、《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等。一是疏证，如《汉书水道疏证》、《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等。

此外，还有一些可供研究地理参考的重要著述，如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劳经原的《唐折冲府考》等，兹不一一列举。

《补编》中的清人地理篇是研究历史地理（尤其是沿革地理）的重要参考书。谓其重要，是因为：

（1）它填补了8部正史没有地理志的空白。二十五史中，《史记》、《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无地理志。《补编》的清人地理篇中，《三国郡县表附考证》、《三国疆域表》、《三国疆域志补注》、《三国疆域志疑》可补《三国志》无地理志之缺；《补梁疆域志》可补《梁书》无地理志之缺；《补陈疆域志》可补《陈书》无地理志之缺；《南北史补志》、《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可补《南史》、《北史》无地理志之缺。《五代地理考》可补《旧五代史》无地理志、《新五代史》职方考过于简略的不足。《补编》中清人地理篇虽无《北齐书》、《周书》的补志，但《隋书·地理志》包含梁、陈、北齐、北周、隋5个朝代的地理内容，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对这5个朝代的地理皆有补注和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北齐书》、《周书》无地理志之缺，而《十六国疆域志》、《南北朝舆地表》等，对于研究南北朝时期的政区沿革和疆域变迁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对17部正史地理志进行校订、注释和疏证，订正了讹误，增补了内容，疏通了疑滞，方便了读者。如吴卓信以毕生精力撰成的《汉书地理志补注》，体大思精，以《汉志》所载每一郡国为一卷，于正文注文无不赅引，释古今沿革之迹，于牴牾疑滞处又无不加以博辨考证，有纠班氏之脱误者，有辨前人之是非者，长达80余万字。李兆洛评价说：“此书搜辑赅博，大致备矣”。又如杨守敬撰《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历时30年，先后五易其稿，方才写成。考证的全文为《隋志》的6倍。《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不仅旁征博引，广为诠释，丰富了《隋志》内容，而且校补遗漏，订正舛误，为后人研究《隋志》提供了很大方便。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点校《隋书·地理志》，“采用杨考（即《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者亦较多”。其他作品同样具有这种参考价值。由此可见，研究某个朝代的地理，依靠正史地理志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参考《补编》地理篇。如研究《晋志》，必须参考《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新校晋书地理志》；研究《魏书地形志》，必须参考《魏书地形志校录》。若要作深入研究，当然还要查找更多的资料。

（3）突破了一批沿革地理研究中的难题。例如南朝梁在宋、齐之后，时北方有北魏，后改为北齐、北周，《宋书》、《南齐书》、《魏书》虽有地志，但东晋十六国以来，多侨置郡县，朝南暮北，旋生旋亡，建置沿革极难

《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汉书地理志补注·序》。

《隋书·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

推求。《陈书》、《周书》无志；《南史》、《北史》亦无志可考，欲作补梁疆域志，其难不言而喻。洪 孙知难而进，著成《补梁疆域志》4 卷。又如《汉志》记水道，有名可指者 361 条，无名者 160 条，这虽是《水经注》以前关于水道最详实的记载，但其所叙，只提首末，不及经过，失之太简。洪颐煊便广考载籍，一一加以疏证，又复引征古书，“证其同异，别为四卷，首纪北方诸水，次纪东南诸水，次纪西南诸水，末仿《水经》之例，记以地泽所在”。又有陈澧以内府地图为本，作《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将汉地、今地并书之，使读者开卷了然。吴承志则在陈氏《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的基础上，作《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补正》，于陈澧所未备者补之，其疏舛者纠正之，又广征古籍，参稽众说，审辨班志原文之讹。经过这些学者的研究，基本弄清了《汉志》所载水道的情况。再如唐初行政制度，本为州县 2 级制（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公元 742 ~ 758 年）16 年中，也实行过郡县 2 级制，但为时很短）。安史之乱以后，割据的藩镇独霸一方，小者控辖数州，大者连郡十余，形成了事实上的 3 级制。《旧唐书》和《新唐书》皆未言及藩镇割据以后的政区沿革，惟《新唐书·方镇表》保存了不少有关资料。《新唐书·方镇表》“表地不表人”，记载方镇置废沿革较详。但该表疏漏错误较多，有待订正。吴廷燮从两唐书纪传及其他类书、地志、总集、别集、墓碑、杂史中，辑录出大量资料，按时间先后，进行爬梳排比，撰成《唐方镇年表》一文，订正了《新唐书·方镇表》的舛误，补充了许多资料，使唐末疆域政区沿革历历可考，从而解决了《旧唐书》和《新唐书》所未解决的问题。类似这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作品，《二十五史补编》的清人地理篇中还有许多。

《补编》清人地理篇中的大多数作品，引证宏博，考订精详，但也并非没有问题。如刘文淇错将西汉末年的政区当成西汉初年的政区，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楚汉时期的疆域，于是错误百出，几无一是。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对个别方镇的考证，也有过于牵强，或自相矛盾之处。此外，因抄手“而致交舛互伪”的例子也有所见。故利用《补编》清人地理篇的研究成果，仍需加以甄别，不能囿于旧说，也不能迷信前人。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今人又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在重视《补编》的同时，还要重视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比如王仲莘的《北周地理志》已经出版，该书对北周疆域政区的研究，已经超过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故研究北周沿革地理时，决不能埋头于《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而置《北周地理志》于不顾。

五、《地学杂志》中的地理论述

《地学杂志》是反映中国近代地理学早期研究成果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始创于清宣统二年（公元 1910 年），最后一期出版于 1937 年，共出版 181 期，大部分刊行于民国后，1912 年前仅出版 18 期（内有合刊）。本书专述清代地理学，所述应以清代为断，但这里若以清代为断，阐述多有不便，读者亦难窥全豹，故本节所述，多有论及民国以后者，特此说明。

最初，《地学杂志》设“论丛”、“杂俎”、“说郭”、“邮筒”、“本

会纪事”5个栏目，前三者为主要栏目。以《地学杂志》第一年第一号为例，“论丛”内容有“论地质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杂俎”分内外编，内编有“海南岛”、“天山南路巴格喇赤湖”、“中国之矿产”、“承德府调查记”、“吉省添设各缺”、“旧长兴岛之新布置”、“营口之沿革”、“黑龙江之航业”、“浚治辽河办法”、“邮部筹定展筑张绥路线”、“会议政务处奏议复东督锡良奏设县缺折”、“黔省之无尽宝藏”、“茅山金矿”、“鳄鱼食人”、“俄人经营蒙古”，外编内容有“南极探险”、“湖水骤涸”、“日本东西两京之比较”、“法领安南之新要塞”；“说郭”内容有“地球记”、“蒙古矿产”、“蒙古与张家口之关系”、“说滦河”、“说滏阳河”、“环游地球”、“里海位置”、“火山洞中探险”、“鸟地”、“北极潮流之发见”、“中国西北部游记”、“佛教史迹探险”、“中国古代之飞船”、“饮乳动物”、“高山探奇”、“火星上白光”、“地质学家之资料”、“人猿”、“独自光”、“法国考古”、“沌谷山房日钞”。

《地学杂志》出版后，深受国内外人士欢迎，销路日增，旧刊杂志亦要再版。例如第一年第一号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正月出版，同年6月再版，1923年7月三版，1925年10月四版；第五号再版3次，第七号再版3次，第十号再版4次，等等。

1922年，《地学杂志》革新内容，增设栏目，调整后的计划及要求如下：

一、自十三年（按指公元1922年）第一期起，将原有“论丛”、“杂俎”、“内外编”、“说郭”、“邮筒”、“介绍图书”诸栏加以归并，大致如次：

甲、论丛：凡关于地理学学理上之讨论，及教授方法之论著，均入此栏，每朝登载三篇，选择务严，冗滥之作概予屏绝，以昭审慎。

乙、说郭：凡最近地理学界之名著、重要译述，以及时贤之地学讲演，为“论丛”所不能容者，概入此栏。

丙、杂俎：刊载最近最有价值之游记、调查、探险报告等。

丁、地学界消息：刊布最近海内外地学界消息，以志留心地学同志之参证。

戊、通讯：本学者态度，以剖析疑难，讨论地理学上之重要问题、重要发现为宗旨，浅薄浮泛之作，概不采录。

己、介绍与批评：介绍批评地学界新旧出版之图志杂志，以供学者之采择。

庚、会务报告：报告本会一切重要事件。

辛、地学研究资料：搜集各报纸杂志、私人采访之碎锦断玉，略分为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人生地理，以供同志研究。

以上选材务求翔实，立论期于精当，每期最少以4栏为度，论丛、说郭、杂俎为固定栏，余栏视材料之多少，临时酌定。

二、今后拟按期刊登之几种重要译著：

甲、《达尔文世界一周学术探险记》，英国查理斯·达尔文著；

乙、《文明与气候》，耶鲁大学教授汉丁敦著；

丙、《地理学史》，开尔底、霍次华合著；

丁、《地理学概论》，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中米尔博士著之部分；

戊、《近代地理学》，纽毕金著，由盛叙功先生担任翻译；

己、《人生地理学》，汉丁敦著，由盛叙功、庆观澜担任翻译。

《地学杂志》虽然深受国内外各界人士欢迎，但在经营过程中，因华北形势急危及资金短缺等原因，“亦艰阻备尝，陷于停顿者再”。1927年之前，能维持出版，大半皆张相文支撑之力。嗣后，又得到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补助和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等人的支持，1937年前《地学杂志》才能勉强维持，未曾停刊。1928年，《地学杂志》编辑部改组，由聂崇岐任编辑，陈垣、白月垣、章鸿钊、沈之洪、张星烺、苏莘、姚士鳌、翁文灏为名誉编辑。在地学会同仁的努力下，杂志之内容日益改进，“私家术学者，学校教授者，政治家谋建设者，莫不手持一编，以为参订互稽之用”。

如果说，《地学杂志》第一期的内容还不够成熟、质量还不够高的话，那么1933年出版的《地学杂志》（张蔚西先生纪念号）的学术水平已令人刮目相看。纪念号发表的论著有张星烺的“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谭其骧的“汉百三郡国建置之始考”、王以中的“明代北方边防图籍考”、傅振伦的“燕下都遗迹考”、许桂馨的“山西地理考察”、林观得的“福州经济地理述略”、白眉初的“洛阳与长安”、张印堂的“中华古代文化之发展及其地理背景”、陶谦译的“中国土耳其地下的宝藏”、姚薇元译的“古代欧亚大陆交通考”、葛启扬的“民国十七年以来中国县名更置表”、聂崇岐的“一百六十九期《地学杂志》总目”。这些论著的质量已臻当时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

《地学杂志》的内容十分丰富，据聂崇岐研究，前169期发表的论著，可分为20类（按：每类论著的统计数字系笔者所加），其目次为：

一、天文气象

1. 天文（附历法晷刻）16篇；
2. 气象（附光湿度潮流）31篇；

二、地质（附古生物）

1. 地史6篇；
2. 地质17篇；
3. 冰川5篇；
4. 火山13篇；
5. 地震13篇；
6. 古生物6篇；

三、地形（附地理文化关系）

1. 地形（附地磁）28篇；
2. 山脉16篇；
3. 河流28篇；
4. 湖海16篇；
5. 地与文化12篇；

四、水利（附水产）71篇；

五、交通

1. 交通概况（附古交通）13篇；

《地学杂志》，1921年第12期。

《地学杂志》，1921年第12期。

沈之洪：“续刊《地学杂志》叙”，《地学杂志》，1928年第1期。

2. 铁路 (附国道) 43 篇 ;
3. 航运 24 篇 ;
4. 航空 8 篇 ;
5. 隧道 (附海底电线) 7 篇 ;
- 六、物产 (附经济情况)
1. 物产总述 (附地与生物) 21 篇 ;
2. 矿产 79 篇 ;
3. 动物 16 篇 ;
4. 植物 5 篇 ;
5. 林木 9 篇 ;
6. 农艺 (土地附) 20 篇 ;
7. 工艺 11 篇 ;
8. 经济概况 6 篇 ;
- 七、民族 38 篇 ;
- 八、人口移殖
1. 人口 17 篇 ;
2. 移民拓殖 31 篇 ;
- 九、礼俗宗教
1. 礼俗 14 篇 ;
2. 宗教 6 篇 ;
- 十、地方风土志
1. 国内 83 篇 ;
2. 国外 70 篇 ;
- 十一、调查报告 85 篇 ;
- 十二、游记 156 篇 ;
- 十三、琐谈古迹
1. 琐谈 54 篇 ;
2. 古迹 34 篇 ;
- 十四、考释
1. 考证 52 篇 ;
2. 注释 7 篇 ;
3. 批评 21 篇 ;
- 十五、议论序跋传记诗歌
1. 议论 21 篇 ;
2. 序跋 21 篇 ;
3. 传记 15 篇 ;
4. 诗歌 5 篇 ;
- 十六、裁置名称界务 (附都市)
1. 建置裁并 90 篇 ;
2. 地方名称 11 篇 ;
3. 界务 (附藩属) 23 篇 ;
4. 都市 6 篇 ;
- 十七、国际问题 52 篇 ;

十八、地理学地图学教授法

1. 地理学 24 篇；
2. 地图学 5 篇；
3. 教授法 6 篇；
4. 学会 5 篇；

十九、图表目录

1. 图

地质矿产图 22 幅

地形图（附地震图）10 幅；

水道图 14 幅；

地方图（附路线等图）32 幅；

历史地图 4 幅；

2. 表 18 篇；

3. 目录 11 篇；

二十、杂项 17 篇。

上述论文的数量及其研究的范围，反映了清末以来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状况，以及《地学杂志》对中国现代地理学所作的贡献。

此外，《地学杂志》的下列编纂思想，也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1）关心时务，提倡地理研究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20 世纪初，英国侵略军多次派兵侵占云南西部片马（在今泸水县登梗附近）地区，滇边交涉风云日急，片马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但当时许多人却不知片马之所在，报刊上的报道，亦“每多茫然”，后云南会员钟进堂得到新测云南详图一幅，“片马形势如观掌纹”，《地学杂志》遂“急付之石印，以供国人研究”，凡属地学会会员，则“各赠送一份，不取分文”。民国初，日本出于侵略的需要，将中国的东沙岛和西沙群岛说成日本“发现的无人岛”，《地学杂志》便约请会员李长傅等撰著“东沙岛及西沙群岛”等论文，“揭穿日本人之诡谋”。再如章鸿钊去杭州，见乡民以石灰代肥，连阡盈亩，一白如染，遂就观察到的事实，施肥原则，以石灰代肥的利害进行论述，写成“论杭属以石灰代肥之隐忧”一文，指出如不加以改正，将“耗尽地力”，“消灭耕土”，“使产物品质渐劣”。这些与时务有关的论文，使《地学杂志》充满了时代的气息。

（2）重视发表内容新颖的论文，拓宽地理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地学杂志》刊登的著作，其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已见于聂崇岐编制的“一百六十九期《地学杂志》总目”，这些著作几乎涉及到当时地理学所有的分支学科和邻近学科。高玉钟的“中国产业地理”、忻敬之的“军事

聂崇岐：“一百六十九期《地学杂志》总目”，《地学杂志》张蔚西先生纪念专号。

《地学杂志》1910 年中国地学会事务所启。

同上。

同上。

同上。

《地学杂志》，1911 年第 18 号编者按。

聂崇岐：“一百六十九期《地学杂志》总目”，《地学杂志》张蔚西先生纪念专号。

地理学发凡”、蔡源明译的“中国之生物地理”、存吾土的“地理与文化”等选题，皆可列于当时地理研究的最前列。许多分期登载的长篇论文，如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初稿”、张鸿翔的“长城关堡录”等，后来皆出过专书。这些论著为建立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重视野外调查，提倡地理系学生和地学工作者参加考察。

《地学杂志》不仅在前 169 期发表调查报告 85 篇，而且还发表诸如“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事业”、“中华地质调查方法议”等论文，介绍外国野外调查的情况，讨论地质地理调查的方法。为了倡导地理工作者走向社会，走向自然，还经常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对考察活动进行评述。例如 1925 年第 2 期《地学杂志》发表清华大学地理系学生陈增敏、孙海晏实地考察后所写的“湘粤旅行闻见录”，便加按语说：“清华年来频有利用假期，组织种种考察团之举，这是其它大学应当效法的”。这类按语，对野外调查和高校地理实习，起了很好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4) 发表不同观点论文，鼓励开展学术讨论。

当时，成吉思汗陵寝究竟在何处，是历史学和地理研究中的一大问题，中外史书虽有记载，然真象难考。张相文在实地考察后，断定在鄂尔多斯的埃锦赫洛，但屠进山则认为应在喀鲁河畔，二者观点不同。《地学杂志》不仅先后刊登了张、屠二氏的辩论文章，而且就出版《成吉思汗陵寝辩证证书》一书事，在杂志上刊登广告，鼓励更多的同仁关心这场辩论。

第五章 地图的编制

一、《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内府舆图》

《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是清初在实测基础上先后完成的 2 种采用经纬度与投影法绘制的全国地图。它们“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种，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表明“中国在制图学方面又再一次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

(一) 测量成图经过

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将西方经纬度制图法传入中国，当时并未引起中国人的多大重视，只是将他们的地图成品作为珍奇玩物观赏。清康熙皇帝追求西方科学技术，广泛涉猎西方天文、历法、地理、数理等书籍，延聘西方传教士入宫讲授和担任有关部门的业务工作。尤其是在康熙二十八年（公元 1689 年）中俄东北边境问题谈判中，法国传教士张诚（J.F.Gerbillon）等作为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得康熙皇帝的信赖，同时也促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精确地图的重要性。在张诚等人建议下，康熙帝确立了采用经纬度法重新绘制全国地图的决心，特别下令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招聘学有专长的 10 多名传教士来华，负责地图测绘工作。为了慎重从事，康熙四十六年（公元 1707 年）令白晋等人先在北京附近进行小区测量试验，将用经纬度法绘制的地图与旧图比较，认为远胜旧图后，才下令白晋等人按照西方经纬度和投影法开始大规模测绘各省地图。

据法国传教士杜赫德（J.B.DuHalde）神甫编纂的《中国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1735 年巴黎版）等有关材料，清初大规模测量地图正式始于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公元 1708 年 7 月 4 日）。

首先由白晋、雷孝思等进行长城及其两侧邻近各地的位置以及大小河流、津渡的测量，直到 1709 年 1 月 10 日结束工作。同年 5 月 8 日，雷孝思等自北京前往东北地区测量，完成了辽东省、图门江，直至黑龙江的入海口地区的制图任务。接着雷孝思等又完成了北直隶省的地图测绘。1710 年 7 月 22 日，康熙还派人到黑龙江地区测绘，并重点测绘了新建的墨尔根（今嫩江县）和齐齐哈尔（今龙江县）等镇。

为了加快测绘速度，康熙五十年（公元 1711 年）增加了工作人员，分为 2 队进行。一队由雷孝思与新来的葡萄牙神甫麦大成（P.Cordoso）负责，测绘山东省地图；杜德美与费隐（P.Fridelli）等出长城，测绘今哈密以东蒙古地区。同时还因“鸭绿、图门二江未详晰”，又“命乌喇总管穆克登皆按事部员复往详察”。接着，麦大成与汤尚贤（P.DeTartre）神甫等又负责完成了陕西（包括甘肃）、山西等地的测量工作。冯秉正（P.DeMeilla）神甫与肯特雷（P.Kenderer）神甫协助雷孝思测定了河南省地图，随后又一起测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第 5 卷第 2 章，科学出版社，1976 年版。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第 5 卷第 2 章，科学出版社，1976 年版。

原文如此，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应为西历 1708 年 6 月 4 日。

《清史稿·何国宗传》。

绘了江南、浙江和福建省地图。汤尚贤与麦大成负责江西、广东和广西的测绘工作。费隐等负责四川与云南、贵州等地的测量。

在西藏方面，从康熙四十八年到五十年（公元 1709 ~ 1711 年），曾由随军进藏的测绘人员目测了西藏地图，但因无经纬度测试，难以与其它地区新式地图配套。于是，在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六年，又派了在钦天监学习过数学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同往西藏测绘。测量人员直达恒河源而止。

到康熙五十六年（公元 1717 年）一月，完成了各地的测绘工作，各区负责人携带资料陆续返回北京，由杜德美神甫负责进行全国总图——《皇舆全览图》的编制工作。全图到五十七年制成并进呈康熙御览。

康熙时期的这次全国地图实测，历时 10 余年，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主要有：白晋、雷孝思、杜德美、潘如、汤尚贤、费隐、麦大成等 10 多人。参加广东、云南等省区测量的中国人员还有：何国栋、索柱、白映棠、贡额、那海、李英等人。他们共测绘了全国 631 个经纬点（未含西藏，见表 12）。

表 12 康熙测绘各省经纬点数

省名	点数	省名	点数	省名	点数	省名	点数	省名	点数
直隶	48	蒙古	93	福建	30	广东	37	陕西	28
河南	29	山东	28	台湾	7	海南	7	贵州	25
湖广	54	江西	30	江南	37	广西	28	云南	30
吉黑	36	四川	28	山西	28	浙江	30	辽东	8

康熙时，由于准噶尔部叛乱，中国西部的测量工作只限于哈密以东地区。到乾隆时，平定了准噶尔、大小和卓木叛乱后，乾隆先后两次派人到西北地区进行测量。第一次从乾隆二十一年（公元 1756 年）二月开始，于二十四年测绘完毕。分南、北两路同时进行。据乾隆所题《大清一统舆图》诗自注称：“上半年平定准噶尔，迤西诸部，悉入版章。因命都御史何国宗率西人由南北二路，分道至各鄂托克测量星度，占候节气，详询其山川险易，道里远近”。

第二次，即乾隆二十四年图成后，又派明安图等前往新疆各地复校测量结果。两次测量，获得哈密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约 90 个点的经纬度等资料。在此基础上，编著了《西域图志》（后改名为《钦定皇舆西域图志》52 卷）一书，图文并茂，详细介绍了新疆的人文、自然状况。由于获得了西北地区的实测资料，乾隆二十五年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订，完成了《乾隆内府舆图》。

（二）内容特点

《皇舆全览图》是在大规模全国经纬度实测基础上绘成的，此图采用梯形投影法，以经过北京的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按 1 : 140 ~ 150 万的比例绘制，范围涉及南到海南岛、北达黑龙江、东及台湾，西至哈密以东的满蒙关内各省的广大地区，即西至西经 40 多度，北至北纬 55 度。康熙五十八年（公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一。

《清史稿·何国宗传》。

元 1719 年)又将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等绘制的西藏地图补入总图之中。

据任金城先生研究,目前能见到的《皇舆全览图》主要有 3 种版本。

第一种是包括全国总图和 32 幅分省分区图的形式。据《清史稿·何国宗传》载:“(康熙)五十八年图成,为全国一,离合凡三十二帧,别为各省图,省各一帧”。又据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载:“康熙地图三十二叶本,内地十六叶,边外十六叶。”现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原故宫博物院明清部)珍藏的康熙时测绘的各省舆图共 30 余幅,可能即属于这一版本中的分省图原本,或原图摹绘本。

第二种是珍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的 41 块铜版地图(后由沈阳故宫博物院重印时金梁题名为《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该图“满汉合璧,铜刻至精”,内地各省地名用汉文标注,边疆各地则用满文。以通过北京的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西到西经 40 度,以纬度 5 度为 1 排,南北共分 8 排,每排又以经度分为若干幅,共 41 幅。每幅长 39.75 厘米,宽 67 厘米。

第三种为“分省分府小叶本”地图。即图书集成内的地图,其特点:“计二百二十七叶,……。所载镇堡小名,细若牛毛,与大叶本不异,但不著经纬度数及无边外诸国”。现北京图书馆所藏内府精绘的分省分府《皇舆全图》,即属这一类型。

此外,《皇舆全览图》还有一种版本,即修订的《皇舆方格全图》。这是清雍正年间,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基础上修订的版本。据珍藏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雍正间刊本直格十排《皇舆全图》,其范围比康熙图范围略大。在投影上,康熙图的投影除中经线与纬线成直交外,其余经纬线皆相互斜交。而雍正图则完全改为直交,使得愈向高纬度,图面误差愈大。

《乾隆内府舆图》由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负责绘制而成,后制成铜版 104 块,以纬度 5 度为 1 排,共 13 排,故又称《乾隆十三排图》。乾隆舆图是在康熙图基础上,吸收了新疆等地区的资料绘制而成。所以,它涉及的范围远较康熙《皇舆全览图》广大。其范围:“南至琼海,北至俄罗斯北海,东至东海,西至地中海,西南至五印度南海,合为一图,纵横数丈,而剖分为十三排,合若干叶,每叶著明经纬度数,盖本康熙图,而制极其精,推极其广,从古地图未有能及此者也。”即北达北纬 80 度,西至西经 90 度左右的地方,面积较康熙图大 1 倍多,包括了北冰洋、印度洋、波罗的海、地中海与红海之间的广大地区,是一幅名副其实的亚洲地图。

乾隆图的版本较多,依北京故宫博物院 1932 年重印的《乾隆内府舆图》,乾隆图以通过北京的子午线为中央经线,但未作零度(后修订时改正)。在数学基础上,与康熙图基本相同,比例尺约为 1:140 万。在地理要素上,也

中科院自然史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 324~327 页。另据汪前进先生研究认为,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采用的是正弦曲线等面积伪圆柱投影(即桑逊投影),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 年第 2 期。

任金城:“康熙和乾隆时期我国地图测绘事业的成就及其评价”,《科学史集刊》第 10 辑。

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华书局,第 278 页,1959 年版。

中科院自然史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 324~327 页。另据汪前进先生研究认为,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采用的是正弦曲线等面积伪圆柱投影(即桑逊投影),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 年第 2 期。

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第 278 页。

比康熙图（如《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要详细。基本据实标绘实际城镇、山川状况。在图形符号上，亦略有差异（图3）。

《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	《乾隆内府舆图》
府	府
州	州
县	县
城镇（只有地名无府号）	城镇
山	山

图3 《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与《乾隆内府舆图》图例比较

（三）意义

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皇舆全览图》完成后，康熙及九卿们即予以很高的评价。如《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三载：“寻九卿奏称：从来舆图地记，统统前后相沿，传闻附会，虽有成书，终难考信。或山川经络不分，或州县方隅易位，自古至今迄无定论。我皇上……分命使臣，测量极度。极高差一度，为地距二百里。昼夜之长短，节气之先后，日食之分秒时刻，都邑之远近方位，皆于是乎定。天道地道，兼而有之。从来舆图所未有也。……皇上精求博考，积三十年之心力，核亿万里之山河，收寰宇于尺寸之中，画形胜于几席之上。臣等……昔曾经过之区，宛若阡陌，素所未历之境，不啻乡间。”

总之，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内府舆图》的完成，在中国地图史、地理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它是中国第一次在实测经纬度基础上绘制的地图，给后来的中国地图发展以深刻影响。康熙时的经纬度测量，主要有4种方法：用太阳观察确定各点的经纬度；用月食观察确定；用木星遮掩某恒星观察确定；

用木星第一卫星观察确定。但事实上，主要使用的是三角测量法。如雷孝思在他的报告中写道：“由于所测城市相距很近，用天文观察法实际上几乎无法进行。由于钟摆运动不均或对木星卫星掩始时间观察不够精确这样最小的误差，都会使经度测定的结果形成相当大的误差。这就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根据观测结果，两个城市会被画在一起。而三角测量法就不会有此弊病。因为我们尺不离手、精确分割半圆、在两地间多设测定点使之连成环环相扣的三角网。持续进行三角法测量，还有其有利之处，这可以测出一地的经度、纬度，此后通过测定太阳或北极星在子午圈的高度加以校正”。

由于进行了全国631个重要点的经纬度控制测量，所以，新绘的《皇舆全览图》及后来的《乾隆内府舆图》具有相当高的准确性。成为以后多种中国地图的蓝本。如1735年法国唐维尔(D'Anville)编绘的《中国分省图》、《满蒙藏图》、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董立方绘李兆洛编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胡林翼、严树森编制的《大清一统舆图》(又称《皇朝中外一统舆图》)等，都是分别以康熙图或乾隆图为蓝本的。

葛剑雄编译：“测绘中国地图纪事”，《上海测绘》，1989年第3期。

第二，康熙《皇舆全览图》第一次采取以经纬度分幅的方法（沈阳故宫铜版地图），这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第三，首次发现子午线上一度的长短因纬度高低而异，为“地球扁圆说”提供了最早实证。1710年雷孝思等在东北测量北纬41度到北纬47度间的长度时发现，“无论他们在测量中如何小心翼翼，各度之间总有近30秒的差距。”“当他们将47度与其他各度比较时，发现差距竟达258尺。至此，传教士们认为每度经纬长度肯定是不等的。”对于这一发现，雷孝思等当时虽然只这样认识：“尽管几何学家还没有发现这一现象，仅有一些设想地球是扁球体的人作过推测。”但事实上，这正是世界上首次通过实地测量而获得地球为椭圆体的实证资料。

二、《大清会典舆图》

《大清会典舆图》是清末组织编制的一部全国地图集。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为编制这一图集所进行的省级地图测绘上。

（一）编制过程

编制《大清会典舆图》是在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在北京建立“会典馆”以后开始的。会典馆的主要任务是修编《大清会典》，其中“舆地图”也是一项主要内容。为编纂好舆图，首先要求各省绘出省、府、州、县地图报送会典馆。为此，会典馆在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十七年先后发过2个专门通知，规定有关制图原则。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地图的方向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2）使用计里画方方法比例，比例尺为省图每方百里；府、直隶州图每方五十里；厅县每方十里。图上每方边长为七分二厘。

（3）规定统一图式符号。

（4）规定图说格式，凡省、府图附以图说，仍按旧式，州县图改说为横表。表列沿革、疆域、天度、山镇、水道、乡镇、官职7项，依次填写。

（5）各省要进行实测经纬度和地形，省图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圆锥投影法。”

根据会典馆的绘图要求，各省一般都设立专门机构专司此事。如安徽“委派司道，在省设局，筹款议章”；福建“于奉文之日，设局会垣”。组织专人从事测绘制图工作。

当时的野外测量、纬度确定主要采用“由太阳午正高弧定纬度法”，利用冬至日测太阳的垂角来推算纬度，另也有用北极星定纬度的。经度确定则主要依据月蚀定经度法。对于曲折地形测量，主要使用罗盘仪用简单导线法进行。如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福建省会舆图局测绘图说章程》中所述：“用直矩尺法，携有镜之直矩，登最高之山顶，俯视诸峰罗列目前，即

同上。

葛剑雄编译：“测绘中国地图纪事”，《上海测绘》，1989年第3期。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安徽巡抚福润奏折。

光绪十六年《福建省会舆图局测绘图说章程》。

以开方之图板，置尺镜其上，但观方格交点即知某某相距若干里，毋劳册记布算之繁，披图了如指掌。若支河曲港，仍用平度罗经相辅而行”。另一种测绘地形的的方法是，先测出各地物的角度数值记在簿上，然后再依此转换绘成地图。即所谓：“昼则测量登册，夜则按册造以量代算之图”。

经过各地的努力，到光绪二十年（公元 1894 年）后陆续完成了各省地图的测绘工作。其中已知各省舆图测绘完成时间如表 13。

表 13 各省地图测绘完成时间

图名	绘制时间	付印时间
广东舆地全图	1889 ~ 1891 年	1897 年
湖北舆图	1889 ~ 1893 年	1901 年
甘肃全省舆图	1891 ~ 1893 年	1899 年
陕西全省舆地图	1890 ~ ?	1899 年
黑龙江全省舆地图说	1890 ~ 1895 年	1899 年
江西全省舆图	1891 ~ 1896 年	1896 年
湖南舆图	1891 ~ 1895 年	1897 年
安徽舆地图	1890 ~ 1895 年	
福建全省舆地图	1890 ~ ?	1905 年（重印本）
浙江全省舆图	1895 ~ 1898 年	

（二）内容特点

（1）《会典舆图》的编制时期，正是中国由传统地图制作方法向近现代科学制图法的转变时期，因此，在这次地图制作中，首先表现为计里画方法与地图经纬线的混用。

按照会典馆的制图要求：“北上南下，计里画方”、“添绘经纬，酌用圆锥外切之法以肖地体”。既定出各省画方的比例，又要酌用投影法，这本身就有较大矛盾。因此，即使作了圆锥投影经纬度图的，也基本上与主图无关。主图仍然以传统计里画方法为据，只是多数省图以方格加绘经纬线，或在方格纵横线上直接标注经纬度，从而构成计里画方与经纬网相重叠的双重网络系统。广东、甘肃省图只在主图前加了一幅圆锥投影的经纬度图。而在其他主图上并不加经纬网，仍用计里画方网格。山东省图则仅在画有计里画方网格的图幅上方，画出长约三毫米的纵短线，用以代表经线（加注经度注记），但在图下方却无纵短线相应，使之难起任何作用。云南省图直接在计里画方方格上标注经纬度（把经度注在纵线上，纬度记在横线上）。

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国新旧制图方法转变过程的一个特殊面貌。

（2）在地图比例尺上，会典馆有明确规定，要求“州县图格注明，方数不拘，大小必须画一”，“今照原格七分二厘开方”。又规定省图方百里，府图每方边长 50 里，县图每方边长 10 里。按清制每里 180 丈计算，则省图比例尺约为 1 : 250 万；府图 1 : 125 万；县图 1 : 25 万。但是，各地在实际制图中，并未完全按照这一规定执行。表 14 即反映了陕西、福建、山东 3

陆桂星等：《测绘浅说·说绘八》，陕西省舆图局刊印，光绪十六年。

《福建全省舆图·序》，1950 年重印本。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 1895 年）十一月安徽巡抚福润奏折。

省輿图的实际比例尺情况。

表 14 陕西、福建、山东 3 省輿图方格比例表

图名	级别	方格边长	实际里数	比例尺数
陕西 全省 輿地 图	省图	三分九厘	百里	1 460 万
	府图	七分	五十里	1 129 万
	县图	五分	十里	1 36 万
		六分二厘	十里	1 29 万
		七分	十里	1 25 万
福建 全 省輿 地图	省图	六分六厘	百里	1 273 万
	府图	六分六厘	五十里	1 136 万
	县图	三分四厘	十里	1 53 万
山东 全省 輿图 表说	省图	六分九厘	百里	1 260 万
	府图	六分九厘	五十里	1 130 万
	县图	六分九厘	十里	1 26 万

(3) 由于比例尺有统一规定,各地政区大小差异较大,因此,各地完成的省区图集的形状大小便相差很多,如《陕西全省輿地图》,宽 60 厘米,高 31 厘米;《黑龙江全省輿地图说》宽 18.5 厘米,高 29 厘米;《福建全省輿地图》宽 38 厘米,高 33.5 厘米等。

(4) 在地图符号使用上,各图基本按照会典馆的规定符号表示河流、居民地、山脉、道路边界。基本图例如图 4。

在这些图形符号中,除了中国传统的符号形式,如省、府、州、驿站等治所标志,以及“城照原形”的写景画法外,各地还根据当地的地理特点,创制了部分地物要素符号,并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如《陕西全省輿地图》对黄土地貌的“塬”和“冲沟”、《安徽輿地图》对新出现的电线、电报局、航行灯塔等,都使用了较科学符号。此外,安徽、湖北省的輿图还改变了传统的笔架式和毛虫式表示山脉的方法,采用了比较科学的晕滃法表示地貌。

(5) 一般图册都为单色,但计里画方网格和经纬线常用红色或淡蓝色绘成,也有用铅笔描绘方格的。个别绘本加有色彩,常以黄色染黄河,绿色染一般河流。

(6) 在地图内容选取方面,各地区都提出了一定的原则。如《福建全省輿地图》的测绘章程中就指出福建省地图绘制中的地理要素选取标准,其曰:“各州县所属村堡……动以千计,若一一绘入十里之格,势不能容,今定图中应绘之地,除佐武驻扎处必应注出外,其余应入者九事:一营汛;二驿站;三镇集;四厘卡、税口、关津;五盐场卫所;六堤堰;七炮台;八近日防练军会屯扎处;九故城基址尚存者,其村堡人住户及五百家以上者入图。”

(7) 在輿图内容的准确性方面,各地、各图差异较大。内地和文化发达地区的测绘一般表现比较好,边远地区的差误则比较严重。如福建省的“测

据 1895 年《安徽輿地图》的绘图作识定式表。

绘章程”中就明文规定山区可以“概测”，高山地区可以免测，只须在图上注明为某山即可。云南省则对一些边远县府的地图制作，采用前人的全国大图进行改制。如《云南省舆图·凡例》中所说：“开方计里既因山多而不能实测，则地方之形势只能就各属送分图，参以道光通志所有之府图，以及李兆洛、胡文忠天下全图，用分厘尺悉心通计。”这种以全国图倒过来编制府县图的做法，其所绘地图的简略不详可想而知。此外，一些地区虽然测定了部分经纬度点，但大多是按照清初康熙时的测点加以校订，只有少数是对一些重要城镇经纬度值的新测定。

三、《历代舆地图》

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是中国清代最著名的历史考证地图集。

杨守敬早在青年时代，就对历史地图产生了浓厚兴趣。20岁时，曾有浙江余杭人郑兰避乱至宜都，杨守敬从郑兰处见有六严的《舆地图》，便借回影绘两部。后来，杨守敬在北京和归善、邓承修等合作，共同编制正史《地理志》各图。因南朝梁、陈、齐及北周等书无《地理志》，故未能成图。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又与东湖饶敦秩等同编《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补绘梁、陈、齐、北周各图。又新绘东晋、东西魏、五代、南宋以及历代四裔图。经过这次修补。“合之前稿，共得六十七篇”。此稿初刊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续刊于三十二年，补订成71篇。包括“禹贡九州图”、“尔雅殷制图”、“职方周制图”、“春秋列国图”、“七国形势图”、“秦三十六郡国”、“楚汉之际诸侯王国”、“楚汉之际形势图”、“前汉地理志图”、“前汉末割据图”、“后汉郡国志图”、“后汉末割据图”、“三国疆域图”、“三国形势图”、“晋地理志图”、“东晋疆域图”、“前赵疆域图”、“后赵疆域图”、“前燕疆域图”、“后燕疆域图”、“南燕疆域图”、“北燕疆域图”、“前秦疆域图”、“后秦疆域图”、“西秦疆域图”、“前后蜀疆域图”、“前凉疆域图”、“后凉疆域图”、“南凉疆域图”、“北凉疆域图”、“西凉疆域图”、“西夏疆域图”、“杨氏疆域图”、“南宋州郡志图”、“南齐州郡志图”、“梁疆域图”、“陈疆域图”、“晋宋齐梁陈形势图”等。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杨守敬与其门人熊会贞重新校订该图集，同时补其缺略，以原来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为基础，作为“历代舆地沿革总图”，又扩大增补了“春秋列国图”、“战国疆域图”、“瀛秦郡县图”、“前汉地理图”、“续汉郡国图”、“三国疆域图”、“西晋地理图”、“东晋疆域图”、“二赵疆域图”、“四燕疆域图”、“三秦疆域图”、“五凉疆域图”、“后蜀夏疆域图”、“刘宋州郡图”、“南齐州郡图”、“萧梁疆域图”、“陈疆域图”、“北魏地形志图”、“北齐疆域图”、“西魏疆域图”、“北周疆域图”、“隋地理志图”、“唐地理志图”、“后梁并十国图”、“后唐并七国图”、“后晋并七国图”、“后汉并六国图”、“后周并七国图”、“宋地理志图”、“辽地理志图”、“金地理志图”、“元地理志图”、“明地理志图”、“水经注图”（当时未刻印）。从光绪三十

高僬：“明清两代全国和省区地图集编制概况”，《测绘学报》，第5卷第4期。

高僬：“明清两代全国和省区地图集编制概况”，《测绘学报》，第5卷第4期。

二年(公元1906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陆续刻印完成。命名为《历代舆地图》(一些版本封面题为《历代舆地沿革图》或题《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

据《观海堂地理书目》统计,《历代舆地图》当时共分358卷,45个图组,分装为34册。图集首为《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70幅,概略表示历史境域大势。然后,自春秋战国至明代,按中国历史朝代的先后顺序,安排图幅,详细表示各朝代统治势力的主要涉及范围、行政区划、山河大势等地理要素。其中隋代以前各幅地图多附有序、表或札记等。

《历代舆地图》主要以清乾隆内府舆图为底图,同时参阅税安礼编辑的《历代地理指掌图》、六严的《舆地图》、胡渭的《禹贡锥指》中地图等。按古法,用黑色表示古要素和古地名,用朱红色表示当代河流山川、地名等地理要素。古今对照,便于查阅。图中还用黑体字对历史事件和地名的变迁在图上加注说明,图注中有不少是对历代《地理志》的讹误进行补正。

《历代舆地图》无论从制图方法,还是从其通古贯今的内容系统性上,都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是清代,也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空前的沿革地理巨著,它一出版,即广为流传,影响极大。

《水经注图》是杨守敬的又一部历史地理力作,它是配合杨守敬校注《水经注》时所作,全图80卷,采用古今对照、朱墨套印法,将郦道元《水经注》所述各项内容,标注在清代地图上。即所谓该图“皆循郦氏步趋。必一一证合。以书考图,以图复书,无不吻合,而流移变动如指指掌。”它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四、译编地图

(一)《海国图志》地图

《海国图志》是魏源编著的一部世界地理著作,为了让读者更加直接地了解世界各地的地理位置,这部著作附绘了一套地图。关于地图资料来源,魏源说:各图皆“香港英夷公司所呈《大宪图》也”,“乃广州府经历婺源程承训所摹,饰以五色,因取以冠是书之首,斯纯乎以夷人谭夷地也。”

全图共有74幅。主要包括3种图组:历史沿革图,共8幅。有“汉西域沿革图”、“北魏书西域沿革图”、“唐西域沿革图”、“元西北疆域沿革图”、“东南洋各国沿革图”、“西南洋五印度沿革图”、“小西洋利未利亚洲沿革图”、“大西洋欧罗巴各国沿革图”;东西两半球图。即所谓“地球正背面全图”;各大洲图及各大洲所属国家分图。主要有亚细亚洲全图1幅,分国图25幅;利未利亚洲全图1幅,分国图23幅等。

在各洲各国地图的绘制方法上,完全采用西方的经纬度和投影法。在投

1975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影印本(10册装)。1981年再版本同。题:据光绪四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878~1911年)在沪、鄂两地递次刊本。原图34册。杨守敬编绘。

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观海堂校刻本(42册装)。题:杨守敬制,熊会贞校刻本。

1975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影印本(10册装)。1981年再版本同。题:据光绪四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878~1911年)在沪、鄂两地递次刊本。原图34册。杨守敬编绘。

魏源:《海国图志·后记》。

影选择上，各洲地图一般采用彭纳圆锥投影，各国地图一般采用圆锥投影。但对个别特殊地区又进行了调整，如对非洲一些国家采用比圆锥投影变形较小的桑逊正弦曲线投影；对于四面临海的澳大利亚，则选用了最合适航海的投影法——墨卡托投影。全图集各图统一使用经纬度网络，经线以穿过巴里亚里斯岛的子午线为零度，全球分为东、西经各 180 度。在比例尺的选用上，由于图纸大小一致，而各国面积大小差异很大，因此，地图的比例尺大小不一，尤其是各国分图的比例尺差异更大，如小国瑞士国图的比例为 1 : 100 万，而澳大利亚图的比例尺则为 1 : 1000 万。

在地图表示内容的可靠性上，除沿革地图部分没有采用经纬度和计里画方方法、均为示意性表示外，各国地图都采用了经纬度控制法绘制，因此，各国分图的方位、地名等要素基本正确，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各地的地理状况。

《海国图志》的地图是中国人编制的第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状况的地图集，对后来中国人关于世界地理的认识，世界地图集的编制，具有深刻的影响。

（二）《中外舆地全图》

《中外舆地全图》为武昌邹代钧主持译编的一部世界地图集。

关于这部地图集的译编起因、规模、特点，邹代钧在他拟定的“地图公会章程”中，说得很清楚：

蒙所见华文地球各国舆图有《瀛寰志略》本、《海国图志》本、制造局《地球图》本，皆照西人原图译出，然展转绘刻，不无差移，且分率过小，山川形势仅得仿佛，近日坊间所印《万国舆图》及《中外舆地全图》，尤为疏陋，盖书贾射利之作，不足责也。蒙昔年随使英法，购得德意志人所作图本，方尺之幅百万，精冠泰西，于天下各国皆备，惟欧洲各国则甚详，余尚嫌略。乃悉意搜单行之幅，得俄人所作中亚西图、西伯利亚二图，英人所作印度、缅甸、暹罗及北亚美利加、南阿非利加等图，法人所作越南图，德人所作南洋群岛图、阿非利加洲图，均称精详，足补图本之缺。兹不揣固陋，拟以图本为底稿，其略者别增入。……比例略归一律，以中尺二寸为一度，合一百八十万分地周之一（阿非利加、南亚美利加地多荒漠，西人所作图亦不甚详，拟用中尺一寸为一度，合三百六十万分地周之一）。以京师中线为起数，市镇满五百人者载之。险恶均载。约南北一尺，东西一尺四寸之幅，四百余纸。

同时还计划了国内部分，采用各省最新地图资料编纂分省地图，“其分率较外国图大倍之，以四寸为一度，幅数殆二百纸”。

这 600 多幅地图，“分之各自为册，合之则成全部”，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世界地图集。

自光绪二十二年（公元 1896 年）到二十八年的多年努力，邹代钧基本完成了图集的译编工作。然而，由于经费困难，图集并未能刻版刊行。而是在清政府资助下，作为“大学堂审定中等课本”刊印了 68 幅地图，结集为《中外舆地全图》。其过程据邹代钧称：

（光绪二十八年秋）余携稿本（按即《中外舆地全图》）来京师，就正于长沙张尚书（张百熙），时尚书奉命管学务。见图欣然谓：朝廷兴学，以普通科学救国民，舆地一科尤为重要。即为详加审定，以分图虽详密，实专攻地理者所用，无当普通教育，不妨稍缓出，可先将各国总图六十八幅刊成

一册，以为中小学堂课本，庶使海内学子无智无愚，均一览而知天下万国之形势矣。并订购二千份，预支款为刊费，令余南旋开雕。始去冬，竣工今秋，装订成册，以报尚书之命，庶不负尚书殷殷嘉惠来学之至意。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年）刊印的《中外舆地全图》，计有总图 3 幅，全国图 1 幅，分省图 24 幅，各州各国图 38 幅，群岛图 2 幅。合 68 幅。在表现方法上，采取经纬度、圆锥投影法，用晕滃法绘山脉，居民点还按人口多少分级表示。它有很高的科学性，是当时一部最好的世界地图集。

《中外舆地全图》的一些其它图幅在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年）以后，也陆续进行刊印。

（三）《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

《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是由周世棠、孙海环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年），编译的一册 8 开本彩绘世界地图集。

全图集有地文图 4 页、世界全图 6 幅、洲全图及各国分图 41 幅、中国全图及分省区图 25 幅。另在相关图幅中附重要都会等小图（附图）58 幅。在封二上还绘有 54 个国家的旗徽。

《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内容很丰富。其中地文图中就包括有：天体图；地球测绘图；潮流、雨期及排水图；海面同温度图；夏至后气压及风位图；冬至后气压及风位图；磁石偏差图；植物分布图；世界水陆图；世界人种及宗教图等。在地图表示上，使用经纬度、投影法。以“格临惠契”（即格林尼治）天文台为零度子午线，北京位于东经 $116^{\circ}20'$ 。各幅图列有相应的比例尺数据及示意标尺图形。在地图符号运用上，中国部分多使用清末《大清会典舆图》的类似符号，外国部分则注意采用西方近代科学地图符号，如中国图的省会、府治、散厅直隶厅、州治、县治，分别用传统的框圈符号来表示。而外国城镇则以人口多少划分，采用不同的地图符号。如人口 50000 以上的都会、10000 人以上的都会、3000 人以上的城镇、3000 人以下的重要聚落，分别用形体或大小圆圈等符号来表示。

据汪起鹏《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叙》称，周世棠、孙海环为了编制这部地图集，在 2 年多时间里，“搜罗中外名著者，积数十种”。而且，“新益求新，改正重雕者至五六通”。依据该图集“例言”所述，这部图集的内容选取原则是：“凡政治之沿革与夫形势之变迁，皆据最新调查一一编入。”大致“中国本部”（内地）各省，主要依据邹代钧的《中外舆地全图》，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清帝国全图》；中国东北地区据日、俄两国参谋本部所编绘的《满洲新图》；西藏地区则据归安胡氏所译《西藏全图》。各地人文地理事项（政区改易、铁路等）资料的截止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年）二月。外国地图资料的来源，是由 10 多种外文著作、地图辑译而成，其中如 Bartholomew, J.G. Twentieth Century Citizen's Atlas; Philips New Handy General Atlas of the World; Times Atlas. 而对于外国人名、地名的译文，依据《外国地名人辞典》一书，进行了规范化翻译。

《中外舆地全图·序例》，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年）舆地学会编译刊印。

《中外舆地全图·序例》，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年）舆地学会编译刊印。

下 篇

地理思想

第六章 地理视野

地理发现，是人们地理认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理视野，是人们对其周围地理环境的认识范围和认识程度。

清朝虽是由兴起于中国东北部边疆地区的落后部族所建立的王朝，但它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却继承了汉唐以至明代的汉族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又经过 200 多年的不断发展，清代人的地理视野，较之以前的中国任何时代，无论在对周围地理环境认识的深度上，还是认识范围的广度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中国地理认识

清朝自 1644 年入关后，经过几十年的征战，到乾隆时期，才最后形成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大国。乾隆时期清朝国内辖地除盛京、吉林、黑龙江 3 将军辖区以外，还包括称为本部的 18 行省 和称为藩部的内蒙古、青海蒙古、喀尔喀蒙古、西藏、新疆等地。清王朝的疆域：北至恰克图，南至海南岛、团沙群岛，西至葱岭（帕米尔），东至外兴安岭、库页岛。清王朝不仅拥有这样广阔的疆域，而且对之实行了有效的统治和管理。建成的是一个国势强大的统一国家，特别是经过康熙、乾隆两次组织的大范围全国地图测绘工作，使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土内的地理状况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就人们的地理认识范围而言，主要表现为，对境内自然地理要素分布规律及边疆地理认识程度的加深两方面。

（一）自然地理要素分布规律

较之前代，清人对境内山脉体系、江源、河源、气候分布规律等，都有新的认识。

1. 地势

关于全国的山脉体系认识，清初可以顾炎武为代表。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地脉》一节中，引用明末王士性《五岳游草》的论述，阐述了当时人们对全国山脉（称“龙”、“龙脉”）大势的认识：

昆仑据地之中，四旁山麓各入大荒外，入中国者一东南支也。其支又于塞外分三支：左支环阴山、贺兰，入山西，起太行数千里，出为医巫闾，渡辽海而止，为北龙。中支循西蕃入趋岷山，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叙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趋关中，脉系大散关，左渭右汉，中出为终南、太华，下泰山，起嵩山，右转荆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泰山入海为中龙。右支出吐蕃之西，下丽江，趋云南，绕沾益、贵竹关岭，而东去沅陵分：其一由武冈出湘江，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洋山过九疑、衡山，出湘江，东

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直隶。

趋匡庐止，又分：其一过庾岭，渡草坪，去黄山、天目、三吴止。过庾岭者又分仙霞关至闽止。分衢为大拌山，右下括苍，左去为天台、四明，渡海止。综为南龙也。

其说认为：中国境内山脉皆源于西部昆仑山。向东有3条主脉，即北干为阴山、贺兰山、太行山，至辽东半岛一带为一列。中干为祁连山、秦岭、嵩山、泰山为一列，另在其南还有一小支脉（当指大巴山至叙州一列）。南干由昆仑经云贵高原北部，至湖南沅陵，又分为3支，北支由武冈至武陵为一列；中支由海洋山、九疑山、衡山，至庐山为一列；南支过大庾岭后又分2小支，北小支向东达于黄山、天目山为一列；南小支由仙霞关至福建，再分2支，至浙江天台山、四明山为一支；至括苍山为另一支（见图5）。

显而易见，这种分脉方法并未摆脱《禹贡》的“三条四列”的影响，也不比宋元明的传统观念有多大改变，特别是除了中干与事实较符外，其它各支存在着极大的错误。但是，作为中国古代对于中国山脉体系的认识，它还是有许多发展之处：一是关于南方，东南丘陵地区的山脉认识有了发展，出现了较多的山名，而且试图归理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比过去的认识要深入。二是对过去认为南龙、中龙源于岷山的观念有了改变，认为中、南两条干支的源脉亦在西部昆仑山，如顾炎武所说：“宋儒乃谓南龙与中龙同出岷山，沿江而分。盖宋画大渡河为守，而弃滇、云，当时士大夫游辙未至，故不知而臆度之也。今金沙江源出吐蕃犁牛河，入滇下川江，则已先于塞外隔断岷山矣，故南龙不起岷山也。”

清初康熙在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地图测量。尤其是乾隆时期对新疆等地的扩测，使当时人们对中国的山川地理大势的认识有了较大进步。其中对中国山脉体系也有了新的认识，如清代后期魏源的《葱岭三干考》云：

葱岭即昆仑，其东出之山分为三大干，以北干为正。北干自天山起祖，自伊犁绕宰桑泊（斋桑泊）之北，而起阿尔泰山，东走杭爱山，起肯特岭，为外兴安岭，包外蒙古各部，绵亘而东，直抵混同入海，其北尽于俄罗斯阿尔泰山为正干。故引度长荒，东趋巴里坤哈密者乃其分支。分支短，尽乎安西州之布隆谷河。中干自于阗南山起祖，经青海，由三危积石，绕套

图5 明末清初所了解的中国山脉大势示意图

外为贺兰山、阴山，历归化城宣府至独石口外之多伦湖而起内兴安岭，至内蒙各部而为辽东之长白山，以尽于朝鲜、日本。复分数支，其在大漠内黄河北者为北支；在黄河南、汉水北者为中支；汉水南江水北者为南支。南干自阿里之冈底斯山起祖，起阿里东为卫藏，入四川、云南，东趋两粤，起五岭，循八闽，以尽于台湾、琉球。

他认为中国境内（包括“外蒙”）的主要山脉体系有3条。其中北干为阿尔泰山、杭爱山、外兴安岭一线。其南天山为北干的分支山脉。中干以昆仑山向东，经积石山、阿尼玛卿山分为3支：北支由此向东北经贺兰山、阴山、兴安岭、长白山；中支为秦岭、伏牛山；南支为大巴山。南干似自冈底斯山、巴颜喀拉山、横断山脉到南岭（见图6）。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

本书中国全图均以现代版地图为准。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四帙。

尽管魏源的论述中，还有许多不全面的地方（如太行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的位置），但基本勾勒出几条主要山脉干线，尤其是去掉了关于东南丘陵作为山脉的体系的观念，扩大了山系范围。

关于国内各区域的地理大势，清初也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论述了全国各省会（政治、经济中心）的形成与周围地理环境的关系。

2. 河流

清代关于全国河流状况的认识，较之以前各代有了很大的进步。由于进行全国地图的测绘，使人们对全国水系河网有了更系统的了解，先后出现了多种全国及区域性水道著作，专记河流源渊、流经情况，如清初黄宗羲的《今水经》，中期齐召南的《水道提纲》、陈登龙（乾隆时人）的《蜀水考》、徐松的《西域水道记》等，尤其是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记述全国河流达 8600 多条，远远超出北魏酈道元《水经注》的 2 倍多，对全国各地的主要河渠基本都有记述。其范围包括：“内有盛京鸭绿江以西而南，而西南至合浦；外自云南而西而北，又自汉北阿尔泰山、肯特山而东至海，又自海而南而西而北。域中万川，纲目毕列。”是中国古人记述河流水系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书。

除了对全国水系网络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外，清代对于河流认识的发展，还突出表现在对黄河源及长江源流的认识上。

关于河源先秦时代就有所谓“河出昆仑”、“潜流积石”，大禹“导河积石”等说法。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武帝据其西域所见所闻，“按图籍”，明确将于阗南山（今昆仑山脉西段）定为“河源之地”，以今塔里木河为黄河上源，运用“潜流”观念，将它与青海的黄河联系起来。东汉以后，随着中原人民与西藏等地交通往来增多，对黄河上源的认识也逐渐丰富起来。唐初，侯君集等率部追击吐谷浑时，就可能到达黄河上游两湖（扎陵湖、鄂陵湖）地区。史称：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侯君集等“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观河源。”此后文成公主入藏，穆宗时刘元鼎赴藏会盟（长庆元年，公元 821 年）等，都曾经过河源地区，并留下了最初的河源水文及地理状况的记录。如《旧唐书·吐蕃传》载：“元鼎往来蕃中，并路经河州……是时元鼎往来，渡黄河上流，在洪济梁（桥）西南二千余里，其水极为浅狭，春可揭涉，秋夏则以船渡，其南三百里有三山，山形如 ，河源其间，水甚清冷，流经诸水，色遂赤，续为诸水所注，渐即黄浊”。但真正第一次踏勘河源的，却要晚至元初的都实，其考察范围已及河源星宿海地区，如《宋史·河渠志》所载：

大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 1290 年，《元史·地理志》作十七年），我世祖皇帝命学士蒲察笃（都）实西穷河源，始得其详，今西蕃朵甘思南鄙（边）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间，有泉近百泓，汇而为海，登高望之，若星

《水道提纲·序言》。

《山海经·西山经》。

《尚书·禹贡》。

《汉书·西域传》

《新唐书·吐谷浑传》

《旧唐书·吐谷浑传》、《新唐书·吐蕃传》等。

宿布列，故名。流出复湑，曰哈刺海，东出曰赤宾河，合忽兰、也里术二河，东北流为九渡河，其水犹清，骑可涉也。贯山中行，出西戎之都会，曰阔即、曰阔提者，合纳怜河，所谓细黄河也；水流已浊，绕昆仑（今阿尼玛卿山）之南……复绕昆仑之北……东北至兰州，始入中国。为“河源之地”，以今塔里木河为黄河上源，运用“潜流”观念，将它与青海的黄河联系起来。东汉以后，随着中原人民与西藏等地交通往来增多，对黄河上源的认识也逐渐丰富起来。唐初，侯君集等率部追击吐谷浑时，就可能到达黄河上游两湖（扎陵湖、鄂陵湖）地区。史称：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侯君集等“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观河源。”此后文成公主入藏，穆宗时刘元鼎赴藏会盟（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等，都曾经过河源地区，并留下了最初的河源水文及地理状况的记录。如《旧唐书·吐蕃传》载：“元鼎往来蕃中，并路经河州……是时元鼎往来，渡黄河上流，在洪济梁（桥）西南二千余里，其水极为浅狭，春可揭涉，秋夏则以船渡，其南三百里有三山，山形如，河源其间，水甚清冷，流经诸水，色遂赤，续为诸水所注，渐即黄浊”。但真正第一次踏勘河源的，却要晚至元初的都实，其考察范围已及河源星宿海地区，如《宋史·河渠志》所载：

大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元史·地理志》作十七年），我世祖皇帝命学士蒲察笃（都）实西穷河源，始得其详，今西蕃朵甘思南鄙（边）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间，有泉近百泓，汇而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复湑，曰哈刺海，东出曰赤宾河，合忽兰、也里术二河，东北流为九渡河，其水犹清，骑可涉也。贯山中行，出西戎之都会，曰阔即、曰阔提者，合纳怜河，所谓细黄河也；水流已浊，绕昆仑（今阿尼玛卿山）之南……复绕昆仑之北……东北至兰州，始入中国。

河源在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胜人迹，逼观弗克……散若列星，故名星宿（火敦脑儿）……群流奔凑，近五七（七当为“十”之误）里，汇二巨泽，名阿刺脑儿（即扎陵、鄂陵二湖）。自西徂东，连属吞噬。广轮马行一日程，迤迤东鹜成川，号赤宾河。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僧宗泐往返西域，途经河源，在其《望河源》诗中自记说：“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所出之水是为河源。”藏语抹必力赤巴山即巴颜喀拉山，这里似已注意到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卡日曲为河源。

以上是清代以前关于黄河源流的认识程度。到清代以后，随着康熙、乾隆两朝地图测绘工作的开展，有关河源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以拉锡、舒兰为首的考察团对河源的考察和乾隆四十七年阿弥达专程考察探寻河源后，对黄河源流便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

拉锡等在考察河源后进呈的《星宿海河源图》中，已发现星宿海以西黄河有3条源流，称“三河往东顺流入于扎陵”。到清中叶齐召南撰写《水道

《汉书·西域传》

《新唐书·吐谷浑传》

《旧唐书·吐谷浑传》、《新唐书·吐蕃传》等。

《汉书·西域传》

《新唐书·吐谷浑传》

提纲》时，便根据测绘的地图等资料，比较正确的记述了黄河星宿海以上的河流情况。他说：

黄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颜喀喇山之东麓，二泉流数里，合而东南，名阿尔坦河，南流折而东，有山水自西南来会（原注：当河源南岸，有古尔板蒙滚拖罗海山，三峰相并，又有拉母拖罗海山，稍崇峻。北岸有噶达素七老峰，高四丈，亭亭独立，石紫赤色，俗传为落星石。西南有阿拉巴尔颜喀喇岭），又东折而北，而东，而东南流，有乌哈峰泉水自西南来会。又东有拉母拖罗海山水自南、有西拉萨山水自北俱来会，又东有七根池水自北来会。又东流数十里，折东北流百里，至鄂敦他拉，即古星宿海，《元史》所谓火敦脑儿也。自河源至此已三百里……阿尔坦河自西南来汇。……东南流注于查灵海，即扎陵湖（原注：泽周三百余里，东西长南北狭，河亘其中而流，土人呼白为查，形长为灵，以其水色白也）。自海东南流出五十里，有一水，会三河，自南来会。又东南折而东北，与东南来之喀拉河并东北为鄂灵海（原注：鄂灵海在查灵海东五十余里，周三百余里，形如瓠瓜，西南广而东北狭。蒙语以青为鄂，言水色青也，即《元史》所谓汇二巨泽，名阿拉脑儿者）。由海东北流出……

这一段关于黄河上源渊流和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的记述，不仅较过去的认识详细，范围扩大，而且，与现代考察的情况相比也比较准确。但在这里，齐召南是把中间的河流（即今约古宗列）认作黄河正源，而把从西南流来的黄河正源阿尔坦河（即今卡日曲）作为南源（见图7）。这一点，却与现代考察结论不同（以卡日曲为正源）。

然而不久，在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阿弥达考察黄河源之后，便正确指出卡日曲为黄河正源。史称：“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遣大学士阿桂之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据《湟中杂记》载，阿弥达到达河源地区后：

查看鄂敦他拉（星宿海）共有三溪流出。自北面及中间流出者，水系绿色；从西南流出者水系黄色；……西南一山，山间有泉流出，其色黄。询之蒙、蕃等，其水名阿勒坦郭勒，此即河源也。

在纪昀《河源纪略》、吴省兰《河源纪略承修稿》中，都有类似记载。这里的阿勒坦郭勒，即今卡日曲，在名称、水文特征上都相符。蒙语“阿勒坦”为“黄金”意，藏语“卡日”为“铜色”，蒙语“郭勒”、藏语“曲”，皆为“河”意，二者之名都表示该河水文特征为黄色的河流。而事实上，由于卡日曲流经第三纪红色地层，河水常为金黄色，所以，齐召南的阿尔坦，阿弘达的阿勒坦郭勒，都是指今卡日曲。至此，中国古代经过数千年的努力、考察，终于弄清了黄河上源的河流水文特征，并判断出河流的正源为卡日曲，与现代的科学考察结论相符。

但是，此期仍有学者迷信《禹贡》、《山海经》，特别是汉代旧说，相信黄河源出昆仑，潜流青海，复出而为黄河正源的观念，并将昆仑、积石地

《水道提纲》卷五。

黄河源勘察队：“黄河河源查勘报告”（摘要），《新黄河》，1953年1~2合刊。

《水道提纲》卷五。

“查看河源情形篇”，载《玉简斋丛书》本《湟中杂记》。

望进行新的附会解释。特别是乾隆帝也不顾确凿的河源知识，仍要坚持潜流说，认为：“《汉书》河出昆仑之语，考之于今，昆仑在回部中，回部诸水皆东注蒲昌海，即盐泽（今罗布泊）也。盐泽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为大河之水”。即仍相信汉代的于阗南山为昆仑之说。与之相应，巴颜喀拉山的噶达素齐老峰也被人附会为积石山，认为其“即《禹贡》积石。……殆无一不相合者。”乾隆时吴省兰所纂《河源纪略承修稿》中，亦认为“河水发源回部之西陲，始见于喀什塔什吉布察克诸山，即葱岭也……河水又东入罗布淖尔（罗布泊）而伏流……，一千五百里，东南至阿勒坦噶达素齐老，流出为阿勒坦郭勒，是为伏流重出之真源……。”无疑，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在河源认识上，它却代表了当时一种旧的传统认识观。

关于长江源流，《尚书·禹贡》最早有“岷山导江”的说法，此后中国历代一直将长江支流岷江作为长江的正源。直到明代徐霞客（1587~1641）才在一篇《江源考》中指出：“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并指出金沙江发源于黄河上源星宿海南之山（即今巴颜喀拉山）的南麓，说：“发于南者，曰犁牛石，南流经石门关，始东折而入丽江为金沙江，又北曲为叙州大江，与岷山之江合。”但当时这一观点并未为世人所接受。

直到清代，由于有测绘地图出现，看到长江水系实际状况的人不少，于是关于长江源流，除少数人仍遵崇古圣，坚持岷江说以外，大多数人已认为无论从河流长度、还是从水量上，都不该以岷江为源，而应将金沙江作为长江的正源。

如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9年）杨椿看到新测的《皇舆图》后，即指出：江源有三，在番界，黄河西巴颜哈拉岭七七勒哈纳者，番名岷捏撮，岷江之源也。在达赖喇嘛东北乳牛山者，番名鸟捏乌苏，金沙江之源也。在呼胡诺尔哈木界马儿杂儿柰山者，鸭龙江（雅砻江）之源也。据各种资料推算，又指出：

金沙江之源至叙州府（今四川宜宾市）六千九百余里；鸭龙江之源至红卜苴三千四百里，又一千六百里至叙州府；而岷江之源至叙州府只一千六百里耳。由此得出结论：“言江源自当以金沙为主”。

当时人李绂也根据地图等资料指出：“以源之远论，当主金沙江；以源之大论，当主鸭砻江。然不如金沙为确，盖金沙较鸭砻又远千九百里，源远则流无不盛者，若岷江则断断不得指为江源也”。齐召南亦有同样结论，他在《江道编》中指出：“金沙江即古丽水，亦曰绳水，亦曰犁牛河，蕃名木鲁乌苏，……出西藏卫地之巴萨通拉木山（即当拉岭，今唐古拉山）东麓。山形高大，类乳牛，即古犁石山也。”（原注：“西二十五度四分，极三十四度六分，在黄河源之西经一千五百里，……一名布顿楚河，又名巴楚河”）这里的巴楚河，或布顿楚河，即今长江源头布曲。此外，《江道编》还提到

赵荣：“黄河源的认识”，《青年地理学家》，1988年第4期。

《河源纪略》卷五。

于谦：“积石山考”，《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5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查看河源情形篇”，载《玉简斋丛书》本《湟中杂记》。

杨椿：《孟邻堂文钞·江源记》卷十四，《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4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李绂：《穆堂初稿·江源考》卷十九，《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4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江源地区的克托乃乌兰木伦河（即今沱沱河）、喀七乌兰木伦河（即今朵尔曲）和阿克达木曲（即今当曲）。

由此可见，至少到清康熙末期，通过考察实测，当时人们已对以金沙江作为长江正源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以岷江为源的观念。同时，对长江另一条源流雅砻江也有了较多了解；对金沙江上源（通天河以上）地区的基本河系，也有了较系统的了解（见图 8），只是尚未注意到沱沱河才是江源所在（沱沱河为几条河中最长）。

但是，还应注意，由于当时对岷江上源，以及金沙江、雅砻江的确切流经、相互联系，似有不明之处。因此，除了一般已认定金沙江为长江正源的观点外，还有其它一些观点。如全祖望认为，探求江源，“不始于岷山则可，离岷山以求江则不可”，认为长江正源仍为岷江，只是其上源可能更长，而未被发现罢了，如云：“愚最取范石湖（成大）之说，以为大江自西戎以来，自岷山出，举其大略，而不必确求所证于大荒之外。”不过这在当时并不是一种主要观点，只不过是墨守旧经的一种表现而已。

总之，随着清初地图的实测，以及几次专门考察，清代对于河源、江源的认识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地理视野已扩展到真正的河源地区和江源地区，并对各区域的水系特征都有了较清楚的了解，甚至明确指出黄河正源所在，结束了自古以来关于河源的各种臆度猜测论述。

3. 植被分布与气候规律

古代关于植被分布规律，季风、信风等自然地理分布现象，都有一定的认识。较之过去，清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发展，即关于中国第二条植被分界线的明确认识，植物分布垂直带谱，以及台风的深入认识。

关于第二条植被分布界线（南岭）的认识，早在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中已有论述，如其所述：“茺菁，岭峽（南岭）已南俱无之。偶有土人因官携种，就彼种之，出地则变为芥，亦橘种淮北为枳之义也”，即将南岭作为茺菁的种植分界线。此后，也有游人士客注意到南岭南北的植物差异现象，但直到明末清初时，屈大均（1630~1696）才“更明确地提出把南岭大庾岭作为我国植物分布的又一条分界线”。他在《广东新语》卷二十五中说到：

（榕树）性畏寒，逾梅岭则不生。故红梅驿有数榕，为炎寒（炎热，即南亚热带）之界，又封川西三十里分界村，二广同日植一榕，相去三丈许，而东大西小，东荣西瘁，东榕又不落叶。咫尺间，地之冷暖已分如此。自韶州西北行，榕多直出，不甚高，与广州榕婆娑偃蹇者异。

关于植物分布的垂直带谱现象，先秦《管子·地员篇》中就曾描述，此后，各代都有零星记述，清末胡薇元在登峨眉山时，也曾观察记录了峨眉山的植被垂直分布现象，他在《峨眉山行记》中写道：

登解脱坡……踉蹌仰趾，积叶在足，……上白岩，四里逾白龙洞金龙寺，浓翠蔽岭，松杉夹道，……放光崖，……灌木层累，使人不见其险，……五

文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四帙：《水道提纲·江》卷八。

杨椿：《孟邻堂文钞·江源记》卷十四，《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4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一，百川学海本。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181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里上峰顶大乘殿……地高风利，……六里，上罗汉三坡，荒岭曼衍，古木连蜷，……山后荒漠蔓草。

他清楚地记述了峨眉山脚为常绿阔叶林植被（“积叶在足”）；山的上部为针叶林（“松杉夹道”）；再向上则为灌木丛（“灌木层累”）；到山顶就变成了高山草地景观（“荒漠蔓草”）。

关于东南海陆风向的认识和记录，古代认识也比较早。但关于台风与飓风（寒潮或冷锋大风）的差别、特点和发生规律进行比较，并作出科学区别的，却在清代。清康熙时的《台湾府志·风信》第一节中，就谈到台风与飓风的区别及各自出现规律。该书云：

风大而烈者为飓，又甚者为台。飓常骤发，台则有渐。飓或瞬发倏止；台则常连日夜，或数日而止。大约正、二、三、四月发者为飓；五、六、七、八月发者为台。九月则北风初烈，或至连月，俗称九降风，间或有台，则骤于春飓。……四月少飓日，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阳春，天气多晴顺也。最忌六月、九月，以六月多飓，九月多九降也。十月以后，北风常作，然台飓无定期，舟人视风隙以来往。五、六、七、八月应属南风，台将发则北风先至，转而东南，又转而南，又转而西南始止。……五、六、七月间风雨俱至，即俗所谓西北雨、风时雨也。舟人视天边有点黑，则收帆严舵以待之，瞬息之间风雨骤至，随刻即止，若预待稍迟，则收帆不及而或至覆舟焉。

（二）边疆地理认识的发展

清代对于边疆地理认识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有关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事项认识的深入、系统，以及专门或较系统的著作出现。其中关于西北地区的地理认识进步最为显著。

1. 西北地区

清初噶尔丹等在西北地区发动叛乱，康熙帝曾亲率大军3次深入新疆。乾隆时清廷平定叛乱后，又派刘统勋等率测量队进行天山南北地理大测量，令其将沿途山川地名考验纂录，编成《皇舆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等著作。此后为加强对于新疆地区的统治，历代驻疆官员都比较重视当地史地著作的纂修，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为了强化国防，兴起的边疆史地研究，又进一步推动了对西北地区的地理、人文状况的认识，出现了《扈从纪程》（高士奇）、《西域水道记》（徐松）、《新疆识略》（徐松等主撰）、《西域闻见录》（椿园氏）、《西域图志》（祁韵士）、《西域释地》（祁韵士）、《藩部要略》（祁韵士）等大量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清代关于西北边疆地理认识的新进展。

如徐松《西域水道记》以湖泊划分新疆地区水系，全面系统记述了全疆水系情况，并旁及交通、物产、城邑兴废、民族分布等人文地理资料，是中国近代关于新疆水系最全面、翔实的著作。其所涉及范围包括：罗布淖尔（罗布泊）、哈喇淖尔（哈拉湖）、巴尔库勒淖尔（巴里坤湖）、额彬格逊淖尔（玛纳斯湖）、喀喇塔拉额西柯淖尔（艾比湖）、巴勒喀什淖尔（巴尔喀什湖）、赛喇木淖尔（赛里木湖）、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阿拉克图古勒淖尔（阿拉湖）、噶勒扎尔巴什淖尔（布伦托海）、宰桑淖尔（斋桑泊）等11个湖区，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各内陆湖水系状况。

关于新疆周围地区的气候特征，这时也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如肖雄在

《听园西疆杂述诗》卷四《气候》中所述：

新疆气候不齐，哈密犹属东陲。而冬之寒、夏之热皆倍于内地。即如夏日，晴则酷热难禁，若天阴风起，忽如冬令，即值暑天晴日，昼中大热，早晚仍需棉服，即当炎日卓午，城中挥汗不止，出城北行三十里，至黑帐房地方，又寒气逼人，气候大约如此。盖因地高土燥，蒸之以炎日，故热不可挡。……巴里坤在大谷中，为新疆极寒处，冬不待言，即夏日晴明，犹宜春服，若阴霾辄至，飞雪著裘者有之。吐鲁番之热，不但迥异各城，并倍于南省。……伊犁虽在北路之西，而地当岭外，气候较北路和平多矣。常下雨，每当三月，大有春景，至九月犹不甚寒，南八城捷至伊犁，犹近温线，故温和而有雨。哈密捷至乌鲁木齐及塔尔巴哈台，地与温线较远，与冷线较近，故雨泽甚稀，常数年不见。边地多风，常三五日一发，昼夜不止，尘沙入室，出户不能睁眼。戈壁广野中，尤猛烈难行，石子小者能飞，大者能走，沙石怒号，击肉欲破，行人车马遇之，须即停止，苟且遮避，若稍移动，即迷失不复得路矣。

此记载非常形象、生动，这样准确、具体记述该地区的气候特点，是以前著作中所看不到的。

其它如动物的地理分布、植被、冰川、沙漠等方面，都有详细记录和认识。如徐松不仅记述了许多处冰川等现象，而且将木素尔岭上的冰川分为3种，说：“木素尔岭……坚冰结成，层峦叠嶂，高下光莹，冰有三色：一种浅绿；一种白如水晶；一种白如磔”。总之，清代几百年对西北地区的经营、开发，使当时人们对新疆等地区的水文、气候等自然地理以及民族、城市等人文地理现象已有了较全面、系统的认识。

2. 东北地区

清初有许多关内百姓去东北谋生，同时政府又以遣戍罪犯的方式，由内地向东北迁徙了不少官员、文人、民众。这些关内民众不仅以较先进的技术开发了东北地区，促进其经济发展，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东北地区的地理认识。以文字形式流传的重要著作有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杨宾的《柳边纪略》、西清的《黑龙江外纪》和《黑龙江纪略》、马冠群的《吉林地略》、朱一新的《吉林形势》、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和《东三省舆地图说》等，这些著作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东北地理的新认识。

如关于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地区的气候等地理状况，吴振臣在《宁古塔纪略》中写道：

其地苦寒。自春初至三月终，日夜大风如雷鸣电激，尘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有白鹅飞下，便不能复起，不数日即有浓霜。八月中即下大雪，九月中河尽冻，十月地裂盈尺，雪才到地，即成坚冰，虽白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裘，久居则重裘可御寒矣。至三月终，冻始解，草木尚未萌芽。

特别是清末，曹廷杰对东北地区的史地研究，大大丰富和完善了人们的东北地理认识。如他所著《西伯利亚东偏纪要》（1885年）一书（附图8幅），对今俄属黑龙江下游的伯力，以及兴凯湖、海参崴等地区的有关自然、人文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和记述。其内容包括：“凡彼东海滨省所占吉、江二省地界，兵数多寡，地理险要，道路出入，屯站人口总数，土产赋税大概，各

《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

《西域水道记》卷二。

国在彼贸易，各种人数目、风俗及古人用兵存迹，有关今日兵防与夫今日吉、江二省边防，可酌量变通，或证据往事，堪补史书之缺者，皆汇入其中。”他的《东北边防辑要》、《东三省舆地图说》更是在汇集前人认识成果的基础上，加上亲自实际踏勘而写成的重要史地著作，对东北边疆史地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记述、分析。所以，后人认为他的著作“为讲辽东舆地必读之作。”

以清末曹廷杰为标志，清代关于东北地区的地理认识已相当系统、深入，已由过去的零散记述，进入到深入分析、总结阶段。

3. 北方地区

关于北方蒙古地区的地理认识，过去主要是一些旅行见闻的片断记述，到清代则有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或研究记述，所反映的地理认识程度比过去更加系统、深入，其中主要有图理琛的《异域录》、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著作，尤其以图理琛的见闻记录为重要。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 1712 年），康熙帝派遣内阁侍读图理琛等西行，前往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探望中国西北厄鲁特蒙古的土尔扈特部。他们由北京出发，经张家口，过蒙古高原，入俄境，自楚库柏兴（今色楞格斯克）、乌拉柏兴（今乌兰乌德），渡柏海儿湖（贝加尔湖），经厄尔口城（今伊尔库斯克），顺昂噶拉河（安加拉河），转沿鄂布河（鄂毕河）至苏尔呼忒柏兴（苏尔古特），向西至西穆必尔斯科（今乌里扬诺夫斯克），直达土尔扈特首领阿玉奇游牧地方马骛托海（今马纳特）后，溯厄尔齐斯河（额尔齐斯河）等，由原路返回。往返 3 年，行程达三四万里。图理琛的《异域录》记述了这次出使经过及沿途见闻，全书以地理为纲，日月附见，述所见山川、民俗风情、人物土产等。其中除了关于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为中心的见闻记述最为重要外，其它有关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地理认识也较过去详悉。如述乌拉柏兴附近的地理情况时，说该地：

在楚库柏兴之东北，相去二百余里，山高大多林。色楞格河边宽阔之处，间有田亩。色楞格河自西南流过柏兴，相（向）西北而流。乌的河自东南来，于柏兴之西，绕流归入色楞格河。四面皆山，无城垣。此处俄罗斯与蒙古人等二百余户杂处，驻兵二百名，设管辖柏兴头目一员，有天主堂二座，其庐舍生计牧畜，与楚库柏兴同。……又越三宿，于二十一日至柏海儿湖之南岸博索尔斯科地方，沿途皆大山林藪，路旁俱田亩，此间有则阳海及哈拉果尔两村落，皆俄罗斯居住，不甚稠密。

关于柏海儿湖及其周围地理大势，则记述道：

柏海儿湖周围，诸山连绕，四面菁葱，岚氛香霭，林木苍郁，波浪浩瀚，极目无际。……

柏海儿湖南北有百余里不等，东西有千余里，四面皆山，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其巴尔古西穆河自东南流入，从东北流入又有一河，名曰昂噶拉河。……柏海儿湖内产各种鱼及獭。于十二月下旬冰始结实，人方行走，三月尽冰始解。柏海儿湖之西北，流出一河，亦名昂噶拉河（即今安加拉河），向西北流，两岸皆大山林藪，约行五十余里，皆山冈，川谷宽阔。

关于贝加尔湖的记载，早在汉代就有，但像如此详细、准确的认识和记

《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

《西域水道记》卷二。

《异域录》卷下《四库全书》卷五百九十四。

述只有清代才出现。其它相关地区的记述，也都较深入、系统、全面。

张穆（1805~1849）的《蒙古游牧记》（16卷），则在于广泛参阅各种有关蒙古地区的历史、地理记述，对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蒙古各部落的历史、王公系谱事迹，游牧所在，四至，盟旗沿革，各地的山川城堡等，都作了详细记述，是一部清中叶以前有关蒙古（北方）地区史地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因此，《异域录》、《蒙古游牧记》等著作的出现，可以说标志着清代对于北方内、外蒙古地区的地理等状况有了系统、深入的认识。

4. 西南地区

清代在西南地区主要是对西藏地区地理认识的深入。

清初除了委派测绘人员入藏进行地图测量，并将其地理认识成果反映在《皇舆全图》和《乾隆内府舆图》中之外。还有一些旅行人员及驻藏人员写了一些关于西藏地区地理和人文状况的著作，主要有王世浚的《进藏纪程》、黄沛翘的《西藏图考》等。

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王世浚由成都经雅安、打箭炉（今康定）、理塘、巴塘、察木多（今昌都）、洛龙宗（今洛隆）、江达（今工布江达）、得庆（今庆孜），到乌斯藏（今拉萨）。沿途所见的地理景观，人文现象众多。他根据见闻写成《进藏纪程》一书，除了第一次详细记述由川西入藏的路线外，还保留了许多丰富的地理资料，如述打箭炉地区情况：

直抵西炉，则群峰 航，高插云霄，中敞一涧，广阔如平地。……不产五谷，唯青稞与牛羊而已。对乌斯藏的记述：

东临大河，西枕苇荡，前揖峻岭，后倚高山。……地产青稞，其稻米、枣、杏、葡萄、冰糖俱出后藏。造土香，市珍珠、珊瑚、 瑚、密蜡、绿松石、青金石、玛瑙、石膏、石蓝、石黄、赤金、氍毹、毡毯之类。关于巴塘的描述：

地暖无积雪，节气与内地无殊，土产则葡萄、胡桃、栗、谷、蔬菜、牛、羊、鸡、鸭、猓猓孙、艾叶豹、元狐、獭儿之属。这些记述，与过去的记述相比要系统和详细得多。

清中叶姚莹（1785~1853）曾两次出差康藏，著有《康輶纪行》，对康藏地区的地理状况记述颇详，并纠正了一些前人著作中的错误，如他指出了《四川通志》记载察雅诸河的源头和流向之误，认为勒楮河即《今舆图》之勒楚河（即察雅河，又名麦曲），源出察雅东南，在江卡之东北（即在贡觉南境的波多拉则卡），其与察雅西北的昂喇山无涉。《四川通志》以为其源出昂喇山“失之远矣”。再如色楮河应为《今舆图》所记之匝楚河（今扎曲）。其东北一小水（今格曲）发源上纳奇，西南流来会。匝楚河即察木多大河（实应为其东源），南流经察雅之西境会楚楚河、色尔慕楚河、大勒楚河，南过江卡入澜沧江，而察木多在江卡之北上流数百里。因此，他指出《四川通志》所谓“色楮河源出上纳奇，流经江卡等处西南察木多大河”，是把主流与支流、上下游关系都颠倒了。

清末黄沛翘所撰《西藏图考》更是对以前西藏地理状况认识的一个系统总结。黄沛翘久任川藏军职，谙悉边务，他博采历代地志和同时代人有关西藏的各种文字资料，再结合实际考察所得，将有关西藏地区的史地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爬梳，并绘成地图，著成《西藏图考》8卷，记述西藏的山川、城池、风土、物产、艺文等各项内容，其所记次序依次为：西藏地图、西藏

源流、西藏程站、城池、津梁关隘、塘铺、山川、公署、寺庙、古迹、土产、藏事、艺文，附外国。该书所记述的山川和人文等地理状况的详悉，使之成为清代关于西藏地理认识的代表，标志着当时对西藏地区地理认识的最新水平。

5. 东南地区

清代关于东南地区的地理认识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台湾地理情况的深入了解。

对于台湾的地理认识，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记述。但是，第一次全面、系统记述台湾地理情况及人文现象的详细著作，则是清初黄叔璥（1666～1742）的《台海使槎录》。

《台海使槎录》是作者在康熙末年巡视台湾期间，依据亲自考察所作，所以内容丰富，记述详确。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该书为：“于山水风土、民俗物产，言之颇详。而于山川险隘、控制机宜及海道风信，亦皆一一究悉。于形势尤为赅备。虽所记止于一隅，而亘古以来，舆记之所不详者，搜罗编缀，源委灿然。”特别是由于“诸书（过去书籍）记载，或遗或略，或传闻失真”，更显出黄叔璥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可以说，无论该书所记地理内容的详细程度，还是史料价值，它都是清代对台湾地区史地认识的一个新标志。

如关于台湾形势的记述，不仅是现状记述，而且有地理形势的正确分析。其曰：

台湾在福建之东南，地隔重洋，形势延袤。……远望皆大山叠嶂，莫知纪极。府治南北，千有余里，越港即水师安平镇，又有七鲲身，沙浅潮平，可通安平港内，为水师战艘、商民舟楫止宿之地，港名鹿耳门，出入仅容三舟，左右皆沙石浅淤焉。此台湾之门户也，衡渡到澎湖，岛屿错落，有名号者三十六岛。澎湖沟底，皆老古石，参差港泊，有南风北风，二者殊澳，此台湾之外门户也。……澎湖为台湾之门户，鹿耳为台湾之咽喉，大鸡笼（基隆）为北路之险隘，沙马矶为南路之砥柱。关于台湾的气候，述道：

台湾环海孤峙，极东南之奥。气候与漳、泉相似，热多于寒，故花则经年常开，叶则历年不落。春燠独先，夏热倍酷，秋多烈日，冬鲜凄风。四五月之交，梅雨连旬，多雷电，山溪水涨。自秋及春，则有风而无雨，多露少雾……此一郡之大概也，诸罗自半线以南，气候同于府治，半线以北，山愈深，土愈燥，水恶土瘠，烟瘴愈厉，易生疾病，……鸡笼社孤悬海口，地高风烈，冬春之际，时有霜雪，此又一郡之中而南北异宜者矣。

这一段不仅文字生动，而且表明当时对台湾气候状况的较准确了解。其它关于土壤、耕作植物区域的地形分析等内容，也都比较系统，是以前著作中所没有看到的记述。

此外，康熙时靳治扬等的《台湾府志》（10卷）、周元文的《台湾府志》（10卷）、乾隆时刘良璧的《台湾府志》（20卷）、光绪时蒋师辙等的《台湾通志》（40卷）等，都从不同角度详细记述了台湾地区的地理、历史、人文等情况，这些都标志着当时地理认识的扩大和深入。

《四库全书·台海使槎录提要》，文渊阁影印本卷五百九十二。

《四库全书·台海使槎录提要》，文渊阁影印本卷五百九十二。

《四库全书·台海使槎录提要》，文渊阁影印本卷五百九十二。

二、世界地理认识

中国人关于域外地理的认识大致由西汉张骞通西域开始，此后经唐、宋、元、明各代的发展，对世界各地地理状况已有了相当的了解。尤其是13世纪初蒙古西征，远及欧洲、非洲地区，而15世纪初郑和航海活动广及东南海域及非洲东岸，因此，至明代中叶，中国人的地理认识已远及非洲北部、欧洲东部及俄罗斯等地。然而，由于当时美洲尚未发现，而且大洋洲、两极地区亦不见于记载，所以，在明代中叶以前，中国人的世界地理认识范围尚不及世界之半。而且，对于欧洲等边远地区的认识也十分粗浅。如明后期《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所述当时的中国人世界观念：“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十五省，在它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构成的说法。”

然而，随着十五六世纪西方地理大发现的到来，以及明后期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中国人关于世界地理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到清末时，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已遍及世界各主要地区，已对世界地理概况有了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

与过去相比，其地理认识的扩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地球、五带、五大洲

关于人类居住地——地球的形状，中国古代有所谓“天圆地方”“浑天”等说，其基本保持的是一种大地地平观。然而，到明后期利玛窦来华传教时，他所带来的大地球形观念，就开始冲击中国的传统思想。

利玛窦在他的著作中写道：

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并以他的亲身经历证明大地为球形，说：

予自大西浮海入中国，至昼夜平线已见南北二极，皆在平地略无高低，道转而南过大浪山（好望角），已见南极出地三十六度，则大浪山与中国上下相为对待矣，而吾彼时只仰天在上，未视之在下也。故谓地形圆而周围皆生齿者，信然矣。

利玛窦带来的这种地球观作为一种新的地理观念，随着他的各种世界地图迅速在中国传播，并渐得认可。如郭子章在《黔草·山海舆地全图序》中

利玛窦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二卷第六章，中华书局，1983年版。

利玛窦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二卷第六章，中华书局，1983年版。

见《晋书·天文志》。

宋正海：“中国传统地球观是地平大地观”，《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

以下利氏引文，转自〔日〕鮎沢信太郎：《地理学史 研究》，第97~99页，原书房，昭和五十五年。

所说：“利生之《图说》曰：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故有天球、有地球、有经线、有纬线。地之东西南北各一周九万里，地之厚二万八千六百余文（里），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浑沦一球，原无上下，此则中国千古以来未闻之说者。”在介绍了大地球形观念后，利玛窦还向中国介绍了西方关于地球气候差异的五带观念。他说：

以天势分山海，自北而南为五带。一在昼长昼短二圈之间，其地甚热，带近日轮故也。二在北极圈内，三在南极圈内，此二处地居甚冷，带远日轮故也。四在北极昼长二圈之间，五在南极昼短二圈之间，此二地皆谓之正常，不甚冷热，日轮不远不近故也。

关于世界海陆大势，中国古代的认识多在想象之中，如战国邹衍的“大九州”说，《山海经》、《河图括地象》中的“大荒”、“八极”等观念，均与事实不符，而直到利玛窦才第一次全面介绍了当时西方人关于世界海陆大势的最新知识——五大洲的概念。利玛窦在其世界图所附注文中说：

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洲，曰欧罗巴，曰利未亚，曰亚细亚，曰南比亚墨利加，曰墨瓦腊泥加（南极一带）。若欧罗巴者，南至地中海，北至卧兰的亚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若利未亚者，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东至西红海仙劳冷祖岛，西至河摺亚诺沧，即此洲只以圣地之下微路与亚细亚相联，其余皆为四海所围。若亚细亚者，南至苏门答腊、吕宋等岛，北至新会白腊及北海，东至日本岛、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红海、小西洋。若亚墨利加者，全为四海所围，南北以微地相联。若墨瓦腊泥加者，尽在南方，惟见南极出地，而北极恒藏焉，其界未审何如，故未敢订之，惟其北边与大小爪哇及墨瓦泥峡为境也。

在南北亚墨利加及墨瓦腊泥加后，利玛窦还加注说：“自古无人知有此处，惟一百年前欧罗巴人乘船至其海边之地，方知，然其地广阔而人蛮猾，迄今未详审地内各国人俗”。表明对其内地地理状况还不熟悉。在墨瓦腊泥加的想象图上，他注以：“墨瓦腊泥加系佛郎几国人姓名，前六十年，始遇此峡并此地，故欧罗巴人以其姓名，名峡名海名地。”这是指1519年9月出发，1521年到达菲律宾的葡萄牙人麦哲伦。此后，在清初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59~1688年在华）所著《坤舆图说》中，对南北美洲及大洋洲已有了比较准确的介绍。

以上回顾说明，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洋传教士所带来的有关地球、五带、五大洲等地理观念，在明后期已传入中国，一些西方图籍已在部分学者中翻刻、引用、流传。但是，这些全新的地理观念并未为大多数学者所了解或接受，如明万历时，严从简所著《殊域周咨录》，述海外各国事，却仍不知葡萄牙为何国。其云：“别有番国佛郎机（指葡萄牙）者，前代不通中国，或云此喃勃利国之更名也。古有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机国之相对。”到清初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海外诸番》中仍采其说。其它类似例子很多。可见，明末，五洲、地球等观念虽已传入中国，但其影响并不大。

然而到了清代，利玛窦的这些地理观念，以及后来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利类思等的《西方纪要》、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等世界地理著作、地理认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识，已开始广为流传，并被中国社会所接受，成为中国扩大世界地理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在清初所纂修的正史《明史》、《清一统志》等官方著作中，就开始正式采录传教士的地理观点。《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外国传》中，记述意大利时曾说到：“意大利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清一统志》卷五百五十二则记道：“利玛窦有万国全图，其大略言天下有五大洲。”又说：“据利玛窦、南怀仁所记，欧罗巴洲之地共七十余国。”乾隆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道光时魏源的《海国图志》、《海外番夷录》等，都大量引用了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人的著作观点，使地球、五带、五大洲的世界地理观念，在清代真正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通地理观。

乾隆时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蒋友仁还首次详细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学说，在其所著《坤舆图说稿》中说到：“哥白尼论诸曜，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人初闻此论，辍警为异说，盖止恃目证之故。今以理明之：如人自地视太阳、太阴，谓其两径相等，而大不过五六寸；若以法推，则知太阳之径百倍大于地球之径，而太阴之径止为地球径四分之一也。人自地视太阳，似太阳动而地球静。今设地球动太阳静，于推算既觅合而于理亦属无疑，试举二三端以验其理……（下略）。”

（二）世界范围的扩大

关于世界各主要地区的地理认识，特别是对欧洲、美洲、澳洲等地区的新的地理认识，是清代逐渐完成的。明后期虽然已有传教士的地图介绍美洲等地区的情况，但从清初撰写的《明史·外国传》来看，虽记述了9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其涉及的外国，主要是东南亚、南亚、西南亚的沿海国家和地区。除了北方蒙古及中亚等地的记述外，关于西欧、非洲等地的记述，只有佛郎机、和兰（荷兰）、拂林（东罗马，今伊斯坦布尔）和意大利（今意大利），而且了解极其浮浅，所记错误百出，如称“佛郎机，近满刺加（今马六甲）”、和兰“地近佛郎机”。

清代，虽然相当长地实行闭关政策，但与外国联系仍未间断，据《嘉庆重修一统志》有关“朝贡各国”（卷五百五十二~五百六十）所列的国名来看（表15），清代嘉庆年间与外部联系国家和地区，虽未涉及南北美洲和大洋洲，但已比明代有了较大的扩展，就欧洲地区来说，已增加了英国（吉喇）、法国（法兰西）、俄国（俄罗斯）等地。

表 15 清代朝贡各国表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四《天主教》。

《海国图志》卷七十五~七十六《国地总论》。

道光甲辰十年（公元1844年）印，见徐朝俊《高厚蒙求摘略》文。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四《天主教》。

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百五十二~五百六十。

国名	今地	国名	今地
朝鲜	朝鲜	柔佛	马来西亚柔佛
琉球	台湾	彭亨	彭亨
荷兰	荷兰	丁机奴	马来西亚丁加奴
西洋	意大利	喘国	
暹罗	泰国	噠国	
越南	越南	麻六甲	马六甲
俄罗斯	俄罗斯	哑齐	苏门答腊古国
南掌	老挝	南渤利班达亚齐
苏禄	菲律宾宿务岛地区	占城	越南中部
日本	日本	柬埔寨	柬埔寨
吕宋	吕宋岛	榜葛刺	孟加拉
缅甸	缅甸	拂林	东罗马
宋	泰国宋卡	古里	印度卡里卡特
合猫里	爪哇附近	柯枝	印度西柯钦
美洛居	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	锡兰山	斯里兰卡
汶莱	汶莱	西洋锁里	印度科罗曼德海岸
咕喇	英国	噶喇巴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整欠	云南附近	渤泥	加里曼丹岛
葫芦国	缅甸附近	麻叶瓮	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
马辰	加里曼丹岛南端	旧港	苏门答腊巨港
港口	越柬交界河仙	法兰西	法国
广南	越南会安		

经过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和世界的交往日益增多，对世界地理面貌的认识有了飞跃的发展，至清末，已对世界五大洲的各国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岛屿）的记载和认识已较为翔实。

嘉庆末年，谢清高（1765～1821）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一书，是谢清高在外轮上工作14年间周游世界各地的见闻记录。从资料来看，他大致到过南洋群岛、印度沿岸各地、欧洲各国、美洲各国和非洲西海岸。《海录》分上中下3卷，上卷《西南海》介绍了泰国、越南、马来半岛等地区35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情况；中卷《南海》介绍了印度尼西亚、吕宋等33个国家和地区；下卷《西北海》记述了欧洲、美洲、非洲27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情况，共计95个国家与地区。在他的记述中，除了关于英、美、法、葡等国的详细叙述外，还介绍了北纬60度左右爱斯基摩人地区的情况，称那里：“天气凝寒，雪花遍地。船初至海口，有冰块流出，大者寻丈，未敢遽进。鸣大炮，有土人摇小船来引，其船皆刳独木为之，.....其人甚稀，而形似中国，食干鱼。每见太阳在南方，高仅数丈，一二时即落，而未甚昏黑.....。”此书在1845年后，多次被翻刻，影响很大。它表明清人的世界地理视野已大

1842年王蕴香辑印《域外丛书》；1843年郑光祖辑印《舟车所至》；潘仕成辑《海山仙馆丛书》，都收有此书。

为扩展。

再如魏源《海国图志》（100卷本）的卷三~七十，是专述世界地理和各国区域地理的篇章，其中卷三~四为世界和各洲地图，卷五~十记述中印半岛各国，卷十一~十六记南洋群岛各国，卷十七记日本，卷十八记南太平洋各岛，卷十九~三十二记印度和西南亚各国，卷三十三~三十六记非洲，卷三十七~四十九记欧洲各国，卷五十~五十三记英国，卷五十四~五十六记俄国，卷五十七~五十八记北欧各国，卷五十九~六十三记美国和美洲各国，卷六十四~七十记南美各国。

几与魏源同时的徐继畲在厦门时，曾与美国传教士雅俾理接触颇多，并得到最新的世界地图等资料，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著成《瀛环志略》一书，于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刊印出版。这也是一部中国人编写的世界地理著作，共分10卷，约20多万字，全书以地图为纲，文字为辅（说明），全面介绍世界各大洲七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情况。其中卷一~三为地球基础知识和亚洲各国概况，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卷四~七以较大篇幅，重点介绍了英、法、俄、意、荷、比、葡、奥等16个国家的地理情况，卷八介绍非洲各国，卷九~十为美洲各国。所记内容包括各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疆域政区、山脉河流、地形气候、经济物产、民族、风土人情、历史沿革等各方面的情况。

同时，鸦片战争后，中国与外国的接触逐渐频繁，出访、出游不断进行，使许多人在实际考察中进一步扩大了对世界地理认识的视野。如第一批清政府派遣赴泰西“游历”的代表团——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斌椿父子率领的同文馆学生一行5人，就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俄国、普鲁士、比利时等。斌椿事后著有《乘槎笔记》1卷、诗稿《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张德彝著有《舟之海述奇》4卷等。文中对西方所见所闻都有记述、吟咏。同治七年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由美国人蒲安臣率领，由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组成的代表团，曾访问英、美、普、俄等国。其成员之一、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著有《初使泰西记》，记述此团1861~1870年间的出使访问见闻和有关经历。王韬（1828~1890）于1867年出访欧洲法国、英国等地2年多，也著有《漫游随录》记述西方见闻。尤其是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李圭作为中国工商界代表赴美参加世界博览会，来去环行地球一周，归国后写有《环游地球新录》一书，记录了他在美国游览费城、华盛顿、哈特福德、纽约等城市，然后往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继续东行回国的见闻感想。有意思的是，李圭的这次旅游不仅认识了沿途世界各地的情况，而且他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明白了地球的球体形状，在该书“地球图说”中，他说到：“地形如球，环日而行，日不动而地动。——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此说十常八九，圭初亦颇疑之，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使地域或方、日动而地不动，安能自上海东行，行尽仍回上海，水陆共八万二千三百五十一里，不向西行半步欤？……知地形如球，日不动而地动，无或疑矣！”该书曾印3000册，广为流传，宣传了新的地理知识。此外，黎庶昌自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随郭嵩焘出使西欧，作为外交使官在英、法、德、西班牙等国居留5年多，所著《西洋杂志》也包含了丰富的世界地理见闻知识。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上海积山书局刊印、同康庐编纂的《中外地輿图说集成》一书，除卷首详列世界各地、各国地图外，还分130卷汇集

了有关世界各地的游记、地记等资料，尤其是卷一《地理总说》中，分盖地论、地理浅说、地球总论、地球志略、地理说略、地球形势说、地理形势考、五洲方域考、括地略，卷二有国地异名录、五大洲輿地户口、物产表、輿地全览、天下形势考等，总论世界五大洲及地理概况。

总之，在这些不断的考察游行中，逐渐增大了人们的地理视野，丰富了清代关于世界地理面貌的认识。宣统二年（公元 1910 年）湖南学务公所刊印的王先谦《五洲地理志略》，就比较完整的记述了五大洲 215 个国家和地区（见表 16）。

此外，从文字记述上也可看出，清代对世界各地的区域地理认识，已较过去深入、系统。

如关于葡萄牙，明代所了解的情况仅限于其位置的传闻和与明朝的简单交往。仅知：“佛郎机近满刺加。正德中，据满刺加地，逐其主。十三年（公元 1518 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此后是与明朝的几次交往记述。这段记载文字，既没有弄清葡萄牙的正确地理位置（错误地认为地近马六甲地区），也没有涉及该国的任何地理情况。而到清代以后，随着外国地理著作的译介，有关葡萄牙的情况已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如云：

葡萄牙，在欧罗巴西南，纬线自赤道北三十七度起，至四十二度止，经线自中华北京偏西百二十三度起，至百二十六度止，东北界西班牙，西面距大西洋。长一千二百里，阔三百六十里，总计之，十三万里。河皆发源于西班牙，由此入海。湖之大者隆加巴砂。通国分八部，曰额斯德玛多，首都名里斯奔，乃京都也，郊外港通海口，转输极盛；曰卑啦，曰亚寒德入，富庶甲于诸部；曰亚尔加菲、曰斗啰米虐，为西洋黑酒大埔头；曰达啦蒙德；曰亚索喇九岛；曰马德辣岛。

按葡萄牙属地，在印度国者，有二：曰山得那哥；曰的玉城。有海口二：曰大谋尼，曰底汗。在非洲之索发拉境内者，有海口二：曰西拉，曰低低。在非洲之东北境者，有岛一，曰马低拉，周一千里，设总督兼摄。这里不仅准确表述了葡萄牙的地理位置、邻国，以及面积、河流特征、城市经济状况，而且，涉及到海外殖民地的情况，较之过去的记述无疑要清楚，准确得多。

再如，关于意大利，明代尚不知其情况如何，仅知有该国而已。如《明史》所说：“意大利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但到徐继畲时，对该国地形特点等已有了较具体、准确的认识。如萧应椿引《瀛环志略》等资料说：

表 16 《五洲地理志略》所记世界国家和地区

卷一～十三亚洲
日领朝鲜
日本

《明史·外国传》卷三百二十五。

《明史·外国传》卷三百二十五。

《明史·外国传》卷三百二十六。

- 英领缅甸
- 恩丹们群岛
- 尼科巴群岛
- 暹罗
- 英领马来诸国
- 潘劣克
- 沙刺我
- 圣皆乌藏
- 尼格里诸小国
- 彭亨
- 朝霍尔
- 英领海峡属地
- 槟榔屿
- 麻喇甲
- 新加坡
- 英领坎林群岛
- 克力司墨司群岛
- 法领安南国
- 荷领爪哇
- 苏门答腊
- 西里百
- 婆罗洲
- 英领北婆罗洲
- 美领菲律宾群岛
- 英领印度
- 波斯
- 阿富汗伊伦高原
- 英领俾路芝国
- 阿刺伯
- 亚细亚土耳其
- 亚细亚俄罗斯
- 卷十四~十五 澳洲
- 英领非畿群岛
- 汤格群岛
- 尼那富
- 尼华群岛
- 塞佛支群岛
- 哈维群岛

} 远印度半岛

} 马来群岛

} 伊伦高原

沙罗门群岛
三太克拉士群岛
其尔般群岛
安里斯群岛
非尼克斯群岛
犹尼恩群岛
曼尼希基群岛
买诺群岛
牛希伯利群岛
德领毕士马克群岛
马什尔群岛
沙摩亚群岛
喀罗林群岛
马利阿拉群岛
法领牛坎雷多尼亚
犹衣或华丽群岛
霍痕群岛
梭赛依替群岛
巴马多群岛
奥斯脱兰耳群岛
马基塞群岛
克里般敦岛
美领夏威夷
瓜摩岛
土退拉
马奴亚
英领新南韦而司
维多利亚
坤司兰
南澳斯太利亚
西澳斯太利亚
牛畿内亚
新西兰岛
达斯马尼岛
卷十六~十八非洲
埃及
苏丹(英埃)
阿比西尼亚
欧里脱里亚(意)
梭曼利兰
摩洛哥
波雷西骄
阿兰欺里亚
土尼斯

的黎波里
冈比

西欧拉良

金岸

拉高斯

梭科拖

根多

巴奴

奴不

塞内加

畿内亚与富皆太郎

苏丹及替白土等

象牙岸与康

打呵摩

几内亚（葡）

佛狄角群岛

圣道摩与圣泼陵西

覆能多波

恩脑保

高里斯科

三仲恩角

几内亚（法）

力比里亚

坎满伦司

康哥（比）

康哥（法）

韦对

彼日迷

坎耐

恩哥喇

西南非洲

桑给巴

东非洲（英、葡、法）

梭曼利兰

梭科脱刺

马达葛士加岛

哥摩罗群岛

毛里削斯岛

塞舌勒群岛

罗德给岛

采哥群岛

喀格多斯岛

亚密兰群岛

爱耳打巴拉岛
路尼恩岛
圣保尔岛
牛阿摩司段德岛
段贵伦群岛
岌科仑尼
耐脱尔
若庐兰
汤格兰
巴什多兰
彼春那兰
湄推比里兰与曼双那兰
中非洲
脱郎斯窝耳
奥凌资河领地
卷十九~二十三美洲
那佛司科西亚
依德华岛
牛不伦瑞
牛芬兰岛
腊不拉多
贵北
安大利疴
马尼多巴
哥伦比亚
诸属地(坎拿大)
米贵伦与圣庇尔

緬國
牛罕什爾
洼望
麻薩朱色
罗德島
千納底克
牛約克
牛日西
賓西洼尼
特拉華
馬理蘭
哥伦比亚都城 } 美利堅合眾國
勿吉尼
北加羅里那
南加羅里那
喬治亞
佛落里達
西勿吉尼
根特機
倭海阿
音的阿那
伊里內
密執安

韦司康沁
明耐梭塔
罗华
弥梭里
北带科大
南带科大
尼勃拉斯加
干塞司
汀耐西
阿拉巴马
密士失必
鲁西阿那
得撒
亚克拉呵马
阿干萨
土人地
望大那
外痾明
可罗拉多
新墨西哥属地
阿利素那
有大
尼佛大
依大和
华盛顿
痾里刚
加利福尼亚
阿拉斯喀

墨西哥合众国
瓜地马拉
萨马多
関都拉斯
尼加拉瓜
哥斯德里加
関都拉斯（英）

古巴岛

中美洲

般拖连科岛
海地
都民尼加
巴哈马
阿德克司库岛
牙买加岛
坎曼司
里华群岛
文华群岛
剔离尼旦
多巴峨
瓜达鹿比
马的尼
圣古庐斯与圣约翰
维尼若伦群岛与圣马丁等

巴西
瓜阿拉
巴拉圭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
厄瓜多
秘鲁
玻利非亚
智利
亚尔然丁
乌拉圭
覆克兰群岛
南乔治亚岛

} 南美洲

卷二十四 ~ 二十六 欧洲

俄罗斯
土耳其
勃耳格里亚
赛维阿
蒙尼各罗
罗美尼亚
希腊

} 巴尔肯半岛

英吉利
法兰西
安道耳

摩纳哥
瑞西
德意志
意大利
奥大利
匈牙利
光石
荷兰
比利时
庐森不尔尼
瑞典
挪威
丹麦
西班牙
葡萄牙

义大利，东北界奥地利，北界瑞士，西北界佛郎西（法国），其余全土斜伸于地中海，似人股之著展者，分其地为九大国……。纬线自赤道北三十七度起，至四十七度止，经纬自中华北京偏西九十八度起，至百有一度止，长二千五百里，阔大略三百六十里，总海岛而计之，共四十万八千里。河之大者，曰玻亚的、亚尔诺、低伯。通国分十五土，中有六十九部。略言于下……

关于墨西哥的地理认识也已相当准确。王先谦在《五洲地理志略》卷二十二中所述：

墨西哥，北美之西南境也。北界美国荒地，东界得撒，西距大洋海，南界危地马拉，地形浙南渐削，由西北而掉于东南，长约万里，极北广约三千里，极南不过四五百里，烟山自西北来（注：此山在美利坚西界，称落机大山，在墨西哥称烟山，因火烽最多故也，自危地马拉以南，到南美之极南境，皆称安达斯大山，实则一脉相连，长约二万余里），贯国中如脊，火烽甚多，大者有四，烟炎常灼霄汉，地震最烈，陵谷时时易形。北境平漫有草无木，居民牧牛以百万亿计，衣食皆取给于牛。秋高草枯，或投炬旷野中延烧，辄数十百里。南境在山东者多沙碛，山西水土肥沃，百卉繁生。西国果实皆备，河之长者曰巴拉窝，曰哥罗拉多，曰索诺拉，曰萨比那。迤北颇寒，迤南滨海一带炎热异常；内地渐高，热渐减，高至四五百丈则和适如中原。物产无多，惟乌木、红木、牙兰米、香料，而大利则在于银。其山产矿最主，攻矿之厂三千余所，各国行用番银出于墨西哥者，盖三分之二……”

这里不仅准确叙述了墨西哥的地理位置、地形特色、物产、城市等情况，而且此后还讲到该地的历史沿革等情况。

再如图理琛对俄罗斯的地理认识也很具体。当他奉命出使土尔扈特时，康熙帝就在上谕中强调到：“此役，俄罗斯国人民生计、地理形势，亦须留意。”因此他非常注意对沿途地理情况观察记录，在他的《异域录》所附地图上，比较清楚地表示了俄罗斯的方舆形势，包括了俄罗斯的主要河流水系，

萧应椿：《五洲述略》卷二。

萧应椿：《五洲述略》卷二。

自东向西有：昂噶拉河（今安加拉河）、伊聂谢河（叶尼塞河）、鄂布河（鄂毕河）、厄尔齐斯河（额尔齐斯河）、托波儿河（托博尔河）、揭的河（克特河）、土拉河（图腊河）、喀穆河（卡马河）、佛尔格河（伏尔加河）等。

在区域地理观察上，也非常深入仔细，如对安加拉河的地理描述：

昂噶拉河自柏海儿湖流出，向西北，绕过厄尔口城，仍向西北而流，汇于伊聂谢河，归入北海。水清溜（流）急，大于色楞格河。两岸皆山，有高峻峰峦，亦有平坂山岗。多林藪：有杉、松、马尾松、杨、桦、樱、蕁刺玫，岸有丛柳。行千余里，水渐浊，厄尔口河自厄尔口城之处归入。又行一千九百余里，伊里穆河自东北归入。自伊里穆河归入之处以至伊聂谢河，其间之河，俄罗斯又呼为通古斯科河。除厄尔口河、伊里穆河，又有十余小河皆归入昂噶拉河。昂噶拉河内有碑克五处，破落克八处，西费喇九处。河内高峰及临水悬崖，俄罗斯人名之曰碑克。河两边皆峭壁，中有大石，水直陡下流者，俄罗斯人名之曰破落克。水浅有石水紧溜急之处，俄罗斯人名之曰西费喇。五月初四日自厄尔口城乘船起程，沿途河岸之下未消之冰雪尚有二三尺不等，亦有至丈余之处，顺流昼夜行十九日，至伊聂谢柏兴地方。其间水程三千余里，沿途河岸宽阔之处，间有田亩，其山坡少平之处，亦有耕种者，有小柏兴甚稀，俄罗斯与布喇特及索伦人等杂处。

此后，何秋涛著《朔方备乘》时，又依据新资料补正了图理琛在《康熙年间俄罗斯图》记述中的一些错误，使人们对俄罗斯的地理认识更为详确。

总之，清代的地理认识范围，不仅在面上逐渐扩大到世界各地，而且在区域地理的认识深度上，也变得较为系统、深入、准确。

唐锡仁：“图理琛与《异域录》”，《科学史集刊》10辑。

《异域录》卷上。

第七章 地理学理论

清代的地理学理论，主要包括对地理学体系、人地关系，及其它有关地理理论的认识 3 个方面。

一、地理学的体系与理论

(一) “地理”的含义与地理学体系概念

地理学 (Geography)，在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以至于近现代，其基本含义都是指一门学问，一门关于“大地描述”(geo, 大地的; graphy, 描述)的学问。

而在中国古代则不同。“地理”一词最早出现于先秦著作《易·系辞》中，其最初的含义正如曹婉如先生和唐锡仁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最早所谓的“地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而言，更确切地说是指山川、陵陆、水泽等的分布和特点而言。与西方的地理 (Geography) 一词的含义不尽相同。特别是自东汉班固将“地理”作为著作的篇名——《汉书·地理志》，而使之成为一门学问的名词术语后，中国古代关于“地理学”的含义，更有了明显差异。后人对它的解，见仁见智，各不相同。

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特征及其对以后“正史”地理志的影响来看，“地理学(志)”是以记述政区沿革为主，附记山川、物产、风俗等自然地理和人文现象的一种学问。《隋书·经籍志》在记述有关地理类著作时曾说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今任、陆二家所记之内，而又别行者，各录在其书上，自余次之于下，以备地理之记焉。”由此可见，南北朝至隋时，是将地理志、地方志，都称为“地理”书和地理学的内容，并在图书分类上，将之置于史部之内，这种分类法一直沿用到近代。

但是，在宋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艺文志》中，却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即在地理类中，除继续著录有关地志著作外，如贾耽的《三代地理志》、《地理论》、邢禹的《景法朝陵·地理记》、薛常的《地理丛考》等，又在“五行”类中还著录了一些以“地理”命名的堪舆、风水著作，如所谓《大唐地理经》、《五音地理经》等。宋代这类著作大量出现，如《宋史·艺文志》五行类著录的就有《地理三宝经》、《地理正经》、《地理口诀》等 22 种以“地理”命名的堪舆著作。这种情况直至清代依然如此，如在《四库全书》的分类上，史部地理类收入有关地理志、沿革志、方志等地理著作，而在子部五行等类收入堪舆风水等“地理”著作。

唐杜佑曾说：言地理者应包括“辩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比较正确的指出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二重性内容。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具有二重意义：一是作为官方正统的地理学概念。其侧重于疆域、政区的各种地理、人文沿革等事项的记述。其代表著作形式就是所谓正史中的

曹婉如、唐锡仁：“‘地理’一词在中国的最早出现及其含义”，《地理》，1961年第5期。

《通典·州郡·序》。

地理志、一统志、沿革志、地方志等；二是作为民间方术的地理学概念。即所谓堪舆风水学，其侧重于局部地区微观地形、地理情况的研究，带有相当的迷信色彩。

清代，中国地理学这种二重性仍然表现突出。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都著录了大量方志、地志、沿革，以及堪舆等方面的著作，尤其是纪昀在撰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不仅对有关地方志、地理志、沿革志、游记等史部地理类的地理著作进行考证、评价，而且对许多堪舆风水著作，也作有提要，对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做过考证与质疑，其中包括有《天机素书》、《地理玉函纂要》、《九星穴法》、《玉尺经》、《地理大全》、《地理总括》、《堪舆类纂人天共宝》、《山法全书》等堪舆著作。

因此，清代的地理学有其独特的内容体系和范畴，而就清代传统观点来看，地理学仍以官方传统的方志、地理志、沿革志等内容为主。以《古今图书集成》等丛书的著录为例，可以看出当时地理学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体系，主要是对全国各行政区域的沿革现状（职方典），以及全国山川等地理实体、边疆和世界地理（边裔典）的记述。而就其著作形式来看，则如《四库全书》所分，地理学包括以下几方面：总志、都会郡县志、河渠、边防、山川、杂记、游记、外纪，以及包含大量地理内容的相宅墓书等。即地理学可概括为：

- 总志
- 方志
- 河渠水利
- 山川
- 名胜古迹
- 游记
- 边疆域外（边防·外纪）
- 堪舆
- 其它（杂记，包括各地物产、风土等著作类型）

计 9 种著作形式。

如果根据清末民初王重民先生《清代文集篇目索引》中地理类的划分，则地理学包括以下方面：

- 通论
- 总志
- 方志（古地理、地方沿革、民族等）
- 河渠水利
- 山川
- 游记
- 古迹名胜
- 外纪边防

其中，每类都有大量关于各地理要素（都邑、山川湖海等）沿革的“考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一《子部·术数》。

《通典·州郡·序》。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一《子部·术数》。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 1935 年）十一月国立北平图书馆等出版。

释”论著。

根据清代地理著作的实际情况，以及人们对地理学的传统观念分类，笔者认为清代对于地理学体系的概念，从著作形式上可以归纳为：总志（以全国地理情况为记述对象）、方志（包括边疆域外地理著作）、沿革地理著作、山川水利著作、游记、堪輿等著作，即将有关以上各方面的研究、著述都归之于地理学的范畴，使之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的、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学科特征。其中，沿革地理方面内容类乎于近代行政区划地理学；方志类乎区域地理学；方志与游记，又近于人文地理学；而山川水利及堪輿则近于自然地理学。

在各分支学科发展中，清代尤以方志、沿革地理、堪輿等方面比较发达，在论著和理论方面的建树也较多。

（二）沿革地理学理论

沿革地理学在清代得到很大发展，以至于有人将政区沿革作为地理学的主要基本内容。如说：

地理之学，经史钤键，志乘为地理专书，其要尤在郡县沿革。盖秦汉迄今，分并增省，名同实异最为纠纷。戴震尚谓：地志沿革不明，则山川人物无一不误。洵知言也。郑樵讥班氏地理不主山川，而主郡国。谓：九州有时而移，山川千古不易，不知《禹贡》九州大界，可以山川定之，郡县壤地分割，山川在其境者大率卑小无名，本不足以定经界之正，况山则今古而号，川更移徙无常，以云不易，夫岂其然。且班氏自谓推表山川，县邑之下，颇详山水，考古者取以互证，自胜凿空，必谓山川可恃。郡国不可恃者，郑氏之过论也。今作表，以著相承之，绪而博采史志及专家之书于后。

在乾嘉年间沿革地理学得到迅速发展，而且成绩斐然。在一般记述方面，有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胡谓的《禹贡锥指》、清《一统志》等；专题水道著作方面，有黄宗羲的《今水经》、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傅泽洪等的《行水金鉴》和黎世序等的《续行水金鉴》等；在沿革地理表方面，有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杨丕复的《历代輿地沿革表》、段长基的《历代疆域表》、《历代沿革表》等；在历史沿革地图方面，自胡谓《禹贡锥指》中的沿革地理附图，至清末一直皆有制作，其中尤以李兆洛的《历代地理沿革图》、杨守敬的《历代輿地图》等著名。

在沿革地理学理论方面，清代除继承古代传统著作体系方式外，主要表现在：经过清初顾炎武等人的工作，特别是乾嘉考据学方法的借鉴，使沿革地理学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方法。这就是：以比较、分析、归纳的逻辑方法为主，讲求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研究。即以史料、实证为主，结合逻辑分析等科学方法，进行地名、政区沿革、古代地理著作校释等沿革地理研究工作。在研究程序上，如顾炎武所说：考证研究，首先要搜寻有关资料证据，“事无证”，再“求之迹，迹有不明，当度之理。”

在具体研究上，无论是进行考证、注释，还是辑佚，都强调要广泛占据有关考论对象的所有资料。如胡渭在进行《禹贡》研究时，就说自己在资料

方面，“诸家《书》解及《河渠书》、《地理志》、《沟洫志》、《水经注》之外，凡古今载籍之言，无论经史子集，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顾炎武从27岁起即广泛收集二十一史、一统志与各省、府、州、县志书及文集、奏章中的资料，为其《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地理著作准备资料。而顾祖禹也是：“思欲远追《禹贡》、《职方》之纪，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裨官野乘之说，参订百家之志，续昭代之书，垂之后代，俾览者有所考镜。”

其次，进行资料的分析、比较、检验，以确定所论释资料的价值。清代学者大都比较尊崇古代经典文献的资料价值，如顾炎武说：“凡考地理，当以《水经》、《皇览》、《郡国志》等书为据。”其著《山东肇域记》所援引的史料，都以经典著作和“正史”资料为主，很少使用地方资料。据统计，该书引用书籍文献80余种，引文700余条，其中出自《尚书》、《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及先秦诸子者，凡280余条（内《春秋》、《左传》占近200条）；出自《史记》、《汉书》等二十一史者，共300余条（内前四史约200余条）；《水经》、《水经注》80余条；各类典章制度、政书、总志、方志、碑刻、文集、游记60余条。而其中元、明方志资料则不满20条，即使引用方志，也往往证之于正史。

再次，在论证方法上，还依据论据资料的价值，以及对论题的直接或间接等关系，运用本证、旁证、推论等不同手段进行考订或证明。所谓本证，即指校释之书本身不同章节资料的相互说明；旁证则是采用其它著作的资料。如顾炎武在讲到他的治学方法时说：“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恃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偕其韵……。”

又说：“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

然而，在具体对待史料的分析、评判和研究方法运用上，也有不同的观点。如顾祖禹就自称他所撰的《读史方輿纪要》在史料运用上，是“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戴震则在沿革地理研究中强调了水系的作用。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对戴震的研究方法有详细叙述，其云：

国朝之言地理者……而先生乃至其上。盖从来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然则，先生之《水地记》固将合天下之山为一山，合天下之川为一川，而自《尚书》、《周官》、《周礼》、《春秋》之地名，以及我国历代史志建置沿革之纷错，无不以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贴，至迹而不乱。

以上不难看出，清代学者在沿革地理的研究方法、著作等方面，已形成了比较明确的理论观点。

《禹贡锥指·例略》。

《读史方輿纪要·自序》。

《山东肇域记》卷一。

《禹贡锥指·例略》。

萧一山：《清代通史》（一），第95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顾炎武：《音学五书·序》。

《读史方輿纪要·自序》。

（三）方志学理论

方志作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清代得到了巨大发展。无论从志书的编撰数量，还是从方志编纂的理论、方法上，都达到中国古代方志著作鼎盛时期。

关于方志理论的阐述，清初顾炎武、方苞等就有论述，到乾隆大修方志时，有关修志的理论方法更受重视，并逐形成了所谓考据地理派和方志史志派两大学术派别。

1. 清初顾炎武、方苞等修志原则

清初顾炎武在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著作基础上，对方志修纂方法、原则有所论述，他在《营平二州史事序》中曾说到：“昔神庙之初，边陲无事，大帅（指戚继光）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图籍。而福（指福建）之士人郭选卿在戚大将军幕府，网罗天下书志略备；又自行历蓟北诸边营垒；又遣卒至塞外，穷濡源，视旧大宁遗址还报，与书不合，则再复按，必得实乃止，作《燕史》百三十卷。文虽晦涩，而一方之故，颇称明悉。”后人将他的修志要点概括为5点：（1）修志的人要有一定的学识；（2）要网罗天下志书作参考；（3）要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勘对，必修行其实而后止；（4）要有充裕的时间；（5）文字要通俗易懂。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勘对，必修

康熙初年任保和殿大学士的卫国祚，提出了修志的“三长”理论。他在《曲沃县志》序言中说道：

尝闻作史有三长。曰：才、学、识。修志亦有三长。曰：正、虚、公。这里的“正”，是指修志者必须刚正不阿，不曲从权贵；“虚”是指修志者要虚己受人，广泛接受意见；“公”是指修志者要主持公道，不为个人主观意见相左右，客观反映事物真象。

雍正时，方苞在《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中，阐明了修志的许多原则，主要包括：（1）体例必须统一；（2）由博返约，提倡简明扼要；（3）强调资料的可靠性。多原则，主要包括：（1）体例必须

2. 戴震等考据地理派修志理论

在清代文化高压政策下，一批学者深受摧残，使当时文化界只有走向考古探微的历史研究之中，从事与现实相去甚远的词章考据、名物训诂工作，形成所谓考据学派。其中一批学者则侧重于考证地理沿革、名物方位，并进行相关志书评断、撰述的工作，形成所谓考据地理学派。他们对方志修撰有自己的理论和原则，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戴震、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等人。

他们的主要修志理论和方法，就是倚重考据学的“崇古薄今”思想和“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的方法，认为地方志即是地理沿革考证。如戴震所说：“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无论从孙星衍所修《三水县志》（今陕西旬邑县）、《礼泉县志》（今陕西礼泉）、《乾隆直隶州志》（陕西）；洪亮吉修《泾县志》（甘肃）、《淳化县志》（陕西）、《长武县志》（陕西），还是孙、洪合修《澄城县志》（陕西）等，都体现了他们“厚古薄今”、重视旧材料、轻视现代材料

的原则，甚至认为搜集旧有资料，只要进行排比，注明出处，搞成资料汇编就可以。如洪亮吉所说：

方志作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清代得到了巨大发展。无论从志书的编撰数量，还是从方志编纂的理论、方法上，都达到中国古代方志著作鼎盛时期。

关于方志理论的阐述，清初顾炎武、方苞等就有论述，到乾隆大修方志时，有关修志的理论方法更受重视，并逐形成了所谓考据地理派和方志史志派两大学术派别。

1. 清初顾炎武、方苞等修志原则

清初顾炎武在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著作基础上，曾对方志修纂方法、原则有所论述，他在《营平二州史事序》中曾说到：“昔神庙之初，边陲无事，大帅（指戚继光）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图籍。而福（指福建）之士人郭选卿在戚大将军幕府，网罗天下书志略备；又自行历蓟北诸边营垒；又遣卒至塞外，穷濡源，视旧大宁遗址还报，与书不合，则再复按，必得实乃止，作《燕史》百三十卷。文虽晦涩，而一方之故，颇称明悉。”后人将他的修志要点概括为5点：（1）修志的人要有一定的学识；（2）要网罗天下志书作参考；（3）要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勘对，必修行其实而后止；（4）要有充裕的时间；（5）文字要通俗易懂。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勘对，必修

康熙初年任保和殿大学士的卫国祚，提出了修志的“三长”理论。他在《曲沃县志》序言中说道：

尝闻作史有三长。曰：才、学、识。修志亦有三长。曰：正、虚、公。这里的“正”，是指修志者必须刚正不阿，不曲从权贵；“虚”是指修志者要虚己受人，广泛接受意见；“公”是指修志者要主持公道，不为个人主观意见相左右，客观反映事物真象。

雍正时，方苞在《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中，阐明了修志的许多原则，主要包括：（1）体例必须统一；（2）由博返约，提倡简明扼要；（3）强调资料的可靠性。多原则，主要包括：（1）体例必须

2. 戴震等考据地理派修志理论

在清代文化高压政策下，一批学者深受摧残，使当时文化界只有走向考古探微的历史研究之中，从事与现实相去甚远的词章考据、名物训诂工作，形成所谓考据学派。其中一批学者则侧重于考证地理沿革、名物方位，并进行相关志书评断、撰述的工作，形成所谓考据地理学派。他们对方志修撰有自己的理论和原则，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戴震、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等人。

他们的主要修志理论和方法，就是倚重考据学的“崇古薄今”思想和“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的方法，认为地方志即是地理沿革考证。如戴震所说：“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无论从孙星衍所修《三水县志》（今陕西旬邑县）、《礼泉县志》（今陕西礼泉）、《乾隆直隶州志》（陕西）；洪亮吉修《泾县志》（甘肃）、《淳化县志》（陕西）、《长武县志》（陕西），还是孙、洪合修《澄城县

萧一山：《清代通史》（一），第95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朱士嘉：“谈谈清代学者论述修志的问题”，《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5~6合刊。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志》（陕西）等，都体现了他们“厚古薄今”、重视旧材料、轻视现代材料的原则，甚至认为搜集旧有资料，只要进行排比，注明出处，搞成资料汇编就可以。如洪亮吉所说：

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苟简则舆图疆域，容有不详，……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才于异地，移景物于一方，以致讹以传讹，误中复误，……撰方志之法，贵因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又归一是。

所以，洪亮吉所撰《乾隆直隶邠州志》虽记载了邠州（今陕西彬县、旬邑、淳化、永寿县）地区的州县建置、沿革、山川、水利、分署、驿庙、古迹、大事、钱粮、兵驿、人物、风俗等方面的情况，取材也较为广泛，但却重视古代材料，轻视当代材料，尽管考据精详，而对当时的一些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记述极少或脱漏。而他修志所制定的类目，更是以前人的撰著为依据。如其“舆地记”系仿周《舆地图记簿》；“职官表”系仿班固《百官公卿表》等；“会计簿”系仿宋李常《元祐会计录》等；“衙署志”系仿宋无名氏《衙署志》；“先贤传”系仿魏明帝《海内先贤传》等；“列女传”系仿刘向《列女传》等；“金石录”系仿宋赵明诚《金石录》等。

3. 章学诚与方志史志学派

与考据派同时，是以章学诚等为代表的史志学派，他们对方志属性、编撰理论、方法都有系统论述。

首先，章学诚提出了方志是史，是一地区全史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志乃史载”，“方志为国史要删”，“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志乃史体”等。并对戴震“志以考地理”的观点进行了驳辩。他指出：

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他还进一步说明，考沿革要以过去的典籍为基本材料，并认为“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大文献而轻沿革耳”。

其次，在具体进行方志编纂的方法、理论上，提出了所谓“史家法度”及“三书”、“四体”、“五难”、“八忌”、“四要”等观点。

“史家法度”是指修志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求。章学诚认为：“志者，史之一隅，州志，又志之一隅也。获麟而后，迁（司马迁）、固（班固）极著作之能，向（刘向）、歆（刘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

因此指出：“志”既然是“史”，志中文字必关系到史法，所以“全书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而修志和撰史一样，修志人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史家法度”），即所谓“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

朱士嘉：“谈谈清代学者论述修志的问题”，《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5~6合刊。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复崔荆州书》。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书州县请立志科议》。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书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同上。

《章氏遗书·外编·和州志志隅自叙》。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

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

“三书”、“四体”是章学诚所设定的志书门类。他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而“志”为主体，按其记述内容又可分为“四体”，即：“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认为一部志书的体例应分志、掌故、文征3部分。其中“志”下又分纪、谱、考、传4门，分别记述有关庆典、科甲、法制、人物事迹；掌故是有关一方典章制度的原始纪录；文征则是地方文献的汇辑。

“五难”、“八忌”、“四要”是指在修志时，应注意克服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义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五难）；排除“八忌”：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推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达到“四要”，即：要简、要严、要核、要雅。

4. 孙诒让、邹汉勋的修志理论

乾隆年间，方志史志派和考据地理派的争论涉及到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诸多方面，对于方志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清代后期，不少学者融史志派与地理派的优点于一炉，既注意完善方志体例，更重视地理内容的表述。在这方面，孙诒让、邹汉勋是两位重要学者。

孙诒让在《瑞安方志局总例六条》“纂辑例”中指出：“郡县志虽为舆地专家，而其为书，实兼正史表、志、传三者之体，至于综萃文献，则义通乎传记；删辑掌故，则例涉乎政书。”在“测绘例”中，他指出：“凡考证方舆，以图学为最要。近代地志往往疏略不讲，而顾崇饰名胜、侈图八景，轻重倒置，通学所嗤。……此次重修，首宜弥兹缺点。”该志所绘明成化前及泰顺县未分前的全境图、总图、城厢图、55都图、沿海图等，皆“延请精究测算专家周历各乡，将村庄市镇山形水道，一一测明方位斜直，距数远近，计里开方，分别精绘。”在“校勘例”中，他指出：“校勘之学，立于精究苍雅，深通古书义例，然此为校定经史及秦汉书旧籍言耳。若地志，则义兼通俗，不必远征雅故，即有援引书册，亦多出唐宋之后，无衍奥错互之文，不过逐条勘对无脱，即为允愿。然有要义二端，不可不讲者，曰：一字不略过，一字不逢改也”。在“采访例”中，他要求：“地志网罗文献，事赅古今，稽古则专重考证，诹今则尤资采访。此次修志，议区分访、专访二项。如忠义、孝友、义行、列女散处城乡，非一人耳目所能周悉，则由各乡绅耆分任采访，并准其家属及戚友等来局开报，庶几见闻较广，不至湮没遗漏。惟分任采访及来局开报之人，务宜破除情面，秉公查核，不可徇私阿好，略涉夸饰，有乖公论。”这些观点表明他对两派的修志观点进行过批判和总结，既师承了两派的长处，又克服了他们的片面性。

邹汉勋（1805~1853）先后纂修过《贵阳府志》、《兴义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等志书，皆被后人誉为清代名志。他纂修的志书，既注意详今略古，又重视经世致用，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内容列为著述重点。他引用资料时，征引史籍文献甚广，且注重考证，特别是对方志制图理论也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修志十议》。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方志立三书议》。

有阐述。他认为，绘制地图，一要明分率，二要分准望，三要定中宫，四要测日星。明分率就是确定比例尺，分准望就是确定方位，定中宫、测日星即是要实际测量、确定座标。他还设计象形符号改进地物的表示方法。邹汉勋关于方志中必须重视地图制作的理论及制图原则，对提高方志地图的质量，对地图学的发展都颇有贡献。在其它修志理论方面，他还提出：纂修地方志应仿《禹贡》、《汉书·地理志》例，以行省统府州，以府州统州县，以州县统乡，以乡里统村；并应详记四至、八到、山川、津梁、关隘、水利、镇市、寺观；山川要详其源流、脉络、流域。他还认为：应当注意对汉族和少数民族户口、河运、盐政、矿产、物产、赋税等经济情况的记载。关于艺文志的编纂，他主张仿《汉书·艺文志》法，详载郡中著述，录其序跋，略作提要。他对立传的标准，提出：贤达以仕迹为断，文学以著述为断，封赠以诰轴为断，耆宿、行宿、孝友、忠义皆以事实为断。

此外，清初贾汉复、乾隆时谢启昆等，也都对方志的编纂发表了意见。

（四）堪輿学中的地理思想

堪輿学，即风水地理，又称青囊术，是中国古代一种关于居址（墓址）选择以及建筑布局的学问。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清代时，由于皇帝的青睐使之“正规化”，有关著作不仅收入官方的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而且将其广泛用于宫室、皇陵选择布局，以及民间居宅基本建筑上。与之相应，各种堪輿著作也应运而生。如清乾隆时，吴元音在《葬经笺注·凡例》中说：“地理（指堪輿）之说以伪乱真，甚于他书十倍。盖自《青鸟》、《孤首》而后，代有传文。其见于《人文共宝》、《仙婆集》、《天机会元》、《地理统宗》、《地理大全》、《山法全书》、《人子需知》等集者，不下百余种。而别刻传单，为各集之所不载，又不啻千百余家。”

晋代郭璞《葬书》中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故谓之风水”。其准则是：“高山要论风，平洋（平原）须看水。”汉代许慎在注堪輿二字时说：“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清代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又进一步发挥说：“盖堪为高处，輿为下处，天高地下之义也。”比较恰当的表达了堪輿术是追求天地人协调的基本理想。因此，尽管堪輿学中充满了许多迷信色彩，但是由于始终离不开地、水等自然地理要素，所以堪輿学中仍包含有不少地理学的思想和认识，尤其是清代堪輿学中，更是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一些自然地理现象认识、利用的思想。其中主要包括对地形、水、位置、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的认识和利用原则。

1. 地形的观察与分类

堪輿学的基本理论原则是“气”——乘气、聚气、顺气等。清张凤藻明确说到：“凡看地……总以气为主”。而“凡地气，从下荫人，力深而缓，天气煦育人身，力浮而速。故阳宅下乘地之吉气，尤欲上乘天之旺气也。”

“气”是中国古代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从云气、水气、烟气，

翟忠义：《中国地理学家》，第39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淮南子·天文训》。

张凤藻：《穿透真传·厄言》，清光绪五十七年刻本。

高见南：《相宅经纂》卷四，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刻本。

以及人的呼吸之气概括而来，是一种玄而又玄的哲学观念。但在实际作用上，它与生命具有很大关系。如：人身内之气保持生机和力量；大地之气则维持万物的生长和代谢。在堪舆学中，于是引申出“地气”、“阳气”、“阴气”等观念。

就堪舆中“气”的表现来说，与地形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所谓：“气者，形之微；形者，气之著。气隐而难知，形显而易见。经曰：地有吉气，土随而起，化形之著于外者也。气吉，形必秀润、特达、端庄；气凶，形必粗顽、欹斜、破碎”。即将气与自然环境中地形的好坏联系起来。因此，堪舆学特别重视对地形的观察、分析。在所谓堪舆方法“地理五诀”（龙、穴、砂、水、向）中，其中两项与地形有关，即“龙”（大山势），“砂”（小山形，主山旁小山）。

在堪舆学中，对地形的观察分析称之为“觅龙”（“地脉之行止起伏曰龙”，又谓“龙者何？山之脉也……土乃龙之肉，石乃龙之骨，草乃龙之毛”）。而觅龙，又要“首寻祖宗父母，审气脉，别生气，分阴阳。”这里祖宗指山脉的出处，亦即群山的起源处；父母山指山脉的入首处，山脊的起伏轮廓线为脉的外形，审脉时要先观察山脊是否曲屈起伏，再细察山的分脊，合脊处是否有轮、有晕，并据以判断出山的“形”与“势”来。

“形”、“势”，是堪舆学对地形（山脉）大势的2种大的分类。其差别在于“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居乎粗，形在乎细”。“左右前后兮谓之势，山水应案兮谓之三形”。可见，势指的是远处群峰起伏的宏观大势，形则指近处山的微观形状。

在长期的堪舆实践中，人们根据远处山脉的特点，配合风水思想将山脉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远山（势）主要有九势、五势之分；近处山的具体形状则以比拟法分为所谓五星、九星等形状。

“九势”的名称及形状如下：

- （1）回龙：形势蟠迎，朝宗顾祖，如舐尾之龙，回头之虎，第一龙；
- （2）出洋龙：形势特达，发达蜿蜒，如出林之兽，过海之船；
- （3）降龙：形势耸秀，峭峻高危，如入朝大座，勒马开旗；
- （4）生龙：形势拱辅，支节楞层，如蜈蚣槎爪，玉带瓜藤；
- （5）飞龙：形势翔集，奋迅悠扬，如雁腾鹰举，两翼开张，凤舞鸾翔，双翅拱抱；
- （6）卧龙：形势蹲踞，安稳停蓄，如虎屯象驻，牛眠犀伏；
- （7）隐龙：形势磅礴，脉理淹延，如浮排仙掌，展诰铺毡；
- （8）腾龙：形势高远，险峻特宽，如仰天壶井，盛露金盘；
- （9）领群龙：形势依随，稠众环合，如走麋驱羊，游鱼飞鹄。

“五势”是指：“龙北发，朝南来，为正势；龙西北发作穴，南作朝，为侧势；龙逆水上，朝顺水下，此乃逆势；龙顺水下，朝逆水上，此乃顺势；

《淮南子·天文训》。

张凤藻：《穿透真传·厄言》，清光绪五十七年刻本。

高见南：《相宅经纂》卷四，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刻本。

实指一种地质地理纹样，但堪舆学中使用了球、息等许多古怪术语。

《管氏地理指蒙》，“四势三形第八十五”，《古今图书集成》卷六百六十四。

《管氏地理指蒙》，“九龙三应第九十八”，《古今图书集成》卷六百六十四。

龙身回顾，祖山作朝，此乃回势。”

“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九星”为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它们亦被赋予特定的意义。“五星”代表一定的山形，如金，头圆而足阔；木，头圆而身直；水，头平而生浪，平行则如生蛇过水；火，头尖而足阔；土，头平而体秀（图9）。九星所代表山形如图10。还有三台、华盖、宝盖等山形分类（见图11）。

此外，人们还通过对整个山势形体的总体感觉把握，概括总结出不同山的典型特征及其与人的关系。如所谓：“山厚人肥，山瘦人饥，山清人秀，山浊人迷，山驻人宁，山走人离，山勇人勇，山缩人痴，山顺人孝，山逆人亏”等。

2. 水的重视与利用

在堪舆学中，水是一个被非常重视的要素。堪舆学家认为：“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人身之血以气而行，山水之气以水而运”，水是关系到“气”的一大要素，是财源和吉利的象征，因此，堪舆中对水有不少定义和优劣评价。

如关于“水口”（水流入之处和流出之处），有所谓“源宜朝抱有情，不宜直射关闭，去口宜关闭紧密，最怕直去无收”的论述。关于“水城”（河流形态），指出：“若方圆平直，有澄凝团聚之形，无歪斜倾泄之患，则水法便是七八分好了。”由于水的重要，所以，堪舆家审视风水之地，“凡到一乡之中，先看水城归哪一边。”对于好的水势，则充分利用，对于不好的河流形态，则采取人工措施加以改造，引导利用，其中主要有引沟开圳、挖塘蓄水、开湖、筑堤坝、建桥等措施。

这些措施，其实都是为疏通、调理宅区用水、排水而进行的，具有较强的实际功用和科学道理。如关于挖塘蓄水，认为“塘之蓄水，中以荫地脉，养真气”。同时指出其开挖要得宜，即：

- （1）顺局宽旷，则取塘以凝聚之；
- （2）来水躁急，则取塘以静注之；
- （3）值煞曜之方，有高山逼压，阴煞射来，取塘以纯之。

这里，前二者具有明显的科学道理。如在来水急湍之处挖塘，既缓冲水势，又可以防洪；在宽广空旷之处挖塘蓄水，即可在景观上有所对比，同时亦便于居地洗濯、灌溉、饮用等。

3. 位置的确定

堪舆学家对于宅基（主要指聚落家室）位置确定，基本有两条原则，即

实指一种地质地理纹样，但堪舆学中使用了球、息等许多古怪术语。

《管氏地理指蒙》，“四势三形第八十五”，《古今图书集成》卷六百六十四。

《管氏地理指蒙》，“九龙三应第九十八”，《古今图书集成》卷六百六十四。

姚瞻旗辑：《阴阳二宅全书》。

《地理大全·山法全书》卷首上。

熊超碯：《堪舆泄秘》卷三。

同上。

《地理大全·山法全书》卷首上。

林枚：《阳宅会心集》卷上，《开塘说》。

所谓“枕山、环水、面屏”和“背水、面街、人家”。

如“丹经口诀”所称：“阳宅（好的宅基）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藏积万金，关煞二方无障碍，光明正大旺门庭”。而在平原地区，认为：“山地观脉（山势），脉气重于水；平地观水，水神旺于脉”。“平洋（平原）地阳盛阴衰，只要四面水绕归流一处，以水为龙脉，以水为护卫。”“平洋莫问龙，水绕是真纵（踪）”。这就形成了山地所谓枕山、环水、面屏的选址原则和平原区以水为主的“背水、面街、人家”的选址原则。其实，这种选址原则主要是在尊崇自然地理条件的前提下所确立的，宏观上符合山区、平原的地理大势，微观上也符合对山水等自然条件的利用。如背山面水，不仅有心理上的依托稳固之感，在环境上也利于营建宅基和汲取用水，起到安全防卫作用。

至于大邑都会的选择及其位置的确定，也是在乡村聚落选择原则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后提出的。如所谓：“凡京都府县，其基阔大，其基既阔，宜以河水辨之，河水之弯曲乃龙气聚会也，若隐隐与河水之明堂、朝水、秀峰相对者，大吉之宅也。”清江子《宅谱问答指要》中也说到：“至于督藩大府，京都畿甸，皆平野旷阔，水为缠绕，不见山峰，盖不如此则气象不宽，堂局不展，如头面窄，规模狭，止可作小小县镇，亦不可作大县也。盖龙到大尽处必是被大江大河拦截无处，方得他住。及到此田地，必皆是平田旷野，非常人之所能收拾。望之无限，不见所际，据之无凭，不见所倚，然百十里间，皆是环卫。无一山不顾盼，无一水不萦回，虽别处数百里外山水，莫不来此交会”。这里实际上是论述了大都市的选择原则：一是要注意河流，以保证城市大量用水；二是地区要宽阔，有发展余地，否则难以成为大邑。表现了城市选址的基本科学思想。

4. 植被的重视

堪舆学家对植被（树木等）是非常重视的。他们认为：“村乡之有树木，犹人之有衣服，稀薄则性寒，过厚则苦热。此中道理，阴阳务要冲和。”又指出：“如四应山环局窄，阳气不舒，不可有树以助其阴，即或堂局宽平而局外有低山护卫者，亦不可种树，惟于背后左右之处有疏旷者，则密植以障其空，若上手不是障空，不必种树以闭天门。”

在树种选择上，堪舆学家认为：最好在宅基“东种桃柳（益马），西种槐榆，南种梅枣（益牛），北种柰杏”。又有“中门有槐，富贵三世，百鬼不近”；“宅东有杏凶，宅北有李、宅西有桃皆为淫邪”；“门庭前喜种双枣，四畔有竹木有翠则进财”。这些原则剔除了迷信成分外，也有一定科学道理，既符合树种的生植特性，又满足了改善宅旁小气候的观赏要求。如：

桃树、柳树喜欢温暖和阳光，树冠小，因此，它们宜种于宅基之东，反之不利生长。

姚延奎：《阳宅集成》卷一《基形》。

《宅谱指额》卷一《问阳基作用》。

《地理五诀》卷八。

何晓昕：《风水探源》，第69～74页，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林枚：《阳宅会心集》卷上，《开塘说》。

林枚：《阳宅会心集》卷上《种树说》。

《相宅经纂》卷四，《阳宅宜忌》。

杏树不耐涝，比较耐寒，而一般都是宅东水分较多，宅北较寒冷，所以，杏树宜植宅北。

槐树喜光不耐荫，所以种在宅南比较合适。

李树对水分要求高，只能种在土壤较温润、阳光充足的朝南地带，否则栽到背阴之地，则难以结出好果，故宅北忌李。

榆树速生，树叶繁茂，种于宅后，有利于防风、御寒。

总之，在堪輿学的许多貌似迷信的论述、规定、禁忌中，仔细分析，其中包含了许多人们关于自然地理的初步科学知识。因此，过去的堪輿学中的地理学精华，可以说是中国较接近近代自然地理学的一门学问。

（五）革新地理学思想

在清代传统沿革地理学发展中，清初即出现了革新传统地理学的思想。其中以刘献廷、孙兰等人的见解为代表。

刘献廷首先对中国几千年来旧地理学及其著作体系，提出了不同意见，主张地理学应注意探求自然规律（“天地之故”），他说：

方輿之书所记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慨乎未之有闻也。同时，他还提出革新传统沿革地理著作的办法，主张一开头就把各地自然环境的特点及规律记录下来。他说：

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确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几句，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

孙兰则进一步强调了地理学应探求自然规律，并列举了一系列应研究的问题。他在《柳庭輿地隅说》自叙中讲到：

志也者，志其迹；记者，记其事，说则不然，说其所以然，又说其所当然，说其未有天地

之始与既有天地之后，则所谓輿地之说也。何以为山？何以为川？山何以峙？川何以流？

人何以生？国何以建？山何以分支别派？水何以输泻传流？古今何以变迁为沿革？人物何以治乱成古今？且吾中国土地在大地中止东南一隅，合华裔而统计之才八十一分之一耳。其间或异或同者，不合观之，何以见宇宙之大乎？且夫天度不同，地形亦异，中土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之下，其间寒暑昼夜、性情起居，于习见习闻之常不推。而极之三大殊方之地何以广？未闻未见，常变之不等乎？

遗憾的是，刘献廷、孙兰这种相当进步的地理学思想，在当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此后统治阶级在思想和学术上推行的“禁锢政策”，阻碍了这一思想的发展。然而，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列强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中国许多新的地理学思想也很快被以多种渠道传入的西方地理学思想体系所替代。翻译、编写、学习西方地理学一时成为风尚，以致在改造、更新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方面起到主导作用。

从刊载于 1911 年 7 月出版的《地学杂志》上中国地学会的一则有奖征文启示中，可以看出，清初孙兰等倡导的革新地理学思想，到清末，已在吸收西方近代地理学成就的基础上，逐渐得到确立，出现了近现代科学地理学意义上的研究课题。该征文的 3 类 25 个问题如下：

甲类：

1. 中国地质北多黄土南多赤砂，其构成之原因先后，可历言欤？
2. 日中黑子究为何物？或谓黑子发现时与地面之水旱有关，能详析其理欤？
3. 自汉以来，中国与西域之交通频繁，凡兵威所及，使节所经及商人高僧之行迹，能详其通路，证以今名欤？
4. 中国北方之地河滨海堦何以多斥卤硝碱？今欲化分改良以成沃壤，其道何由？
5. 风暴时雨，古人多托之神话，试缕陈土俗相沿之谣谚，而以学理推论其原因。
6. 黄梅雨之成因，言人人殊，当会萃诸家之说，据学理以折衷之。

乙类：

1. 变更各省域以适于行政区划议。
2. 文明之趋势多自南而北，而中国何以自北而南？其发展之次第能缕述之欤？
3. 今拟遍设气象台测候所，以预防水旱之灾，试就天然之区域以规划之（含满洲、新疆及各藩属）。
4. 就最近界约，牖陈沿边要害，以规战守议。
5. 黄河发源，或谓始于星宿；或谓潜流再发，实始昆仑。能罗列最近探险家之言，据山川之脉络以断之欤？
6. 就传染病之种类，历考其原始发生地，并推阐其发生之原因。

丙类：

1. 自苏伊士河开通，世界之形势一变，迨巴拿马运河告成，世界之形势又将一变，而影响及于中国者尤大，据已往测方来其利害，可得言欤？
2. 蒙古改建行省区划议。
3. 西藏改建行省区划议。
4. 青海改建行省区划议。
5. 导淮入海，应如何立干分支，以规划全局论。
6. 日本人有人文地理学者，相矜以创获，而中国诸子百家每先及之，能博引群籍以条证之欤？
7. 规划征兵区域议（含满洲、新疆及各藩属）。
8. 中国各都市盛衰变迁考（含满洲、新疆及各藩属）。
9. 中国将来之都市变迁说（含满洲、新疆及各藩属）。
10. 中国之动植物有来自别土、历久蕃生若固有者，试历考其种类与源流。
11. 中国商品以丝茶为大宗，试考其发明之原始与历代输出之衰旺。
12. 自近世趋重工商，而都市之人口日增，田野之人口日减，为生活上一大问题，宜如何调剂盈虚，使国计民生两受其利欤？
13. 竹枝词百首并注（不论本外国，凡关于山川景物，及特别之风土民情者，皆可入咏，并详加注解）。

这则启示生动地表明，先进的地理学思想终于冲破了多种阻碍取得了它应有的地位，并日益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

二、人地关系论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中国很早即注意到人地关系问题，早在先秦著作《礼记·王制》篇中就提出了“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而在先秦的《荀子·天论》中，则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地理虚无主义观念。此后，唐代刘禹锡又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人地相关思想。到了清代，关于人地关系理论主要有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天命论等不同观点。

（一）地理环境决定论

清代关于人地关系的环境决定论思想，自清初至清末，许多人都有这一观念，是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观点。

清初，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曾引述明末王士性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他在论述各地文明发达（“龙兴”）程度时说：

独贵竹百粤之山，牵群列队向东而行，粤西水好而无开洋，贵竹山劣而又无闭水，龙行不住，郡邑皆立于山椒水澗，止为南龙过路之场，尚无驻蹕之地。故粤西数千年暗晦，虽与吴越闽广同入中国，不能同耀光明也。

这里虽从堪舆学的角度分析了贵州地区山势顽劣不吉的特征，然后得出因此造成文化不发达的结论。但他是从地理环境因素来谈文化现象的，反映了他的环境决定论思想。

在阐述地理环境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决定作用时，顾炎武也阐述了地理环境在影响文化时会发生条件转化的思想。他曾说到：

今日东南之独盛也，然东南他日盛而久，其末势有不转而云贵、百粤？如树花先开，必于木末，其随盛而花不尽者，又转而老干内，时溢而成萼，薇桂等花皆然。山川气宇与花木异？故中龙先陈，先曲阜，其后转而关中；北龙先涿鹿、先晋阳，而后亦转塞外。今南龙先吴越、闽越，安得他日不转而百粤、鬼方者也。

刘献廷亦认为地理环境对于人的文化修养、习俗等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人的初始学习时甚至会成为决定的因素。他在《广阳杂记》中说道：

大兄云：满洲掳去汉人子女，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直无别。至老年，乡音渐出矣，虽操满语，其音则土，百不遗一云。予谓人至晚年，渐归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能会也。予十九岁去乡井，寓吴下三十年，饮食起居与吴习，亦自忘其为北产矣。丙辰之秋，大病几死，少愈，所患者皆北味，梦寐中所见境界，无非北方幼时熟游之地。以此知汉高之思丰沛，太公之乐新丰，乃人情之至，非诬也。

在这里，他虽在字面上将人们对幼时生活环境（故乡）的思恋归之为“人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形势》。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地脉》。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第3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情”，其实表明的是，故乡环境对人在知识、生理发育成长过程中的深刻影响和塑造作用，以至于人一生都会牢记过去的生活环境（“幼时熟游之地”）。反映了他对地理环境决定作用的认可。在另外一处，刘献廷还讲到自然环境对开拓人的胸怀、陶冶性情的作用，也表明了他的这一决定论思想。他说：

江西风土与江南迥异。……江西皆则森秀竦插，有超然远举之致。吾谓目中所见山水，当以此为第一。他日纵不能卜居，亦当流寓一二载，以洗涤尘秽，开拓其心胸，死亦无恨矣。

魏源对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也有论述。他在分析了新疆、乌梁海地区的山脉大势等地理环境后，指出自清康熙用兵新疆，平定叛乱，据有利地形后，准噶尔部不再反叛南侵，其原因即在于地理形势所致。如云：“自康熙用兵，修攘恢复。增赛音诺颜部，而准夷不敢南牧。盖地利形势然哉。”在论述挑选兵勇训练时，更明确表达了他的环境决定论思想。他说：训练兵勇“以金川屯练为强，尤长于山战”，而其原因在于，这里“地苦寒，所食惟包谷、油麦、青稞、苦荞、牛、羊”，所以“人皆悍鸷贪利”。他还分析了世界文明起源于温带亚洲的事实，指出环境（气候）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得出“地不灵者人不杰，信哉”的结论。

直到清末，张相文也持有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如他在《地文学》一书中，讲到人种的优劣差异时，解释这种差异的形成是由于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他将人类从发型上分为直发、拳发和绒发3种。认为直发种人“思想较高”；拳发种人“思想多高于他种人”；绒发种人“思想低劣，无能光于历史”。并指出：“各种族之盛衰兴展，常视其分布地之气候物产以为进退，因之，生活程度之高低，亦若天实限之，而不能强同者。寒热带之人，为天然力所束缚，或昏怠弛缓，或畏琐困陋，皆不免长为野蛮。亚热带则生物以时，得天颇优，常为开化之行先导。亚寒带则生物鲜少，人尚武健，在中古时常足以胜他族，然发达竞争，要以温带之地为高尚人种之锻炼场，故今富强文明诸国，莫非温带之民族所创建也。”

这是张相文在学习西方地理学观点方法时所引进的决定论观点，在教科书中出现的这种理论，反映了它在当时中国的人地关系诸观点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是当时人地关系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地理思想。

（二）人地相关论

人地相关思想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地理思想，它强调了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

早在清初，顾祖禹就明确阐述过这一思想，并强调了人地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论述战争胜败与地理形势的关系时，他认为：山川形势固然重要，对攻守战取有重要影响。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为因素。他在《读史方輿纪要·总序》中说：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形势》。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地脉》。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第3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海国图志》卷七十四，《国地总论》上。

张相文：《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1908年版。

且夫地利，亦何常有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之丘。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坂，羊肠之径，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无景之溪，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渐东之浚，有时天堑之险不能及也。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乌足与言地利哉！关于陕西关中地理形势的分析更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他说：

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酝成天下之大。……蒲洪、姚萇之时，可以用关中矣，而其人非也；诸葛武侯之才，足以用关中矣，而其时非也；张浚之时，可以用关中，浚之识亦知关中为可用，而其才非也。这里一方面叙述了关中地理形势的重要，一方面又强调这种地理形势要发挥作用时，是与一定的时机、人的行为和才能密切相关。

几乎与顾祖禹同时代的另一位地理学家孙兰，也具有这种人地相关论思想。他是用发展的观点来观察社会事物的变化，以及地理环境作用的变化的。他认为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影响大小、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他指出：“黄帝定诸侯，区为万国；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井田制的废除也是势在必行，所以，他认为：“险厄因乎势变，势去险亦变矣。”在论述各地文化差异的原因时，他指出，文化的差异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地理环境、时代、人的性情习惯等，即所谓：“其所以异者，有天之异，地之异，时与势之异，变与常之异。因之心性情异而事亦异焉。”反映了他的人地关系的辩证观点。

最值得重视的是，清末梁启超在对地理学进行较多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他的地理学思想，代表了清代有关人地相关论思想的最高水平。

梁启超先后写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等文章，阐述了他的地理观。关于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离不开地理环境，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影响到地区文化的形成，但是，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并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

在论述社会发展、文明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时，他指出：“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恃，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恃以成人也。”强调了地理环境对文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分析地理环境对中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影响时，指出：“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但“谓物质的环境万能力”，只“含有一部分真理”。他又说：

孙兰：《柳庭舆地隅说》卷上，光绪乙酉（公元1885年）刊本。

孙兰：《柳庭舆地隅说》卷下。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地理等。

孙兰：《柳庭舆地隅说》卷上，光绪乙酉（公元1885年）刊本。

孙兰：《柳庭舆地隅说》卷下。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地理等。

专从此（地理环境）方面观察，遂可解答一切问题耶？又大不然。使物质上环境果为文化唯一之原动力，则吾侪良可以委心任运，听其自然变化；而在环境状态无大变异之际，其所产获者亦宜一成而不变。然而事实上决不尔。……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能以心力改造环境，而非悉听环境宰制。他还指出：

历史为人类心力所构成，人类惟能常运其心力以征服自然界，是以有历史。若谓地理能支配历史，则五百年前之美洲，地形气候，皆非有以大异于今日，而声明文物，判若天渊，此何以称焉？虽然人类征服自然之力本自有界限，且当文化愈低度时，则其力愈薄弱，故愈

古代，则地理规定历史之程度愈强。在这里，他已科学地阐明了人在人地关系中的主观能动性，并进一步明确指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制御地理环境的能力亦随之加强。他的这一思想，就是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正确的。

此外，在论述地理环境对社会、文化影响时，梁启超还深刻分析了各地环境与文化的关系，认识到不同的地理环境会使不同地区、民族的生产方式各具特色。如他在分析高原、平原、海滨等地区的地理特征和社会文化现象时，指出：高原地区草木茂盛最适于畜牧，牧民逐水草而居，其内部则缺乏统一的内聚联系，所以不能形成国家；而平原地区土地肥沃，利于灌溉，适于农业，人民皆土著，血缘与地域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容易形成巩固的封建统治；滨海居民濒海而居，富于开拓冒险精神，因而濒海国家发展较快。

这些结论也是比较符合古代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的。

总之，以梁启超人地相关论思想为标志，标明清代关于人地关系的科学认识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已比较正确地注意到了人和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中的意义以及相互间的作用。

（三）天命论

清代除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地相关论的思想外，由于受宋明理学的影响，一些哲学家还从唯心主义“天命论”出发，极力维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鼓吹“理在心中”、“理在事先”，把自然界看作是神秘莫测的，甚或是虚无缥缈的。反映在人地关系上，出现了地理虚无主义的天命观思想。

如清代乾隆四十七年（公元 1782 年），黄河在河南省决口，合龙工程久久不成，严重威胁下游各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当时上自乾隆帝，下至众多河工、官吏，都认为不能合龙的原因在于“河神”，是因为没有找到真正的河源，祭祀好河神。于是，遂派遣阿弥达亲赴河源寻找黄河正源，恭祭河神。

但在清代这种天命论人地关系思想并不占主要地位，只是一部分人所持有的观点。

同上。

《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七。

《饮冰室文集》之十。

《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七。

三、其它地理学理论

在清代，除了对有关地理学科和人地关系的讨论外，对地理学的其它问题，诸如自然地理要素成因、区域地理等问题，也都有所论述和探讨。尤其是在当时的许多实践工作中，也反映出当时对一些地理规律的正确认识。

（一）自然地理规律认识

对地形、水、气候、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的分布及其成因认识，自先秦起，就有不少探讨分析、论述。到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传教布道中，也引进介绍了西方对一些自然地理要素成因的观点，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在这方面的地理认识。

如关于云雨成因，南怀仁在《坤舆图说》（卷上）中介绍说：

云乃湿气之密且结者也。地水之气被日爆暖，冲至空际中域一遇本域之寒，即弃所带之热，而反原冷之性。因渐凑密，终结成云。……则或薄而稀，或厚而密者，又由于气之干湿清浊相胜之异势也。薄稀者轻浮易为风所拨散，难以成雨，是为枯瘠无益之云。若厚密者，多含润泽，故易化雨。这里已正确指出了云雨是由水蒸气的蒸发、凝结而形成的。

再如关于山脉的成因，南怀仁指出“乃地震所致。或风力、或水势所成”。等等。

清代，中国人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也继续探讨一些自然地理要素的成因，以及一些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其观点或结论皆较前代有所进步或创新。

如关于水分循环问题，游艺已用类似于热量及热力学原理来阐明这一循环机制。他在《天经或问·地》中说道：

日为火主，照及下土，以吸动地上之热气，热气炎上，而水土之气随之，是水受阳嘘，渐近冷际，则飘扬飞腾，结而成云。……冷湿之气，在云中旋转，相荡相薄，则旋为千百螺髻，势将变化，而万雨生焉。雨既成质，必复于地，譬如蒸水，因热上升，腾腾作气，云之象也。上及于盖，盖是冷际，就化为水，便复下坠。云之行雨，即此类也。他在这里正确地阐述了水分循环机制，以及云雨形成过程。游艺的这一思想，在过去曾有，但他的认识较之以前的任何论述要准确、详细，强调了太阳的蒸发机制。如明代郎瑛所论仅仅为：“气自卑而升上，水出于山，气之化也。水自高而趋下入于大海，水归本也。盖水，气一也。气为水之本，水为气之化，气钟而水息矣，水流而气消矣。”

关于潮汐的发生规律及其原因，中国古代早有观察、论述，并有专门著作。到了清代，人们仍在不断探索各地潮汐的规律。顾炎武就对潮汐的发生和涨潮规律进行过总结。他指出：

潮之迟速大小有常。……潮之极涨在春秋之中，潮之极大在朔望之后，……每月自十三日起汛，潮日壮一日，十七日十八日愈壮，二十日始衰，

南怀仁：《坤舆图说》卷上。

南怀仁：《坤舆图说》卷上。

唐封演：《说潮》载《全唐文》卷四百四十，清俞思谦集历代潮汐说成《海塘录》一书。

至二十六而衰止也。又自二十七日起汛，潮日壮一日，初一初二愈壮，初五日始衰，至十二日而衰止也。一月之间，潮凡再壮再衰，汐亦如此，其期不爽，故谓之潮信。

他比较准确地描述了潮汐现象及其规律。

关于潮汐发生的成因，中国很早已注意到潮汐与月球的关系。如唐封演就指出：“月，阴精也。水，阴气也。潜相感致，体于盈缩也”。首次提出了月亮和海水“潜相感致”（相互作用）而引发潮汐的观点。但此后，中国关于潮汐成因理论的探讨，仍只限于潮汐出现与月球的运动规律的相互关系上，未能进一步解释它们之间的引力机制等问题。直到清代，万有引力定律以及许多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后，人们才开始用科学方法去探讨、认识潮汐发生的原因。其中最著名的是魏源的潮汐成因论。

魏源用万有引力定律从天体运动的角度，分析潮汐的成因，证实了月亮是引起潮汐的主要原因，指出了每天潮汐变化时刻，阐述了地球、月球和太阳三者相对位置的变化，使引潮力增加或减少，从而形成每月两次大小潮的变化。同时，他还指出：“然地球亦非四面全水，故潮之长落，各处亦不能尽同，况且，山、峡、洲、岛阻束水势，所以同时之潮，又有或高或低，或大或小，或长落，或不长落之别焉”。魏源的这一论述，标志着中国古代潮汐成因理论的最高认识水平。

除了一般潮汐规律认识外，清代对中国著名的钱塘江潮的成因也提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钱塘江潮是一处著名自然景观，历来注意的人不少，从地理、水文角度解释其成因的也颇多论述。如汉王充认为主要是喇叭形河口地形的影响所致，晋葛洪则提出了潮汐能量的概念，唐卢肇在继承二人观点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江水的作用，认为大潮是因江水与海水在狭窄河道相遇：“激而为斗”，形成怒潮。此后，燕肃经过调查，发现钱塘江河口存在南北互连的“沙”（拦门沙坎），认为它是暴潮产生的重要原因。此后，各代的论述基本囿于以上各说。直到清代，人们才用综合因素解释钱塘江潮的成因。周春（1728~1815）在他的《海潮说》中指出，钱塘江潮不同于它处的原因是：“他处之潮，海自海而江自江，故其势杂”。而钱塘江潮，“海自东来，经东南大洋，入尖山口而一束，其势远且猛；江自西来，前扬波后重水，出龛赭海门而亦一束，其势隘且急。两潮会于城南，激荡冲突。”这种江潮和海潮共同作用形成暴涨潮的理论，已得到现代暴涨潮理论的证实。表明清中叶人们已能正确解释钱塘江潮的成因。

关于地震的成因，清魏源通过观察、分析，也提出了比从前正确的理论。他通过观察铁末、硫磺、水的化合反应，以及地震后的现象，指出：“地震

翟忠义：《中国地理学家》，第 239~240 页，山东教育出版，1989 年版。

《全唐文》卷四百四十，《说潮》。

《海国图志》卷九十八。

翟忠义：《中国地理学家》，第 239~240 页，山东教育出版，1989 年版。

《全唐文》卷四百四十，《说潮》。

《海国图志》卷九十八。

燕肃：《海潮论》，载姚宽《西溪丛语》卷上。

《海潮辑说》卷上。

毛汉礼：《海洋科学》，第 64 页，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

者，乃地内硫磺、各石之类然（燃）烧也。……总之，地中有温泉及硫磺、各矿，其处则频频遭地震。”尽管此说不尽符合科学道理，但比过去用阴阳二气来解释地震成因则大大前进了一步。同时，魏源还注意到震前的异常现象，以及震中与周边震区的关系等问题。如说：“其（地）体愈刚坚者，其震动愈远。再，地动有因本处而震他处者。有因他处而震动本处者。凡本处之动，上下摇动，其动也大；他处之动，两旁摇晃，其动也小”等。这些分析都具有相当科学道理。

对全国河流水汛特色认识上清代也有进步。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曾说道：“若云大河（黄河）、江（长江）、淮（淮河）及诸小水同时各涨于其他，则必天下同时皆若霖雨。而河源远出绝域，彼中晴雨必无一揆（“一样”）之理。江汉之涨则因雪液，河水莫大于矾水，在春夏之交。汉水盛于夏，江水盛于秋，其他小水多盛于春。此涨彼落，不能九州而同。”这里他从河流补给角度（雪、雨等）分析了河流水汛的成因，及其发生的时间，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在清代自然地理规律认识上，最为突出的当推孙兰关于流水地貌发育的理论——“变盈流谦”说。

孙兰把侵蚀和堆积看作是地貌发育过程中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塑造和改变着地表面貌，并认为：在以流水为中心的地形演变中，有3种演变形式：渐变因素、突变因素和人为因素。他在《柳庭舆地隅说》卷上说：

变盈流谦，其变之说亦有可异者。有因时而变（渐变）、有因人而变（人为因素）、有因变而变（突变）者。因时而变者，如大雨时行，山川洗涤（指散流、暴雨冲刷），洪流下注，山石崩从，久久不穷，则高下易位。因人而变者，如凿山通道，排河入淮，壅水溉田，起险设障，久久相因，地道顿异。因变而变者，如土壅山崩，地震川竭，忽然异形，山川改观，如此之类，亦为变盈流谦。孙兰将流水地形变化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指出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和控制作用。这不仅比中国古代的任何地形发育观点都要全面、系统，而且，相对于19世纪戴维斯（W.M.Davis）的“地理循环论”的封闭系统和单一因素（地壳抬升）应更有积极意义。遗憾的是它还缺乏许多科学的实证内容，尚难以同戴维斯的理论相提并论，不过，无论如何，在戴维斯200年以前的17世纪初，他能就流水地形发育提出这样的理论见解，不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地理学史上，都是极具创新精神的。

此外，在自然地理区域划分上，清代徐松创立了内陆地区以湖泊为中心的自然流域区划原则。他在撰述《西域水道记》时，将新疆地区按湖泊所受水的流域范围划为11个区域，然后依次记述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理状况，以及流域内人文地理事项。全部记述井然有序，这是内陆地区以自然地理（河流）系统为原则的一种比较科学的区划方法。

（二）水利实践中的地理思想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水利事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从来十分重要，尤其是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由于它下游泛滥频仍，给国家安定带来极大威胁。

《海国图志》卷九十八，《地球天文合论》。

王夫之：《船山遗书·书经稗疏·决九川》卷一。

因此，治河兴利成为朝野上下十分关注的事业，历朝历代都设有整治黄河的专职官员，监督黄河水利工作。清代亦设有“河道总督”等高级官职。专门领导治黄工作。

在清代的治黄等水利实践中，既有许多治水的议论，也有付之实践的计
划，其中包含了许多科学的地理思想与理论。

清初治河，主要由靳辅负责，陈潢助理。在治理河道上，他们遵循明代
潘季驯的理论“坚筑堤防”、“束水攻沙”，认识到河流水量与泥沙搬运能
力成正比的这种科学道理。如靳辅所述：

水势分而河流缓，流缓则沙停，沙停则底垫，以致河道日坏而远道因之
日堦。又说：

黄河之水从来裹沙而行，水大则流急而沙随水去；水小则流缓而沙随水
漫。沙随水去，则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归；沙停水漫，则河底日高而旁溢
无所底止。正是由于他们正确把握了这一流体力学原理，因此，在治河方略
中便确立了清代继承明代“束水攻沙”的治河方针。同时，靳辅等也是基于
这一原理，进一步发展了潘季驯的治河理论。

明代潘季驯在治河时，认为河口淤沙无法疏浚，只有任其自然冲刷，可
不必费心于河口治理。但靳辅他们则认为，根据河流搬运的自然规律，“治
水者必先从下流治起，下游疏通，则上游自不饱涨，”并认为：下游“云梯
关（今江苏滨海县东）外为重”，“关外之底既垫，则关内之底必淤。”所
以，他们治河于云梯关外下游地区，“设兵二百四十名，给船十二只，专令
浚堤外到海口一带之淤沙。”这也是他们对自然规律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应用
的表现。

此外，在河道冲沙工程中，为了加速冲刷黄河下游严重淤积，靳辅等还
创立了“川字河”方法，以加大河流冲刷能力。自清江浦以下至河口三百多
里的河道里，“于河身两旁近水之处，离水三丈，下锹掘土，各挑引水河一
道，面阔八丈，底宽二丈，深一丈二尺，以待黄淮下注。”这种方法等于在
同一河床内形成并列的3道河沟（中间为主河），河沟之间为两道沙滩，一
经上游河水冲刷，河床内沙滩（二道）便受河水由上而下的左右侵蚀冲刷，
大大增加了河水的冲刷搬运能力，使河道淤积迅速冲去，恢复宽阔的河道（三
道河沟合而为一）。无疑，这是以水力侵蚀理论为依据制定的治河措施，是
非常明智的。

这些都标志着靳辅等在治黄水利工程中，已比较科学地运用地理理论来
指导社会实践工作的进行。

除了靳辅等“以水攻沙”方略在治水中付诸实践，并取得较大社会效益
外，清代还有不少关于黄河水利的议论，其中也包含了一定的地理思想。

如清康熙时，陈法在《河干问答》中提出了“论二渎（指黄河与淮河）
交流之害。”认为借清刷黄，对黄河无利而有害。他说“因黄（河）性湍急，
故能刷沙，清水合之，其性反缓，其冲沙也无力。”这样，“不惟不能助黄，

《行水金鉴》卷四十七。

《河防一览》卷七。

《行水金鉴》卷四十八。

《行水金鉴》卷四十七。

独山莫氏写本校印（道光本），黔南丛书别集。

反而牵制之。且沙见清水而下沉，是不惟不能刷之，而反停淤之”。因此，“海口之不能日深，未必不受淮之累也。”

明清两代治黄，依据“束水攻沙”的理论，常采用借清助黄以加大水量，提高冲沙能力，一般说来，根据河流挟沙能力与流速高次方成正比的原理，借清助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黄河流量、流速都很大，而淮河助黄水量小时便会产生倒灌现象。再则，当黄河高浓度含沙时，清水加入后是否能促使河道冲刷或淤积，至今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当时陈法已注意到这一问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乾隆时，御史胡定曾奏“河防事宜十条”，其中提出了沟涧筑坝、汰沙澄源的建议。其云：

黄河之沙多出自三门（峡）以上及山西中条山一带破涧中，请令地方官于涧口筑坝堰，水发沙泄涧中，渐为平壤，可种秋麦。这表明他已认识到黄河泥沙主要是由于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所造成的，所以，提出在黄土高原地区的丘陵沟壑区打坝拦泥，淤地种麦的措施。这个建议，与中国目前依据黄河水沙原理，在黄土高原地区采取的沟底打坝的水土保持措施，是完全相同的，但它早在200多年前被认识和提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遗憾的是，胡定的这一重要见解当时并未被注意和采纳，但它仍然反映出那时人们对黄河水性、水沙规律的正确认识水平。

嘉庆时，河督康基田在《河源纪闻》中曾谈到他关于河流的河势常态的正确认识。他说：

河中溜势迁转不一，随水之大小而易其方，不可不权其变，如水小归槽，水大走滩，水之常性也。又说：

水小力聚于上湾，水大力猛，……则其力在下湾。

即正确指出：黄河下游水小时，一般河水归槽，比降变缓，水流随湾而行，冲力在上湾转折处；水大时，比降增大，溜势取直，冲力集中在下湾。

在清代有关黄河水利实践的理论中，魏源关于黄河下游河道的认识值得一提。其中包含了关于黄河下游地理形势、黄河水性等多方面的正确地理观念。关于黄河下游河道流向，他认为黄河北去由大清河入海是一条好的出路。他首先从黄河下游地理形势上分析，说：“地势北岸下而南岸高，河流北趋顺而南趋逆，故挽复道，北难而南易。上游北决，则较下游其挽回尤不易。”“然则河之北决，非就下之性乎？每上游豫省北决，必贯张秋运河，趋大清河入海，非天然河槽乎？”他已认识到，一旦黄河由河南省北决，必然夺大清河入海，而且河决开封以上（封丘），东北流经山东入海为最佳地点。他说：

近日黄河屡决，皆在南岸，诚为无益；即北决，而仅在下湾徐、沛，归德之间亦无益；惟北决于开封以上则大益。何则？河、济，北流也，而泰山之伏脉界其中，故自封丘以东，地势中隆高起，而运河分水龙王庙，遏汶成湖，分流南北以济运，是河本在中干之北，自有天然归海之壑。

所以，他主张对北道大清河等加以整治，使之成为黄河下游备道。他还预见到铜瓦厢改道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由江苏入海）不会维持很久，大改道已成必然趋势。因而，他进一步指出：“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

《续行水金鉴》卷十一。

独山莫氏写本校印（道光本），黔南丛书别集。

复生不能治，断非改道不为功。人力预改之者，上也，否则待天意自改之，虽非下士所敢议，而亦乌忌不议。”他认为，既然旧河道难以维持，不如有计划地进行人工改道为好，否则黄河就要自找出路（泛滥决口改道）。

事实上，在魏源这一论述后不久，咸丰五年（公元 1855 年）黄河即在兰阳铜瓦厢决口改道，果真北行，沿大清河入海。这充分说明魏源分析的准确性。

关于华北平原上的漳河、永定河的治理，魏源通过实际考察，也提出过不少颇有见识的建议。他指出：在华北平原采取当时流行的“筑堤束水法”治河，不是因地制宜，而是“逆水性”。主张“以不筑堤为上策，顺其性作遥堤者次之，强之就高，愈防愈溃，是为无策”。其理由是漳河、永定河两岸，沙土占十之八九，胶泥仅十之一二，若以沙土筑堤，旋成旋溃，即使不溃决，也愈淤愈高，遇盛涨必建瓴而下，“其害十倍”。从区域地理特性来看，魏源的这种论述包含了他对当地地理、水文环境的正确认识，是十分有见地的。

以上引文见《魏源集·筹河篇》。

以上引文见《魏源集·筹河篇》。

第八章 与外国地理思想的交流和比较

一、交流

清代与外国地理思想的交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与所谓西洋近代地理学（欧美等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交流；一是与东洋（日本）近代地理学的交流。

（一）中西地理思想交流

清代与西方地理学的交流非常活跃，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可以分为3个时期，即：明末清初时期、清代中期和清代晚期。

1. 明末清初时期

15世纪末和16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积累资本，积极向海外发展，东方世界成为其重要的目标。明后期，随着葡萄牙、荷兰等殖民势力的东来，西方的文化、宗教等也随之传到东方。

在文化方面，尤以耶稣会传教士对西方文化的宣传最为重要。除宗教宣传外，他们还传播了许多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方面，新建的清政府对外国文化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对各少数民族、外国技术人员给予了较大的信任，使清初出现了中外文化交流十分活跃的局面。就地理学而言，从明后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到清顺治康熙年间，通过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人的著述，一方面向中国介绍了许多重要的西方地理知识，同时也在他们的地理作品中吸收了中国的许多地理认识成果，形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的交流时期。

这一时期从西方传入的地理作品主要有：利玛窦的多种世界地图（包括文字说明）、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西方要纪》（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合著）、《坤舆外纪》等。这些地理著作，首先向中国宣传了西方地理学的大地球形说、五大洲分区、各地地理人文特点、经纬度制图等思想、方法，给中国人的传统地理观念以较大冲击。

如在利玛窦的各种地图中（《山海舆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等），都有以地球南北极为中心的半球图、椭圆形世界图、日月蚀图，以及相应的文字说明。南怀仁的《坤舆图说》也包括有“地体之圖”、“地圖”、“地震”、“海水之动”、“气功”、“风”、五大洲各国地理、人文状况等内容。这些地理知识基本都是16世纪的西方地理观念。它们通过传教士的著述、宣传，很快对中国文化界产生了影响，日益被中国著作所引用。如利玛窦的地图在30年间多次被刊刻，广泛流传，几遍中国。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5年）郭子章不仅刊刻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还撰写《山海舆地全图》序文一篇，介绍西方地理知识（后载入《黔草》一书）。此后，王圻著《三才图会》，亦将吴中明刊印的利玛窦世界地图、图中注文等一并采入。再后，章璜著《图书编》也采用新的地图，还将各项相关注文汇集成《地球图说》一文。万历末年，程百二著《方輿胜略》（18卷），在《外夷》卷中也附有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以及冯应京、吴中明《山海舆地全图》两序、《山海舆地全图解》、《答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山海舆地全图各国经纬度分略》、徐光启《地圆说》等内容。再后，崇祯时潘光祖的《舆图

备考》，都采纳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作为附图（《缠度图》）。清初游子六编的《天经或问》，在其征引书目中已列有利玛窦等传教士的著作名称，论说中也引用不少传教士的观点、说法。而且，该书《序图》卷记入《大地圆球诸国全图》，也显然是吸收了西方大地球形等地理观念。康熙三年（公元 1664 年）刊行的方密之的《物理小识》（12 卷），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其中大量引用了《职方外纪》的许多内容和利玛窦世界图说的资料。尤其是，到了这一时期的最后（康熙时代），天文、地理等先进的西方科学理论的影响愈来愈大，以致清朝政府决定采取西洋大地测量、经纬度制图等地理方法，开展大范围的全国地图测量，并编制出中国最早的全国经纬度实测地图《皇輿全览图》。在地理研究方法、著作体例上，孙兰提出地理学应究“天地之故”；刘献廷不仅提出地理学应究“天地之故”，而且在地理著作体系上，还应有所改变等。这些都标志着以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传播媒体的西方地理思想、观念，已由最初在中国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进而扩大成一种较为普遍的地理新认识。

其次，在这一时期，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迎合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心态，不仅在著作体系方法上参考中文，模仿当时中国（明、清）文人学士的写作方法著作各种地图和书籍，甚至改变西方传统的地图上五洲布局习惯，而将中国改绘在地图中央。同时，在地理内容上也吸收了中国的许多地理认识。

据万历三十年（公元 1602 年）利玛窦北京版《坤輿万国全图》上的有关各国国情注记文字分析，该图就曾“取（中国）通志诸书，重为考订”，即取之于《新五代史》、《隋书》等著作。例如利玛窦在其地图牛蹄突厥地方注说：

[牛蹄突厥]人身牛足。水曰 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彻底，常烧器消冰乃得饮。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二载：

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芦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彻底，常烧器消冰乃得饮。

再如关于袜劫子，利玛窦图在袜劫子国下注说：

其人髦首，披皮为衣，不鞍而善骑射。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其国三面皆室韦。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二载：

东北（牛蹄突厥的东北）至袜劫子，其人髦首，披布为衣，不鞍而骑，大弓长箭尤善射。

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国皆畏之，契丹五骑遇一袜劫子则皆散走。其国三面皆室韦。

而关于日本图上所记的 50 多个国名，则基本上与明胡宗宪（1490？～1565）所著《筹海图编》（13 卷）所载的有关名称、排列顺序等相类。此外，

[日] 鮎沢信太郎：《地理学史 研究》，原书房，昭和五十五年版。

《柳庭輿地隅说·自叙》。

《广阳杂记》卷一。

[日] 鮎沢信太郎：《地理学史 研究》，原书房，昭和五十五年版。

《柳庭輿地隅说·自叙》。

还有不少地方的记述，与中国史书所载基本雷同。

此外，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马尔蒂尼，Martini，1614~1661）曾 2 次来华（1643~1651、1657~1661），著有多种介绍中国历史、地理、语法等方面的著作，其中尤以介绍中国地理的拉丁文著作《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最为重要。该书于 1665 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共有地图 17 幅（其中全国图 1 幅，分省图 15 幅，日本图 1 幅），每幅图都附有文字说明，内容涉及地理位置、建置沿革、山脉河流、气候、土壤、户口、田赋、植物、城镇、民族风情、宗教等。书末还搜集了全国各地的经纬度数据 1754 处。在荷兰出版后，深受西方读者的欢迎，并被译成法、德、荷兰等文字广为流传。这是一部大量参考中国史籍资料，比较准确地介绍中国地理情况的地图集，是 18 世纪前流传在西方的一部重要的中国地理著作。

由此可见，在中西地理学交流中，西方传教士在大力宣传西方地理观念和地理认识的同时，也注意吸收了中国的一些地理认识成果。但就地理学思想交流的主要方向、影响和结果来看，虽然这一时期传教士也向西方不断报告一些中国的地理情况，如利玛窦的《华国奇观》、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等，但其内容大多限于中国的奇闻异事、人文风情及一般地理常识的介绍，而缺乏有关中国地理学的理论、方法的介绍及传播与交流。西方地理学影响中国则不然，它促成了有关投影、经纬度法、地球、五大洲、五带等西方近代科学地理学的知识、理论、方法在中国传播并逐步被中国众多学者所接受。因此，这一时期的交流具有很大局限性，尤其是清初的双向交流中，是以西方地理学成功地冲击、影响中国传统地理学为主导方向的。

2. 清代中期

明后期利玛窦等早期耶稣、基督会传教士来华，为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便于传教布道，在教仪宣传、要求上作了许多迎合中国传统的让步，容让中国传统文化礼俗的存在。到 1633 年西班牙传教士摩拉尔（Morales）来华，即对耶稣会传教士改变教仪的做法提出异议。1643 年他返回欧洲，向罗马教廷陈述了这一问题，遂引起罗马教廷与中国的教仪之争，以至于康熙帝与教皇屡有书信来往，各持己见，由是引起康熙帝对教派、教仪之争的愤慨，以致多次下令驱逐传教士出境。但这时仍对具有技术的传教士采取了保护态度。而到雍正皇帝即位时，即对在华传教士实行了较多的禁教运动，多次颁诏禁止他们的活动，并驱逐出境。如雍正《东华录》载：雍正元年（公元 1723 年）十二月礼部议复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所奏称：“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效力外，余具安插澳门。应如所请，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从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禁教活动。

由此以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对外基本上奉行了闭关锁国政策，禁止外来文化的进入。于是，这一时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包括地理学）上一个沉寂时期。

在地理学交流上，除了乾隆时期仍然依照西洋制图法，在康熙《皇舆全图》基础上调绘、补测完成了新的全国地图《乾隆内府舆图》之外，其他新的西方地理知识传入极少。从清代有关文献中，很难找到有新的西方地理知

高泳源：“卫匡国（马尔蒂尼）的《中国新图志》”，《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 4 期。

高泳源：“卫匡国（马尔蒂尼）的《中国新图志》”，《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 4 期。

识、观点、理论的介绍和引用。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方地理学新观点，不仅没有被重视、继承，反而被传统的中国地理学所淹没，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甚至兴起了沿革地理考据热，再度回复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绝对主导地位。

但在这一时期，中国新测绘完成的全国地图却被传教士带往国外，对西方地理界、文化界产生一定的冲击。据方豪教授调查，今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 42 幅中国地图，即系 18 世纪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J.B.Bourguignon d'Anville），根据传教士费隐所带回去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副本所制，曾先后在巴黎出版两次，在荷兰海牙出版一次。其出版情况如下：

1729 年（雍正七年）出版北直隶、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图

1730 年出版中国全图及高丽图

1731 年出版中国鞑靼分图，即今蒙古、青海、新疆等图，共 12 幅

1732 年出版中国鞑靼总图，附西藏分图 9 幅，及比林旅行图

1733 年出版不丹图

1734 年出版中国鞑靼西藏全图

唐维尔的中国地图有两种，一为大型特制本，地图 50 页，图画 14 页。除 12 页地图外，并有读史参考图、城邑图等，约成书于乾隆初年。另一种为格洛西氏《中国志》（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的附录本，刊印于乾隆末年（五十年，公元 1785 年），共有地图及图画 65 页。此外，在雍正十三年（公元 1735 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也载有唐维尔的中国地图，共 32 页。

这些虽然表明当时中国地理文化与西方的交流，但是，这种交流却仅限于有关中国地理知识的介绍，而不像西方地理学在中国那样，从地理思想、地理方法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3. 清代后期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用炮舰政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渐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境地。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清代后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地理学上，则进入了一个比较活跃的中西文化交流时期。这一时期的地理文化交流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西方地理思想随着列强的侵略政策，以各种方式直接进入中国；一种是面对列强侵略，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积极学习、引进西方科学地理思想，发展、改造中国的古代传统地理学。

西方地理思想的直接进入中国，主要是指当时许多西方地理学家在中国进行的地理考察和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成果给以后的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以深刻影响。如美国地理学家威理士 1903~1904 年在华从事地质地理调查，对华北地文期划分提出了较早的意见，此后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并逐渐建立起中国北方地文期序列。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俄国地理学家奥布鲁契夫关于黄土成因的见解（李氏提出黄土风成或水成；奥氏提出风成说）；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关于塔里木盆地的气候变迁研究；俄国地理学家普尔热瓦斯基、德国李希霍芬、瑞典斯文·赫定等关于罗布泊是否为游移湖的讨论

等，都具有直接宣传西方地理思想、研究方法，启迪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作用，这些问题也都成为日后中国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学者对西方地理学的积极主动引进，主要是指对当时的西方地理著作的翻译，以及新型地理著作的编撰。它们直接向中国社会宣传了西方地理学的观点和理论。

从这一时期的总体特点来看，其主要表现为：西方地理思想从多方面冲击中国的传统地理学的观念和方法；在地理著述上，出现了较多较科学的世界地理著作，但在内容上，主要以向中国介绍西方关于世界地理状况的地理知识为主。如翻译的英国衣丁堡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慕维廉的《地理全志》、崎冀的《（最新）地文图志》、葡萄牙人玛吉士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美国人戴德江的《地理志略》、裨理哲的《地球说略》等著作；中国人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同康庐的《中外地輿图说集成》、萧应椿的《五洲述略》、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沈敦和辑的《法兰西国志略》、《德意国志略》、《英吉利国志略》等都是如此。但也应注意到以张相文的《地文学》为代表，它的结构体系已标志着西方近代自然地理学在中国的确立。

此外，外国考察家、地理学家对中国地质地理的许多研究成果，则被首先带回西方发表（他们的著作，都是以本国文字先在各国内出版），并引起西方地理学界的重视。这一方面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地理状况，另一方面为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课题。如关于罗布泊的问题，首先是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于 1876~1877 年和 1883~1885 年两次到塔里木河下游罗布泊一带考察后提出今台特马湖及其附近小湖是历史上的罗布泊的观点，文章在欧洲发表后引起轰动，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从有关历史资料分析认为罗布泊应是咸水湖，而台特马湖是淡水湖。他对普氏的观点提出了疑问，并撰文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塔里木河经常变动它的流向和位置，它离开了它那旧的蓄水湖而流入目前的这个湖泊。如果是这样，（普氏发现的湖）便是一个比较新的湖。”而普氏遂撰写“关于李希霍芬对‘从固勒扎越过天山到罗布泊’一文所提意见说几句话”进行了辩论。这一讨论引起了西方地理界对罗布泊的考察热，到 19 世纪末，先后有卡莱、达尔格里夫等许多人前往考察。1900 年瑞典斯文·赫定也进行了认真考察，提出了游移湖的看法。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是一个问题的研究，而且是当时中西地理学交流的产物。

就清代中国地理学与西方地理学交流的整个过程来看，基本是以西方地理学对中国传统地理思想的冲击、影响、改变为主，以致于动摇了中国传统地理学体系，属于单向性影响。

（二）中日地理思想交流

日本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长期以来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唐代，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文化、道德、传统上，中国都给予日本以深刻影响，使之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圈中的一员。但是，到明

杨吾扬：《地理学思想简史》，第 124~125 页，高教出版社，1989 年版；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第 250~254 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参见《海山仙馆丛书》及《小方壶斋輿地丛钞》。

清时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逐渐向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地理学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中日地理学的相互关系也有了重大改变。

就其发展过程来看，中日地理学思想交流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明治维新（明治元年，公元 1868 年）前的前期，与明治维新后的后期。

1. 前期

日本明治维新前正值德川幕府时代，其对外实行锁国政策，只允许日本与中国和荷兰进行一定的经济贸易活动。在文化发展上，基本上是在汉唐文化传统影响下的日本文化独立发展阶段，同时仍受明清文化的影响。地理学的发展也是如此。

如当时的日本地理志，其方法深受中国明清地理著作传统的影响。据日本岩根保重研究指出，当时的日本地理志“几乎全学《大明一统志》的形式，记述以疆域、风俗、城邑、山川、道路、土产、神社、佛阁、坟墓、人物等项目为主要内容。不言而喻，连文字也使用的是汉字。”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西方地理著述也很快由中国传向日本，如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艾儒略、南怀仁的有关地理作品，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由中国传到日本。据日本鲇沢信太郎提供的材料分析，在这一时期，最少在以下几种日本著作中可以看到明末清初中国《月令广义》等著作中的地图等地理资料的转载、翻译：

（1）清初（日宽文初，公元 1605 年左右），日本松下见林所著《论奥辩证》卷上就记有“山海舆地全图三才会地理一卷”，并给属于《月令广义》系统的世界地图附以日本的句读标记，全书引用中国《三才图会》的内容很多；

（2）日本宝永三年（公元 1706 年）马场信武所著《初学天文指南钞》卷一有日文的“山海舆地论”和“山海舆地全图”。据分析，这是据中国 1600 年左右刊印的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编译而成。

此外，元禄二年（公元 1689 年）井口常范的《天文图解》、正德三年（公元 1713 年）刊印的寺岛良安的《和汉三才图会》、1709 年版的新井白石的《西洋纪闻》、宽政三年（公元 1791 年）高井晒我的《训蒙天地辩》等等著作，都大量引用了中国的《月令广义》、《三才图会》、《天经或问》等著作的地理资料或地图作品。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翻译西方地理著作和编撰世界地理著作，很快出现了一批翻译地理著作（如《地理全志》等）和新编世界地理著作（如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等），而此时日本仍处于锁国政策下，因此，魏源《海国图志》出版后（百卷本出版于 1852）即迅速传入日本（1854 年被译成日文）；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刊行于 1848 年，1860 年前后即传入日本，1861 年之后曾被多次刻印，在日本广为流传。更有意思的是，19 世纪 50 年代，清政府还将新译（汉译）的《地理全志》作为礼物送给日本（道光二十七年，公元 1847 年），1859 年日本再版。其中不仅介绍了当时的西方地理知识、理论，更重要的是一些西方地理学的汉译术语，亦因此而在日本确立，如地质学及相关的岩石名称等，从而对日本地质地理学发展以很大

〔日〕岩根保重：“德川时代 地志 撰述”，载《地理论丛》第一辑。

〔日〕鲇沢信太郎：《地理学史 研究》，第 377～380 页，原书房，昭和五十五年版。

〔日〕土井正民著，张驰等译：《日本近代地学思想史》，第 45 页，地质出版社，1990 年版。

影响。

总之，19 世纪中叶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国清朝与日本的地理学交流，主要是中国方面的地理思想、知识向日本的传入和影响。

2. 后期

从 1868 年开始日本明治天皇实行了著名的维新运动，取消闭关锁国政策，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吸收各国新科技、新思想的革新活动，尤其是将学习的目标主要转向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通过派遣留学生，聘请外国专家等方式，积极发展日本的资本主义事业。在这一大背景下，这一时期的中日地理学交流活动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中国作为日本的传统源地之一，仍然与日本地理学有着密切联系，对之发生着一定的影响；一是由于日本政府积极吸收西方文化，日本地理学的近代化迅速走到中国的前面，反过来对中国清末地理学发展以相当影响。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中日地理学交流出现了一个以西方地理学为主要内容的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活跃局面。

前者如 19 世纪中叶介绍到日本的中国汉著地理著作《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在日本明治维新后，仍然在日本国内被翻刊流行。同时，这一时期编写的日本全国地理志，虽然吸收了大量西方地理学的内容、体例，但仍保存了中国和日本地理著作的传统特点。如明治三十六年至大正四年（1903~1915）山崎直方、佐藤伝藏编的《大日本地志》（10 卷），是一部以关东地区为中心，记述日本全部领土的地志著作。在著作体例上已与传统的中国地志有所区别。其内容由地文、人文、地方志 3 部分组成。其中地文部分以地质、地体构造、地震、气温、降雨、火山等自然地理内容为主。这显然是受西方近代地理学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其人文部分却仍保持了原来中国传统地志记述的格式，以历史文献为主，涉及到有关各地区战场、行政中心沿革等内容的记述。地方志部分，以街道的记述为主要内容，同时载有名胜古迹等，这些仍属中国传统地理志的著作范畴。明治三十九年（公元 1906 年）日本依田雄甫修《“汉译”世界读史地图》（日本京富山房书局印），所列参考书中也包括了《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以及胡宗宪《筹海图编》等大量中国文献。由此可见，清末这一时期，在日本，尽管西方近代地理学已逐渐确立，但中国传统地理学思想的影响仍在发生作用。

在中国方面也有类似情况。日本明治维新后，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引进、确立非常迅速。到明治二十年（公元 1887 年）左右，日本已开始在大学（理科大学，小藤文次郎；文科大学，坪井九马三）陆续开设新的地理课程，作为专门课程的地理学讲座也于明治四十年在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等正式设立，这一切都标志着日本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已走到中国之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学者编的许多地理著作已经超出中国地理学的水平，因此，当时的日本地理学便自然成为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学习的目标，他们的地理著作、思想，开始被引进到中国，转载、吸收到清末中国学者的地理作品之中。如清末王锡祺所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就收有日本人的地理论文及游记 23 篇。而见于清末王先谦《五洲地理志略》所引用日本地理著作至少有 15 种。其名称如下：

- 矢津昌永：《高等地理》
- 野口保兴：《中外大地志》
- 伊东祐毅：《万国年鉴》
- 坂本健一：《地名人辞典》

樋田保熙：《世界地理》，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中文刊印

周起凤译：《万国地理志》，光绪二十八年中文刊印

吴启孙译：《世界地理学》，光绪二十八年中文刊印

出洋学生编：《万国地理志》，光绪二十八年中文刊印

辻武雄：《五大洲志》，光绪二十八年中文刊印

吉田晋：《世界大地图》，光绪三十一年刊印

岸田吟香：《万国舆地分图》

依田雄甫：《万国形势指掌图》，光绪三十年刊印

掘田璋左右：《外国地理讲义》，光绪三十三年刊印

下村修介等：《西比利亚大地志》

冈本监辅：《墨西哥记》据顾燮光《读书经眼录》载，1901~1904年中国出版日本地理类书34种（不含游记、测绘、博物等），1903年还将日本矢津昌永的《世界地理学》作为教科书。

1903年范迪吉等翻译日本《普通百科全书》其中有关地理方面的著作有：

佐藤伝藏：《日本新地理》、《万国新地理》

田道新之助：《万国地理学新书》

富山房：《地理学新书》、《日本地理问答》、《世界地理问答》

山上万次郎：《日本旅行地理》、《世界旅行地理》

永井惟直：《商工地理学》等

1904年福建留日学生组织“闽学会”，计划出版的《闽学会丛书》，其中也包括有日本岩崎重三著的《新式地文学》、守屋荒美雄（杨允昌译）的《国际地理学》等。

据《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等资料统计，从1883年到1911年中国翻译日本地理著作约59种，其中自然地理学9种，人文地理学10种，地志及其它相关地理著作40种。这些日本地理著作不仅向中国介绍了一般的地理知识，而且在地理思想上给予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以深刻影响。如张相文的《地文学》就是在参考日本有关地文学著作基础上编写而成的，由于他在书中增加《生物界》一节，使之不仅成为中国近代自然地理学著作的先河，而且，就其内容体例而言，以后的自然地理学教材体例仍未脱其窠臼。

综观清代与日本的地理学交流，前期以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为主，呈单向影响型；后期则变为相互影响，而且在交流方式上，既有官方的正规交流，也有民间的广泛交流；在著作方式上，既有翻译作品刊行，也有汉著或日著作品的直接流传。

（三）对西方地理学的评判

从明后期西方地理思想传入中国，至清末西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被接受、认可，清人对西方地理学的态度大致可归纳为3种：全盘否定；一概肯定；取其正确、去其错误的扬弃观点。从其发展过程来看，明末清初，

由会文学社出版。

谭汝谦等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源昌久：“日本地理学书 中国近代地理学”，《地理学评论》67卷3期。

否定派与肯定派并行发展，此后肯定派渐居主导地位；清中叶以来，特别是清末则以扬弃派为主，遂使西方地理学思想、体系渐在中国确立。

1. 否定派

明后期，传教士将西方地理知识和地图介绍到中国时，除少数官员外，并未引起整个社会和统治阶层以及文化界的重视，得到的首先是一片反对、怀疑之声。

清初魏浚在《利说荒唐惑世》一文中，对利玛窦等人所介绍的西方地理思想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承认它的客观性。如云：

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坤輿全图，洸洋寥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鸣銮交趾，所见相远，以至于此，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谈无忌若此，信之者乃谓其国人好远游，斯非远游者耶？谈天衍谓中国居天下八分之一，分为九州，而吾中国为赤县神州，此其诞妄又甚于邹衍矣！至于九天之说，总以星体大小揣臆言其远近，日反在土火之下。杜撰可笑。……全图只因月中魄影，如世所谓婆罗树及玉兔者，昔人以为大地山河之影，因杜撰以欺世人耳，试取图与月影质之即见。

康熙年间的钦天监杨光先对西方的“地圆”说，也痛加驳斥。他说：如果“四大部洲、万国之山河大地，总是一大圆球”，那么，“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即在下面的国土之人“倒悬”在地球上。所以，他认为：“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乎！”原因是“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因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他甚至发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洋人”的呼声，认为西洋传教士的天文、地理知识及宗教等，都是异端邪说，必须严加禁止。

清中期大学者阮元（1764～1849）也对地球说竭力否定，认为这种理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

清《四库全书提要》卷七十一评价《职方外纪》时，对其所记内容也表示怀疑态度。说该书：

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图，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广异闻也。

清《文献通考》也对传教士介绍的五大洲等西方地理学观念持否定态度，并进行了辩驳。其卷一百九十八《四裔考》六《意大利》条下评《职方外纪》时说：

至意大利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第敢以中土为五洲之一，又名之曰亚细亚洲，而据其所称第五洲曰墨瓦蜡泥加洲者，乃以其臣墨瓦兰辗转经年，忽得海峡，亘千余里，因首开此区，故名之曰墨瓦兰泥加洲。夫以千余里之地，名之为一洲，而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洲。以

谭汝谦等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源昌久：“日本地理学书 中国近代地理学”，《地理学评论》67卷3期。

杨光先：《不得已》卷下。

杨光先：《日食天象验》。

《畴人传·蒋友人》。

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矣。又其所自述彼国土物情政教，反有非中华所及者，虽荒远狃獠，水土奇异，人性质朴，似或有之；而即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诞，则诸如此类，亦疑为剿说趸足，故其说之太过者，不俱刊而不纪云。

同卷《考博尔都噶尔亚》（即葡萄牙）条下，又说：

自利玛窦始为全图，流传中国，厥后庞迪我翻刻西洋地图，衍为图说，艾儒略辑为《职方外纪》，其言未免夸张，正庄子所云存而不论者。

清初所纂《明史·外国传》卷二百一十四《意大利亚传》中，也认为利玛窦等带来的西方地理知识、观念，“荒渺莫考”。

由此可见，明末清初，怀疑、反对西方地理学的大有人在，代表了一般文化界的态度。

清代中期以后，对西方地理学的完全否定态度就渐趋消失，渐被在承认前提下的扬弃派所取代。

2. 肯定派

以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刘献廷等为代表，对西方科学技术采取了肯定的态度，有的人甚至以为西方科学技术才是真正的科学，转而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地理学方面，李之藻、刘献廷等代表了当时的肯定派，以与当时的否定派相抗礼，他们对西方地理学全盘肯定，提出“西化”或改造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意见。

如李之藻尊崇西学，通过指责中国传统儒学而表明西学之优。他说中国儒学的治学“之病有四：浅学自奢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固习三也；恶闻胜己四也。”指出西学之优在于：“西学不徒论其度数而已，又能论其所以然之理。……观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皆精绝。”所以，他对西方地理知识和制图方法极为推崇，并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刻版印制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

清初刘献廷也极推崇西方地理学，认为地理学应究“天地之故”，并倡议在地方志著作的开头部分，记录各地的经度、纬度，划出经纬线表，然后根据经纬度的差异来推求各地节气之先后、日蚀之分秒和星位之变化等。

3. 扬弃派

扬弃派是在基本肯定西方地理思想的前提下，提倡中西会通交流，不一味迷信西方地理学的所有见解，而是结合中国和作者本人已有的地理认识，对西方地理认识、地理观点、地理思想加以诠释，或修正或吸收。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锡阐、徐继畲、魏源、梁启超、王先谦等。

王锡阐在对待西方历法在中国的应用上，就坚持“正古法之误而存其是，取西方之长而去其短”的科学态度，他说：“吾谓西法善矣，然以为测候精详可也；安其误而不辨不可矣。”与王锡阐同时的梅文鼎也有这种思想，梁启超甚至说：对于诸法为纯客观的比较批评，“自定九（即梅文鼎）始。”

而戴震则既尊崇西方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又继承中国传统的元气论，力图从力学上解释地圆说和地球不坠以及人不倾跌的原因。尽管他的解释不

“请译西法、历法等书疏”，转引自《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第64页。

《广阳杂记》卷三。

《畴人传》卷三十一。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文集》之七十五。

“请译西法、历法等书疏”，转引自《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第64页。

尽科学，但表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西方地理科学的谨慎态度。

清道光时徐继畲撰写的《瀛环志略》，既参考美国的雅裨理的地图等资料，又对雅裨理提供的某些地理情况，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提出质疑。如在序言中，他提到自己参考雅裨理地图的情况说：“道光癸卯（公元 1843 年），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文，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但卷三“五印度”对雅裨理关于锡兰的认识却提出了质疑，他说：“余尝闻米利坚人雅裨理云，锡兰为天竺本国，今称五印度为天竺，乃世俗相沿之误。按《后汉书》以天竺为身毒，似非以一岛之名概全土，雅裨理所云，不知何所据也？”

魏源对西方地理观点的态度同样持批评和审慎的态度。如关于欧亚两洲分界线，艾儒略《职方外纪》定在大乃河（今第聂伯河），而南怀仁《坤舆图说》却定在阿被河（今鄂毕河）。对此，魏源指出：“此二河者，一在里海之西，一在葱岭之东，相去二十余度，计五千余里。循前图，大乃河则西侵欧罗巴之界；依后图，阿被河则东侵阿细亚之界。究竟此二河中，五千余里之际，属彼洲乎？属此洲乎？”不仅如此，他在自己的《地球图》中已正确地将乌拉尔山作为欧亚二洲的分界线。但是，魏源对西方地理学的批判也有错误或不科学的地方，尤其是拘泥于中国古代的一些传统观念，牵强附会地解释新的地理事实，出现了唯心主义的倾向。如关于五大洲与世界地理面貌，他认为西方地理学家的五大洲，相比于“佛经所谓四大洲者，西人止得其二，而余未之闻焉。”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所对应的佛经二洲是这样的：“阿细亚、欧罗巴、利未亚共为南赡部洲也，南北墨利加则为西牛货州也。”

此后他又以相当篇幅论述了佛经释典中有关地理见解与西洋地理观点的差异和关系，并坚持以佛经四洲来划分大陆，推论世界地理大势。

魏源以后，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对西方地理学都持扬弃态度，注意学习新的地理思想、方法、知识。从王先谦、张相文等人编著的地理著作，到清末《大清会典图》（光绪初开始），及各省区地图的编绘，都表现出对西方地理思想、方法、认识、成果的应用，以及借鉴和修正。

如西方的地图投影法，自利玛窦地图传入后，清初测绘全国地图曾加以引用，然而，此后“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和推广投影的方法。所以，一般地图仍用计里画方法来绘制。”到清末，一方面，中国传统制图的“计里画方”法暴露出许多缺点；另一方面，人们对西方地理学的肯定态度愈来愈明确。所以，西方经纬线、投影法等制图体系再次被确认和推广，以至逐步取代中国的传统制图法。如《清会典图·凡例》中就明确指出：“地本圆体，图为平面，绘图于平，虽有弦线切线，及墨加禱（即麦卡托）诸法，然皆因图制宜利弊参半。……今遵内府图高偏度分，用尖锥容图法（即指圆锥投影法）绘成《皇舆全图》，不加方格”。同时还通令各省编地图时要尽可能使用圆锥投影法（广东、甘肃等省实行）。宣统元年（公元 1909 年）罗汝楠在其《中国近世舆地图说》中，进一步阐述了天球与地球的关系，论述了几种地图投

《海国图志》卷七十四，《国地总论》上。

同上。

高儒：“论我国地图的数学要素和表示方法的演进特色”，《1962 年制图学会论文集》（上），中国工业出版社，1964 年版。

影法的特色与使用场合。其所云投影法包括：“平球法”（正方位投影）、“正球法（横方位投影）、“经纬均作曲线法”（伪圆锥投影之类）、“经曲纬直法”（伪圆柱投影一类）、“圆锥含球法”（圆锥投影）等。这既标志着西方制图法在中国的确立，也标志着清末人们对西方地理学的肯定态度。

二、比较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以来，至 19 世纪中叶，都是人类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地理发现和地理学发展时期。随着新的地理发现的不断扩张，人类地理视野的扩大和地理知识的积累，使欧洲出现了不少地理学家或地理哲学家。如 17 世纪上半叶德国地理学家瓦伦纽斯(Bernardus Varenius, 1622 ~ 1650)，此后的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 ~ 1755)、法国地理学家布丰(Buffon, 1707 ~ 1788)、德国哲学家康德(I. Kant, 1724 ~ 1804)等，都曾根据地理大发现的资料，从理论上论述对地理学性质，以及他们对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等方面的思想认识。尤其是 19 世纪上中叶德国的两位地理学大师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 ~ 1859)和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 1779 ~ 1859)的出现与研究工作，更是开创了近代地理学的新纪元。此后，在其弟子李希霍芬(1833 ~ 1905)、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1844 ~ 1904)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基本奠定了近代地理学的科学体系。如李希霍芬在 19 世纪末即指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以及与其成因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的科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将过去的描述原则、因果论等提高到探明地理事物形成过程的发生学原则。拉采尔则奠定了人文地理的理论基础。总之，19 世纪中叶以来，近代地理学已逐渐在西方建立起来，使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被确立和重视。

然而，与西方近代科学地理学的萌芽、建立、发展过程基本同期的中国清代地理学，却在关于地理学的性质、内容、研究范围、方法、目的等方面，都与西方地理学表现了较大的差异。并出现了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渐被西方近代地理学取代的趋势。就清代传统地理学与西方同期地理学的差异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地理学的性质与内容

在西方，从 17 世纪初的瓦伦纽斯开始，对地理学的性质、内容、体系已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

如瓦伦纽斯不仅第一次将哥白尼、刻卜勒和伽利略以太阳为中心的学说引进地理学，正确解释了地球上不同纬度的热量差异，而且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地理学要集中于地球表面的研究，要研究地球表面的地形、气候、森林等自然因素，也要研究人类（居民）的形体、语言、文化、艺术、城市等人文因素。他还将地理学明确分为“通论地理学”和“特殊地理学”两大部门。认为：通论地理学（即普通地理学、一般地理学）是研究整个地球的总的情况，并解释其各种性质。它包括地球的形状、大小、位置、水陆分布、山地、

〔英〕罗·迪金森著，葛以德等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

森林、沙漠、水文和大气，以及由天文原因引起的现象和事件，如纬度、气候带、经度等；并探求对各种地理特征的解释性说明。而特殊地理学（即专门地理学）则是单独描述每个国家（地区）的结构和位置，其内容包括三部分，即天文特征，指由于太阳和星体视运动所影响人们的那些特征；地文特征，指在每个区域内都能观察到的各种自然地理现象；人文特征，指涉及到区域居民的各种特征。

此后，哲学家康德在大学讲授地理学时也对地理学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地理学是提供自然系统（指人以外的世界）知识的科学，他说：“这意味着地理学研究特定的具体事物中的关系，而不是事物的抽象的一般特征，并且集中注意于自然的差异性，而不是其相似性。”他认为地理学的观点是：“在地理学领域内，一切事物是按照它们在地球表面的区域联系来考虑的，应像在历史学上，一切事物是按它们的时间联系来考虑的一样。”他把地理学分为数量、精神、政治、贸易和神学等 5 种，他还注意到人及其活动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并认识到人类活动是地球表面一切变化的主要作用之一。

19 世纪中叶，德国地理学家洪堡、李特尔则共同表达了地理学是对相互关联的地球表面事物和现象进行分析、描述的思想。首先，洪堡在他长期野外工作的基础上将地球看成一个和谐、统一的综合体。认为有人居住的世界是由各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而地理学即是一门关于地球的描述的科学。认为地理学是对地球表面事物和现象相互依存的方式进行正确分析研究的科学。李特尔和洪堡一样，认为地球是一个由彼此关联的部分组成的统一体，并进一步将洪堡的“地球描述”（Erdbeschreibung）明确限定为“地球表面”（Erdkunde，该词今有“地学”、“地球学”二义）。他指出：地理学“不仅仅在于罗列那些占据地球空间各部分的事物；而且要理解在地区上结合在一起的事物的相互关系和因果关系。”他还说：“地理科学着重研究地表的空間（只有这些地表空間是布满事物的），即从事各地点同时并存的现象的描述和相互关系的研究。”

19 世纪末，李希霍芬在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对地理学的性质、体系进一步进行论述，他认为：地理学必须限于研究地球表层，即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相互接触的地方。并认为地理学的特殊目的是集中研究地球表面上的相互联系的各种现象。地理学的最高目的在于：发掘人类和物质的地球，以及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步骤上，则必须从详细的描述自然现象开始，然后推进到考察地球表面的其它现象与基本的自然结构的关系。他将地理学进而区分为特殊地理学与普通地理学两类。认为特殊地理学即描述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对它所下的定义是：“地球上每一个区域，不论它多大或多小，也不论它是大洲、小岛、有自然边界的内陆区域、人为划定边界的国家、一条山脉、一条河流的流域或一个海，都是作为较小区域单元的集合体，并根据其可见的外貌（其中包括人类文化成就）来进行研究

〔英〕罗·迪金森著，葛以德等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

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第 220 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美〕普·詹姆斯等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 141～142 页，商务印书馆，1989 年版。

〔美〕普·詹姆斯等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 163 页，商务印书馆，1989 年版。

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第 221 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的。”而普通地理学(又称分析地理学)则是从形态、物质、变化的动力或原因、运动这4个基础研究地球上稳定出现的现象。

与17~19世纪西方近代地理学的逐步建立相对应,在中国的明末至清代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先进的近代地理思想萌芽。如明末徐霞客对岩溶地貌等地理现象的观察,已开始了探索整体地理环境的自然规律的尝试。清初刘献廷、孙兰也都提出了更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思想,如提倡地理学研究要究“天地之故”(自然规律研究),要增加地理著作的科学性(增加经纬度等内容)等。但是,就中国清代地理学的发展主流来看,这时人们仍然将地理学作为史学的附庸,或仍将地理学作为一门为统治者提供各地地理状况(资料)的工具,而没有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规律的科学。它在内容上包括方志、沿革地理,以及堪舆学等门类,而以沿革地理为主。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地理学的再次大规模传入,才又出现了部分学者,以至官方对西方地理思想、体系的接纳、认可,渐使西方地理学思想在中国取得主导地位。

然而,在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人地关系的认识上,清代与西方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当时都出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和人地相关论思想,而中国对人地相关思想的认识却要比西方早得多。17世纪初的顾祖禹等即已提出了人地相关论的思想,并作了深刻的论述,而西方人地相关论思想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Paul Vidal de la Blache, 1845~1918)才有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地理学家的特殊任务是阐述自然和人文条件的空间相互关系”。

在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上,西方侧重于自然规律的探讨,成就比较突出,而清代则在这一方面建树甚少。相对于孙兰对“变盈流谦”等地理理论的认识,西方则在此期先后提出了世界性行星风系模型(英国天文学家哈雷, Edmund Halley, 1656~1742)、地理循环论(美国戴维斯1899年提出)、假想大陆气候分类分布模式(德国柯本, W. Koppen, 1900年提出)、土壤成因与土壤带理论(俄国道库恰也夫1883~1900年完成)等自然地理理论。

(二) 关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

在地理学研究范围方面,17世纪到20世纪初的西方地理学除了区域地理外,主要是关于全球、全世界地理状况的认识与研究,以及对一般地理规律的探讨研究。

17世纪初,瓦伦纽斯所著《日本和暹罗王朝记》即是一本专为商人提供各地区的民族、经济、地理等状况的知识用书。而他的《通论地理学》则是关于地理学一般理论的著作。18世纪到19世纪初,在有关区域地理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也依然将局部区域与世界地理区划等问题联系起来。如1754

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第220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美〕普·詹姆斯等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141~142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美〕普·詹姆斯等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163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文集》之七十五。

西方如拉采尔等曾提出“环境决定论”思想,法国维达尔提出“人地相关论”思想。

〔英〕罗·迪金森著,葛以德等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第238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年布申 (A.F. Buschirg) 写的《新地理学》一书, 就仿照古代斯特拉波的写法, 试图用政治单元作为区域的基础进行“描述地球表面的已知部分。” 1756 年法国比阿什 (P. Buache) 写的《论自然地理学》则是根据 1737 年对英吉利海峡的深度测量, 提出以山脉和盆地作为界线和单元来划分已知世界的区域。1775 年德国加特雷 (J.C. Gatterer) 在《地理学纲要》一书中则用区域、国家、人种等指标划分世界区域。19 世纪中叶, 洪堡、李特尔 2 位地理学大师, 他们也将地理学的研究放眼于整个地球和世界。如洪堡曾长期考察过美洲、西欧和南欧等许多地区, 他所著《新大陆热带区旅行自述》既是一部关于美洲地区自然界 (特别是植物)、经济和政治的百科全书, 也是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的区域著作。他的《宇宙》(5 卷) 一书更是一部世界地理的宏篇巨著。其中每一卷都阐述宇宙学领域内的一个特定专题, 如关于全球的整个图景、天体空间的定律、人类对自然景观的认识过程及变化, 地球表面自然和人文现象的分布及其关系等。与洪堡同时代的李特尔也著有关于全球地理的专著, 他所著长达 2 万多页、19 卷本的《地球科学——它同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关系》(又译《普通比较地理学——自然和历史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坚实基础》), 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世界地理科学巨著。此后, 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政治地理学》, 法国维达尔的《人类地理学》, 白吕纳 1910 年出版的《人文地理学》, 英国麦金德 (H.J. Mackinder, 1861 ~ 1947) 1902 年发表的《不列颠与不列颠的海洋》、1904 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等等, 都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全球, 以整个世界范围作为探讨社会、文化规律的基础。

与此相对, 清代中叶以后也有关于世界地理的著作。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萧应椿的《五洲述略》等。但是, 它们都不能与西方的世界地理研究相比。一是这类著作在所有清代地理著作中所占比例极小, 只有清末几部; 二是它们都局限于西方传入中国或所闻见的世界各地情况的知识综述, 缺乏科学研究的思想意识。如前所述, 当时中国地理学的研究范围, 主要局限于中国域内及边疆地区, 缺乏关于世界地理的主动研究, 特别是清代的地理学除了地方志、游记等著作关于各地地理状况的记述描述性记录外, 其大量的地理研究则囿于行政区的沿革考证等。这与西方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新区域地理事项相互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更不能相提并论。所以, 在地理学研究范围上, 清代是以中国境内的区域地理观察和记述性研究为主的。

(三) 关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这一时期, 西方地理学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于科学考察。许多地理学家都有过丰富的地理考察实践, 而且在考察研究中注意对各地经纬度、海拔、气温、植物等要素的科学观察和文字记录, 以及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因果等关系进行分析, 表现了较强的数理倾向和科学性。例如, 洪堡在对美洲安第斯山脉的考察中, 就包括对该区各点的海拔高程、气温、经纬度的测量, 以及地形、气温、植被、农业状况的综合观察分析, 从而掌握了植物垂直地带性的分异规律。在他的巨著《宇宙》卷三“绪论”中, 他还阐述了自己的地理学研究方法和原则。他说:

我所写的这部关于宇宙著作的基本原则,就是企图把宇宙现象作为一个自然整体来认识, 并揭示在这些现象的个体组合中, 怎样认识它们所受

到的共同制约——或者说大自然规律的支配，以及通过怎样的途径来从这些规律提高到因果关系的探讨……而这种认识必须通过对于直接观察所得的结果的深思熟虑，而不是通过基于思维演绎和思想发展的一种宇宙观。

他还说：

如果我们要正确地理解自然，我们就绝不可把事物的现状及其过去的连续不断的发展截然分开。不回顾事物的形成过程，就不可能获得对事物性质的正确理解，不仅仅是有机体经常处于不断变化以及不断分解，并产生新质的过程中，地球本身在其存在的每一形态中，也都有前一阶段的秘密显示出来。……在对于地球的自然面貌进行描述时，现在和过去这两者之间很明显地是相互渗透。

李特尔在论述地理学研究地方条件时，也谈到应注意一个地方在地域、形态、物质等特点方面的属性。其中第一个属性是指地球表面的自然区划；第二个属性包括水、海、大气的分布和运动，它们是人类生活的基础；第三个属性是物质条件，是自然历史的地理外貌，它包括矿藏、植物、动物的分布。这些表明李特尔强调的是，地理学要研究地理规律，揭示各种地理现象的内在联系。

而李希霍芬在关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上，已明确指出，将一般因果论提高到探讨形成过程的发生学原则。他在《旅行研究指南》一书中写道：“长期以来，人们已经把具有明确长轴的山脉和不具有这种形态的山块区分开来了。较好的方法似乎是利用发生学的因素，根据在外部形态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营力，来对山脉作进一步分类。”在实践中，他正是从发生学的观点，探讨了黄土的成因，提出黄土风成说的理论。

总之，此时西方地理学的研究已逐渐建立起一套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使这一时期的地理作品，不论是地理论著，还是考察报告，都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如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区旅行自述》（30卷）就是一部科学性极强的地理考察研究报告。

其目录如下：

- 1~2 卷热带植物（图 143）
- 3~4 卷野牡丹种专论（图 120）
- 5 卷含羞草科及其豆科植物专论（图 60）
- 6~7 卷禾本科植物修订本（图 220）
- 8 卷新的植物种属（图 63）
- 9~14 卷（缺）
- 15~16 卷美洲科迪勒拉山系和印第安人遗迹的观察（图 63）
- 17 卷新大陆的地图和自然（地图 39）
- 18 卷新大陆历史地理评述以及十五和十六世纪中天文航海学的进展
- 19 卷新西班牙王国的地图与自然（地图 20）
- 20 卷安第斯山及其附近的自然图表（热带植物地理）
- 21~22 卷在新大陆热带区域旅程中所作的天文观察（三角测量和气压表测量汇编）
- 23~24 卷 1799~1803 年在大西洋、新大陆内地和南部海洋所作的动物

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第 157~158 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第 198 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和比较解剖学观察文集（图 54）

25~26 卷新西班牙王国政治论集（续附古巴的政治一文）

27 卷植物地理文集，附热带区域自然图表一幅。

28~30 卷 1799~1804 年洪堡和邦普兰所作的新大陆热带区旅行的历史记载。

在这一时期，清代地理学的研究仍然继承中国古代传统，以文字描述为主，除了清初对西方经纬度测绘等方法的引进，在一些地图、著作（《水道提纲》等）中对经纬度等有所应用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以传统的沿革地理、文献考据为主。就是清末一些学者吸取外国地理知识编著的世界地理著作（如王先谦《五洲地理志略》等），其著作体裁仍然采用文献汇编、考据、条理分析的著作方法。

在地理学思想方法上，清初刘献廷等人虽已提出了地理学应究“天地之故”，探讨地理规律，但是，在各种地理论著中，真正从事这一研究的成果却很少。许多人注意的是地理考证研究方法的如何完善和深入。如关于中国历代政区沿革，杨丕复著《舆地沿革表》（40 卷）、陈芳绩著《历代地理沿革表》（47 卷）、李兆洛著《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20 卷），就是从不同角度整理中国历代政区沿革，以便于读者检索、查阅使用，其中陈书按古以察今，杨书由今以溯古；陈书以朝代为经、地名为纬，杨书则以地名为经、朝代为纬；李书所收地名全按韵部排列，方便检索。三者相互勘治，极便使用。尤其是在文献考证研究方面，由于受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清代的地理考证研究也在方法上涉及到版本、本证、旁证等非常严密的考证方法的应用。

不过，清代地理学在以考据方法为主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些注重实践，改良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思想 and 实践，这就是当时一些学者倡导的地理学应重视“目验”的考证方法。尤其是到清中叶以后，以边疆史地研究为中心，形成了新的治学方法，即：考证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如清初阎若璩就极重视地理研究中的“目验”，即实践所得。他极为推崇酈道元的《水经注》，认为酈氏所注多从目验得来。他曾指出：“《书》亦极有难考处，只如《禹贡》说三江及荆扬间地理，是吾辈所亲自见者，皆有疑。至北方即无疑。此无他，是不曾见耳。”因此，他强调地理研究应从实地考察着手，重视实际验证。顾炎武等更是重视实地调查，他身体力行，遍历天下，考察地理，分析沿革，写成了著名的地理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虽以书斋研究为主，但也能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穷异同”。

清代后期，祁韵士、徐松等人也都极力倡导文献与考察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如祁韵士在新疆“既得亲履其地，多所周历，得自目睹，而昔年备员史职，又尝伏读御制、文集、诗及平定准噶尔回部方略二书，故于新疆旧事知之最详，颇堪自信”，写出了《新疆要略》、《西域释地》、《万里行程记》等著名的边疆史地著作。徐松则“自出关以来，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有所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仆夫、

《潜邱札记》三。

《潜邱札记》一。

《读史方輿纪要·自叙》。

《新疆要略·自叙》。

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遍稽旧史、方略及案牘之关地理者，笔之成《西域水道记》五卷。”

清代地理学的实践派虽然进行了不少工作，但是他们的实践研究仍多限于配合沿革地理的记录、考证，涉及到自然地理的记述还比较少，而且，更缺乏有关地理事项的因果分析。这与西方地理学界进行的科学考察尚不可同日而语，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重要的地理研究方法，清代已跨出了值得称道的一步。

（四）关于地理学的研究目的

关于地理学的研究目的，清代与西方地理学也有较大差异。

西方地理学基本继承其过去的传统，将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去研究，尤其在地理大发现积累的丰富地理资料基础上，人们除将地理学作为一门有用的知识学科外，更有许多人将它作为一门科学去研究，试图分析、探讨各种地理事项的发生和分布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从瓦伦纽斯的《通论地理学》，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区旅行自述》、《宇宙》，李特尔的《地学通论》，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政治地理学》，亨丁顿的《文明与气候》等等，都是以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规律等问题的科学研究为目的。

而在同一时期的清代，则仍然沿用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研究习惯，将地理学作为一门简单的应用学科，强调它的应用性和史料性。即所谓自清初即被人们所竭力倡导的“经世致用”传统，强调地理著作的内容要与国家政治、民生相结合。所以，清代许多重要地理著作，除极少部分深受考据学的影响作为专门的学术研究而存世外，其中绝大部分都与当时国家或作者的社会政治背景相关，这就形成了清代地理学在著作内容上，以地志、水道著作和政区沿革三大部分为主体的著作体系。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国家，随时了解掌握各地情况（方志沿革），免除河患（水道著作），是关系到社稷安危的大事。所以，从清初二顾的地理总志，到各种水道著作、边疆史地专书，以至于清末的世界地理著作的编写，无不包含着作者“经世致用”和存今验古的目的。

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自序》中谈到他的著作目的时说：“祖禹之为此书也，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河渠沟洫，足备式遏，关隘尤重，则增入之。朝贡四夷诸蛮，严别内外，风土嗜好，则详载之。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游览赋诗，何与人事？则汰去之！”明确表现了作者著此书是关心国家治乱、生民利病的目的。

傅泽洪等撰《行水金鉴》，也主要在于试图了解四渎之源流利弊，总结历代治水经验，以供司水政者参考。这一思想，傅泽洪在序文中说得也很清楚，他说：“四渎，古运河也，沿江达淮，乱河湮济，《禹贡》具载之矣。而今之运河，则自元明始。然元创之而不用，明用之以转运荆、扬、徐、兖、豫诸州数百万石之粮，贡于京师，迄于今二百余年。……然是运河也，亦未始不以四渎之通塞为利害。……夫禹之治水，疏濬决排，以去民患，而今也无日不以垒堤为事，亦无日不以堤决为虞。迨一旦有事，耗官家百万金钱，若填巨海。而治之仍不得其法，今日决于此，明日复决于彼。且今年决明年

又决，劳民伤财，无已时何哉。堤日高，河身日因之亦俱高，疏濬决排之不讲也。……纂辑成书，凡四读运河兴废之由，及疏筑塞防一切事宜之得失缓急，犁然悉备。……吾愿司水政者，三复斯编。”此后黎世序等人再纂成《续行水金鉴》一书，也是出于同样目的。

李兆洛编纂《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也说他是因为历代疆域名称更替繁乱，影响到人们对各地形势利病的正确、及时认识。如云：“疆域名号，合并析易，或间废缺，纷纭参错，代有罢立，苟非由今日以推诸古昔，明其地之远近，名之同异，人士且南朔之不辨，奚以达其形势利病之得失缓急哉！”

鸦片战争后出现了边疆史地研究高潮，这是当时学者试图通过研究边疆史地，来寻求“筹远”、“制夷”的对策。他们通过慎密的文献考订和实际考察，一方面注意弄清各地的山川等地理实际情况，排除过去各种不确切观念；另一方面则从区域地理角度，提出各种“筹远”、“制夷”的方略，试图使“读史者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

林则徐编辑《四洲志》、魏源撰《海国图志》等，也有明显的“致用”目的。就是杨守敬、丁谦等致力于沿革地理研究的一些地理学家，其研究目的也都是为了廓清中国历史沿革的纷乱状况，以便于治史、从政者参阅方便。魏源更明确说明他编写《海国图志》，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综上所述，清代地理学与同期的西方地理学相比较，无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清代地理学基本上仍然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但是，自明末开始，西方地理学的一些方法、思想便不断的被引入、吸收，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许多地理学观念、知识、方法，日益动摇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绝对统治地位，在地方以至全国的地图制作上，已正式确定了西方投影法及经纬法的地位；吸收西方地理知识的世界地理著作、教科书的陆续出现，使中外地理学思想的差异逐渐缩小。即，清代地理学与同期西方地理学的差异，经历了一个由差异较大向趋同方向发展的转变过程。

《续行水金鉴·潘锡恩序》。

《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自序》。

《蒙古游牧记·祁隽藻序》。

《续行水金鉴·潘锡恩序》。

第九章 清代地理学发展综论

(一) 清代地理学思想特点

关于清代地理学思想的一些具体特点，前面几章已有阐述，这里再从学科体系、发展过程、成果特点等整体学科特征角度进行总结。综括清代 200 多年间地理学发展的主要脉络，笔者认为清代地理学思想具有以下 3 方面的主要特点：

1. 重视传统，成就突出

从中国地理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清代地理学无论在研究成果，还是地理思想、研究方法上，都表现为对古代传统地理学的重视和继承、发展，基本上还是一个以中国古代地理学传统为主体的时期，是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其主要表现在：

(1) 研究领域的扩大。从清代的地理著作和论文等资料来看，从上古到清代、从中原到边疆，几乎所有见于记载的重要政区、地名和水道，都有人作了考证；从上古到清代的重要地理著作，也都有人进行校勘或辑佚；对全国范围的地理形势，通过实测地图，进行了极为广泛深入的认识，出现了许多填补区域记述空白的方志和其它地理著作（主要为边疆地区）。特别是清末，学者还注重了世界地理的认识，出现了多种世界地理著作。总之，清代地理研究的范围之广、成果之多是历史上空前的。

(2) 研究手段的多样化。清代除了讲求地理研究中的实践活动、地图的利用等基本方法外，在地理文献考证、地理著作整理等方面，建立了一套比较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包括所谓文献考证中的本证、旁证，以及校勘、注释、辑佚等具体方法原则。在研究程序上，已形成“事无证，当求之迹，迹有不明，当度之理”的研究思路。

(3) 研究水平的提高。清代学者的地理考证研究，注重资料的广泛罗列搜集和正确的分析辨伪，往往足不出户，却能“纸上谈兵”，使其研究达到很高水平。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便是如此，其中关于边远各地许多山川形胜记载，非他亲历考察所得，但他却能从广博的资料中归纳出正确的文字记录。如该书魏禧序文中所举之例说：“北平韩子孺时从余案上见此书（《读史方輿纪要》），瞪目视余曰：‘吾不敢他论，吾侨家云南，出入黔蜀者二十余年，颇能知其山川道里，顾先生闭户宛溪，足不出吴会，而所论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见而足履者，岂不异哉！’……。”熊开元序亦谈道：“余楚人，习闻三楚之要，莫如荆襄，又熟履其地，考往事得失及今崇邑，知海外一区为三吴保障……罔非身履而知。今宛溪坐筹一室，出入二十一史，凡形势之险扼、道里之近遥、山水之源委、称名之舛错，正其讹，核其实，芟其蔓，振其纲……。”徐松称赞沈垚所撰《新疆私议》的准确性时说：“吾谪戍新疆，诸水道咸所目击，犹历数十年之久始知曲折，沈君闭户家居，独从故纸中搜得之，非具绝大识力，曷克臻此！”这些都标志着清代地理学家研究成果的水平相当高。

总之，以上诸点可以看出，清代地理学的发展，尤其是传统的沿革地理

顾炎武：《山东肇域记》卷一。

萧一山：《清代通史》（四），第 1955 页，中华书局，1985 年版。

的发展，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进入中国传统地理学发展的最高阶段。

2. 思想活跃、阶段明显

从清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地理思想比较活跃，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研究重点或新思想。

清朝入关后，至雍正元年（公元 1723 年）颁诏禁止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传教，并随之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到 1840 年鸦片战争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为标志，清代地理学呈现出早中晚 3 个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

（1）早期，是指清定都北京到康熙末约 80 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正当清王朝建立之初，在继承前代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积累的基础上，新王朝在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开拓精神。在地理学上也表现出对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外国地理知识、地理方法的广泛吸收与运用甚至一些中国学者还提出了革新中国传统地理学体系

的新思想。

这一时期，上自皇帝（康熙），下至低层知识分子（刘献廷、孙兰等），以及广大中小官吏、学者等，对西方地理学的态度比较客观，有助于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流传和迅速扩大。以至影响到政府决定聘用外国学者（西方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费隐、潘如、奥古斯丁、麦大成、汤尚贤等）、采用经纬度、投影等科学方法，进行了全国地图的测绘工作。

作为中国传统的地理学，这一时期有了极为重要的发展，出现了多种重要的传统地理著作，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胡渭的《禹贡锥指》，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傅泽洪等的《行水金鉴》，以及康熙二十五年（公元 1686 年）开始的《一统志》编纂等，标志着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蓬勃发展。

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无论在地理学学科体系，还是地理理论问题上，都有了重要论述。如刘献廷等关于革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思想，以及提出地理学应注意自然规律研究（“究天地之故”）的倡议。还有顾祖禹的“人地相关论”思想、孙兰关于侵蚀规律（“变盈流谦”）的探讨等，更标志着这一时期中国地理学欣欣向荣的积极进取面貌。

（2）中期（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初，约公元 1723~1840 年）。自雍正元年禁止耶稣会传教士在内地活动，驱之于澳门居住，到 1840 年鸦片战争，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对内迭兴文字狱，实行文化高压政策，使读书人只能埋头故纸堆，不敢涉足政治时事，清初刚兴起的“经世致用”的应用地理思想，与其它进步思想一样，很快被扼杀。学术走向脱离实际、纸上谈兵的“纯学术”时代。尤其是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发展，主要表现为沿革考据方面的成就。在地理学思想上，也表现为清初刚刚活跃的地理学思想转入沉寂时期，代之而起的是以校注、辑佚、整理古代地理著作作为主的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理论的全面深入发展。

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之一是，由于雍正全面对传教士活动的公开限制和开始推行的闭关政策，使清初被认可的西方地理学思想变得渐少有人提及、发展。尤其是地图方面，虽然先后有采用西方测绘的全国地图存世，但由于它们制成后深藏秘府内宫，很少为一般文人学士看到，社会影响并不大，而在一般民间和文人学士间所绘制的各种地图，仍然采用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等方法制图。第二个突出表现是，大批学者集中精力于古代地理名著《禹贡》、

《水经注》，以及“正史”中《地理志》的校注、补证等工作，出现了许多校注、辑佚版本。如全祖望、戴震、赵一清等关于《水经注》的研究；毕源关于《山海经》的校勘；钱坫、徐松、汪远孙等关于“正史”《地理志》的校释等。第三个突出表现是：出现的一些地理著作，也是深受中国传统地理思想方法的影响，如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深受《水经注》著作方法的影响；《续行水金鉴》是对清初《行水金鉴》的继承，等等。突出表现之四是，这一时期使中国传统的方志得到极大发展：一为雍正时确立了方志60年一修的制度；二为出现了一大批省、府、州、县（厅）的各种方志著作；三为方志理论有了明确的发展，出现了戴震等考据地理派修志理论和章学诚的史志派理论等；四为编成了规模宏大的全国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即《嘉庆重修一统志》）。

这些都标志着这一时期中国地理学的主要方向和成就，与前期有明显的不同，变得在中国传统地理学方面的单方面深入发展。

（3）晚期（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约公元1840~1911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结果，一方面迫使中国社会接受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积极观察世界，探索富国强民之路，即所谓“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于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推翻清王朝这一段时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界，出现了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复杂局面。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地理学思想也呈现出一个多层次、多方位的发展现象。

首先是，中国传统地理学仍在继续发展，出现了杨守敬、丁谦等传统地理学大家。他们无论是在地理沿革考证，还是古籍校勘、历史地图制作等各方面，其成就都达到了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高峰。同时，面对当时社会腐败，外敌入侵，一批地理学者重新强调实践、实证和“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如朱一新《东三省内外蒙古地图考证》、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等等；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努力于国外地理知识的搜集、整理，编著了各种世界地理著作，如魏源、徐继畲、同康庐、王先谦等都有世界地理著作问世。

其次，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地理学也以多种方式在中国传播、扩大，以至于被官方认可、接受。这一时期西方地理学的传播主要有3种途径（方式）：一是外国地理著作的输入，由中国和外国学者共同翻译出版，或直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传（如日文等著作）。英国慕维廉的《地理全志》、莱伊尔的《地学浅释》等，都是由外国人与华衡芳等合译而成的；《澳大利亚新志》则是由吴宗濂、赵无益翻译而成的。二是一些外国学者深入中国直接从事地学考察工作，以西方地理学思想方法，去分析、认识中国的地理状况，直接影响中国当时以及后来的地理发展，如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俄国地理学家奥布鲁契夫等人的在华考察工作，都对传播西方地理学起到了很大作用。三是一些中国学者以积极的态度，面向世界，努力学习和研究科学地理学，积极促进西方地理学的传播。如张相文等，不仅学习、认可西方的地理学，而且能对之发展。张相文编著了著名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以及《地文学》。清政府也将西方地理学（包括当时所谓“地文地质学”、“地理学研究法”、“气象学”、“地理总论”等）正式作为各级学校的课程，进一步促进、确立了西方地理

学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这一切，使得清后期的地理学呈现了较为活跃的繁荣局面。除了传统地理学的发展外，人们对待地理学的认识出现了一个较大的转变，相对于明末清初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地理学传播，这一时期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深刻，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地理学的态度也更为客观、积极，并逐渐完整地接受了西方近代地理学的思想、体系。

从清代地理学研究课题的主要趋势来看，也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即早期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以顾炎武、顾祖禹、傅泽洪等为代表，注意山川形势扼塞及水利建设；中期，学者脱离实际，注重郡县沿革，水道变迁，古代著作校勘等工作；后期的地理研究则开始将边疆域外地理逐渐作为一个重要部门。

3. 兼容并蓄，趋向“西化”

清代地理学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在地理学学科体系上，表现为中外地理学互相交融，并行发展。而且在思想方法上，渐向西方地理学转化。

如前所述，清代自开国伊始，即一方面继承汉唐以来汉族文化传统；一方面又认可了明末西洋传教士所引进的西洋文化东播的事实。因此，在地理学上，既有顾炎武、顾祖禹、黄仪、陈芳绩、徐学乾、胡渭、阎若璩、齐召南、全祖望、赵一清、陈伦炯、戴震、程瑶田、吴卓信、章学诚、洪亮吉、祁韵士、李兆洛、徐松、陈沆、杨守敬、丁谦等一大批从事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地理学家出现，以及大批的中国传统考据、沿革、方志著作和计里画方地图等地理作品问世。同时，自清初到清末，也有许多西方地理著作、地理知识、地理思想方法，在中国缓慢的发展、流传、以至于清末将深受西方地理思想影响的地理学，明确列入政府颁布的《学堂章程》，规定了相应的学习内容和要求。如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各种世界地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和《坤舆外纪》、戴进贤的《地球图》等西方地理作品就广泛流传，渐为清代中国社会所认可，以致清康熙、乾隆决定采用西方经纬度，投影制图法，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地图实测和编制，标志着清初西方地理学已在中国有了相当发展，取得了重要地位。清代中期，由于闭关政策，使清初一度被认可的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继续，但其影响仍然存在，特别是此后不久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地理学随着西学东渐的高涨，和“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出现，再次大规模传入中国，加之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学习、引进，使西方地理学在清末再次成为当时中国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在大量西方、国外地理著作的翻译、编纂，以及西方地图投影、经纬度法和地理学体系被官方的认可、倡导，如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会典馆关于编制大清会典图，所提出的注意地图投影及经纬度的要求。二十八年、二十九年所颁布的学堂章程中，都明确规定了对当时西方地理学课程体系的学习。

因此，在地理学发展上，清代是一个中西地理学相互影响，并行发展，渐趋西化的过程。从它的学术成果上看，以中国传统地理学方法所从事的地理考证、区域记述（包括方志、游记、专门河渠记述）等方面的成果最多，占绝对主导地位，但是，从学科的发展趋势来看，西方地理学的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发展，已呈现出逐渐发展，不断扩大，以至取代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趋势。

（二）清代地理学发展的原因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清代地理学的发展特点而言，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有以下3点。

1. 社会形态的变化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清朝，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对科学（包括地理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在政治策略上，清代统治者曾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制定有相应的文化政策，直接影响了包括地理学在内的各门科学的发展。

清初，建国伊始，为了稳固统治，起于关外的清统治者，在政治上对汉族文人学士采取了感化怀柔政策，文化上对于先进的中外文化采用了宽容并蓄的态度。如皇太极、顺治帝，都极推行尊孔崇儒政策，康熙帝自幼即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他自己说：“朕自五令即知读书，……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及读《尚书》……朕皆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捍格。”他还下令编写《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等理学著作，使尊孔崇儒的思想及其它汉文化得以在清初继续发展。

同时，清初统治者对于明末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天文、数理、地理等知识，也采取客观态度。如关于历法的制定、钦天监的管理，就先后任用汉人杨光先、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等执掌。历法也是通过比较，最后选定西洋汤若望的《时宪历》。康熙帝曾拜西洋传教士南怀仁、张诚、白晋、徐日升、安多等人为师，虚心向他们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其认真、虚心的态度，连传教士们都感叹不已。白晋曾说：“康熙皇帝令人难以置信地深切注意并细心地从事这些研究工作。尽管这些原理中包含着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我们进讲时也不够注意礼节，但皇上从不感到厌烦”。“他说对于刻苦学习科学知识也从不感到苦恼”。在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十月谕西洋传教士利类安的圣谕中，也表明了他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视，如云：“尔众西洋人内，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系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除会技艺人留用外，其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断不姑留。”

正是在这种君主倡导、政治宽松的客观形势下，清初地理学才呈现出中西交融发展，互补长短，甚至出现了学习西方地理学更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思想。

经过清初近百年的发展，到雍、乾以后，清朝统治者的地位已相当巩固。清朝在国家政治文化策略上，便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从自康熙时即已开始的皇朝礼俗与耶稣会教义礼法的争论，这时已经公开化。康熙虽对罗马教义不满，但在多次诏谕中，仍有袒护教士的倾向，以图利用他们的科学技术才能，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丰富人们的文化知识。而到雍正即位后，对于已危及皇权尊严的天主教及其传播者，即采取了严厉措施，将传教士驱逐出中国，不允许他们再在中国活动以伤“风俗”。雍正元年、二年，多次下达谕旨严禁天主教活动，雍正七年再次申令查禁，

《四库全书》史部卷一百六十九《诏令奏议》。

《四库全书》史部卷一百六十九《诏令奏议》。

《朱批谕旨》载雍正七年湖南巡抚赵弘思奏疏云：

一、……大学士马尔塞等寄信，奉上谕：“近闻西洋之人，外省府县中，尚有潜藏居住者。本地无赖之人，相互往来，私从其教。恐久之湮染益深，甚有关于风俗。钦此。”臣已严饬各属，昼夜查报，倘有潜住之人。臣当遵旨委官押送澳门安插。

正是在雍正时期这种对西洋传教士的严查禁止情况下，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来华要求通商、通使，遂被清朝以“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回绝；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英国再次提出要求，仍被依“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而断然拒绝。这样，就进一步走上闭关自守的道路，隔断了中国与外国文化的交流，使清初逐渐发展起来的西方地理学，成了无源之流而渐次枯竭。

在推行闭关政策的同时，清中期，尤其是乾隆时期，对汉人、汉文化也采取了高压政策。清代对汉人、汉族文化，虽然一直标榜“满汉合一”、“满汉一体”。但实际上，无论在官职任用，还是待遇上，都有“右满而外汉”之别；朝廷大吏虽满汉兼用，汉人却任事而品低，满人则品高而权重，此外对于满人还有许多特权。总之，满清统治者对汉人从一开始就采用了怀柔、利用和惩处并用的政策，尤其是对待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知识分子，一方面拉笼、利用，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限制他们不得危及满清统治。从清初康熙网络文人学士开修《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大型工具书和类书，同时，又大兴庄廷珑《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等文字狱，到清中期乾隆时，继承前代之法，实有过之无不及。乾隆时文字之狱层出不穷，惩罚更严，告奸亦盛，如御史曹一士指出当时文网的严酷说：

比年以来，小人不知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

乾隆时也广罗学士，组织了大型类书《四库全书》的修纂，以及其它重要著作的纂修（如《清文鉴》、《明史》、《平定准噶尔方略》、《大清会典》等），也多次行谕征集民间藏书。但是，清政府对于这些书籍的处理却有一系列明确的规定，即对于所有不利清朝统治者的书籍，尽行销毁。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八月谕令曰：

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概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

据乾隆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称，当时江西一省收缴应毁禁之书共有8000余部；浙江省在《四库全书》告成之年，先后共缴奏图书538种，13862部；江西、湖北、广东3省被全毁、抽毁书籍、书版达2929种；乾隆四十三

上海点石斋光绪十三年石印本第57册。

《乾隆敕谕》。

《嘉庆敕谕》。

上海点石斋光绪十三年石印本第57册。

萧一山：《清代通史》（二），第44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年江南省亦毁书 2678 部等。

同时，清统治者明确反对士子过问政治。如乾隆在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中说：“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而且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清中期在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和诱导下，当时学者的学术研究只能走向脱离实际和埋头于古纸堆中考据的落后方向。也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考据学和沿革地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并与前期那种中西交流、思想活跃的局面产生了强烈对比。

鸦片战争后，面对列强，为了御侮护尊，富国强民，清政府被迫面向世界，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 19 世纪 60~90 年代的“洋务运动”，通过译书、办厂、延聘外国技师、留学等方式，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知识，光绪时又试图进行变法“维新”。在这种“开放”的国策下，又出现了大量引进、推广西方科学技术的局面，地理学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手段，当时最受人们重视，使很多外国地理知识、思想很快传入中国。同时，作为传统的中国古代地理学仍在发展，但一些有识之士，也面对当时的国情，再次提出了注重“经世致用”和加强边疆地理研究的新方向。

总之，清末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当时清政府的“开放”政策，使地理学再次呈现中西交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表现出不同于前面两个阶段的特色。然而，还应注意到，洋务运动始终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只试图借用西方先进技术来维护落后的封建统治，而不积极进行教育改革等治本措施，这就大大延缓了清末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和利用，以及对中国传统旧文化的改造，使中国在地理学方面开始落后于基本上同步发展的日本。

综上所述，清政府不同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方针（尤其是文化方针），对各个时期的地理学发展起了很大的导向作用，直接影响了各时期的地理学研究方向、成果、特点等的形成。

2. 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有着 5000 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它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科学技术方面，自上古至明代，都形成了自己一定的传统体系。作为中华文明的主体，它必然对后来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清代文化的发展有着直接的深刻影响。在地理学方面，更是如此，古代的传统地理学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直接影响着清代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例如：西晋裴秀确立的以“制图六体”为特点的中国古代地图制作方法，经裴秀《地形方丈图》、唐贾耽《海内华夷图》、宋《禹迹图》（石刻），到元代朱思本《舆地图》、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等的发展、推广、普及，已成为中国古代地图制作的主要方法，而这种制图方法和有关理论直接影响到清代地图的制作体系。尽管清初曾采用经纬度法制图，但直至清末，大量地图还是采用这一传统方法制作。如清初朱约淳的《阅史津逮》、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道光年间严如煜的《洋防辑要》、俞昌广的《海防辑要》

等书所附地图，无不受中国古代制图法的影响。清同治年间邹世诒编绘《大清一统舆图》时，虽然采用清初实测地图的经纬度制图方法，但仍并用“计里画方”方法。清末（光绪）会典馆关于各地编制地图方法的规定中，也是既提出了各省画方的比例，又要“酌用圆锥外切之法”。所以，当时的各省地图集基本仍属“计里画方”系统的作品，多数省的图集是以方格加绘经线构成制图网的：方格横线注以纬度，经线以北京起算注以经度，而方格的纵线则不加说明。表现了古代传统计里画方法影响的深刻。

此外，中国古代地图制作中的山水画式地图、针路图、历史地图等系统的地图制作方法，也影响着清代的制图思想。如清代的《长江图》、《长江万里图》等，就是深受古代山水画式地图的影响，属于该系统的地图（或称图画）。1956年章巽先生发现的清初古航海图（69篇），则是与以明《郑和航海图》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针路图体系相合的针路图。清代李兆洛的《历代地理沿革图》、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等历史地图，在古今地理内容表现上，则完全继承了唐贾耽所开创的“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的“朱墨套印法”。既用计里画方法，又用经纬度法，迭加朱墨套印，进一步增强了历史地图的科学性。

总之，中国古代传统的地图制作方法，在清代的地图作品中，几乎都有继承和发展。

在地理著作体系上，以《汉书·地理志》为代表的正史地理志系统；以唐《元和郡县图志》、元《一统志》为代表的一统志系统；以《水经注》为代表的水道著作体系，以及地方志体系等，都在清代地理著作中有所继承和发展。如清代纂修的《明史》中对《地理志》的保留；清《一统志》的反复修纂；《今水经》、《水道提纲》、《西域水道记》等对《水经注》著作方法的模仿；大量地方志的出现，以及有关方志理论的讨论，都可看作清代地理学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例证。

在地理思想上，中国古代将地理学作为史学的附庸，并用它来直接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如汉代《淮南子·泰族训》中所说：“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因此，中国古代地理学历来重视记述各地基本人文、地理状况。这一基本思想也影响到清代。清代学者强调地理学应“经世致用”，以及清廷对地方志编修的着力倡导，也都与此传统思想有关。

此外，自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以政区沿革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传统地理学（《汉书·地理志》以降，至唐杜佑《通典》、宋《资治通鉴》胡三省地理注等），也直接影响着清代地理学者对沿革地理的广泛关注（辑佚、考释、补作等）。

在思想方法上，与西方的重理性、实验，强调严密的逻辑思维，注重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科学观念相反，中国古代大多数地学著作都是重直觉，重经验，忽视对自然科学原理的探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如阮元对西方地球观在中国的传播中出现的不同观点，认为是因为西方

〔日〕海野一隆：“广舆图的反响”，《大阪大学教养部研究集录（人文、社会科学）》，第23辑。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25～28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章巽：《古航海图考释》，海洋出版社，1980年版。

〔日〕海野一隆：“广舆图的反响”，《大阪大学教养部研究集录（人文、社会科学）》，第23辑。

学者“强求其所以然”而导致“其法屡变”，无所底止。而大力推崇中国古代学者不求其“所以然”的妙处，他说“良以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故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并得意洋洋地说：“但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之终古无弊哉。”正是这种因循守旧、不求甚解的思想方法，也阻碍了清代对地理学规律的探索。

总之，作为几千年文明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给于清代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and 思想方法以深刻的影响，是传统地理学在清代保持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3. 近代科学地理思潮的冲击

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起，西方地理学即注意地理学的科学性，强调数量方法的应用和自然规律的探索，维持着将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正确方向。15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的进行，西方地理学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如瓦伦纽斯关于地理学的理论；16世纪初达·芬奇(L. DaVinci, 1452~1519)关于流水侵蚀学说；1681年英国牧师托马斯·伯内特(T. Burnet 约1635~1715)关于地球起源于灾变的学说等，尤其是在地图学方面，更强调不同投影法的应用及经纬度制图传统，使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地理学不仅以了解最新世界知识见长，更因其关于地理学的理论、自然地理规律的探索和地图制作的进步而成为当时世界地理科学的中心。

到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来中国进行传教时，西方的地理学观点、认识、思想，也随之被介绍到中国，作为一种较之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更具科学意义的地理学体系，一开始就显示了极强的影响力，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体系。在地理学理论方面，出现了以刘献廷等为代表的学习西方地理学，更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议论。此后，齐召南、徐松等在他们的地理著作中，已注意到对各重要地点经纬度数据的记录，这无疑也是对更新地理学的一种实践。

如果说，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西方地理学，对于中国明末清初的学者来说，还只是边远异国的另一种学问的话，那么，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迫使中国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时候，西方地理学已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自然科学，它对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变革则更具有影响力。

众所周知，经过地理大发现后数百年的知识积累，到19世纪中叶，经德国两位地理学大师洪堡、李特尔的努力，终于使近代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确立。此后，以德国为中心向其欧洲邻国及其他国家传播、扩散。到19世纪末，英、法、美、俄等重要国家都先后建立了地理学会或相关组织，并于1871年召开了国际地理会议，此后在1875、1881、1889等年接连召开大型国际地理学讨论会，形成了以德国地理学体系为中心的近代地理学蓬勃发展的局面。

与中国文化同属的日本，自19世纪70年代的明治维新后，积极转向学习西方。在地理学上，出现了许多取代传统地理学的西方地理学观念。如第一个留学德国的地理学家小藤文次郎学成归国后，即于1888年左右在东京理科大学开始教授西方近代地理学，此后不久，坪井九马三、山崎直方等亦分别在文科大学、理科大学讲授近代科学地理学。而且，日本亦在此期间，以不同的方式派员参加了第二、三、四届国际地理学讨论会，极大地促进了日本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到19世纪末，日本在近代地理学的认识、发展上，已

大体上与西方近代地理学达到同步地位。

可以想见，19 世纪中叶以后积极倡导“洋务”、“变法”的中国学者，面对这种从西向东普遍兴起的近代地理学，不能不要求对旧的传统地理学进行改革，事实上，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速了中国传统地理学改革和近代科学地理学的确立。除了中国学者主动翻译、编著广泛出现的各种国外近代地理著作外（如华蘅芳译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等），来自不同国度、地区的学者也向中国输入了近代地理思想方法。19 世纪末来到中国的俄国、瑞典、美国、德国等国家的考察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向中国传播了一定的近代地理学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些学者对地理科学的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康有为开始对古代传统学问产生疑问，发出了“究复何用”的怀疑，而且积极的转向各种西方自然科学的学习，其中包括地理的学习。梁启超也由“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的读书人，而后变成积极的科学探讨者；谭嗣同年轻时曾致力考据、笺注、金石、刻镂等传统学问，“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这些有识之士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影响下，开始摒弃了以“经学”为正统的观点，发出了要探讨自然科学规律的呼声。如李善兰已将对自然技术科学（“格致”）的“精而通之，神而明之”，视为“最大学问”。在这种情势下，上自清政府，下及知识界，逐渐普遍地接受了近代地理学思想，并将它列入新的《学堂章程》，终于开始了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彻底改造与更新。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 年版。

《饮冰室文集》之四。

《谭嗣同全集》（上），中华书局，1981 年版。

王韬：《蘅华馆日记》咸丰八年（公元 1858 年）十月二十二日甲子。

